

理性与疯狂 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

王绍光

社会与思想丛书缘起

历史悠久的牛津大学出版社从一九九二年起开始出版中文书籍。这或许预示着：中文这一为十多亿人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在世界文化和学术的发展中将会日益取得其应有的地位。现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又决定出版「社会与思想丛书」，使更有系统地积累有价值的中文学术著述和译述，我们希望，这对于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社会与思想丛书」将首先着重于对中国本土社会与本土思想的经验研究和理论分析。诚如人们今天已普遍意识到的，晚近十余年来中国所发生的深刻变革，并非仅仅只是相对于一九四九年以来甚至一九一一年以来而言的变迁，而是意味着：自秦汉以来既已定型的古老农业中国，已经真正开始了其创造性自我转化的进程。这一历史巨变已经将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到了中外学者的眼前，例如，乡土中国的这一转化将会为华夏民族带来什么样的新的基层生活共同体？什么样的日常生活结构？什么样的文化表达和交往形式？什么样的政治组织方式和社会经济网络？所有这些都历史性地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基本课题，同时恰恰也就提供了「中国传统性」再获新生的历史契机。可以说，当代中国的这一历史变革已经为中国当代学术文化的突破性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历史可能与坚定的经验基础，因为它一方面使人们已能立足于今日的经验去思考中国的未来，同时也已为人们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去再度重新认识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明、中国的传统性。有鉴于此，本丛书将不仅强调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同时亦重视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以张大「中国现代性」的历史文化资源。

「社会与思想丛书」的另一方面则是同时注重对西方社会与思想，以及其它非西方社会与思想的研究。如果说，晚近十余年来的中国变革标志着「中国现代性」的真正历史出场，那么，七十年代以来西方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无疑莫过于对「西方现代性」历史形成的全面重新检讨：在经济领域，所谓「福特式大生产方式」的危机不仅促发对「后福特时代生产」的思考，而且首先迫使人们重新检讨「福特式生产」的历史成因及内在缺失：在政治领域，西方现存体制与民权运动以来民主发展的尖锐张力，已重新激发西方近代以来「自由主义 v.s. 共和主义 (Republicanism)」这一基本辩论；在文化领域，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不但已全面动摇近代西方苦心营构的文化秩序和价值等级，而且更进而对「西方传统性」本身发起了全面的批判。所有这些都提醒人们：自上世纪末以来一直在学习西方的中国人，今天已不能同样全面重新检讨中国人以往对西方的理解和认识。因此，本丛书将不仅包括对当代西方的研究，而且更强调对西方历史传统的重新认识，特别是西方传统内在差异性的研究。

本丛书定名为「社会与思想」，自然表达了一种期望，即：对社会制度层面的研究与对思想意识层面的研究，应该日益结合而不是互不相干。从学科的角度讲，亦即

希望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与人文及哲学领域的研究，能够相互渗透，相互促进。通过多学科的合作与跨学科的研究去深入认识中西现代性与中西传统性，以往那种僵硬的「传统 v.s. 现代」、「中国 v.s. 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或将会真正打破，代之而起的是人类对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同等尊重和相互理解。中文学术世界为此任重而道远！

甘阳

目录

第1章 引论	1
对文化大革命研究文献的重新估价	1
中国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1
西方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3
「毛中心论」的几个假设	4
分析的框架	6
基本矛盾	6
政策冲突	7
领导层内部的权力斗争	8
社会冲突	8
精英与群众的模糊划分	10
理性的行动者和超凡魅力的消失	12
关于本书方法论的说明	13
第2章「彭、罗、陆、杨集团」的倒台	15
第3章「文化大革命」的头50天	19
又一场反右运动	19
横扫「牛鬼蛇神」	25
教育改革	30
第4章 1966年8月	33
关于工作组问题	33
十一中全会	34
工作组的撤离	35
基层的文化革命委员会	36
红卫兵的崛起	37
破四旧	38
串联：造反精神的传播	41
「南下一小撮」——不受欢迎的人	41

第 5 章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46
「文化大革命」在 9 月下旬的大转折	46
10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	47
第 6 章 党组织的衰落.....	49
学生造反组织的出现	49
武汉地方当局的垮台	50
群众组织的普及	51
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对峙	53
第 7 章 造反派与保守派.....	56
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构成	56
造反派和保守派的行为方式	61
第 8 章 「一月风暴」中的武汉.....	63
武汉的夺权斗争	63
「二八声明」	64
第 9 章 武汉的「二月逆流」	66
第 10 章 求平衡的发展.....	71
反击「二月逆流」	71
「拥军爱民」运动	74
第 11 章 派性冲突的恶化	76
保守派与造反派联盟的形成	76
划分造反派和保守派的问题	79
5、6 月间的武斗	81
第 12 章 武汉事件	86
第 13 章 1967 年的酷暑.....	96
第 14 章 大联合	103

顽固的保守派	103
桀骜不驯的造反派	105
大联合——无法实现的目标	108
毛的“伟大战略部署”	111
第 15 章 革命委员会	117
压制造反派	117
强行“三结合”	118
武汉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121
进一步恢复秩序	122
第 16 章 从「三反一粉碎」到非激进化	125
武汉反对四种右倾的运动	125
1968 年的酷暑	128
非激进化	131
第 17 章 新思潮	136
第 18 章 1969 年的派性回潮	144
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暗潮涌动	144
武汉的「反复旧」运动	147
1969 年的新思潮	152
第 19 章 70 年代初的中国社会	156
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	156
恢复旧的权力机构	159
第 20 章 批林批孔运动	161
党的「十大」及其对地方政纲的影响	161
武汉的批林批孔运动	163
遏制激进主义	168
第 21 章 邓小平的复出与 1975 年的武汉局势	172
第 22 章 「文化大革命」的最后篇章	177

文化革命派的反击与武汉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77
造反派夺权的最后一搏	181
尾声	185
第 23 章 结论.....	187
「真正的信徒」还是「理性行动者」？	187
超凡魅力的领袖气质之剖析	190
超凡魅力的消失	196
又一次「文化大革命」？	200
后记	203

第1章 引论

人们均认为，文化大革命（1966—1976）是 20 世纪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这场运动自 1976 年结束以后已过去许多年了，但它仍然在影响着千百万中国人，无论他们个人是否曾经历过这场大风暴。比如说，在 1989 年的抗议运动中，文革的问题就一再冒了出来。就像法国大革命一直是法国的政治生活中的议题一样，文革这个问题很可能永远留在中国政治中。许多人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了解这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产生的原因、过程和后果。的确，文革为剖析中国政治的进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因为它是一场危机，正是在危机中，一个政治制度的本质、长处和弱点最容易原形毕露。

尽管文革很重要，而且已有大量的文献对之进行探讨，但我们对文革的了解依然是很肤浅的。在我看来，对于理解这场动乱特别关键的一个方面被忽视了，那就是大多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感受和行为以及他们与政界人物的相互作用。这种忽视是致命的。因为文革最显著的特征正在于它关系着千百万人，所以，如果不涉及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便无法对其作出充分的解释。

对文化大革命研究文献的重新估价

中国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如今，所有中国人都谴责文革，讲述他们在此期间所遭受的痛苦经历。他们认为，既然文革是一场灾难，就得谴责那些应为它负责的人。许多人相信，文革完全是阴谋的产物。有些人认为这场全国性的灾难而怪罪林彪和「四人帮」；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毛泽东应对长达十年的黑暗岁月负责。但是，在很长时间里，文革领导人的做法和他们的总体目标是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内部意见不一之处很少，这一点却被人们遗忘了。如果对中国已经过去的这一事件进一步坚持历史的精确态度的话，那么很快就会发现：千百万人遭受痛苦正是基于许多个人所做出的无以胜数的错误决定和行动；多数文革的牺牲品也在某个时间，以某种方式使别人成了牺牲品。因此，不能像中国人现在这样把责任向上级（最终是毛那里）一推了之，以表明自己的清白。并非所发生的每件事都是毛泽东的神奇领导品质的产物，它们也源于激烈的派性斗争。为什么许许多

多的人积极投身这场运动？为什么那些自称是毛泽东的真心追随者的人们最终分裂成敌对的派系？这些问题很少有人提出并做出基本的解答。

中共也不愿意去触动旧伤。在《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中共称，文革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一场内乱。同时，也承认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应对文革的严重「左」倾错误负主要责任；中国的政治体制在主要领导人手里集中了过多的权力，因而易于产生个人专制和个人崇拜，因而也就没能防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并监督其进行。决议几乎没有怎么讲群众在文革中的作用，只是含糊地提了一句文革脱离了群众。然而，人们不禁想知道，假如说文革脱离了群众的话，是谁构成了这样大一场群众运动的社会基础呢？

更有意思的是，不知出于甚么样的理由，那些研究文革的中国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也很少注意这场运动的群众基础。但是，数以亿万计的人卷入了文革，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更重要的是，文革期间被激化了的派性斗争在许多地方和单位仍然存在，并继续对目前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消极影响。

1984年6月，中共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国范围展开反对派性的教育。与此同时，准备了好几本小册子并广为散发，这场教育的主题就是：文革不是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那么什么是真正的群众运动呢？推论是这样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不应该是「单个个人的活动，而是全民的需求和必然性的自发的不可遏制的表现」。而为什么文革又不算是真正的群众运动呢？理由是，文革不是「全民需求和必然性的自发的不可遏制的表现」。这样，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这里成了千篇一律的教条。这叫「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吗？恩格斯曾经说过，无论历史「体系」（比如他和马克思的体系）多么出色，「所有历史都必须重新研究」，这句话大概已经为人们所淡忘了。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未曾有过这样的意图，即只有那些反映「全民需求和必然性的自发的、不可遏制的表现」才算是群众运动。相反，恩格斯倒是说过，任何涉及大多数人的这动都不应看作「单个人的活动」，而应理解是「全民需求和必然性的自发的、不可遏制的表现」。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对文革的研究也就必须涉及其群众基础，而不是去否认它是场群众运动这个事实。

「三家村」成员中唯一的幸存者廖沫沙似乎对文革理解得更深刻一些。他指出，对文革的普适的解释，与马、恩和列宁曾强烈抨击过的旧式历史理论一样，存在两个缺陷。他们充其量只考虑人的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不去考察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也不去探讨人民群众的所作所为。廖并没有做出他自己的解释，而是引用马、恩的话提醒人们：有关文革的一些关键问题还没有提出，几个毛主义的高层领导人如何能够把整个中国引向长达十年之久的动乱？为什么两极分化的中国老百姓会彼此斗争？什么是关乎存亡的利益所在？不回答这些问题，文革是无法理解的。

提出恰到好处的问题比提供一打无关要旨的解释更为重要。所以，尽管廖沫沙对

自己提串的问题未予解答，但他对我们理解文革所做出的贡献要比许多研究文革的中国学者大得多。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常常有意或无意地歪曲马克思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当局和中国学者们回避文革的群众基础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不得不排除对往事重新争论的每一个可能。文革的群众基础的确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以至即使是对它在理论层次上进行探讨，看来也可能导致社会团体间新的冲突。为保持社会秩序和全国团结一致，这类问题最好留给后代来讨论。现在，人们应该「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和「算旧帐」。

西方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除了最近的几本着作以外，西方学者也忽视了文革的群众基础问题。

有一个时期，一些历史学家在解释复杂的政治事件时往往满足于把它们归诸领导人的「心理癖好」、「本能」或者「坚定的意志」等等。但现在，社会科学家们基本上放弃了这种解释历史的「伟人决定论」，因为历史现象应该用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与过程而不是靠领袖个人和行为来解释，因为领袖本人也是受这些条件和过程限制的。但认识到旧理论的局限是一回事，在新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则是另一回事。在许多文革文献中，依然存在「伟人决定论」，因而对它的探讨也主要集中在诸如政治阴谋、权力斗争和某些关键人物的沉浮之类问题上。尤其是毛发动这场动乱的动机也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在这些问题上，提出了一些主要论点。

在有些人看来，毛发动文革的基本动机是要改造人的灵魂使之适应于集体主义的社会制度，从而不给个人主义留有余地。有些观察家则持权力斗争说，而且在这一学说范围内的观点也有很大差异。有人认为文革仅仅是毛和刘之间的一场权力竞争，或毛的潜在继承者们之间的角逐。据此，文革被视为「毛的大清洗」或「毛的持久清洗」。甚至有人认为，文革的目的「不只是要清洗，而且实际上是要在中央、大区和省的党的机构中留下永久的印记并保证不再产生毛的对立面，因而造成了一种恐怖局面」。不过多数持权力斗争说的人并不这么极端。他们认为，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目标和达到最终目标的途径和策略的根本分歧，是毛与刘不和的主要原因。只是到后来这种分歧才与权力斗争纠缠在一起，以至权力斗争最终反倒使政策上的冲突看不清楚了。

许多观察家还认为中国在政治上的变化是国外压力的结果。有人认为这尤其可以说是毛对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升级的反应或害怕，而这种军事升级可能威胁到中国革命。文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激起一种「防御心理」和全民参与「修正主义、帝国主义两个恶魔」进行斗争的决心。这样看来，文革是毛使中国面对可能发生的与美国的装冲突的

一种手段。

心理学家们也试图对文革作出解释。一些人认为认知不一论可能有助于解释毛在中国历史的关键运动中的动机和行为。另一些人则指出，毛想使自己「万寿无疆」，这正是他发动文革的动机。毛害怕革命失败，或无法实现他的理想，因此文革是一种使革命永存的追求。

「毛中心论」的几个假设

前面提到的对文革的解释可以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全都是「毛中心论」的观点。就算它们很准确，也顶多就是解释了为什么毛决定发动文革这一点，而没有说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它的时间跨度有十年之久。持「毛中心论」的人似乎还没有认识到，一场涉及千百万人的运动决不可能完全由其发动者来操纵。既然他们假定，对发动者最初动机的研究足以解释像文革这样一场复杂的群众运动，那么他们的学问也就必定基于以下三个假设（在我看来，它们无一合理的）：

1.发动者不仅对于他要达到的目的是明确的，而且也有把握制订一个实现其最终目标的总体计划。否则的话，如果发动者没有开展运动的详细计划，对最终要达到什么目的也不太明确，那就无法保证运动的成功。如果运动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而它又总是偏离发动者最初的计划，那么显然光分析发动者的动机是不够的。

2.发动者有一种神奇的权力，能够保证其宏伟的计划如他希望的那样实现。发动者不能独自来推行其计划；只有他控制下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才能执行他的决定。过去二十年中，学习政治学的学生们知道，决定的实施就像决定本身一样可以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参加决定实施的人也可以改变决策的方向。要研究一场伟大的运动，如果运动发动者不能按他自己的意愿完全操纵运动，那么只注意发动者本身对于一个好的分析者来说似乎是不够的。

3.大多数人可以很好地理解其领袖的意图和循序渐进的计划，并愿意全心全意根据领袖的指示来执行计划。换句话说，追随者与领袖之间是单向的沟通，前者对于后者作出的指示表示接受并原封不动地付诸实施。如果说这种单向沟通只是一种神话，而用动态的相互作用的模式来描述追随者与领袖之间的关系则更为现实，那么在研究这场运动时就应该考虑人民群众在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否则，只注意领袖的动机和行为的 research 是不适当的。

上述三个假设中，最后一个当然是最重要的。因为，一个领袖能否事实上严格根据他的初衷为运动制订出一个逐步实施的总体计划，能否操纵其实施过程，完全是由领袖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如果群众只是被动的工具，领袖当然就能够随意

行事，并在运动的任何阶段都能把他的意志强加于其崇拜者；否则的话，领袖与群众一样，只是一出戏中的一名演员。因而，无论领袖的作用多么重要，让他吸引全部的注意力是不合理的。

「毛中心论」明显或不明显地有这样的假设，文革之中领导人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领袖个人魅力型关系。毛是一位个人魅力型领袖而中国人民是他的盲目追随者。对群众强烈、有时过分的参与文革所做的解释是，这些活动是在最高领袖的鼓舞和操纵下进行的，它们并没有对文革的进程产生真正的影响。既然文革是失去控制的或自发的行动这一可能被排除了，文革期间的群众行为当然就不必解释了。

在社会运动和集体行为理论中，强调某些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品质，并用它来解释他们能够成功地进行动员和保证其追随者的高度一致和忠诚，是个普遍的做法。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首先把个人魅力的概念运用到他关于权威的理论建构中，其中包括传统型、个人魅力型和法理基础型统治。他指出，个人魅力是「某个人人格的一种质量，它使这个人区别于别人，并使其具有超自然、超人，或至少是特别超群的力量或品格」。韦伯还认为，「在个人魅力真正存在之处，承认这种品格并做出相应的行绩是那些负有个人魅力使命者的责任，在心理学上这种「承认」是产生于狂热或绝望和希望的、对拥有这种品质者的一种完全的个人奉献。」

自韦伯以来，个人魅力这个概念就被不加区分地用来描述受人爱戴的领袖的出现。还有就是坚持认为凡存在领袖个人魅力型关系的地方，领袖可以在他的追随者中制造诸如奉献、畏惧、尊敬之类的感情，而且首先是对他的盲目信仰。换句话讲，在一个个人魅力型领袖的忠实追随者眼里，领袖说什么就是什么，目标由领袖确定，手段由领袖选择。领袖可以随意地改变追随者，以至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不会失去其追随者对他的支持。因而，个人魅力论排除所有的理性行为。

个人魅力论的总体框架，尤其是对待文革的毛中心论的态度，其可靠性需要重新加以探讨。如果说中国人民群众仅仅是高层精英人物尤其是毛的被动工具的话，那么文革应是一场能加以控制的运动，人民应一致团结在毛的周围来反对毛的敌人并遵循他的战略部署走向胜利。可是，文革事实上失败了，它的进程遵循的是一个相反的逻辑。从本书中将会看到，文革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控制，违背了毛的意愿，不断出现「偏差」「逆流」。毛的确发动了这场大动乱，然而当他放手发动起来的力量造成了失控的局面时，他的一切努力也就转向了「急救」。刘少奇对文革初期的评价是正确的：一场运动有它自身的逻辑，它要按照自己的而不是你我的逻辑向前发展。毛无疑是个重要因素，但他的决定权也是有限的，因而他并没有起到许多文革观察家们所认为的万能的作用。对毛的权力最有效的限制就是群众的所作所为。

个人魅力和毛中心论假设，在文革中真正的信仰者的特点是没有自我利益、行为没有理智、对领袖言行的不加鉴别以及对领袖的盲从。但从本书中可以看出，至少在

文革中，这种假定存在的真正信仰者根本不是盲目奉献的追随者。相反，他们使领袖随着时间推移根据客观情况调整自己的计划极端困难。尽管毛有他的「个人魅力」，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好像他生活在一个没有国家、社会和各种对抗的社会团体和人群的空间里，好像他行事没有任何限定和条件。把毛当作文革这一历史事件的唯一变量，是无法理解的，可是直到现在仍然没人尝试把其他变量考虑进去。

分析的框架

本书认为，文革并没有按照任何人的意愿一帆风顺地发展。虽然是毛发动了文革，但是高层人士、老百姓和中层当权者，出于各自的动机都参与了文革。因此我深信，如果不着眼于绝大多数人的行为，文革是不可能得到解释的。正是出于这个理由，本书研究的目的就不仅仅是要说明官方的政策是如何产生和变化的，更主要的是准备集中讨论如下问题：为什么千百万人参与了这场运动？为什么他们的行为往往表现为一定的而不是别的方式？他们与「最高统帅」毛泽东的关系如何？他们是怎样影响文革的过程和结果的？等等。

基本矛盾

在某种程度上，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基本矛盾几乎存在于现代每个国家之中。平等和经济增长从本质上讲都不错。然而，哲学家和政治家们发现，在理论上尤其是实践中，把这两种价值置于同一个体系中是困难的。为了加速社会的发展，需要物质刺激和高报酬来鼓励生产和成就，使一切服从于生产的要求，其结果势必会增强公民中的不平等，社会关系的过于商业化，以至最终权力集中在一小部分经济上富裕的阶级手中。为保持平等，不断进行的再分配就必然朝才能较小幸运较少者的方向进行。换句话讲，只有通过一个中介状态才能实现。很多人理由充分地认为，这种平均主义将会限制市场，扼杀个人的自由，阻碍人们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因而将损害经济效率的实现。经济学家阿瑟·奥昆（Author M. Okun）发现，社会总是在面临着这样的选择：以效率为代价提供平等多一些，或者以平等为代价带来效率多一些，他称这种二难选择为「我们最大的社会经济权衡」，对平等和效率的任何一方更为优先都是不恰当的。在他看来最佳的选择就是妥协。从理论上讲，社会平等与经济增长的最终协调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很多情况证明可以做到这一点。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这个二难问题从未得到解决，使所有的社会团体都满意。要在这两种价值观之间达到一种巧妙的平衡似乎是项很难的政治活动。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探寻平等和追求发展两者之间的基本矛盾给社会主义中国提供了内部政治的动力，并产生了最终导致文革的典型特性和压力。

1949 年共产党执政时，与他们民国和晚清的先驱们一样，他们也决心使国家强大起来。如果那时盛行的口号「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说明了一切的话，那么中国马上就有两个宏大的目标需要实现。一个是获得经济技术力量以使之成为发达、强大的工业国家；另外一个是一个基于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公正理论的价值观的社会。但是中国是在缺乏工业、有文化的人口和民主传统的情况下转向了社会主义，而上述这些在波兰尼（Karl Polany）看来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然而，国家面临可怕的物质匮乏，要实现高速现代化和平均主义式的社会转型这两者间的矛盾也就显得十分突出。至于经济增长和「极左」理想主义的过分关注究竟如何走向了极端，1958 年—1959 年的大跃进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因此，这两种价值之间孰重孰轻的紧张关系在中国比在许多其他地方更可能被放大。没有对这个加剧了的基本矛盾的鉴别，文革的起源就不可能得到理解。

这个矛盾是在三个层次上展开的：错综复杂的政策侧重点的变换，领导层的分化，无所不在的社会冲突。

政策冲突

尽管所有中国政界领导人都一致认为应该增强国力和增加财富，但他们却无法回答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在通往两个最终目标的道路上，要促进持续的发展，究竟什么是正确的途径和策略？他们都觉得迫切需要动员个人和社会团体的能量、能力和创造性，但对什么是激发和实现人的潜能的最佳途径他们常常意见不一，也就是说，中国是应该通过动员群众，还是通过狂热的厉行节约，还是通过通常的经济增长和物质刺激来求得发展。这样在决策者们中间就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取向：平均主义和精英统治，前者强调「红」而后者强调「专」。但这并不像有些人所假定的那样，在中国领导层中有两个截然分明的「红派」和「专派」。比如说，毛泽东尽管极为推崇平均主义理想，但还是为了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默许和容忍了权力地位等级制度的出现和入差别的存在。而刘少奇也并没有赞成不顾社会公正而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领导层内的分歧只是程度上而非原则性的问题。在这里，重要的是，至少到 60 年代中期，整个中国领导层已经充分表现出他们无法同时推动平均主义和经济发展。中国的发展任务之间内在的矛盾一直在彼此冲突着，同时又受环境的支配带来了政策上的矛盾。在某些时期，强调「精英统治」原则，同时却维持甚至强化了社会不平等；而在另外的时期，则把平均主义原则放在优先地位，未能使个人和社会团体充分发挥其主动性。还有，

在同一时期内执行互相矛盾的政策也并不罕见。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里都可以看到政策的转变和不兼容，但是在中国，似乎从一个主张到另一个主张的摇摆出现得更为频繁，政策上的不一致往往更普遍。

领导层内部的权力斗争

经常发生的政策上的争执不仅其本身意义重大，而且也在中共高层内部埋下了不和谐的种子。这种政策上的分歧逐渐与权力斗争纠缠在一起，以至权力斗争最终使政策冲突的重要性显得模糊不清。接班的问题则使高层的政治对抗更加复杂化了。

在中国这样的集权主义的政体中，最高领导人的接班问题对于潜在的继承人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高级领导人不是靠选举，而是现任领导人挑选的。在集权主义政体中接替最高职务，既不像传统政体那样，权力更替靠世袭；也不像民主政体那样，为领导职位的竞争提供了一种机制，而是既不靠世袭也不通过法律。对野心家而言，最好的选择就是抢先获得有利于自己的接班人安排；最坏则是阻止其他候选人取得领先地位。因此，领导层内部的争斗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种争斗不仅使潜在的接班人之间互相对立，同时也会引起未来的继承人与现任领导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事实上，正是最高领袖处于政治漩涡的中心。

毛就是这样的最高领袖，到 1966 年时，他形成了一种防卫心理。他的真正的或者想象的内外敌人使他得出这样的结论：除非他做出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否则的话，他的权威就处于危险之中，他的社会主义发展的理想在他死后就会遭到背叛。所以他决定通过发动文革来从内部「炮轰司令部」。

政策冲突和权力斗争解释了为什么毛决定发动文革，但不能解释为什么千百万人参与了这场运动，为什么他们表现为这样而不是那样。所以，关键是要考察一下上面提到的基本矛盾所产生的社会冲突。

社会冲突

作为社会的两个组织原则，精英统治和平均主义取向各有其特殊的组织目标，各有不同的手段，并有明确的社会力量的支持。因此，任何政策上的转变必将使一些人感到满意而同时加重另一些人的不满。政策倾向上侧重点的复杂变化，使不同利益的社会团体感到他们彼此总是处于对抗之中。对于地位、权力和稀有资源的估价或要求，或明或暗地存在着持续不断的冲突，其中冲突各方的目的不仅是要获得所期望的东西，而且还要孤立、伤害或消灭对手。这正是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冲突」。由于几乎所

有的重要资源在中国都是有限的，所以文革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尽管形式隐蔽，社会团体内部的竞争还是相当激烈的。

在文革前的中国，有三个重要的社会分化：

精英与群众间的垂直冲突 1949 年，中共获得了政权。7 年以后，生产的私有手段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那时中国领导层宣布，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关系类型彻底消失了，原因据说是：国有经济将会带来利益上的一致。然而，实际上，尽管私有制已经消灭，劳动分工的等级结构仍然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存在。劳动的经济分工使有些人从事计划和管理工作，而大多数人从事的是不太强调智力的更为平凡的日常工作。那些处于管理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社会分配和再分配地位上的人总的来说获得了更多的报酬。由于等级制度的存在，对于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来说，对那些掌握生产数据的人建立民主的政治控制是很重要的，尽管这样做不太直接，但却是保证以平等的权力运用生产数据的唯一途径。简单地用一个占优越地位的阶级取代另一个阶级并没有什么意义。不幸的是，中国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就建立起了等级制度。这种不民主的权威结构的存在很容易导致支配与服从关系的产生。

精英之间的水平冲突 由于在文革前的中国社会里精英统治和平均主义都在发挥作用，也由于共产党一开始就缺乏有经验和技术熟练的干部来管理、协调和掌握经济发展，中国的精英阶层内部在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前几十年就产生了分化。由于有「知识资本」，像资本家、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这类的旧精英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下来并被委派到新政权的管理和技术岗位上。他们是发挥职能作用的精英，以管理产品和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根据精英统治的原则，这些职能精英得到比普通公众更多的报酬。另外，他们的子女由于他们的能力和从父母那里获得的成就动机一般说来在生活机会的竞争中要占有优势。

而平均主义则要求建立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国家能够对那些利用自己的技能、教育或个人品质试图对社会报酬提出不适当要求的社会或职业团体不断加以控制。把平均主义付诸实践导致（的确也需要）国家权力来控制社会资源的分配和再分配并限制个人的行动自由。这样，政治精英出现了。政治精英不同于职能精英，他们是典型根据政治可靠性来擢升的。一般说来他们是从那些在革命军队里服过役或者在解放前与国民党进行地下斗争的人中间选拔出来的，他们出身低下，很多就是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的过去的农民或者产业工人。与职能精英相同的是，政治精英们也比他们的下属要获得相对高的报酬。但在许多情况下，党的基层和中层干部们却没有同一地方的白领专业人员获得的报酬多。而且，尽管他们的子女比其他任何社会阶层的后代都更多地得益于新政权的阶级优越论，但总的说来竞争不过职能精英的子女。

由于在权力基础、作用、家庭出身和对子女前途的期望上的差异，职能精英与政治精英之间或者说旧精英与新精英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人民共和国的前 20 年里，从未

得到缓和。处于支配地位的政治精英千方百计使职能精英屈服于自己而同时又想利用他们的才能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其中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划成分。每个中国人都贴上了一种阶级标签。作为根据家庭出身来给人划分等级的结果，职能精英们被强迫给予了政治上的低下地位，而不管他们可能在其它方面得到什么。由于有着可观的权力资源——知识和技能（这正是政治精英们总的来说所缺乏而又是社会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职能精英们当然不愿意使自己屈服于政治权威。1956 年—1957 年的「百花齐放」运动就表明了他们要求重新分配权力的愿望。

群众之间的水平冲突 文革以前的中国百姓也不是同质的。群众基本上分为三个类型：积极分子、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这种划分是经济发展上的群众动员手段的副产品。像中国这样一个贫穷的国家，提高生产率的一条途径就是动员那些未经利用的劳动力。但由于贫穷，用来作为报酬的资源是有限的。对人民共和国来说，当生产数据的再分配完成以后，相对廉价的物质刺激的主要资源几乎枯竭。于是新政权不得不诉诸廉价的精神奖赏（比如，评为「积极分子」或者入党、入团）以代替昂贵的物质报酬，这样，特别对那些照官方的阶级成分并不「黑」的人来说又增加了一重标准，从而使对人的划分标准更为严格了。这样做的代价出人意料地高：它分裂了「人民」。只要依靠动员手段和社会生活的政治化，积极分子和落后分子之间的差别就可能继续成为政治上最为显著的社会结构裂缝。这样做的另一个结果是积极分子与其上级之间的主—客关系的形成，关于这一点，安德鲁·沃达（Andrew Walder）在他的近著《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一书中作了描述。

精英与群众的模糊划分

从结构上讲，在这三种社会冲突中，精英与群众之间的垂直冲突是最根本的。从长远来看，政治精英和职能精英之间、积极分子和非积极分子之间的划分只是个暂时现象，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的成熟，它们应逐渐消失。在苏联和其它东欧国家，自 60 年代以来政治精英和职能精英之间的差别正在逐渐消失。尽管到 60 年代中期，中国没有消灭这种差别，但迟早会消减它。就积极分子与非积极分子的划分来说，需要指出的是，只有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精神和政治动员才是适时的和有效的。当其它机制的价值超过了动员手段时，主—客关系网的重要性就会下降，从而使精英与群众在结构上的划分变得更引人注目。

然而，不管将来可能有什么样的发展，大多数中国人在文革前夕还没有认识到精英和群众在整体上的结构划分，相反，这一基本的社会划分被忽略了，并基本上被其它的分歧所掩盖了。

沿袭下来的分歧 划成分等有关政策作为政治精英迫使职能精英就范的工具，更突出那些过去沿袭下来的分歧。当人们进行社会对比时，就会发现遗留下来的东西作为参照系的确有它的意义。

总的说来，社会对比依据三大标准：权力（政治的）、声望（社会的）和财富（经济的）；在三个方面进行：一个人的位置如何是相对于他以前有什么地位，相对于别人有什么地位和相对于一定的平等规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时间上的历时比较会使那些阶级成分「红」的人感到高兴，但却使那些阶级成分「黑」的人感到不安，因为当前者走上坡路时，后者却在走下坡路。上升者当然愿意维持现状，而降降者则希望变革。

但同时比较给每个人都带来了复杂的情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收入、政治影响和声望是一致的；人们已经注意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分解」却很可能发生，即权力、财富和声望是「相背离」的。比如在文革前的中国，出身「黑色」家庭的人政治地位较低但有相对高的收入和教育水平；而那些「红色」家庭背景的人则为他们的阶级成分感到自豪，但极高的地位却几乎不能与自己的实际物质地位相匹配。社会地位诸标志的分解是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果，这种改造通过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了人们普遍追求的价值在分配上的非积累方式，这种结果产生了一种危险的心理后果：它使所有社会团体或多或少产生了对社会结构的不满情绪，原因很简单，人们往往希望有某种程度的共时社会分化，同时又试图使这种分化实现他们所希望的一贯性。

社会比较中规范的方面与其它两个方面同样重要。由于不断地和系统地灌输马列主义原则，平均主义的价值观在中国得到了广泛认可。但究竟「平等」是什么意思？不同的社会团体有不同的理解。与所有的社会一样，能力弱者往往强调结果的平等，而能力强者更注重机会的平等。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高等教育。以前没有特权的社会阶层抱怨过去特权阶层的子女有个良好的开端，而后者则谴责对红五类的优待。于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在受歧视。就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比起 1949 年以前的中国并没有表现出更大不平等，但不平等的意识也是强烈的，因为共产主义政权信奉平均主义思想。

既然社会比较是在全部三个维度上展开的，那么每个社会阶层就都可能经历一定程度的泰德·罗伯特·古尔（Ted Robert Gurr）所说的「相对剥夺」。然而，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中先进社会阶层的成员，那些「红色」阶级成分的人总的说来认为自己与由政治精英所体现的新政权是一致的。但是那些「黑色」阶级成分的人则对现状表示不满，尤其是对那些针对他们来制订、实施政策的政治精英们不满。这样，从上一代遗留下来的社会结构中的阶级界线在它的客观基础消灭以后被慢慢强化了。

保护与被保护除了沿袭下来的划分外，干群之间的主—客关系网也进一步模糊了精英和群众之间的矛盾。积极分子们由于得益于与上司的良好关系，很少去想两个阶级之间利益冲突的潜在可能性。即使是那些对精英们抱有怨恨的落后分子，他们的怨

恨也更多指向个别精英而较少指向划分统治与服从关系的赖以产生的社会结构。

直到 60 年代中期，特权阶级应未真正形成。不但政治精英和职能精英仍未结合在一起，而且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精英也未变成一个从经济意义上讲占据优势的社会阶层。中国采取了强有力的行动来防止新的特权阶级的出现，其中包括有计划地培养干部、党员的「为人民服务」意识，开展不定期的党内整风运动。这些手段，由于基于这样的假设，即权力不平等问题是表现和态度问题而非结构性问题，因而并不能解决想要解决的问题。但在 1949 年以后的十七年里这些手段毕竟缓和了精英和群众之间的冲突。

由于以上这些干扰因素，最基本的社会划分在文革前的中国社会里并没有成为最重要的在政治上相应的划分。相反，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政治精英和积极分子与职能精英和落后分子之间的冲突则是更为惊人的。

革命的不成熟条件概括起来讲，在文革前的中国，社会冲突导致了紧张、失意、缺乏安全 and 不满情绪的增长。没有一种使紧张得以放松的机制，就有可能来一场大爆炸。

但是，如果说在 60 年代中期有一场大爆炸的话，那么充其量是一次反抗而不是一场革命。1965 年，毛泽东宣称：

*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
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这是个大胆的而又错误的断言，因为精英与群众之间的差别到 1966 年还没有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的现行矛盾。尽管由于其它社会划分产生了关系的紧张，但大多数人基本上还是对事情的现状表示满意的。这就是为什么文革中大多数自发的工人运动最后会进入「死硬保守派」之列而与造反派对立起来的原因。即使那些总的说来对文革前的秩序表示不满的人也不可能成为彻底的社会革命派，因为社会不满还没有普遍和紧迫到足以来一场大规模革命运动，而且也没有形成明确的、成熟或先进的政治思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毛 1966 年发动文革时，人们的厌恶往往没有过多集中于制度之上，而是针对个别的坏人。

理性的行动者和超凡魅力的消失

在本书中，通过提供武汉文革的一部「活历史」和这十年间形成的不同社会阶层的「发展模式」，试图把社会政治分析和历史叙述结合起来，从而对长达十年的这场运动的动力作出说明。从本书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从头到尾一直充斥着算计、

代价和利益。换句话说，所有参加文革这场游戏的人，无论是中央或地方的特权阶层，还是普通百姓，「在战略上」都是理性的。还有，本书表明，在文革这场游戏中，同一层次的不同游戏者之间和不同层次的游戏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不是发生在真空之中。相反，包括毛本人在内的各种因素，都受到一些结构的和显而易见的限制。这样就会解释出为什么当文革这个妖怪变得越来越大时，毛发现连他自己也无法控制它或者把它装回到原来的瓶子中去。关于我对领袖魅力消失的理论探讨，请读者们参看结论部分。

关于本书方法论的说明

读者们会注意到，马克思的理论结构对本书的研究有很深的影响。矛盾的概念、阶级之间和派性之间冲突的概念构成了我的分析基础。但历史决不能由理论来推演。本书的研究并不是要使现实世界适应于某一个大的理论模式，它同时也运用一些除马克思方法以外的不同分析手段以便对文革作出有意义的历史解释。它采纳了阐释学和社会心理学的一些外部特点；运用了传播理论、组织理论、领导理论，尤其是社会冲突理论的语言。和乡簿(TangTsou)教授一样，我也认为，要对文革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达到有根有据的理解，采取审慎的折衷主义态度是必要的。

本书的研究主要涉及一个城市，即武汉，它是一个位于华中的有大约 300 万人口的工业城市。我选择武汉作为研究对象有三个原因：一是，我在那里长大，并从 1966 年至 1976 年在这座城市度过了整整十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是武汉文革的参与观察者。其次，我收集了很多文革期间有关当地政治的有意思的材料，而且在这座城市中我有广泛的关系，这有助于接触更多的材料。第三，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我认为武汉的文革比其他许多地方更为典型。西方研究文革的学者往往集中注意三个城市：北京、上海和广州，因为他们可以获得的所谓红卫兵刊物多数来自这三个城市。在整整十年中，北京和上海的文革受到中央当局比较严格的控制。既然这个变量比其它地方要弱得很，这两个城市的文革也就没有武汉的文革具有代表性。比如，由于中央的干预，北京的工人运动被学生运动所盖过了；而在上海，工人运动超过了学生这动，其它省份的这两种运动则纠缠在一起并互相强化。广州的文革则偏离了总的模式，例如，1967 年 7 月武汉事件后，所谓「保守势力」几乎到处都遭到摧毁，而广州的保守派则保留了下来。因为庇护他们的黄永胜（当时是广州军区司令员）与林彪一家有着密切的私人关系。

本书中的材料来自六个主要方面：我自己对那些年的回忆；十年之中我个人的日记和与朋友的书信往来；全国和地方的官方出版物；1966 年至 1969 年由群众组织控

制的全国和地方报纸；当地的档案；还有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谈话记录材料。1986年，我在武汉进行一项实地考察。由于那一年的政治宽松气氛，使我能够接触到武汉档案馆中武汉市教育局的档案和武汉市图书馆与湖北省图书馆中文革期间发行的地方小报。同时，我还与 80 位各个行业的人进行了交谈。我从交谈者那里所得到的情况，证实了对于文革前社会政治结构与文革中派性冲突这两者间的关系的见解。我的许多交谈者在武汉文革中都是知名的。他们的证言对于我建立起基层政治和武汉甚至更高水平的政治之间的联系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而所有这些材料又都是互为补充的。

第2章「彭、罗、陆、杨集团」的倒台

1965年11月11日，上海的《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署名是姚文元。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免职。这两个显然毫无关系的事件都是由毛泽东在幕后操纵的。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毛在上海而不是北京发起对吴晗的批判？为什么把吴晗当作靶子？这两件事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了解一下当时毛如何看待中国总的政治形势和他在权力体系中所处的地位。

1962年，毛呼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确，对毛来说，似乎阶级斗争是尖锐的。他估计，在农村，三分之一地方政府的领导权已被阶级敌人篡夺了。工业领域也是如此，据说许多企业已不是控制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毛尤其担心文艺界的政治状况。他断言，这个领域已经为一条黑线所主导，因此解放以来党的方针政策在文艺界并未得到贯彻。各级教育机构从小学到大学，也被认为是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宰着。

面对这种似乎很危险的状况，毛决心进行反击。于是他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目的据称是要「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毛希望这场运动有助于肃清基层干部中的腐败分子。毛还发动了旨在针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运动。1964年夏，彭真领导的文革小组（五人小组）正式成立，以领导全国范围内的大批判。同时，毛还挑选了39株「毒草」分发到县一级供揭露和批判，其中包括吴晗的《海瑞罢官》和邓拓的《燕山夜话》。

可是毛发现，他的这些努力均遭到了某些高级领导人的阻挠。虽然说学习毛的思想已成为全社会的群众运动，但毛感到他正失去对权力中心的控制。以一件事为例，党的总书记邓小平1959年以来从未请示过毛。即使是做重大的决定时，邓也很少通知毛主席。在毛看来，党的副主席刘少奇也不像以前那样尊重他了。

毛对刘和邓的不信任到1964年末进一步增强了。1964年12月，邓小平要求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有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毛在1963年就决定，以后他只考虑党和国家的战略性问题，而不再处理政治运行中的日常事务，而且毛的确也没有出席在此以前的很多类似会议，邓建议这次会议毛可以不参加。但毛恰恰出席了，而且积极领导了这场讨论。在毛看来，这场运动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但就在他要展开分析时，刘少奇插话表示不同的看法：「可能不止一个矛盾，比如说，有「四清」（政治、经济、组织和思想）与「四不清」之间的矛盾。又比如说，有党员与非党员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彼此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开来。最好

是去解决具体的问题，而不要管所涉及的矛盾的本质如何。」

刘的插话激怒了毛。第二天，毛把两本小册子带到了会议上。他对刘、邓说「这是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宪法，作为公民，我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另一本是党章，作为党的主席，我有出席会议的资格。现在，你们一个阻止我参加这个会议，一个打断我的话，我到底还有什么权利？」然后他批评刘领导的政治局和邓为首的中央书记处是两个「独立王国」。刘和邓的自我批评并没有减轻毛的恼怒，后来毛承认：正是这次会议使他警觉到了失去控制的真正危险。为了重新获得权力，他相信有必要采取不同寻常的手段。

毛选择吴晗的《海瑞罢官》作为攻击的第一个目标。吴晗不仅是一位著名历史学家，而且是彭真（他在邓小平的中央书记处中是个关键人物）领导的北京市政府的副市长，因此对吴晗的批判也就会起到一石双鸟的作用。而且它还可以加强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大批判，并考验一下北京的高级干部比如彭真是否忠心。

1965 年春，毛指示江青和她的非正式的顾问小组秘密准备对吴晗的历史剧进行批判。8 月末，姚文元完成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在 9 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尤其对吴晗进行批判。但他的这个建议并未得到多数与会者的重视。甚至当毛直截了当试探彭真「我们能不能批判吴晗」时，彭冷淡地回答说：「某些方面他当然可以批判。」可直到 10 月，北京仍未采取什么批判吴晗的举动。因此毛最终决定在上海发表姚的文章。

失去对北京控制的失落感，强烈促使毛考虑采取措施来针对一场可能发生的政变。遵照毛的指示，在林彪领导下的一个所谓北京工作组于 1965 年下半年成立了。这个工作组对北京，尤其是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工作和居住的中南海进行秘密调查。这场调查的第一个牺牲者就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他被指控暗中监视毛。第二个是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实际上他是林彪在军权上的对手。林彪成功地促使毛相信，罗不仅是一个野心家，也是反对毛的思想的阴谋家。1965 年 12 月在上海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罗被罢免了职务并遭到检举。杨和罗长期以来一直负责毛的安全。杨负责中南海，罗则被委派在毛所到之处陪同毛。对这两个「阴谋家」的揭露使毛觉得，北京不仅仅是离开了他的控制，而且也充满了政治危险，于是他决定如果不能确保他的安全就不返回北京。

姚文元在《文汇报》上的文章立即震动了北京。党中央以前曾规定报纸公开指名批判某人须经中央宣传部的同意。但姚的文章问世时中宣部并未得到通知。11 月 13 日，北京市委和《人民日报》向《文汇报》询问姚的文章背景如何，如果这篇文章得到毛的同意的话，他们就决定转载姚的文章。由于江青事先指示过防止把消息传到北京，所以，这家上海报纸拒绝提供任何有关的背景情况。于是，北京市委只能求助于他们的第一书记、五人小组组长——彭真（他当时不在北京由于没有搞清楚毛对姚的

文章的支持，彭真指示北京等他回来再说。到 11 月 20 日时，除了上海的另一家报纸《解放日报》转载了姚的文章以外，全国报纸无一作出反应，毛感到很失望，于是命令上海把文章印成小册子发到全国。

在以后的四个月里，彭在党内的地位似乎相当牢靠。然而彭做错了一件事，结果导致了他的下台。3 月 11 日，受彭真的鼓动，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通过电话质问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永直为什么发表姚的文章之前不与北京打招呼。3 月 28 日，康生把这段小插曲告诉了毛并添油加醋地说：「这表明他们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您，我们党的主席。」康的这番话激怒了毛。他绝不能容忍任何人对他玩弄诡计。因此他决心在政治上摧毁彭真和与他有关的一切：五人小组、中宣部、北京市委、二月提纲。

对高级领导人们来说，4 月是个忙碌的月份。书记处于六日至十二日召开了碰头会，政治局常委也于十六日至二十四日召开了会议，这两个会议决定撤销彭真的职务，取消二月提纲，解散五人小组，重组北京市委。4 月 24 日，后来所谓「五·一六通知」的最后方案获得通过。

十天后，政治局开始在北京举行一个为期 23 天的扩大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上，中宣部长陆定一被「揪了出来」，并被指控为与彭真、罗瑞卿和杨尚昆一伙的第四个阴谋家。显然，杨、罗、彭和陆是由于各自不同的原因遭到不幸。但他们却被指控为结成了反党集团。5 月 18 日，林彪就为什么毛对这个集团采取行动作了解释：前几个月，毛主席就特别注意到要防止反革命政变并采取了許多必要的措施。去年冬天，罗瑞卿被揭露出来时，他就与我们讨论了有政变发生的可能。这次，彭真的问题真相大白后，毛主席甚至部署力量保卫要害地方和部门，比如广播电台、军用仓库、公安机关，以防止可能发生的政变……，对我们来说，对来自内部的颠覆保持高度警惕是第一重要的，毛主席常为此焦虑而睡不好觉。

一场大清洗并非毛的目的，但清除直接的威胁毕竟是实现他的目标的必要条件。他那时的目标是什么呢？「五·一六通知」讲得很清楚：第一，「全党必须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第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清洗这些人，有的要调动职务」。

可是，毛难过地注意到，尽管姚的文章已经发表，很多人还得到了毛等人的支持，但在 1966 年的头五个月里，并没有多少人对这种新形势发展感兴趣。要取得政治上的突破，就得做些不同寻常的举动。

5 月 28 日，新的文革小组取代旧文革小组正式成立。三天以后，根据毛的命令，由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率领工作队进驻《人民日报》办公大楼，在未通知刘少奇和北京其他高级领导人的情况下，接管这家党的机关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刊载了一篇火药味很浓的引人注目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天晚上，毛指示康生通过

中央广播电台广播了由北京大学哲学系七名师生所写的大字报的内容。后来，毛承认那时他想要向资产阶级发动一场面的反击。如他所期望的那样，6月1日的新闻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一天一直被普遍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开端。

第3章「文化大革命」的头50天

6月初点燃文革的火焰以后，毛就一直住在南方，从杭州到他的出生地湖南韶山，然后于6月28日到了武汉。在这期间，对于如何推动运动的进展，他对北京的领导人并未做明确的指示。因此负责日常工作的领导人，其中包括刘少奇和邓小平，只能根据他们对毛的意图的理解来自行决定如何指导这场运动。

又一场反右运动

自从1965年1月触怒毛那天起，刘和邓已做了数次自我批评，并努力与毛取得一致。刘同意毛的评价，即地方政府超过三分之一的领导权已经被非无产阶级篡夺了。对于正受到打击的「资产阶级权威」和已遭清洗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刘也毫不同情。但刘并不真正清楚他到底在支持什么。「五·一六通知」对文革所针对的两个目标讲得很清楚：「资产阶级权威」和那些保护他们的当权派；刘更关注的是前者。他还把对资产阶级权威的批判看作另一场反右运动，因为1957年知识分子就是攻击的主要目标。

把文革理解为一场反右运动的并不只刘一个人。1966年3月，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出席了毛在杭州召开的一次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他们才得知毛是想要发动一场针对「资产阶级权威」的这动。既然北京已点名对某些人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批判，包括田汉、翦伯赞、夏衍、吴晗和阳翰笙，他们也决定在地方树一些靶子以表明他们愿意响应毛的号召。在4月中旬中南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陶铸指出必须在中南局挑选一个显要的批判对象。这个对象必须是重要、权威而且有影响的。他指出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可能就是不错的选择。陶讲话五天以后的4月18日，湖北省委就派了一个工作组到武汉大学。这是全国为文化大革命而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

知识分子从整体上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对象。在4月25日湖北省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王任重也像毛那样断言由于文化教育界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文化大革命的目标也必须针对知识分子。他甚至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结果之一就是要查出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知识分子作为新右派。

地方政要们毫不犹豫地就对他们称之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发动进攻。一旦他们明白这样的资产阶级权威就是进攻目标，他们就会以巨大的热情投入战斗。

尽管「五·一六通知」指出要全力注意「那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

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地方官员们还是把这种判决理解为是指「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而不是他们自己中间的什么人。

对于普通群众和基层干部来说，1966 年的前五个月所发生的事件几乎没有引起他们的特别注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少有人读过上年 11 月发表的由毛精心策划并命令全国报纸转载的姚文元的文章。即使是那些看了这篇文章的人，也很少能领会它的深层意义和政治意义。

4 月份，对资产阶级权威们的批判进一步加强。报纸上开始登载批判文章，而且这些文章的内容也开始成为学校、政府机关和工厂政治学习的内容。4 月 18 日，《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积极参加伟大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翌日，国内各主要报纸和地方报纸都转载了这篇社论。「文化革命」一词的使用并没有使人们感到奇怪，因为自 1958 年以来它就用得很普及。

1966 年 5 月，批判出现一个新高潮，重心也由吴晗转向了所谓「三家村」——邓拓、吴晗和廖沫沙，他们都是北京市委和市政府的实力人物。毛安排一批年轻理论家笔伐彭真的根据地——北京市委和市政府。然后，动员群众起来参加斗争「黑帮」和「黑线」。全国到处都开批判会。甚至小学生也要表示他们对「三家村」的愤恨。各单位都出现了控诉和痛斥修正主义分子的大字报。报纸也充斥着批评文章。

表面上，群众好像热情地投入到了这场运动中，但那些远距离的攻击目标实际上并不怎么能引起人们真正的兴趣。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三家村」，对这些人写了些什么也毫不清楚。由于群众把对他们的批判仅仅看作是对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进攻的反应，因而通过参加大批判，他们想要表现出自己捍卫党的热情。他们的批判至少形式上是那么回事，大多重复从《人民日报》和其它官方报纸上得来的词句和指责的话，并把它们用到自己的大字报、批判文章和讲话稿中。

群众的批判表明，和他们的上级一样，他们也把目前的运动当作又一场反右运动，这场运动所针对的也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这个黑帮是从外部来向现行体制发起攻击的，而不是指现行体制本身。当群众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展开斗争时，各级政要的权力地位也就得到了加强，这种情况显然与毛的期望是相悖的。

即使是这种表面上轰轰烈烈的批判也没有延续太久。没有人在与远不可及的敌人的斗争中得到或失去什么，自然在五月中旬唤起的那种激动也就很快在群众中淡化了。许多人认为「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是文化教育界的事，既然已经表示了道义上的支持，那么他们的使命也就算完成了。看来，没有新的刺激，这场运动很快就会陷入僵局。

聂元梓的大字报就是这样的新刺激。在此之前，批判主要集中在资产阶级权威身上。而这张大字报则标志着把目标转向了「党内包庇资产阶级权威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毛后来所说的那样，它的发表搅动了整个世界。这张大字报传给千百万中国人的最重要的信号就是，攻击当地的党的机构并不一定是非法的。当宣布彭真被解职

和北京市委重组时，这个信号也就愈加明晰了。另一个消息也引起了很大的注意：「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虽然不清楚究竟谁属于牛鬼蛇神，也不清楚如何横扫他们和由谁来领导这场运动，但所有的牛鬼蛇神都必须扫除掉，而不仅仅是国内那些高级资产阶级权威，这一点是不能含糊的。这两个信息似乎是矛盾的，但它们都把注意力由对遥远、未知而且与个人无关的邓拓、吴晗、廖沫沙这样的人的斗争转向了与中国社会各个单位本地人之间面对面的争，以期焕发出普通群众的热情。

就在聂元梓大字报发表以后，紧接着武汉一些勇敢的学生贴出大字报批评他们学校的党委对批判「三家村」的运动缺乏热情。6月2日，此类的大字报出现在武汉地质学院。同时，一个口号在华中工学院迅速传播开来：「北大有鬼，我校也有鬼。」

地方领导人对这种挑战感到震惊是有其充分理由的。自1949年解放以来，共产党的干部已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很多情况下他们在斗争别人时起着领导作用。尽管有时偶尔发生对党的干部进行清洗的情况，但总的来说那种压力是来自上面并由上级来采取纪律措施。只是在1957年初政治干部们曾短暂遭到来自下面的挑战。后来证明那是一场虚惊。那些胆敢冒犯党的干部的人为此付出了代价并被扣上「右派」的帽子。因而，当地领导人如今就把近十年之中来自下面的第一次挑战看得很严重。

6月3日，湖北省委指示武汉地区各大专院校党委，有必要求得「学生思想的统一」。在后来几天里，各个学校都举行了全校大会和党团员会议。武汉地质学院党委书记告诫学生们说：

有的同学惶惑了。当前北京市委、北大党委出了问题。共产党是否还值得相信？毛主席是否还值得相信？彼此之间是否还值得相信？

在北京，公开化了的紧张局面显得更加尖锐。与外地不同，北京市委已经被官方指责为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特别是在教育方面。因此北京的学校党委也就比他们外地的同行更易受到学生们的批判。6月初的几天里，北京55所大专院校中的大多数和许多中学的学校当局都认为对学生失去了控制。

出于对目前学校领导的不信任，学生们呼吁新的市委派工作组到学校。面对造反的学生，学校当局也紧急要求上级单位派驻工作组，前者希望工作组把旧领导取而代之，而后者则想要工作组来把学生稳定下来。虽然动机不同甚至是相反的，但传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那里的信息却是一致的：需要派工作组。刘非常倾向于这种意见，因为在以往的政治运动中向基层单位派工作组是个标准的做法；毛最近还向《人民日报》和北京大学派了工作组就是个例子。不过，由于思想上有1965年1月会议的教训，刘决定谨慎从事。首先，刘在6月6日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制订了一个称为「八条规定」的文件以抑制日益恶化的局势。然后，刘少奇和邓小平去杭州，

请毛返回北京负责整个这场运动。但毛还是愿意呆在南方，可能是因为北京的工作组还没有完成在安全保卫上的安排。在6月9日杭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对工作组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尽管毛建议，不必这么匆忙就派工作组，但他也没有明确反对向学校派驻工作组的想法。至少，刘少奇、新任中宣部长陶铸和刚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王任重（他们都出席了这次会议）都认为毛已默许了这个主张。正是基于这种理解导致他们最终同意派工作组。

同样是在6月9日，一张大字报出现在武汉第二中学的校园里。题目真是骇人听闻：「炮轰（学校）党支部」。这张大字报立即在全市引起了轰动。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召开了紧急会议。24小时之内，就有600人的第一批工作组进驻一些经过选择的中学。

两天以后，更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宋侃夫在最近的社教运动中经常光顾的中原机械厂附属技工学校的学生贴出一张大字报，题目是：「敬告宋侃夫」。更糟糕的是，就在同一天，又发现第一冶金工业公司附属第一中学的部分学生成立一个秘密的「革命行动小组」。王任重得知这两个事件时，感到很震惊。他和他的同事们从未想到过来自下面的这种挑战，他们也从未想到过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自然，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有「反革命行为」出现。当天，宋侃夫就怒气冲冲地到了中原机械厂，部署反击牛鬼蛇神。而后湖北省委又派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160人的大型工作组到一冶公司一附中。

到6月中，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完成了向各教育机构派驻工作组的安排部署。每个学校实际上都有个工作组。全部算起来，有一万多名工作组成员。他们被认为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派来的工作组」，因而受到热烈欢迎。然而不幸的是，这些「毛主席的代表」组成时间非常之短，以至对在校园内如何行事毫无准备。

中央的刘少奇、邓小平和各省的地方首脑因工作组进驻校园多少感到放心了一些。6月初几天里的混乱局面，使他们想到了1957年春天，那时在党宣布要修正自己的不足之处后，一些右派分子公开向党发动进攻。如今又有人利用文化大革命这个机会来找麻烦。他们一定是披着革命派外衣的右派分子。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刘称，目前这场运动在很多方面类似于1957年，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揪出」隐藏的右派分子。

既然把文革看作另一场反右运动，那么在策略上与1957年也就有类似之处。6月13日，刘少奇同意并批准将由中南局和西北局提出的文革纲要发至各省，他指出：

「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床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

他接着说：

「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

自然，地方领导人们得知文革只是又一场反右运动时是兴高采烈的，这表明肯定了他们对这场运动的理解，不可理解的事情又可以理解了。现在，他们相信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 1957 年的经验对于指导目前进行的这场运动仍然是有用的。1957 年提出的右派和极右分子的标准又一次拿出来作参考。甚至连右派分子的数量都确定了。在湖北省委的一次会议上，王任重说：

「1957 年全国有了 55 万右派，这次运动抓的右派不会比上次少，比例不止百分之一、二、三，可能达到百分之五。」

更特别的是，宣布可能有大约百分之一的大学生和高中毕业生为「右派分子」。由于准备好要进行又一场反右运动，地方领导人们都急切地想与牛鬼蛇神们进行一场类似毛在 1957 年反右时所玩的游戏：引蛇出洞，然后一网打尽。他们只是需要耐心，等待反击的时机。

6 月 18 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未与工作组商量就采取激烈的行动羞辱大约 60 名「黑帮分子」。这种做法显然与「八条规定」背道而驰。更为严重的是，就在这前后，北京 55 所高等院校中的 39 所的工作组处于被学生们逐出学校的危险中。有些学生还公开攻击「八条」为教条和捆住革命群众手脚的绳索。这种局面促使北京的高级领导人得出这样的结论：

6 月 20 日前后，在野右派感到气候已经适合，纷纷出笼，他们和黑帮分子、保皇派等互相勾结，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兴风作浪。许多单位不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是牛鬼蛇神横扫一切。现在出现了假左派、真右派和我们激烈地争夺领导权的现象。在适当的时候是要反击的。

6 月 18 日事件以后对造反的学生采取强制性手段，并决定把这种办法引向全国以克服所遇到的干扰。因而这场运动也就变成了一场「反干扰运动」。在以后的 30 天时间里，北京有大约一万名大学生和几千名教师被划为「右派分子」或「反革命分子」。

6 月中旬，湖北省委准备召开一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会议。由于在委派会议代表的问题上与工作组和学校党委发生了争执，湖北大学的部分学生和青年教师于 6 月 20 日在校园里进行了一次小规模游行，其中一些还代表那些不满的学生和教师到湖北省委提出了控诉。但这次和平行动却被称为「一次小匈牙利事件」。14 名参

加者，包括与我交谈过的一位，被立即拘留起来。这件事在武汉引起一场轰动。刚刚从北京得到的消息无疑大大促成了湖北省委对此事的处理方式。

同时，湖北的当权者们又认为，全面反击右派分子的条件尚未成熟。6月23日，湖北省委文革领导小组组长许道琦在一次有关这场运动的重要会议上对与会者们说：

有些学校反击了。不要反击过早。反击过早，大坏人就会跑掉。先让他们放。

一周以后，宋侃夫在湖北省委常委的一次扩大会议上又说：

有些单位，一揭到领导的问题就组织反击，有的一放到自己头上就不敢放了，想尽办法把鸣放制止下来，急于转入批判斗争，转移锋芒。当然，也有的单位，确实具备了条件需要反击的，可以经过批准反击。有的单位有老右派攻击，群众急于要揪几个出来斗争，也有这个可能。但要注意放透，不要怕烧到自己。有些单位的反击，不是领导组织的，而是左派自动反击的。这样一反击，有问题的一露头就缩回去了。我们要等人家放得差不多了，再反击也不迟。……总而言之，不要怕乱，乱一点不可避免。但心中要有数，要有准备。只要有了真正革命的左派队伍，就不会出大乱子。

长期酝酿的反击时机终于在7月份出现了。在7月3日写给湖北省委的一封信中，王任重称，通过前几个月随意发表意见，几乎所有的牛鬼蛇神都出来了。他说，用毛的话讲这叫「引蛇出洞，一网打尽」的策略。他指示在10到20天内展开对牛鬼蛇神的反击。关于打击目标的选择，他提出两条原则：「擒贼先擒王」和「枪打出头鸟」。前者适用于当权派就是敌人的情况，而后者则适用于那些猖狂的教师或学生。作为一名慎重的政治家，王任重把这封信呈送给了6月28日到达武汉的毛泽东，听取意见。毛似乎没有表示反对，可能是由于得到了毛的默许，王的信7月14日由中南局传达到中南地区五省然后又由中央传达到其他各省，于是湖北省被看作是全国的样板。

王任重的反击总的来说针对的只是学生中的「右派分子」。1957年反右运动中幸存下来那些人常常很小心，因而几乎难以把他们引出洞，只有那些政治上不成熟的学生才可能成为「出头鸟」。

到7月末，武汉共有13所院校的254名学生被划为「假左派，真右派」。但与北京的一万名学生右派相比，这个数字是平淡的。的确，在武汉，公开反抗党委或者工作队是很少的。整个6月和7月，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一直有力地控制着局势。就像1957年一样，254名学生中的大多数可能只是因为对组织或工作组的权威稍稍不太尊重而招致了「右派」的罪名。但毕竟这次反击是很有成效的。把这254人树为活靶子

表明党组织的合法性不容挑战，这也就对以后几个月中的运动进程产生了影响。

学生们的挑战和当局的反击并不是文革的前几个月中武汉发生的事件的全部内容。这两个月中远不止 254 个牺牲者。

为了表示他们能跟得上形势，武汉的当权者发现控制局面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处处紧跟中央。4 月，当吴晗还是主要目标时，王任重就决定把李达批为武汉的吴晗。5 月份，北京的「三家村」被揭露出来，不久，北京大学的陆平、宋硕和彭佩云被指控结成了「黑帮」。湖北省委发现有必要修改原先的计划以适应新的情况。6 月 3 日，武汉大学的师生员工被告知由李达、朱劭天（党委书记）和何定华（副校长）三人组成的「三家村」已经在校内查出。十天之后，当地报纸和电台把武汉的「三家村」公之于众。6 月 13 日，在湖北省委的动员下，118 个单位的十万名干部、工人和学生聚集在武大校园里「表示对斗争李达为首的黑帮的支持」。以后十天左右，又有 30 万到 50 万人为同一目的去了武大。斗争李达并不需要这么浩大的群众支持。因为，首先是湖北省委而不是武汉大学的师生员工「查出」了「三家村」，而且三个人抵抗来自上面的压力的可能性很小。因而，有组织的声援是一种政治举动，以显示武汉的当权者愿意响应中央的号召，坚定地与黑帮作斗争，有能力动员大多数群众参加战斗。不过，有人却为这种表现付出了代价。在 1222 名武汉大学的员工中，有 227 名被公开划为黑帮分子。另外 91 人虽未公开宣布，但也被划为黑帮分子，他们属于内部掌握之列。即使是武大校党委常委成员也未能幸免。13 名常委中的 9 人被斥为主要黑帮分子。

湖北省长张体学的一番话道出了湖北省委的秘密：

我们已抛出一个三家村，再抛出几个人就主动了，省委就没问题了。

武汉市委不甘心落后于湖北省委。6 月 17 日，宋侃夫在武汉文化界的一次动员会上提出要「粉碎程云和吴克仁（音译）为首的反革命黑帮」。7 月 1 日，中国作家艺术家联合会主席周扬遭到公开批判。六天以后，武汉报纸把程和吴的帮派公布于众并把它谴责为周扬在武汉的帮派。在以后几天里，群众又被动员起来声讨这个反党帮派的「罪行」，于是又有牺牲者付出了代价。比如，单是武汉市文化局就有 37 人被拘留。

横扫「牛鬼蛇神」

在最初的两个月中，很多人由于被划为「牛鬼蛇神」而受到伤害。无论陈伯达起草《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意图如何，对政工干部和积极分子来说，

这篇社论所传递给他们的信号无疑是，除了那些全国或各地区的知名资产阶级权威以外，各单位过去犯过错误的个人也都可能成为打击的目标。王任重对这点讲得很清楚：

*上下左右一起烧，不要限制群众，什么都可以揭，先来一个大揭露。
大小人物都可以揭发，「右派」、「小流氓」、「反革命」、「小野心家」
都应该交群众批判斗争。*

中学的情况王任重的儿子王三宝是湖北实验学校初中三年级的一名学生，他最先把其父的指示付诸实施。6月6日，他贴出了一张《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某些教师。王三宝暗示说其父看过了他的大字报的草稿。因而他的行动被认为意义极不寻常，引起了很大注意。湖北省委的喉舌《支部生活》，两次发表了这位初中生关于如何进行反对牛鬼蛇神斗争的文章。

单单这位小王的大字报就能掀起武汉的中学生冒犯他们的老师的浪潮，这也是夸大其词。不过事实上，在文革初期老师遭到羞辱是个全国普遍的现象。刘少奇关于中学在文革中的主要任务就是纯洁教职工队伍的讲话对高潮的出现负有责任。但小王的那张大字报还是推动了武汉的中学把斗争矛头从远不可及的敌人向近在身边的目标的转变。

当然，最明显的目标还是资产阶级权威。但这个概念是很成问题的，没有给予明确的界定。模棱两可也就带了随意性。当注意力转向校内的目标时，很多教师就被扣上「资产阶级权威」的帽子并成为文革的第一批牺牲品。从三级教师到一级教师是学校里的业务尖子，如今他们就可能被贬为资产阶级权威。但对有的人来说戴上这顶帽子，业务等级并非必然的标准。那时，似乎谁在业务上表现出色谁就会被认为是学术权威，而所有的业务权威都是资产阶级权威。

不管概念的定义多么模糊，还是不能给多数教师扣上资产阶级权威的帽子。不过政治标签并不缺乏。「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一语那时就用得比较普遍。在文革前夕，武汉的中学员工中约有40%出生自阶级成分不好的家庭，在这些学校的主要领导人中比例还要高，达到了48%。凡是出身剥削阶级的人当时都容易被称作「孝子贤孙」。与我交谈过的一个人就回忆说：

在我所在的学校，第一个被打成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是龙XX。龙XX家里有台留声机，又收藏有许多老唱片。他经常邀些年青的同事去他家听唱片，如「梁山伯与祝英台」之类。文革一开始，有人把此事揭了出来，说他散布黄色音乐。他父亲是个资本家，他的所作所为就被解释成不愿与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不久，我自己也开始有麻烦。我有次讲「把仇恨填满炮膛」这一课，其中有一句「美

帝必败，越南必胜」，我讲得太动情，口误成「美帝必胜，越南必败」。下课后，有学生把这事提起，我认为小题大作，没理他。现在学生说，我在两个班的课上把这句话反了好几遍。联系我的资本家出身，指控我是故意的。还有一次讲「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这课，我说到卫生部长在天安门与群众狂欢。现在学生说，我们党中央首长只联欢，不会搞什么狂欢。凭这两条就把我定为反革命，倒霉的当然不止我们两人。几乎所有的教员都多多少少受到了冲击。但出身不好的教员首当其冲。

这所学校发生的情况可以说是武汉的中学总的情况的缩影。

一位被访问者称这个时期是一场「混战」。谁和谁战呢？被进攻者似乎清楚一些，但谁是进攻者呢？后来，由于把「进攻的矛头转向群众」来保护自己，学校党委和工作组也遭到了批判。的确，只要斗争的矛头对准下面，他们就不愿干预。但正如我与别人的谈话所表明的，在多数情况下，打击的对象并不是由党组织和工作组来确定，相反倒是由师生们来选择向谁发动进攻。

幼稚的学生们虽然很具有热情，但由于对他们老师的背景情况缺乏了解而被捆住了手脚。各种出身的人都想从熟悉的老师的言行中挑毛病。对出身好的学生们来说唯一能得到的特殊武器就是指责他们的老师对「工农出身的子弟」歧视或「带有阶级仇恨」。不过他们在选择目标上并不盲目。通常他们有意把自己出于这样那样原因怨恨的老师作为进攻对象。

在教师们中间，社会和人际关系上的裂痕对决定谁进攻谁起着重要作用。在向资产阶级权威发动进攻、公布别人过去犯错误的记录和揪出「剥削阶级孝子贤孙」这几方面，那些出身好或中等出身的人表现得很积极。在这种狂热的政治氛围中，那些出身不好的人感到压力更重以至于互相揭发。一位被访问者在描述他所在学校的情形时说：

当时，谁也不能袖手旁观。尤其是像我这种出身不好的人，压力更大。如你不积极投入运动，就可能被人指为对运动抱抵触态度。所以每个人都挖空心与揭发别人的「罪行」。学生们很幼稚，恨哪个老师就整哪个老师。老师中间也是谁与谁的关系不好，就大揭特揭。我所在的学校有两个老头，都在外语教研室。两人关系从来不好。这时郑老头贴出大字报「看周XX的反动嘴脸」，周老头也不甘示弱，贴出大字报「请看郑XX血淋淋的事实」。笔仗打得不亦乐乎。我平时看不惯孙XX，这时贴出大字报揭发他曾打算改名为孙远东，并说他这样做是暴露了他企图征服远东的狼子野心。这当然是胡扯。

但当时就是这样捕风捉影，根本不管什么证据不证据。

教师们彼此猛揭对方的短处，特别是家庭背景和犯错误的经历，更把局势搅得昏天黑地。起初，对许多道貌岸然的老师成了牛鬼蛇神，学生们感到很吃惊。于是他们很快就失去了对这些老师的敬畏和崇拜。过去的偶像的坍塌和从老师命令下的解脱，使醒悟过来的学生们来势汹汹。

那一阶段，多数情况下中学生并没有受到批判。在决定谁应是进攻对象这一点上虽然没有明确的界线，但对牛鬼蛇神的斗争也还是扩大到了学生本身。有些学生无论在哪里确实成了攻击的靶子，通常都是由那些难以驾驭的狂热的学生积极分子而非党组织或工作组来发动对那些可怜牺牲品的进攻。但有一种类型的学生——「流氓」，对他们的镇压是由武汉的当权者来发动的。

老师们的阶级归属受到了怀疑，权力和声望也就随之而被粉碎，在过去正常环境中受到压制的流氓恶棍们开始在一些学校横行，这被认为是对正在进行的运动的一个威胁。根据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命令，39所中学的159名学生于6月16日至7月24日被抓了起来，并在流氓恶棍非常肆虐的两所学校示众，让人们看看这些「反动流氓学生」如何扰乱公共秩序和危害运动的进行，武汉其他学校的学生都被组织前往观看。

大学的情况 除两方面外，大学的局势与中学并无多大区别。一是，某些高校的党的领导被认为已经「烂掉」，需要由上级党委取代。这些学校的学生和教师因此被鼓励向他们所在学校的现行体制发动进攻。二是，与中学生不同，大学生们从年龄上讲已可以成为攻击的合法对象。在中学里，只有老师们才能作为「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而被揪出。而这顶帽子则可以扣在大学生头上，因为他们很多人的家庭出身阶级成分不好，即使是那些出身好的人也会成为进攻对象，因为据说牛鬼蛇神并不只是指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剥削阶级的腐朽没落思想会腐蚀每一个人。所以在大学里，对打击目标的选择基本上是靠学生自己而不是党组织或工作组。由于在选择进攻目标上学生们「起着重要的作用，批判的范围也就变化很大。出身不好的不必言，就是许多家庭出身好的人也未能幸免。

不过，党组织或工作组不确认谁应是目标，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自己管辖范围内发生的事情毫无责任。在王任重的指示下，工作组鼓励师生员工们揭露和批判他们所选择的任何人，以求在此过程中将真正的牛鬼蛇神揭发出来，尽管这样做的代价是有的人会暂时被错误地指控。所以，牺牲者们觉得无论是工作组、党组织还是那些伤害过他们的同学和同事都不能原谅。

这一阶段，大学里的目标比较分散。老师、学生或党的干部、普通职工，出身不好的、出身好的都可能遭到贬斥。运动初期各高校的这个特点，使后来的激进和保守

组织之间的区别相对模糊一些。

其他部门文革开始时，武汉多数单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没有结束，社教工作组还留在各单位。无论工作组在哪里，都期望他们指导政治运动，而以前的领导则继续从事业务工作。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因单位而异。多数情况下，他们是相互合作的，但有的地方则彼此是对手。

在那些职工多数是知识分子的地方，比如医院和科研文化机构中，资产阶级权威和孝子贤孙和学校里一样也是进攻的主要目标，而且常常是有许多人遭到批判。

在工厂里，资产阶级权威即使有的话也是很少。所以，斗争的矛头就指向那些过去犯过错误的人或者落后分子。工作组号召「揪出历次政治运动没有触动过的地方」。因此，每个人都可以针对本单位的任何人贴大字报，但多数工人和基层干部既不像学生那么狂热，又不像知识分子那样在政治上老于世故。他们常常理解文革主要是一场针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运动。当要求他们参加到运动中来时，往往就在别人的大字报上署上自己的名字而不是去写大字报。只有受过较好教育的政治积极分子才对工作组的号召积极作出反应。但他们所做的基本上也是，或者攻击那些过去政治运动中批判过的人，或者把落后分子的琐碎错事上升到原则高度来批判他们。因而在许多单位，大约 10~20%的职工以大字报的形式遭到批判。

群众中的混战进行了不久之后；工作组就会列出一个人名单，说明下一阶段各单位应进攻的主要对象。针对其他人的大字报基本上是分散的，而那些主要进攻目标则通常受到有组织的谴责。

与此同时，工作组在秘密准备一份名单，把单位里的人分成五种类型：左派、中左、中间分子、中右、右派。在准备这份名单时，工作组会与积极分子们进行协商。名单准备好以后，部分积极分子会被告知谁应该被斗争而谁应被争取。但原则上这份名单应予保密。多数积极分子并不确切清楚他们自己属于哪种类型，「左派」和「右派」并不多。大多数人归入了其余三种类型中。左派当然不愿意抱怨，因为他们的地位好得不能再好了；而右派不敢抱怨，因为他们常常是进攻的对象。问题是被划入中间这种类型的人并不满足。如果积极分子发现自己成了「中左」或更糟糕的「中间分子」，他们会感到失望或者怨恨。中间分子得知他们已被领导正式划入此类型时会觉得已不被信任。即使是众所周知的落后分子也不希望归入此类之中。所以，处于保密状态的这个名单就成了党的领导对付群众的强有力武器，但如果名单公开后，这个武器就可能转而对着党的的领导。

在那些工作组与以前的领导彼此敌对的单位，形势就更加复杂。以前的领导与其他人一样遭到非难。出于对过去的积极分子的不信任，那里的工作组往往要发现和培养自己的积极分子。内部权力结构的重组常常导致这些单位后来的运动偏离正常的方式。如果工作组（通过谴责以前的领导把出身好的工人划为落后分子）从过去的落后

分子中挑选新的积极分子并依靠他们去进攻以前的当权者和积极分子的话，那么结果就是党组织的领导和积极分子对批判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更加狂热。当工作组用外部的力量来取代旧领导时，受过去领导压制过的那些人便主要向从前的当权者发动进攻。因而，过去的领导和积极分子们就会把他们的进攻矛头对准了工作组和新上台的领导。当工作组成功地争取了有些领导干部和积极分子中的大多数时，被排除在外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就可能对造反派们持同情态度。

并非每个单位都卷入了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工厂在文革开始的头两个月中像平常一样平静，几乎没受这场风暴的触及。这些工厂通常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刚结束，而工厂的成员在阶级背景上相当类似。既然说这些单位内部的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问题足够清白或者说已经经过整顿，那么再来一场运动似乎是没有必要的。7月2日，中央在一份文件中明确表示，除了文教系统外，各单位的文化革命只是进行思想教育。换句话说，对这些单位中的个人进行攻击是不对的。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迅速向所属各单位传达了这个指示。因而那些还没有开始横扫牛鬼蛇神的单位就错过了会引起纠纷的一段时期。结果，后来这些单位往往很少有摩擦和对抗。

教育改革

从1964年到1966年，毛经常强调进行一场彻底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即使是在准备对彭、罗、陆、杨集团进行最后一击的过程中，他也在抽出时间筹划他的理想的教育体制。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王任重自然不会错过如此明显的一个信号。他推断教育改革一定是文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6月7日，也就是毛给林彪写那封著名的信一个月以后，身在武汉的王就宣布：「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于是当地报纸发表社论鼓励师生们响应这位省委第一书记的号召。紧接的第二周，中央向各省发布了两个指示，一个是关于高中入学制度的改革，一个是有关大学招生的改革。6月18日，关于大学招生制度改革的指示在报纸上发表，文中谴责现存的入学制度更有利于非无产阶级者的后代而非出身好的孩子。这个文件在中学生尤其是即将毕业的高中生中掀起了轩然大波。自然，出身好的学生对这种新变化感到高兴。他们争相控诉过去那个实际上带有歧视性的大学招生政策。有一群学生抱怨说：

我们工农子女和革命干部子女没有那些地主、资产阶级和某些资产阶级「权威」子女那样「优越」的条件。我们要参加很多家务劳动，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埋头搞功课，而且我们往往遭到那些资产阶级教

师的打击和排斥。他们对我们漠不关心，而对那些听他们话的所谓「好学生」加以精心培养。

另一群补充道：

考试像关卡，一个人从小学读到大学毕业要经过三十几次期终考试，三次升学考试，一层层的关卡，把许多优秀的工农子女关在门外了。这样工农子女学习的机会少了，工农在文化上彻底翻身就根本不可能。

而另一方面，那些出身不好或中等出身的学生们则感到紧张起来。对前者来说，学业上的进步是他们向上爬的最后机会。随着这个通往成功的出路的消失，所有的出路似乎都关闭了。一想到未来他们就感到不寒而栗。就后者而言，未来似乎也是暗淡的，因为对出身好的学生优先的政策自然意味着别人的机会缩小。在中学毕业生代表会议上，武汉市副市长、邓小平的弟弟邓垦作了讲话，使这些学生感到更沮丧。邓说：

在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广大工农子弟升不了学，那还是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什么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是了！新的招生办法，可以更好地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使大量优秀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子女得到升学机会，可以培养出大批的我们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学生，一般说（当然也有少数例外）他们是鄙视劳动、鄙视劳动人民的。他们迷恋走白专道路，想由中学到大学，将来当工程师、当高薪阶层，摆脱劳动。这些人只有通过劳动改造，摆脱剥削阶级的影响，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成为劳动者。…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学生，下了决心，有了做普通劳动者的愿望，还要懂得，最能锻炼人，最能考验人的地方是上山下乡，是到农村去。……有人要求一视同仁，不管是那个阶级大家都一样，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当的。

7月，武汉市政府改革了高中入学程序。入学考试被取消了。招生只根据家庭的阶级背景和政治表现，出身不好的学生们于是成了输家。在36000名初中毕业生中，89.43%的所谓劳动人民子女被高中录取，而只有14.62%的出身不好的孩子非常幸运地获得了以后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

一项调查表明在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之中有着强烈的不满。有的人悲叹道：「上大学不可能了，就什么希望也没有了。」有人则抱怨说：「推荐不能辨别好坏。它并不

是个合理的选择办法。」还有人则抗议：「阶级路线对我们是不公平的。我们坚决反对。」那些知识分子和其他中等家庭出身的学生尽管已被正式划入「劳动人民子女」之列，但也碰到了问题。特别是在那些知识分子子女占相当比例的重点学校中，一些出身好的学生长期以来对他们自己不如那些傲慢的知识分子子女学习成绩好而感到很不舒服，如今时机到了，他们可以利用自己优越的阶级出身盖过他们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同学在学习上的优势。

中学和大学招生的改革所影响的远远不止是毕业生。随着招生制度的改革，可以相信，整个的机会分配体制都将发生变化。每一个青年人需要重新认定他或她在社会中的位置并重新考虑自己的将来。这种错位和与之相伴的利益再分配使无知的学生们强烈地意识到他们的社会地位并对它在政治气候中的变动很敏感。更重要的是，学生这个整体被这种错误分裂开来。谦卑的出身好的学生们成了主角，而那些过去很自信的人则变得垂头丧气。这两部分学生之间过去很小的关系上的裂缝如今变成了大鸿沟。尽管公开冲突还很少，但潜在的紧张气氛则日益加剧，假如社会控制放松的话随时可能爆发。

在某种意义上，头两个月的文革是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方式的进一步显示。它的动力、目标、战略和手段表明文革是又一场反右运动和未完成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综合。基层领导和积极分子们被告知，这场运动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查出右派分子。即使是没有官方的认定，任何一个感觉良好的人都会看到正在进行的这场运动与1957年反右两者之间的相似。那时，很普遍的是，父母提醒孩子别忘了1957年的事并要他们言行谨慎以免被当作右派。对一场新的反右斗争的警惕和自我约束产生了两个后果。首先，很少有人敢于向党的领导挑战。只有一些大学生和高中生才这么做，而且其中多数人出身好，因为这些人要承担的政治风险是相当小的。无论如何，敢于挑战者只占学生总体的极少数。其次，斗争的矛头「冲下」，主要进攻目标还是过去的那些人。这样做的原因并不复杂，因为党组织的领导想要扭转斗争的大方向以保护他们自己，他们根据过去的经验相信，一场政治运动就应该如此。对群众而言，按照他们过去形成的对阶级斗争的理解，对众所周知的牛鬼蛇神展开进攻，不仅安全而且也开心。因而在头两个月里，许多个人成了牺牲品，即使他们并不想反对工作组和党组织。

到7月末，武汉的领导层对领导这场运动走上「正确道路」更有信心。然而他们没有想到，一场突然的变故在中央发生了。

第4章 1966年8月

关于工作组问题

北京所争论的是工作组的作用问题。正如上面所指出的，毛决心发动文革有两个目的：打击傲慢的「资产阶级权威」的气焰，清洗「党内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然而头两个月的情况表明，运动所批判的只是前者，而后者几乎完全没有触动。如果不纠正这个偏差，毛有理由担心这场运动会流产。所以他决定把工作组作为纠偏的出发点。

7月18日，在十个多月的南方之行后，毛终于由武汉返回北京。他听取了陈伯达和康生的汇报，阅读中央文革小组提供的有关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局势的材料。在以后几天里，他召集了一系列会议，指责工作组拖了文革进展的后腿，并说派工作组实质上是「镇压学生运动」。他认为这个政策把运动引上了「歧途」。7月20日，江青从上海返回北京加入了这场战斗。第二天，在陈伯达和康生的怂恿下，中央文革小组的两名成员王力和关锋去清华大学见蒯大富，蒯曾被工作组扣上「反动」的帽子。在后来的九天中，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出动在北京的十几所大学和中学动员了一批反对工作组的力量。在他们看来，毛从未同意过派工作组的决定。这就等于否认了工作组的合法性。这就等于宣布那些决定派工作组的中央领导人犯了严重的错误，尽管多数普通人可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但刘少奇明白这一点，起先，他辩解说派工作组是必要的，试图挽回败局。7月24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在先征求了其他高级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后，刘指出，尽管有些工作组可能脱离群众，但作为党的领导的一种形式，在这样一场群众的政治运动中工作组还是不可缺少的。然而就在第二天，毛发出命令：要把所有工作组都「赶出去」。7月29日，作为反工作组力量的一个象征，蒯大富被邀请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北京大中学校文革积极分子会议。正是在这次群众大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就工作组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据报道刘讲了这样一番话：

「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太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以致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名其妙。」

刘的这番话很可能也反映了许多地方领导人内心的感受。

但毛不愿就此罢休。他决定，不仅是政策本身应受到谴责，而且政策制订者也应受到批判。他还决定削弱刘在党内的地位，他对刘的错误的批评必须让更多的人知道。中来的十一中全会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

十一中全会

在7月27日至30日召开的全会预备会上，与会者们（其中有各省的主要负责人）讨论了毛对工作组的批判和《十六条》草案。尽管全都同意毛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但多数人还是觉得当初派工作组并没有错，而是这种领导形式如今已过时了。当时就有人想知道，撤销工作组以后，用什么形式可以体现党的领导。显然，预备会远远不符合毛的意图。

在全会的前三天（8月1日至3日）刘、邓和周分别发表了讲话。刘关于1962年十中全会以来进展情况的报告得到了与会者的同意。毛竭力想把注意力转到他的认识上来，即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但他的努力充其量只是使一些胆小的与会者作了自我批评。与会者们似乎还是没能领会毛的意思，把矛头指向刘少奇。按原定计划全会将于8月5日结束，除非毛把他的观点亮明，否则这次机会又将丧失。

8月4日，毛对刘发动了直接进攻，使多数与会者大吃一惊。他说，压制学生运动的错误是错误政治路钱的表现，它来自于中央。第二天，他写下了那张著名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指出「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在五十多天的时间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下去」。会议因此作了延长。8月6日，毛从辽宁大连召回了原先不打算出席全会的林彪，以加强他的攻击力。第二天，他的大字报分发给会议的参加者们。8月8日是个转折点，这天通过了《十六条》。从此，全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刘的批判上。8月12日，毛改组了党中央。毛和林都相信，这次改组将保证全会决定即《十六条》的贯彻实施。

《十六条》作为一个指导路线，对所有人来讲，都太模棱两可以至难以贯彻。首先，它对谁是进攻的主要目标不明确。一方面，它要求对准「资产阶级右派」，而另一方面，又宣布文革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中有些地方又暗示「走资派」就在右派分子之中。因而人们就想知道是否除了走资派以外还有别的目标。更成问题的是，对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没有加以明确的界定。其次，尽管其中有一条指出有些工作组犯了「政治路线错误」，但并没有完全批判派工作组这个政策。《十六条》发表以后，陶铸就常常劝告学生们不要指责工作组犯了「路线错误」。而学生们又从某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那里得知，毛谴责百分之九十的工作

组犯了路线错误。第三，《十六条》并没有说明党组织如何正确领导这场运动，或者党组织是否应像历次运动那样起领导作用，因而使各级党组织处于无所适从的状态。第四，它谴责了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做法；但与此同时，它又不明确地警告群众中的右派分子在运动后期将受到惩罚，这就给人留下「秋后算帐」的印象。

正是由于上述所有这些模糊之处，《十六条》可以解释得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在十一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毛警告说：

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都会实行，总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实行。

问题是即使所有的人都真心愿意贯彻《十六条》这个决定，它本身也还是模糊得很，以至人们会以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方式来对它作出解释。

工作组的撤离

一开始，武汉的主要领导对待毛 7 月 27 日突然决定撤销工作组和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对工作组进行批评感到震惊。但他们很快镇定下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8 月 3 日会议以后毛所做的打倒刘少奇的努力多少减弱了湖北省一级领导人的焦虑紧张。在他们看来，毛对工作组的批判主要是对刘少奇的批判。因此，他们与其他省的领导一起，对刘采取了严厉的行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减小了毛把批判矛头对准他们自己的可能性。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以后，陶铸和王任重与中南地区五省的省委书记们进行了座谈。书记们感到放心的是，五省派驻工作组的做法并非路线错误。作为新近得到毛提拔的政治新星，中央文革小组的高级成员和《十六条》的主要作者，陶和王被认为是毛的代表。他们的话进一步使武汉那些曾经担惊受怕的领导人们镇定了下来。在一个地方领导人的合法性基于上级认可而非人民信任的制度下，只要地方官员得到上级的支持，他们就不会失去对自己的自信。

不过，领导层还得加以变动从而与毛的新指示取得一致。8 月 2 日，湖北省委召开第二次文革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会上代表们听取了 7 月 29 日在北京举行的一次类似会议上中央高级领导人所做报告的录音，这次会议要求所有工作组都必须在群众的帮助下改进工作方法。后来几天里，这个录音讲话作了进一步的传达，而后工作组逐步从各个学校撤离。在北京，中央文革小组打算让学生与工作组对抗；与北京不同，武汉还没有建立起「串联学生」与北京和其他城市之间非正式的沟通渠道，学生们总的说来还没有认识到撤销工作组的意义。事实上，工作组离开时常受到热烈欢送。

为了重新获得主动，湖北省长张体学于 8 月 12 日从北京给省里其他领导人打电

话，命令在 8 月 15 日前按照《十六条》在所有大中学校建立起文化革命委员会。他显然急于获得成功以表示湖北省委跟得上毛的指示，从而避免来自上面或下面的攻击。但直到 8 月 20 日，武汉还没有出现一个文革委员会，而且这类委员会的筹备过程充斥着或明或暗的冲突。

基层的文化革命委员会

工作组的撤离在许多学校造成了权力真空。即使是党组织未受到损害，他们也不能直接领导运动，《十六条》给群众以选举文革委员会的权利。但提出了一个问题，应该选谁？那时群众路线被推向了极端。

以前，尽管出身不好的人遭歧视，但官方的路线还是，没谁生来就红，要达此目标唯有通过思想改造。特别是 1965 年 1 月彭真关于阶级路线的谈话以后，尽管剥削家庭出身的青年被鼓励抛弃他们原来的阶级，但许多出身好的学生也遭到批评，说他们自认为「自来红」。后者当然对这个批评感到不舒服，1965 年末到 1966 年初，一个谣传在北京的某些高干子弟中传播开来，说由于某些高干子弟在工作和学习中表现不太好而许多剥削阶级子女却很积极，毛感到有些失望，他说政权不能落入后者手中，因为他相信「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受这则传闻的鼓动，北京一些中学的高干子弟通过非正式方式联合了起来。1966 年 5 月 29 日，第一个正式团体即所谓「红卫兵」在清华大学附中正式形成。不久，别的学校也出现了类似的组织。在工作组撤离之前，无论这些团体（基本还处于秘密状态），还是出身好的学生总的来说都没有想到他们会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到领导作用。

工作组的撤离为出身好的学生提供了一个出来夺权的机会，因为如今几乎没有哪位学校领导会冒「压制革命群众」的风险来约束他们，也没有任何别的团体有足够的政治力量与他们抗衡。他们这样做是基于所谓的「血统论」。工作组失去合法地位以后不久，「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话就出现在北京许多建筑物的墙上。这就等于宣告，那些出身不好的人是二等公民，否认了这些人有通过出色政治表现成为革命派的权利。还有，这句话也意味着一个人的父辈对革命做的贡献越大，他自己也就越革命。换句话说，在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子女中，前三类人的子女比其他人更有权争取领导权。受这个口号的影响，北大、清华等校出身好的学生在 8 月初建立了广泛的联盟。尽管这个口号受到中央文革的批评，它在北京还是更加流行起来，并迅速引起全国的注意。

在武汉也是这样，只有出身好的学生才有资格进文革委员会。没人敢就这条规定的合理性进行争论。这就打击和疏远了出身不好甚至那些中等出身的青年。

与那些只能与侮辱相伴的出身不好的学生比，根正苗红的学生感到自豪和优越。不过，他们并非固有的统一整体。文革委员会成员的自由选举也在他们内部引来了麻烦。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来就从未有过真正的自由选举，所以没人知道对此如何进行。《十六条》要求选举照巴黎公社的样子做，但样板究竟是什么并不清楚。对选举程序缺乏一致意见常常导致对选举结果的争执。

根据《十六条》的要求，文革委员会不仅要在文教系统而且要在除军队以外的所有单位成立。在除学校以外的其他部门中，党组织的权威总的来说还未受到削弱，《十六条》指出，那里的文革委员会应置于党组织的领导之下。结果，选举过程或多或少受到了操纵。文革委员会的成员往往是受党组织信任的出身好的政治积极分子。后来，这些委员会常被激进派谴责为「傀儡委员会」。

红卫兵的崛起

无论革委会是不是「傀儡」，在他们未及巩固自己的权力前，一个新的群众组织迅速崛起并席卷全国，这就是红卫兵。

第一个自称「红卫兵」的组织在清华附中出现时，它还是秘密社团，因为在文革前的中国，任何自愿结成的组织都被为是对党的控制的危险。6月、7月份时，红卫兵和其他学校类似的组织常被宣布为「非法」甚至「反革命」。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的两张大字报特别引起了争论，原因是他们宣称「造反有理」。红卫兵们用在6月5日《人民日报》上找到的毛的语录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但工作组还是认为，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造反是不对的。7月28日，江青与北京海淀区的中学生代表座谈，宣布工作组将从学校撤离。会上，红卫兵们向江青递交了两张大字报，并请她转交给毛。四天以后，毛写了支持红卫兵们的一封信并与那两张大字报一起发给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与会代表。第二天，文革小组承认红卫兵以及其他类似的自发组织是合法的。8月3日，在接到毛来信的副件以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们迅速地把这个好消息传遍北京市。毛对红卫兵的赞扬在北京的学生中引起广泛的反响。于是在以后几天里，红卫兵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甚至那些过去就有的学生地下组织也把名字改成了红卫兵。8月18日，毛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革命群众」。其中红卫兵最引人注目，1500名学生代表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台，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更为重要的是，毛接受并佩戴了一个红卫兵袖章。

这个信号似乎是无可置疑的。在这条引起轰动的消息鼓舞下，武汉的学生们开始筹备他们自己的红卫兵组织。然而，省里的领导人对这样一个异乎寻常的新举动毫无准备。他们唯一安全的反应就是响应毛的话。8月19日，省里主要负责人分别接见

了 11 所大中学校的学生以表示他们对「革命小将」的支持。同一天，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公开出现在武汉街头。以后几天里，省、市领导人们手忙脚乱地宣布成立新的红卫兵组织。8 月 23 日和 25 日，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召开经验交流会以使红卫兵纳入党领导的路线之下。然而，恶魔一旦被释放出来，就不容易再放回到潘多拉的盒子里去。

破四旧

8 月 22 日，北京红卫兵已开始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消息在电台广播了。这件事就开始于毛于 8 月 18 日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破「四旧」这出戏大概出乎任何人的意料。尽管《十六条》和 8 月 18 日林彪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强调有必要根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但这还是被认为是一项需要长时间来完成的大任务。学生们想要立即行动起来，表示他们捍卫文革的决心。像在别的革命环境中一样，「更名换姓」的逻辑又开始起作用。的确，在一场所谓的革命中，没有什么东西比外表的变化更简单和引人注目了。

从北京更改服装样式和地名开始，破四旧的风暴席卷了全国。不过，在武汉，很多学校还没有正式成立红卫兵组织。所以不管是不是红卫兵，学生们全都走上街头。许多人希望，他们在破四旧中的表现会在红卫兵组织开始吸收成员时得到考虑。在开始的几天里，学生们就对此座城市的面貌来了一场革命，更换了那些听起来不革命的地名。

学生们的行动并不仅仅限于修改地名。自 1964 年以来，紧身牛仔裤、尖头鞋、高跟鞋、西服和领带以及长发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标志，要人们避开这些东西。如今这些东西全都遭到禁止。学生们命令理发店、裁缝铺和照相馆不得做任何非无产阶级的样式。他们在主要街道上设立了检查点。长发剪掉，紧身裤被剪开，不合适的鞋被划开。

几天以后，所有四旧的迹象都从大街上消失了。继之，为了破四旧，学生们开始抄黑帮分子的家，没收或者捣毁所有不符合社会主义的东西。出身不好的学生们为了改造或保护自己，常常请他们的同学来搜查自己的家。受害者们也经常提供那些可能成为目标的人的名字，尤其是他们个人的仇人，许多人在学生们来之前他们自己就已破了自家的四旧。几乎没有哪一个有过问题的家庭没有遭到抄家。

尽管破四旧并不在毛和中央文革小组当初的日程上，他们还是不想打击红卫兵们的热情。犹豫了三天以后，他们决定赞成红卫兵们的行动。中央的支持使省里的领导人别无选择，只能对学生们不可容忍的行为采取放任的态度，因为这种行为至少

没有对当地政府构成威胁。

由于中央和地方当局的纵容，学生们闹得越来越凶。他们对「牛鬼蛇神」们召开批斗会，「牛鬼蛇神」们被公开游街并赶出所在的城市。最后，体罚也成了家常便饭。在极端情况下，牛鬼蛇神甚至被处死。受害者在无奈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绝望的反抗，据说有的红卫兵被刺或被打伤。快到8月底时，显然如果不对红卫兵的过火行为有所限制，公共秩序就会崩溃。不过，毛和中央文革小组还是担心红卫兵们放过文革的主要目标——走资派。在观察了一周的形势以后，中央在八月底开始对红卫兵热降温，由于当时社会控制机构仍相当有效，群众暴力很快得到了控制。当社会控制机构瘫痪时，暴力也就成了文革的显著特征。

「牛鬼蛇神」们在街头遭到迫害，房屋被抄，他们的子女也在学校里受到侮辱。8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写的一篇文章，文中写道：

我们凭什么当毛主席的红卫兵？就凭我们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的子弟……历史是谁创造的？我们红五类的父兄！社会是谁推动的？我们红五类的父兄！江山是谁打下的？我们红五类的父兄！……我们就是红五类子弟。非红五类子弟，你要干革命吗？你就要背叛自己的家庭，你就要革自己的命，你就要和红卫兵站在一起。要革命就站出来，站过来我们就欢迎，就团结。站过来是条件，团结是结果。

这段话恰好符合了出身好的学生们的愿望。因而，只有出身于红五类的学生才能加入红卫兵便成了一条规则。在干部子女相对较多的重点学校里，这条规则往往有所改变，使只有「最革命分子」才有资格成为红卫兵。在这里，一个人成为革命者的潜能是由其父母的官位来衡量的。因此，出身不好的学生无论他们的政治表现多么好都会被排除在外。出身于中等家庭的学生则处在微妙的位置。理论上讲他们有机会，但实际上却被别人控制着。以前，中等出身的尤其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子女，往往是学生尖子和老师的支持者。他们怎么可能接受被贬到次要地位呢？

红五类这条原则当然受到了出身好的学生的热烈欢迎，北京有很多干部子女，相比之下武汉的干部子女在中学生中属于极少数，而且主要集中在武昌的少数学校里，武昌是省政府和武汉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武汉红卫兵接受新成员的标准比起北京要节制很多，尽管干部子女在被接纳为第一批红卫兵时的确享有特权。然而，出身不好和中等出身的学生被排除在外，在很多情况下容易引起公愤。一位被访问者当时是一名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中学生，痛苦地回忆起了1966年8月末的一个夜晚：

那天晚上，召开了一次全校动员大会，每个人都必须参加。过去开全校大会是按班级分块坐。可是那天晚上，把人分成三类。红五类坐前排，高唱《东方红》，并反复朗诵「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我们所谓「团结对象」坐中间，只能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黑五类最惨，他们坐在最后，什么也不许唱。不少出身不好的老师被拉上台，被逼着唱「我是牛鬼蛇神」之类的歌。文革前，出身不好的学生也受到歧视，入团比较困难。但那时歧视仍是无形的。那天晚上，歧视以赤裸裸的形式表现出来。学生中潜伏的矛盾变成了公开的对抗。当然受歧视的人当时谁也不敢反抗，但个个已是满肚子火了。那天晚上是我一生的转折点。

类似的情形几乎随处可见。当时，出身好的青年在武汉中学生总数中不到一半。他们的排外和傲慢、专横的表现不可避免地疏远了别的学生。这成了随时都可能爆发的一座火山。

红卫兵的崛起和破四旧的运动从两个意义上讲是重要的。

首先，红卫兵为有着一致利益的人们团结起来以对付别人开了个头。虽然说在 8 月和 9 月时只有出身好的学生才能允许这么做，并且每个学校只应有一个红卫兵组织来代表学生，但红卫兵还可以说是中国自 1949 年以来不受政治等级制度直接控制的第一个真正的群众组织。工会、青年团和妇联，作为党的附属组织，不能与党组织的指引相背，而红卫兵则不像这些组织，它从一开始就是独立的。它们的成立、纳新、组成、纲领、策略和活动都是由成员们自己来决定，而不是由官方的政治统治集团层层决定的。由于它们的独立，它们更可能与官方对抗而非与之合作。还有，党的领导这一原则如今解释成了「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这对不盲从当地领导人来说似乎是合理的。

其次，单个的单位之间相互延伸形成了群众还动。过去，政治运动基本上限定在各单位内，因而所有的社会力量都被截然地分开。只有党组织才有资格通过其等级制度组织跨单位的行动。而红卫兵的成立，则为有共同利益的人们结成跨单位的联盟，追求共同的目标开了先例。

解放以来首次这种突破，带来了自发的而不是受人操纵的群众这动。毛、中央文革以及其他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全部试图控制这场运动。然而，社会控制的紊乱，使得连毛这样的群众运动大师对控制文革都有了困难。

毛承认，他一开始并没有期望红卫兵成为全国范围内的现象，他也不会希望红卫兵朝着他力图避免的方向前进。从 7 月末到 8 月初，毛设法重新指导这场运动，但这些使毛和中央文革恼怒和不安的红卫兵们又一次对那些头两个月中曾被当作目标人

进行了袭击，8月份比起6月和7月来，有更多的人遭到了更残酷的虐待。后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多人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他们，而当毛在北京担起了运动的领导权以及工作组从其所在单位撤离后，他们又遇上了8月份发生的这些事件。出身不好或中等出身的学生的情况就是很好的例子。这表明，涉及千百万人的群众运动有其自身的逻辑。毛对于狂热的学生们对他的号召所做的响应感到很惊奇，以至于他没有认识到自己是在骑着一只难以驯服的老虎。

串联：造反精神的传播

声势浩大的破四旧运动使8月份的另一重要进展有些暗淡，这就是北京与外省市之间日益增强的人员流动以「交流革命经验」，即所谓「串联」。早在6月、7月份，有些人就希望到北京向党中央就工作组和所在单位的领导申诉不满之情，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地方当局禁止他们这样做。7月21日，毛宣布阻止这些人来北京是错误的。工作组撤离后，9月初有更多的学生甚至工人来到北京。8月16日，到北京来的人非常之多，中央文革小组只得在一个大体育场里为他们举行欢迎会。两天以后，毛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官方媒介报道说全国各地有很多学生在广场上。这表明中央已默许了串联。还有，传说毛主席将接见更多的红卫兵，这就更吸引了大量的学生从外地涌入北京。同时，点燃各省文革之火的愿望促使许多北京学生离开首都奔赴各省。

的确，北京学生有两条外地学生不具备的经验。首先，最高地方当局北京市委和市政府已经倒台并被取代；其次，自7月底以来中央文革成员反复强调派工作组的决定是一个「路线错误」，并想方设法鼓励学生们对这一决定和工作组本身进行批判。另外，北京学生得地利之便，能够得到中央新政策的最新情况，因此北京学生们一定觉得各省的文革处于停滞状态，而他们对北京发生的事情的了解对于各地的人们来说当然具有爆炸性。

「南下一小撮」——不受欢迎的人

8月底，第一批北京学生到达武汉。学生们有权利串联，刘少奇在中央受到了批判，地方党委应受到「炮轰」，这个传言如野火一般传遍武汉。省、市领导们感到很惊恐，似乎面临着难以征服的敌人。红卫兵们对牛鬼蛇神的残酷攻击并没有使当地官员们感到太大的担心，但北京学生们带来的消息则使他们非常紧张，因为这种消息往往会摧毁，至少会削弱他们的权力地位。

不久，北京学生正式把进攻矛头对准湖北省委。第一场争执其实是件琐事：《湖北日报》8月9日发表《十六条》时，没有像《人民日报》那样套红印刷，而是用了黑体字。北京学生们称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政治事件，当地官员理应至少承担一些责任。然而，省里的领导们则认为这是小事一桩。那时，「怀疑一切」的口号开始流行起来。但武汉的领导人们有理由相信，即使其他地方的领导人都犯错误，他们也不会。因为直到7月18日毛离开武汉，他都没有对当地的文革形势表示任何不满，而且前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已被提升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还是《十六条》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假如武汉的文革有什么错误的话，这位省的第一把手怎么可能上升为一颗政治新星？因而当地领导人们对他们不屈服于北京学生的决心感到很自信。

为了对付年轻的造反派们，省市领导们采取了几项措施。首先是预防措施。8月29日，湖北省委宣布省委宣传部长曾惇已被「揪出」。一周以后，副省长陈一新被公开批判。这两个人都是省委常委。牺牲他们是为了把对湖北省委的注意力转到对这两个人的批判上，表明湖北省委内隐藏的敌人已被抓住，表示省委对执行文革路线是非常积极的。这又是一场舍卒保车的游戏。

其次是保护措施。当地领导人努力给北京学生和本地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在领导社教运动、社会主义建设和目前的文革之中是多么成功。张体学决不放过任何一个夸赞湖北省委优点和成就的机会。他不止在一个场合都骄傲地宣称：

湖北省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一贯忠实于毛泽东思想的，是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路线的。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是搞得轰轰烈烈、扎扎实实的。

这分明是用防卫来作为平息进攻者并赢得同情的手段。

第三是进攻策略。为了剥夺北京学生传播消息的权利并保持他们自己对消息的垄断地位，当地领导人告诉市民，北京学给武汉带来的只是流言蜚语，唯一可靠的消息来源仍然是各级党组织以前控制的渠道。还有，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秘密组织力量反击北京来的造反派，8月29日，湖北省委起草了一封呼吁信，并于第二天以湖北大学学生的名义发表了。信中称北京学生是阻止武汉文革发展的「一股逆流」，还提出了一个新口号「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意思是任何对湖北省委的攻击都是对毛和党中央的间接攻击。第二天，武汉市委发出了又一封「紧急呼吁信」，用的也是化名，信中号召抵制「南下一小撮」。同时，当地领导人还在北京学生中仔细寻找同情者并力图利用他们来抵消北京造反者的影响。然而，由于本身具有的独特经验，即使那些在北京会被划为保守红卫兵的人也会非常激进，认为「炮轰」一个省的省委是相当合理的。因而对武汉的领导人来说要在北京学生中寻求更多的同情者是非常困难的，当时正任中央文革副组长的王任重对其部属们遇到的问题表示理解。王利用他的地位和

权力，组织几批北京红卫兵，由清华附中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发起人卜大华和 8 月 18 日为毛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宋要武带领，离京奔赴武汉。卜和宋当时都是全国出名的红卫兵，他们的使命是保卫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武汉的政要们把他们视为救兵并给予了特殊的礼遇。这些新来武汉的人以「真正的」北京红卫兵的身份赞扬了武汉的领导层，因而他们在反击其他北京学生的同时帮助巩固了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地位。

在文革以前，党的领导人认为任何向党组织挑战的人必然是坏人或受坏人怂恿的人。按照这个逻辑，武汉的党的领导人认为，尽管左派还没有成为领导力量，中间分子还混迹于主流之中，但北京学生中最积极的分子还是披着极左派外衣的右派。受王任重的指示，湖北省当局对那些活跃的北京学生进行了一番秘密调查，据说他们将会在某一天受到惩罚。

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努力似乎是有效的，当地学生和大多数市民对北京学生的抵抗也是强有力的。在过去 17 年中，还没有谁敢于向省委挑战。即使是在文革的头三个月里，也只是有一些学生对工作组或学校党委进行了批评，因而当地人认为对省委的进攻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这样，北京来的（以及后来从其他地方来的）学生发现他们不受当地人的欢迎。接待站的工作人员被告知要好好接待他们，但要密切注视其行动，当地学生寻找每一个机会与北京学生「辩论」，并常常在交战中抓住对方的把柄。北京学生被诽谤和攻击性的宣传所包围，感到窘迫和极大的愤慨。

然而，正如一句中国话所说的，「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些年轻学生们毫不畏惧。8 月 31 日，毛在北京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在武汉串联的学生们因此要求与湖北省长张体学座谈，希望停止对他们的迫害。张拒绝了这个要求，理由是：如果党的领导人立即满足学生的要求的话，似乎是省委害怕他们。9 月 2 日夜，40 名串联学生来到湖北省委所在地静坐。第二天，学生的数量增加到二百多人，他们还决定绝食抗议。这是 1949 年以来前所未有的事件，因而在武汉引起了轰动。许多工人自发前来谴责学生们「向党进攻」，「惹麻烦」，以及「制造一起武汉匈牙利事件」。毛的一则语录从那时起非常流行：「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因而普遍认为，有些北京学生就是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受到镇压。

串联的学生们发现那时在当地很少有同情者。他们带去的激进主张可能对某些人的思想产生微妙影响，但直至 9 月末当地的第一个激进团体仍然没有出现。大多数工人和干部不愿意看到当地的秩序被扰乱，往往对从外地来的惹麻烦者采取抵制行动，这可能要归功于当地政府采取的毫不妥协的立场。

9 月 4 日，湖北省委在武昌体育场召开串联学生欢迎会。张体学在讲话中再次强调，武汉的文革正在健康发展，湖北省委是革命的，并说他不想做任何自我批评。只

有几百名刚到武汉的学生在场。当被问及是否支持静坐学生的行动时，张回答道：「我只支持左派，不支持右派。」这句话惹怒了仍然在湖北省委办公大楼前绝食抗议的学生们。他们决定举行示威，并派部分代表返回北京就湖北省委镇压串联学生向党中央控诉。当天晚上，湖北省委秘书长王树成通过当地有线广播网发表紧急讲话。表面上他客观地解释了过去两天中发生的事，但他精心挑选的措词和他讲述事情的方式表明，静坐学生是蓄意挑衅和有意惹麻烦。

正如所预料的那样，王的讲话进一步在公众面前使所谓「南下一小撮」名声扫地。在湖北省委于次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所有与会者对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似乎感到非常自豪。张体学高兴地说：「我们赢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

但形势不允许他们松懈。在合肥，一千名北京和当地学生包围了安徽省委大楼，高呼「打倒李葆华（省委第一书记）」、「解散省委」。在上海，市委在北京学生的逼迫下召开了两次群众大会，市委领导在大会上遭到围攻。同样，新疆、广西、江西、江苏、广州等省区的当局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有些地方，局势似乎已失去控制。比如，串联学生与当地工人、农民和干部间的紧张关系爆发成公开的冲突，青岛、西安、长沙等城市都是这样。与此形成对照，武汉的局势要相对平稳，至少没有发生暴力，但这股火随时都可能烧到武汉。于是，当地官员感到有必要采取预防措施，张体学特别强调了宣传的重要性，并将采取一些措施以限制串联学生接近印刷厂、广播设备和交通工具。张体学还建议湖北省委文革领导小组进一步努力亮明省委的观点。他相信，只要当地学生不受到影响，这些串联学生翻不了天。

9月7日，毛严重批评了某些地方领导人煽动工人和农民对付学生。作为知情者，王任重从毛的批评中看到了将来湖北领导层潜在的危险。于是，他第二天就打电话给张体学，警告他除非做自我批评，否则就会陷入麻烦之中。张对王的警告感到很困惑。就在几天前，张被正式提升为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以填补王任重离任留下的空白。这被视为中央对张的信任。然后有川流不息的人来到湖北省委向他表示祝贺，并表示坚决支持省委。还有，9月5日以来，许多吹捧张体学和湖北省委的传单出现在武汉，甚至还有一首歌叫做《湖北省委就是好》。亲湖北省委的力量非常之强大以至张体学认为，省委假如不能控制那些愤怒的当地工人、农民和干部的话，就不能轻易地粉碎反对派。张体学认为武汉的形势有别于其他省份，首先，因为运动置于党组织的控制之下；其次，党组织并没有有意地动员工人、农民和干部去压制学生。所以毛的批评和中央的指示不必在武汉贯彻，王任重一定是过于谨慎了。

9月12日，那些于9月4日返回北京的学生又来到武汉。陶铸于9月8日与他们进行了座谈。陶赞扬湖北省委遵循了毛的革命路线，但指出，如果张体学对过去的成就感到自满，那么他就应做自我批评。串联学生则抓住后一点不放。他们立即在全市到处张贴大字报，称：「陶铸同志指示张体学检查他所犯的错误」。这条消息在全市

引起了轩然大波。以后两天之中，大约有一百万市民走上街头，对湖北省委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议论纷纷。不过绝大多数意思还是：没有犯错误。于是出现了与串联学生提出的「打倒湖北省委」截然相反的口号「捍卫湖北省委」。

9月15日，据说为了消除分歧，湖北省委邀请串联学生代表和当地学生代表出席一个所谓的「协商会」。这次会议又成一场争斗。串联学生坚持认为陶铸曾经指示张体学作自我检查，但在湖北省委看来，陶铸曾经宣布「打倒湖北省委」和「打倒张体学」的口号是错误的。亲湖北省委的学生当然倾向于党组织这一边。他们抗议道，「南下一小撮」「歪曲了」陶铸的指示，并认为北京学生们试图操纵武汉的文革。由于被当地学生们热烈的支持所感动，张体学被这激动的时刻冲昏了头脑。他作了一个充满感情的即席讲话，他说，我以我个人和三千万湖北人民的名义，控诉赵桂林（他是人民大学学生，当时在武汉的北京学生负责人）。张的讲话激起了当地学生对这部分北方人的更大愤怒。会议在混乱之中中断。

也是在9月15日，林彪在北京发表了一篇公开讲话，他说：

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斗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很明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

这成了湖北省委抵制来自下面挑战的一个新武器，对省当局的进攻如今被视为「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行动。

9月18日，三千名工人、干部和学生在武汉的重工业区青山区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声讨「南下一小撮」。同时，出现了大量赞成湖北省委的大字报和传单。因此造反的北京学生们被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他们到处被反对的人群所包围。9月13日，张体学自豪地宣布：「我们赢了」。而在14天前，他还只敢在湖北省委的会议室里关起门来这么讲。如今他似乎已不再担心在群众大会讲这种话。9月25日，赵桂林离开武汉回北京，这被认为是南下一小撮业已失败的确信无疑的标志。

第5章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文化大革命」在9月下旬的大转折

就在这时，一个突然的变化在中央发生了。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以后，毛和中央文革表现得都不是很积极。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周恩来和陶铸主持，随后做出了一系列决定，以努力使文革限定在文教界进行。在中央各部部长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甚至告诉与会者，运动将要结束，目前应该把注意力由文革转向生产。

然而与此同时，毛和中央文革对文化大革命的估计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变化。十一中全会以后与毛的意愿相违背的是，工作组撤离以后，群众之间的关系变得明显紧张起来，以至中央文革很快发现对这类争执的调解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难以进行的。于是中央文革进行了一项广泛调查，结果认为，群众中间的争端反映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间的斗争。代表前者的是那些敢于向一切权威尤其是工作组挑战的人；而代表后者则是那些压制造反派的当权者和受他们支持的人。既然两者不可调和而且造反派处于危险之中，中央文革最后决定支持前者而批判后者。

即使在北京，造反的学生也处于极困难的境地。他们被称为「少数派」，这反映出他们在各自单位的学生总体中的孤立地位。

9月24日，陈伯达首次提出了文革中两条路钱斗争的概念，但未做阐发。

转折点的标志是周恩来在9月26日接见北京第三司令部红卫兵时所讲的话。第三司令部成立于9月6日，基本上由「少数派」组成。起初中央似乎忽视了它的存在，江青、周恩来几次接见第一、二司令部红卫兵甚至还有中学生红卫兵，其中都没有第三司令部的人。如今，周恩来则对少数派采取了明确的支持态度，并提出了几条具体要求，如废除错误的文件，取消错误的类别划分，改变错误待遇等。

当中央的态度发生了大转变时，陶铸和王任重并没有忘记告诉他扞手下的人。陶铸打电话对中南局说，在群众中「抓右派」似乎太早……你们应该先查出一些走资派，其他的敌人可暂时放一放，他们以后会成为运动的目标。王任重命令湖北省委在处理串联学生和当地少数派时要特别谨慎小心。然而，湖北省的领导正为战胜南下一小撮而沾沾自喜，因而并没有领会王任重这番话中的深层意思。相反，他们认为王担心过分了。他们断言，武汉不像北京，少数派真正是少数派，而多数派真正是多数派。所以，为了不脱离左派群众，省委必须支持多数派。他们决定对每个少数派成员的家庭背景和个人表现进行调查。他们还决定动员左派群众斗争南下一小撮和「一小撮本地

少数派分子」。10月1日，省委领导们收到了王任重的又一个指示。这次，王明确命令湖北省委必须做自我批评，尤其是省委必须承认赵桂林是一名「革命闯将」。省委领导对此感到震惊。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权威从此开始走向衰落。

串联的范围和后果超过了毛泽东最初的预料。到1966年底，到武汉串联的人员就达到四百万人。也许大多串联的人对「交流革命经验」不如对游览风景更有兴趣，但串联对打破当时的政治平衡和创造有利于造反派的环境来说起了推动作用。

首先，由于「造反有理」口号的盛行，人人都想造反。中央文革也清楚地意识到，一个地方的保守派可以成为其他地方的激进派，因而鼓励学生们尤其是北京学生出去串联。串联成了利用保守派来激化全国运动进程的一条途径。

其次，串联有助于形成有组织的地方反对派。随着9月中旬串联范围的扩大，外地的消息随串联学生源源不断传入武汉。

重要的是，到9月底，大批武汉学生前往北京并有一部分已经返回。由于已经对外界的情况有所接触和了解，少数大胆的武汉学生公开宣布了他们与地方当局的对立。受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影响，武汉的一些大学生于9月下旬也成立了少数派组织，它们经常自称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最初红卫兵组织垄断地位的打破，是文革中的一个关键进展，由此开始了派性的冲突。

第三，串联对改变大中学校中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的平衡起了促进作用。到10月份，甚至出身不好的学生也允许进行串联。一到外地，他们的身份就不清楚了，别人可以做的他们也都能做，而且他们很快发现文革的主要目标是走资派而不是他们自己。串联为他们提供了重新评价在社会上的地位和文革中的作用的机会。从11月到12月间，当他们带着新思想返回学校时，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被彻底摧毁，于是他们大批加入了激进组织。

文革中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是在1966年10月。林彪在国庆庆祝大会的讲话中，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两天以后，《红旗》杂志也发表了一篇措词强烈的社论。10月6日，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万两千名学生参加了由北京第三司令部召开的「向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开火」的群众大会。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所有主要成员全都出席以示支持。从许多迹象来看，这次大会是一个惊人的事件，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次「向反动路线开火」的全国动员会，其结果很快就影响了全国。

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

10月9日，在毛的动议下举行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目的是要澄清各省领导们

的思想。由于未能达到最初的目的，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中一再延期。刘少奇和邓小平因共同执行了反动路线而被迫做自我批评。各省的主要领导也提心吊胆，由于被指责执行了刘的「错误政治路线」，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和命运感到忧心忡忡。张体学从王任重那里得知毛已经批判他「在政治上落后于形势」，于是赶紧检查自己的错误。出人意料的是，王任重自己也很快成了牺牲品。陈伯达于 10 月 17 日批评了他。第二天，王被迫递交了一份书面检讨。就在会议结束之后，王就被命令离开北京前往广东海南岛，这标志着他的失势。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周恩来对中央今后的计划做了说明。当时，中央一方面继续要求主要限于学生参加文革运动，并使他们的活动保持在一定范围内，同时迫使各省的领导向造反学生做些让步。

会议于 10 月 28 日结束。为了改变基层党的干部的立场，毛建议各省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同时，中央指示会议文件在 11 月 20 日前首先向 17 级以上干部传达，然后再传达到 17 级以下干部。但要各省领导遵循成命已不可能，当中央工作会议还在进行时，中央文革就有意地把会议的情况透露给了北京的激进派红卫兵。这样还在会议结束前，陈伯达的报告就传遍了全城。北京的形势显然对造反派有利了。

第6章 党组织的衰落

武汉的运动也来了个急转弯。直到10月4日，湖北的主要领导仍然对他们没有犯「路线错误」充满信心。然而随着北京的压力的增大，他们不久便感到垂头丧气。起初，他们试图玩弄同样的旧把戏「舍卒保车」，使自己幸免于这场风暴。于是，省文化局副局长任清和武汉市委副书记石渝被公开批判。但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武汉的领导除了承认「错误」，还曾经压制串联学生和当地少数派的事情向他们道歉。王任重的倒台打消了省委主要领导重振雄风的最后一线希望。

中国政治体制的权力结构某种程度上像座金字塔，其中每一层次官员的合法性不是来自下面而是上面，而且对毛的个人崇拜使他成为所有权力的最终源泉。因而在对付来自下面的威胁时，当权者们总是有信心、有力量、有效果。然而，一旦没有了上面的支持，就很容易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攻击。在文革的最初几个月里，由于王任重中央的地位，他往往对武汉的省、市领导起到保护伞的作用。他常常在毛和中央文革面前大加赞扬湖北省委，称武汉是全国文革的标兵。因而当地领导人感到自己很安全同时也很自信。如今保护伞不在了而且中央开始支持他们的对手。失去了上面的支持，他们对下面来说简直不堪一击，更不用说还手了。

学生造反组织的出现

10月中旬，赵桂林带着最新消息返回武汉。但他和串联学生在与当地党的领导人的对抗中已不再起领导作用，因为当地少数派已冲在前面。随着最早红卫兵组织的垄断最终被打破，过去被人们疏远的学生也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组织。他们还发现，对「反动路线」的批判为他们从卑微的位置上站立起来提供了机会。10月份在每所学校都出现了数不清的组织。这些新组织有一样东西是共同的：他们的成员都憎恨最早的红卫兵组织。那些被最早的红卫兵组织排除在外的人自然而然地如入了这些新组织。在这样一个狂热的政治气氛中，归属感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为了与最初的红卫兵竞争，这些新组织在某些问题上组成松散的联盟。随着这类联盟的逐渐巩固，个别组织还合并为大的核心组织。到10月中旬，每所学校通常有一对核心组织：最早的红卫兵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由于前者已于9月12日建立起全市范围的司令部，后者也努力协调他们自己的行动。10月下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力量经历了一个迅速的发展。这要归功于两个策略：首先，成员的标准比最初的红卫兵组织要灵活，后者只接收红五类学生，特别是高干子女，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实际上欢迎每一个人。

其次，他们在促进中立分子变为激进派这一点上很内行。一个方法就是公布所谓「黑材料」，尤其是把人划分为左、中、右的名单，这些名单都是过去由工作组或党委秘密准备的。很多人参加激进组织仅仅是因为发现自己被划入了比想象的还要坏的一类人中，只有在激进组织中勇猛战斗才能雪耻。

组织成员的扩大鼓舞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勇气。在 10 月的最后十天时间里，按照北京第三司令部的样子，武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发动了攻势。他们有的占据了一些学校的广播站，有的控制了档案，有的则夺了文革委员会的权。同时，他们正筹备成立一个全市范围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各主要高校都派代表出席了预备会。由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出现在华中工学院和湖北大学，而且在那里的力量也很强大，因而这两所学校代表的所作所为给人的印象是似乎他们功劳很大。他们为这个筹备中的司令部起草了宣言和章程，并希望别人承认他们的领导地位，他们的气焰激起了其他代表对他们的强烈反感。为了消除他们占据支配地位的可能，后者建议，只有历史清白的党员才能成为主要领导。而这两所学校的代表无一符合这个标准。结果，武汉测绘学院学生杨道远被选为未来的这个司令部的头头，尽管他在当时并非很有能力胜任这个领导工作。为表示不满，这两所学校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决定不再加入统一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组织而成立他们自己的司令部。因此当武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通常称为第二司令部）于 10 月 26 日正式成立时，上述两所学校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并未包括在内。后来他们独立成立的司令部即是通常所说的新华工（新华中工院总部）和新湖大（新湖北大学总部）。尽管形成统一组织的失败并没有立即导致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面对顽固敌人——当地当局和保守力量——时的公开冲突，但这件事带来的潜在的内部矛盾终将在失去共同敌人以后表现出来。

但第二司令部的成立毕竟是个重要的事件，湖北省的一些主要领导（除了当时还在北京的张体学外）都在第二司令部成立时前来祝贺并赞扬这些革命小将具有「造反精神」。不管他们的话是否出于真心，其行动本身就意味着当局已经第一次向激进学生低头。与仅仅一个月以前的局势相比，武汉的政局不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武汉地方当局的垮台

的确，当张体学 10 月底从北京返回武汉时，他发现自己的对手比他月初离开时已经强大得多了。11 月 1 日，湖北省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第一次会议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冲散了。面对来势汹汹的学生，省里的当权派感到毫无办法。尽管中央已建议学生不要干预这类会议，但当地领导人却不再敢限制学生们的行动。当局可以做到的一切就是与造反学生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公开的谈判。从此，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失

去了权威。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重要的结果就是摧毁了地方当局合法性。失去了合法地位，地方当局的主要功能——社会控制也就瘫痪了。没有社会控制，社会就很容易陷入混乱。尽管：以此为代价毛的最高权威被加强了，但没有各级社会控制体系，无论千百万人声称对他个人的领导多么忠诚，都几乎是无法实现的。在过去的沟通渠道中，地方当局介于中央和普通百姓之间。通过各级地方当局，中央对群众的行为不仅能够指挥而且也可以控制。在群众中对于理解上面的精神或执行全国性的方针政策无论什么时候有偏差，地方当局都会出来纠正这些偏差。当然，如果地方当局有意无意地歪曲了中央的精神也会出现危险，在文革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发生了这种情况。但是在中央与普通百姓的新的沟通模式中，地方当局已不存在或不起作用，因而中央充其量只能做出指挥但却不能控制群众的行为，因为没有人再会宣称他对中央精神的解释是权威的，每个人都可按照他或她自己中央精神的理解来行事。更糟糕的是，由于失去了地方当局的监督，致使一些人有可能根据他所在政治派别的利益伪造中央精神。这的确是文革中的一种普遍做法。

群众组织的普及

11 月和 12 月最重要的进展是，运动实质上超出了文教界的范围而进入了社会各个行业。

十一中全会结束后，与学生在学校和社会上的所做所为相比，工厂里的形势总的来说是死气沉沉。工人们说是参加了运动，实际上只是在业余时间学习一些有关运动的重要文件、讲话和社论。正常的生产并没有被扰乱。大多数工人更愿意这场运动按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而决没有想到会允许他们像骚动的学生们那样采取行动。

但对那些已被划为右派、三家村分子或反革命的人来说，重要的是如何洗清名誉。从这方面讲，他们与少数派学生有共同的利益。因而他们往往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常常对官方政策的细微变化更为敏感。然而，在 8 月、9 月份的时候，他们还不敢公开追求自己的目标。这些受迫害者顶多就是在自己单位里建立起秘密的关系网，并通过它来讨论形势，交流看法，更重要的是彼此给予道义上的支持。新消息对他们来说是极有价值的，为了获得官方渠道以外的最新消息，他们自然就会想到串联学生。9 月，武昌城区的湖北大学（当时为一接待中心）成为串联学生的大本营。一些心怀不满的工人也像少数派学生一样下班以后常偷偷跑到湖北大学。除了获得消息外，来自各个工厂的工人还在那里会面。共同的命运使他们彼此同情并联系在一起。于是各种秘密网络形成了。它是以后激进工人组织的萌芽，其中最积极的分子成为此后十年间

武汉历史上的知名人物。

受 10 月份少数派学生胜利的鼓舞，被孤立的工人们变得更富进取性。如果学生「右派」可以获得纠正的话，那么强加给他们的不良身份也可以去掉，于是他们的活动进一步升级了。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赢得造反学生的同情和支持。他们如何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情况很快就引起了一些学生的注意，因为这可以成为反对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新证据。一些非正式的网络于是逐渐在工人积极分子和造反学生之间形成。其中最广泛的一个出现在武昌区。

10 月下旬，形势已毫无疑问地对造反学生有利，于是这些工人积极分子终于决定摆脱疑虑公开宣布他们的存在。10 月 28 日，武昌的这个网络第一次召开独立的群众大会批判湖北省委推行的反动路线。一周以后，它召开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集会批判湖北省委的反动路线，一周以后即加入了第二司令部和其他激进学生组织，并提出「炮轰湖北省委，火烧张体学，猛攻王任重」的口号。

当时，工厂里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和其他地方都是个问题。就在 11 月 10 日《人民日报》发表《抓革命，促生产》社论，要求生产不应被打乱的当天，中央文革得知成立了一个所谓北京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当时，文革领导小组还没有想过如何应付工人组织，而且不只北京一个城市出现了工人组织。11 月 9 日，上海正式成立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工造总司）武汉则出现了工人总部（工总）。

11 月 13 日发生了一个急剧的变化。张春桥在上海宣布工造总司是合法组织。翌日，毛召集了政治局会议，会上他肯定了张的决定，理由是政策总应适应变化了的形势。这就等于毛和中央文革为工人的群众组织开了禁。但毛和中央文革说工人有结社的合法权利时，并没有希望工人分裂，并没有希望对工人组织合法地位的承认带来政治舞台上出现无数对抗性的组织。

工人组织的合法化是文革过程中的关键一步。因为，如果允许工人建立自己的组织，就不能否认其他社会阶层成立组织的权利。而且，群众组织的出现即使没有摧毁也是削弱了各（级党组织）的领导的权威。此外，随着长期被压抑的力量的释放和社会制体系的坍塌，无论中央多么强有力，局势随时都会失去控制。

工总成立后，要求湖北省委给予财政援助，并为前往北京的工人提供补贴。省委拨出 3000 元钱来刻公章和印制袖章，但不允许造反工人去首都。但造反工人们已不再把省委当回事，他们想方设法搞到一列火车去了北京。

当工总在武昌正发展的时候，又一个工人造反组织在汉口成立。由于华中工学院学生们的帮助，工人造反司令部（工造）于 12 月 8 日正式宣布成立。四天以后，又一个工人造反组织九·一三战斗队出现在青山区，武汉两个最大的企业武汉钢铁公司和第一冶金工业公司就在这个区。工总、工造和九·一三战斗队从此成为武汉众多激进工人组织中的佼佼者。

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对峙

尽管激进工人的势头越来越猛，但多数情况下他们在各单位仍是极少数。多数干部、党员、共青团员、过去的积极分子和老工人，被工人造反组织的出现搞得不知所措。对上述这些人来说，他们似乎认为造反派往往是在个人历史上或政治本质上有问题，犯过错误，不守纪律，调皮捣蛋，充满自私自利思想，老是为个人打算的这样一些人，「好人不造反，造反没好人」，所以他们不理解为什么造反派会得到北京的支持，为什么省、市委遭到攻击，为什么中共对日益混乱的局面视而不见。随着造反派的进一步猖獗，他们的忍耐也到了极限。

11月9日，第二司令部和其他激进组织一起占领了湖北省委机关报《湖北日报》的办公大楼，一周以后又命令报纸停办。

造反派关闭一家党报，这大概在全国还是第一次。中共中南局艰难地劝阻造反派不要停办报纸，但造反派无视这一警告。这件事引起了一大批人的愤怒。以后几天里，包括工人、干部、学生以及当地其他居民在内的望不到边的人流包围了《湖北日报》大楼，高呼：「湖北日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和党的机关报」和「我们要看《湖北日报》」，并且警告造反派立即撤出报社大楼。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湖北省委决定与造反派妥协以求得重新出报。11月18日，张体学承认造反派的行为是「革命行动」。然后报纸编委会和湖北省委就该报在前几个月中所犯的「错误」公开作了自我批评。但让步没有使任何人感到高兴。造反派更是得寸进尺，除了继续占领报社大楼外，他们还向湖北省委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让步也使省委的支持者们希望破灭了，在抗议省委的「投降主义」的同时，他们认为有必要建立自己的组织以压倒造反派。在武汉机床厂工人的倡议下，革命工人联合会于12月2日成立，它很快扩大为一个有40万成员的组织。

尽管联合会规模宏大，但它在行动上还是节制的，结果当湖北省委同时面对一方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激进工人组织而另一方是最初的红卫兵和联合会的压力时，宁愿不顾后者的要求而不愿使前者不高兴。12月15日，湖北省委正式决定停止出版《湖北日报》，这一行动被普遍认为是向造反派的投降。造反派因而变得更为放肆。12月18日和19日，他们袭击了红卫兵和联合会的本部。

同时，就在激进组织对付省、市当局占据上风时，造反工人在他们各自单位也大胆提出了个人的要求。其中，所谓「黑材料」是最热门的问题。按照周恩来所做的界定，「黑材料」只是指从1966年5月16日到《十六条》公布时的8月8日之间由工作组和党委汇集的材料。于是规定，除了必须退还给本人的自我检查外，所有其他形式的黑材料都应当众销毁。但造反派更感兴趣的是别人揭发他们什么内容和谁是通风

报信者，而不是他们自己写过的那些东西。而且更重要的还有，他们不仅知道 5 月 16 日以后都搜集了些什么材料，而且还了解自己的个人档案中还有些什么别的内容。然而党的领导人们不愿意交出全部的材料，因为他们认为即使是 1966 年 5 月 16 日以后收集的材料，其中一些有价值的将来也会有用。以前的政治积极分子也不想让所有的材料都露出去，因为其中许多是他们的作品。另外，党的干部和政治积极分子们不相信，这些过去一贯被认为是流氓的造反派会永远得势。

一方要得到更多的材料而另一方拒绝交出，于是紧张就产生了。更糟糕的是，从来就无法弄清楚谁有权利决定哪个是「黑材料」而哪个不是；怎么证明是否所有黑材料都已交出；由谁来裁决挑选黑材料过程中出现的争端。因而造反派靠武力夺取档案是常有的事。这类行动常引起激烈的冲突。在一家工厂，一位女档案保管员在造反派抢夺档案时死于心脏病发作。这位妇女是联合会会员。联合会抓住这件事对造反派发动了反击。12 月 25 日是个下雪天，全市的工人集合在武汉市最大的体育馆新华路体育馆里举行声势浩大的追悼大会。会后，他们抬着死者的大幅肖像在市内进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许多企业下了半旗。这次活动进行得非常成功，但实际它却使联合会处于被动位置。造反派指出这次行动就发生在毛的诞辰日（12 月 26 日）之前，并且指责联合会攻击毛主席，理由是死者的有些肖像比毛的还大，而且还发现在联合会散发的传单中，围绕毛的语录的花边是由飞机形状的标记构成的。于是造反派指责联合会明明是想「轰炸」毛主席。联合会简直难以为自己辩白。

祸不单行。不久更坏的消息公布了：曾负责湖北社教运动的一个中南局主要领导人李一清在广州指出联合会是个「保守组织」。不管别人怎么看，有哪个组织在文革中愿意承认自己是保守的？联合会认为李的指责是错误的，因为其成员的大多数长期以来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骨干，怎么能称他们是保守派呢？1967 年初的几天里，数以千计的工人包围了湖北省委大楼要求收回李的指责。不幸的是，天不作美，雪越下越大，在很冷的天气里难以一直在室外进行抗议活动。另外，还有造反派趁机制造混乱。更糟糕的是，联合会的主要头目前往广州要揪回李一清进行批判。由于缺乏有效的领导，这次活动以参加者们的解散宣告结束。

与似乎奄奄一息的初期红卫兵和联合会相比，激进组织却似乎在新年伊始全速前进。在他们的压力下，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在 1966 年的最后一个月里又作了几次检讨。12 月 25 日，王任重被造反派从广州押回武汉。两天以后，十九个激进组织成立了联合的「斗争王任重指挥部」。1967 年的 1 月 1 日、2 日和 4 日，举行了三个声讨王的群众大会。这位前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和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名声被一扫而光。另外，造反派又一次于 12 月 29 日袭击了红卫兵司令部并于第二天关闭了武汉市委的机关报《武汉晚报》。1 月 5 日，工总开始在全市搜捕联合会成员。结果有 3100 人被拘留。以前的党政当局也失去任何发挥领导作用的权力，武汉落入了造反派之手。

第7章 造反派与保守派

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构成

文革的前六个月是动员阶段。随着运动逐渐涉及从学生到工人的大多数城市居民，人们慢慢分为极为松散的两大类：「造反派」和「保守派」。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在文革的前两个月中遭受痛苦的人往往成为造反派。但是，直到 1966 年底并不是运动的每一个牺牲者都加入了激进组织的行列，也不是每一个造反派以前都曾都是牺牲品。造反派内部也有分化，尽管这种紧张关系还没有表面化。单单文革开始阶段的个人经历，似乎并没有说明派性斗争的全面情况。当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一针见血地指出：据说派性斗争是由工作组的错误方针引起的。但山东省根本就没派工作组，那里也有严重的派性斗争。所以派性斗争实际上是我们社会中阶级和阶层之间潜在冲突的反映。

文革以前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革中的派性斗争有什么联系？我通过访问和阅读文革文献得出了以下几个看法。

总的来说那些与官方有着比较密切关系的人往往是保守派。不仅学校如此，工厂也如此；武汉如此，所有其他地方也如此。我的访谈者个人的经历和他们对所在单位发生情况的叙述都证实了这一推断。实际上，即使是文革尚在进行时，也无人怀疑这一点。文革中，保守派常常攻击激进组织是「牛鬼蛇神」的藏身处。而造反派却几乎不能用同样的罪名来指责他们的对手。保守派常为他们家庭背景的「纯洁」和文革前的政治表现感到自豪，造反派也的确不能否认这点，但他们恰恰就「纯洁」这个概念本身向对方发难。在承认党员、青年团员、模范工人、积极分子、老战士和老工人更可能加入保守组织而不是激进组织的同时，造反派指责这些人形成了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对这个分析张春桥表示同意，他断言，有些模范工人已变成劳动贵族，因而他们在造当权者的反时已不再代表工人的利益。毛也注意到大多数党员、团员、积极分子和普通工人被纳入保守组织，但毛和张都把这个现象主要归咎于走资派竭力蒙蔽这些人。毛本人常常讲：「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然而在解释为什么「好人」会成为保守派时，毛似乎也是最愚蠢的。

随着权力结构的坍塌，文革为每一个人在保守和激进组织之间自由选择提供了机会。大多数人尤其是「好人」自愿加入保守组织并常常在对付造反派时比当权者表现得更不妥协。他们做出这种选择并不是因为害怕或被以前的官员蒙蔽，而是因为他们真心相信旧的结构基本上是可靠的。解放以来多数工人、农民和他们的子女的经济、

社会和政治地位的确已经提高。在过去尤其是政治运动中，他们一贯是作为积极分子或者同盟军来依靠的，但无论如何不是斗争对象。而且在他们来看，多数党的干部是好的，他们没什么经济特权，很少滥用权力谋取个人私利；他们与大多数人关系融洽，只同少数人关系紧张。因而他们认为没什么理由对这个基本上健康的体制及其操作者造反。就某个特定的单位而言，假如造反派可以成功地伸冤的话，那么就证明无论当权者还是过去政治还动的积极参与者都是错误的，而这将会给后者的前途带来危害。因此这些人注定会选择当保守派。

同样，对许多造反派来说，造反是他们的唯一选择。学校里的造反派通常是被最初的红卫兵开除的那些人。在工人和其他单位里，那些被孤立的人除了加入激进组织外是毫无希望为自己伸冤的。的确，激进组织容纳了许多保守组织不会接收的人，即使想加入的人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家庭背景和个人表现而提出申请，也可以接纳进来。所以激进组织中的非无产阶级出身人要比保守组织多得多。造反派提出「改变了的阶级关系」的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根据这一理论，解放以来阶级结构已发生了变化。许多出身好的人已蜕化为劳动贵族并形成了新的既得利益集团，而过去的半无产者和小资产阶级已成为无产阶级。但在建国后的十七年中，后者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经常被不公正地当作运动对象。他们构成了新的被压迫阶级。因而，他们起来反对压迫是合理的，文化大革命将会解放他们。同样可以理解的是，当代中国的两个基本阶级是「造反阶级」和「保守阶级」，他们之间的斗争将持续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发展时期。

即使可以正式划入出身好这一类别中的造反派也常常不如多数保守派那么「纯」。工总领导成员的情况就是个例子。除了其中三个人的情况不太清楚外，其余所有工总领导成员在文革前都或多或少受过处分。重要的不在于对他们的指责是否有充分的依据，而在于他们被当作了牺牲品，所以尽管出身好，他们知道自己也不会进入权力结构之中。

即使是出身好又从未受过处分的人也可能有理由被接纳为激进分子而不是保守派。举个例子说，他们可能曾被当作「落后分子」对待，政工干部和积极分子的不信任、批评和歧视，使他们长期感到不愉快。文革前，他们是敢怒不敢言，现在他们可以把怨气释放出来了。有的人成为造反派则是因为他们的亲属在文革爆发时成了牛鬼蛇神。

所有中国人人都知道，假如自己家庭成员或亲属中有一个人政治上不合格，那么他们也就不会再得到党的干部和出身好的同事的信任。从此以后，无论他们多么积极，都会被打入另册，划入地位低下的一类人中并与那些过去被自己瞧不起的人们有了共同的命运。

对局外人来说，解释为什么出身不好或中等出身的人会造反并不难，但却难以解释许多成分好的人为什么会加入激进组织。然而知情者明白，每个人都有充足的理由

做出自己的选择。一位以前的造反派领袖从自己的观察中得出这样的结论：

只要有一条出路人就不会造反。路断了，走投无路了，就反了，就逼上梁山了。文革前一帆风顺的人不大可能成为造反派。他们与领导无冤无仇怎么会去得罪这些顶头上司？造反的人也很少是出于关心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或仅仅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当时批刘邓，大部分群众不理解、也不关心，包括一部分头头。群众也没感觉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他们主要关心的是自己的切身利益。除了公开的宣传之外，说实话，群众对主席关心的东西并不关心。

但造反派这个词给人一种误解，似乎存在一个范围明确且相对同质的群体。事实上，造反派内也分许多小派系，其中的冲突同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冲突一样激烈，这一点我们在以后的章节中就会看到。为什么呢？以下四个例子可提供一些有关的情况。

事例 1 在一所重点学校里，造反学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属于第二司令部的「红十月」，一部分是第三司令部的支部。前者主要由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学生组成，后者的基本成分则是出身好但被认为落后的学生。不过所有这些人都是由于家庭背景「不清白」或者政治表现不好而被最初的红卫兵组织排除在外的人。这种排除正是这些人造反的原因，但两部分造反派内心有各不相同的目标。红十月造反派往往是因学业成绩优秀和表现好而受老师和学校领导喜爱的学生，所以他们在批判老师和领导时总显得勉强；而第三司令部造反派则不仅攻击学校领导和老师，而且也对「学生中的少数当权者」即以前的好学生进行非难，因为好学生们与他们从未有过密切的关系。尽管在武汉的政治生活中，第三司令部总的说来比第二司令部更为节制，但在这个特定的学校里，局势则正好相反。

事例 2 有一所中学，教师分成三部分：由出身好的过去的政治积极分子组成的保守组织；工总的隶属组织，其成员往往是出身好但不被学校领导信任的教师；自称「红教工」的组织，其成员基本是非无产阶级出身。三者之中，第二类组织最为激进，因为在他们看来以前的学校领导在政治上依靠的是积极分子，而在业务工作中又把非无产阶级出身的教师当作骨干，只有他们这些人被忽视了。第三类组织的教师并不喜欢政治积极子，但由于第二类组织的人业务能力不足，因而他们也看不起这些人。当工总的分支组织集中火力对同时任党支部书记的校长进行攻击时，红色教师们却对这位当权者有着复杂的感情，因为他待他们自己是相当好的。

事例 3 在一家医院里，有两个激进组织。一个主要由出身好的但被认为落后的勤杂工组成，另一个的成员则基本上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员。这两

者都猛攻党委。但前者主要集中于院长，他也是党委委员，而后者则认为党委书记应是主要进攻对象。因为，前者认为院长代表了专业人员的利益而轻视勤杂工尤其是落后工人；而后者则觉得书记应对医院里歧视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做法负责。

事例 4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家大型运输公司被认为已经「烂掉」，所以后来该公司的大多数干部被免职并由其他单位调来的工作组成员所取代。文革爆发后，所谓「四清下台干部」和他们的同情者（多数是公务员）们于是起来反对新的当权者，认为那些前工作组成员应对他们的遭遇负责。然而，这一行动却没有得到主要由多数落后工人组成的另一造反组织的较多支持。这一工人组织对新上任的干部进攻的火力不如对长期担任干部的那些人那么强，因为前者是新手，与工人没有什么冲突，而后者却在多年任职中得罪了很多入。

这四个例子有助于进一步剖析造反派的动机。造反派往往是出于各种原因心怀不满的人。上述这些例子说明，造反派的组成和内部派性斗争是与文革前的主要社会分化即干部群众之间、出身好的与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之间以及政治上的积极分子和落后分子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有密切关联的。出如，出身好的落后分子与当权者和积极分子发生冲突时，他们对那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的怀疑就不会消除，因为这是两者之间由于在家庭背景、教育、工作安排、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客观差异而多年形成的。相反也是这样。尽管这两类造反派在面对保守派的强大压力时出于权宜之计会形成短暂的联盟，但由于动机的不同或者对立因而最终会导致他们之间的反目。

不只造反派这个词多多少少会带来误解，而且用「造反派」和「保守派」这两个有多种用途的标签也会带来棘手的问题。保卫所在单位的当权者的人加入激进组织或者与上司对抗的人加入众所周知的保守派组织，这并不罕见。在社教运动中出现双重权力结构即一个由工作组领导而另一个由党委挂帅的单位中，上述那种情况经常发生。因此党委的支持者们就必然会与那些赞成工作组政策的人发生争执。在文革中，为了增强自己讨价还价的权力，武汉各单位的每一个组织都想把自己与一个全市范围的组织联系起来，而每一个全市范围的组织也想接纳尽可能多的追随者。在内部事务上发生冲突的组织从来未与同样的外部组织建立联系，这似乎是一条规律。因而，党委的同情者成了造反派，而工作组的挑战者却归属于保守派，这都是可能的。

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似乎都没有对这些单位的人作出确切的类别划分。重要的不是造出个新的类别标签而是要认识那些事例所代表的内涵。首先，文革中大多数参与者真正在乎的是他们各自单位里的事情而不是诸如「两条路线」之类的大的意识形态问题争论或者别的什么。否则，内部保守派变成外部的造反派或者反过来，就都是予可想见的。其次，一个局部性的组织归属一个全市范围的组织主要是想通过炫耀与外面势力大的组织的联系来威慑本单位中的对立组织或与之抗衡而并非是想表示其与保护者之间关系之牢固。然而，一旦加入了外面的一个组织，那么这个

局部组织也就与之有了共同的命运，这将会限制它的选择权因而不得不与其保护人在本市政治生活的问题上保持一致。换句话说，正是结盟而非他途才导致了意见的一致。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外面的联系主要服务于内部的目的。

林彪在 1966 年 12 月所做的讲话中，根据他在文革前六个月的观察总结指出，被压制的人和年轻人更有可能成为造反派。成年人根据自己过去的经验已经学会了处事谨慎并且把当造反派可能有的风险看得很重，因为他们还要养家糊口，而年轻人则不太关心冒犯当局的后果如何，尤其是在一种革命气氛中更是如此，这是年轻人显得更为激进的部分原因，另外可能就是他们的好斗表现太引人注目。但在任何年龄组中，很可能站在保守派一边的人比站在造反派一边的多，而年轻的保守派却在行动上比年长者更为激烈。因而年龄似乎影响了一个人行动的好战性但影响不了他的政治取向。可以说，在文革以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决定他在文革中站在哪一边的最关键因素。在 1949 年以后的 17 年中，许多人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文革开始后的两个月左右时间里，他们又与新的牺牲品一起再吃苦头，中央对本地当局的不信任第一次给他们提供了出气的机会，于是他们成了造反派。进攻的目标常常是那些他们认为应对他们的痛苦负责的人和对伸冤造成障碍的人。对刘少奇和刘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除了出于宣传目的外很少使他们感兴趣，由于社会控制机制已经瘫痪，因而造反派很少去想如何使这个体系合理化，他们的造反采取报复的方式，即对过去那些把他们当作牺牲品的人以牙还牙。

保守派常常被称作「保皇派」，意思是他们忠于从刘少奇到自己单位党委书记的各级当权者。的确，当武汉第一次得知刘少奇是目前进行的这场运动的对象时，多数人包括保守派和造反派，都认为是个传闻而已。但一旦证实了刘真的「犯了错误」，保守派和造反派一样对刘表示谴责，而且可能更为苛刻。王任重被中央文革撤职之前，造反派一直不敢忽视他。事实上当造反派得知王任重在北京遇到麻烦时同保守派一样感到震惊。在武汉召开批判刘少奇的第一次群众大会的正是保守派。保守派对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态度很有意思。起初，当省委领导针对串联学生和当地「少数派」的斗争时，保守派是狂热的支持者。而一旦省委在中央的压力下向造反派做了让步，保守派在对付省、市的当权者们时又成了造反者。在基层的个别单位，保守派与当权者有着共同的命运。他们往往拼命捍卫这些领导，因为文革前形成的保护与被保护关系使两者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所以任何对当权者的进攻实际上就等于在打击他们自己。就是为了保卫自己，他们也得捍卫当权者。保守派对高层干部不如对他们直接的上司那么关心，这也说明文革参加者们的动机出于切身利益的多，而出于对宏观思想争论的少。实质上，保守派所捍卫的并非当权者个人而是由他们所体现的现存权力分配结构，他们是这种结构的受益者。

造反派和保守派的行为方式

激进与保守组织在组成和动机上的不同特点导致了不同的行为方式。

由于造反派过去的经历往往不太清白并且是各个单位的少数派，所以他们常常首先与外面的力量联系并在单位以外发挥作用。与外面的联系有助于使他们显得比实际情况更强大，因为各个单位的少数派联合在一起，就能够压倒每个独立的单位中的多数派。由于他们在外发挥着作用和影响，也就不太害怕被披露出来的个人背景会有什么不利之处，而要是活动范围限定在本单位内的话，这一点就会给他们带来困扰。相反，作为多数派的保守派，并没有感到极度需要与外界力量建立联系。他们宁愿运动被约束在每个单位范围内，这样公共秩序就不会遭到严重损害而且他们对少数派的优越地位就能得以维持。由于这个原因，除了最初的红卫兵以外，全市范围的保守组织总是比同样范围的激进组织出现得晚。

在探讨集体行为的规律时，曼科·奥尔森叫（Mancur Olson）指出，成员非强制性的大型组织除了提供集体性的物品以外，还必须提供非集体性的物品从而给潜在的成员一种刺激让他们加入进来。文革期间，每个人似乎都急于加入群众组织，因为不这样做就会被说成「在伟大的政治运动中不积极」，这种指责大多数人都想避免。另外，一个人如果没能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一员就常常被当作他或她有严重问题的标志以至没有一个群众组织愿意接受他或她加入，当时的政治氛围迫使大多数人加入了这个或那个组织。然而，加入是一回事，而是否为之献身则是另一回事。根据奥尔森的规律，对造反派来说，寻求伸冤既是集体性也是非集体性的东西。没有组织支持，个人决不能打破旧的权力平衡，从这个意义讲，属于前者（集体性）；没有个人的努力，单单有利的环境并不必然会导致特定受害者社会地位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后者（非集体性）。既然独来独往的可能性已经排除，造反派于是受到激励，带着更多的奉献精神来行事。

保守派竭力维持现状，这恰恰是奥尔森所说的「公共物品」——它一定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由于没有各自独立的和有选择的个人动机，保守派的战斗能力常常弱于造反派。因此，尽管保守派总是在数量上占优势，却似乎经常被动。只有当现存权力结构受到威胁以至他们在社会中的优越地位处于危险之中时，保守派才会振奋精神打击侵犯者。颇具讽刺的是，似乎保守派显得最紧密、最强大的时候，实际上他们正濒临灭亡。所有的单位里都有激进和保守组织，都采取与一个由各单位许多小组织组成的大的全市性组织一起成立「联合组织」的形式。小组织联合起来形成一个代表大组织的联盟，因为与单位内的对手对抗时，外界的支持对于生存是很关键的。同时，每一个小组织又是高度独立的，因为其成员首先考虑的是改变或保留单位内权力分配的

方式。这样无论是联盟与成员组织的垂直关系还是各个小组织间的水平关系都是松散的。这种多细胞组织有它的优势。它允许活跃分子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也能使领导者们能够保证对组织的维持。但无中心、分散的自发组织网络也有其劣势。它与持续大规模的动员是根本不兼容的，常常影响其战略的有效性。中心组织可以偶尔发发指示，但没有约束力。小组织之间不时可以互相帮助，但他们也不是必须这么做。没有一个奖惩体系，这些组织以紧密的方式来这作是不可能的。与保守派相比，造反组织总的说来在内部协调上更懈怠，在纪律上更松弛。它们无法控制其成员和次一级组织的所有行动。而保守组织则相对集中一些，因为他们的领导人一般说来具有一个造反派不具备的很重要的资源——在过去曾经存在的社会政治组织中的优越地位。他们可以这周这些关系来动员和组织他们的成员。

同样，基层的小组织也没有章法。一个人可以一下子加入不止一个组织。一个组织的成员可以从不参加本组织的任何行动，特别是在激进组织中，有些造反派在抛弃官僚主义的同时也抛弃了领导、程序和纪律，所以他们的组织简直是乌合之众。

当社会控制瘫痪而且新成立的群众组织缺乏内部控制时，意外冲突的可能性就增加了。一个小火花可能会引起燎原大火，因为在敌对的气氛中，即使一个特定单位中的小冲突也很可能被说成是某个大组织为伤害对手而采取的有预谋措施的一部分。因而正像我们从后面几章中可以看到，敌对情绪和挑衅行动逐步升级了。

第8章 「一月风暴」中的武汉

武汉的夺权斗争

到1967年1月中旬，在武汉几乎已看不到保守组织了。但随着造反派逐步占了上风，他们队伍内部的分歧变得越来越大了。尽管这些冲突还没有表面化，但再来个催化剂就会引起爆炸。这个催化剂就是中央号召夺权。

1月14日，受中央鼓动造反派向所谓走资派夺权这一消息的激发，工总邀请另外13个组织一起讨论武汉夺权的前景。在起草「致全市人民的公开信」这一点上，他们很容易地达成了一致。但就如何进行夺权展开具体讨论时则很快陷入了僵局。会谈最终破裂了，公开信也从未散发出去。

在后来几天里，没有再进行商谈，但幕后对夺权的准备则在加速进行。每个组织在密切关注对手的活动的同时都在寻找同盟军。工总、二司、红工军、九·一三战斗队和红教工大本营所在的武昌红台成了密谋策划的中心。想要将功赎「过」的张体学于1月18日提议派他的代表去红楼与那里的造反派就如何完成权力交接交换看法。这一行动表明过去的省领导愿意在夺权中尽可能进行合作。现在问题是谁来夺权。

1月20日，在工总和二司的提议下，会谈在武昌恢复了。共有14个代表参加。彼此争执了三天以后，他们于1月23日宣布已就形成一个大联合达成了一致。于是成立了武汉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并推选工总来主持这个总司令部。这个总司令部将处理夺权中出现的所有事情并作为权力交替时期省、市两级的过渡政府。然而，这只是个幻想而已。就在当天，发现该总部的成员组织之一的工造在汉口秘密成立了由大约20个组织组成的另一个总司令部。工造正密谋把武汉市当局的权力独吞而与别的组织共享省一级当局的权力。

在此以后的三天里，谈判达到白热化。参与者由于三个争论而被划分开来。一是，夺权的条件是否完备。彼此关系密切工总、二司、红工军、九·一三战斗队和红教工坚持认为条件是完备的，因为他们确信联合起来就能在夺权中占据上风。而准备夺取武汉市权力的工造知道无人敢把它这个本市第二大工人造反组织排除在外，因此也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但那些需要更多时间来提升自己讨债还价地位的组织，比如三司、新华工、新潮大等则声称夺权应该推迟。

二是，由哪些组织来当总司令部的常委。二司提议常委会应由五名成员组成，四个工人组织和一个学生组织，意思是常委中的学生组织就是它自己。这个建议当然遭

到了其他学生组织的反对。经过激烈争论，四个工人组织即工总、工造、九·一三战斗队和红工军与三个学生组织即二司、三司和新华工这七家被选为常委。

第三，武昌的总司令部和汉口的总司部关系如何。过去，工总和工造曾就各自领地的划分达成过个君子协定，即武昌是前者的势力范围而汉口属于后者。由于这个原因，工总尽管在其他方面可以旗帜鲜明，惟独对工造试图在自己领地内夺权加以谴责这一点感到犹豫不决。而二司则对工造毫不留情，它想方设法迫使后者立即解散汉口的总司令部。工造表示拒绝。1月25日，决定夺权将于次日下午三时进行，但工造由于对二司坚持汉口的总司令部必须解散的立场表示愤怒，宣布退出「大联合」。

为防止夺权计划的失败，总司令部于第二天上午敦促工造重新加入。而工造则坚持，除非二司离开常委会，否则它不会参加夺权。别的学生组织也支持这个主张，他们也由于二司的「唯一学生组织」计划而感到不快。最终达成了妥协：二司可以保留其常委资格，但它的代表必须换掉。所以那天下午湖北省的权力易手之时，没有二司的代表在场。

湖北电台立即广播了省委的权已被造反派夺去的消息。前第一书记和省长张体学要求湖北省、地、县过去的领导们与新当局进行合作。

然而，过去当权者积极的合作并不能防止新领导层从内部崩溃。由于认识到二司的缺席将大大削弱他们在常委会中的影响，所以「权力交接」发生仅仅五个小时以后，红楼联盟——工总、二司、九·一三战斗队、红工军和红教工联合宣布夺权无效。此后武汉的造反派分裂为两个阵营。

「二八声明」

哪一派也没有放弃夺权的希望，但不再能一起共事了。2月2日，工总与其他12个组织成立了湖北抓革命促生产革命造反司令部。次日，工造与其他43个组织又成立了湖北抓革命促生产夺产红色造反司令部。2月5日，革命造反司令部仿照上海的样子在《长江日报》发表「紧急通知」。第二天，几乎同样内容的又一个「紧急通知」出现在《湖北日报》上，但署名却是红色造反司令部。这一竞争以及其他敌对行动逐步引起两大阵营关系的恶化。

2月8日，工总、二司和另外10个组织在《长江日报》上发表声明，攻击工造及其同伙是「托派」、「分裂主义组织和「湖北省委的第五纵队」。这一声明无异火上浇油。此后的两周内，「2·8声明」成了武汉的头号热门话题。而它的对手则骂这个声明是「一株毒草」，并天天围攻《长江日报》，谴责这家报纸「挑动群众斗群众」，「支一派压一派」。而「2·8声明」的认同者则赞扬它是一朵「美丽的香花」，并认为

该声明是正确的，理由是革命者必须把「托派」清除出队伍以达到最后的胜利。这个话题压倒了一切，以至在全市到处可以发现街上的人群在对这个声明日夜进行激烈争论。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参与争论的多数人从未看过声明的原文。更有意思的是，许多表面上对这一声明坚决支持的人私下承认他们个人并不喜欢它；或者正好相反。显然，所争论的并非声明本身而是人们的派性认同。这种争论决不会改变人们对声明主题的态度，但对强化一个人对他所属组织的认同则是有效的。在此之前，围绕 1 月夺权的争论主要涉及的是群众组织的头面人物。对 2 月 8 日声明的讨论则促进了派性对抗向基层的扩展。此后，武汉造反派这一边的每个群众组织甚至每个人都被划入「香花派」和「毒革派」中的一派。尽管两派出于反对保守派的目的偶尔会结成策略上的同盟，但直至文革结束，他们之间的不信任从未真正消除。

1 月份的夺权似乎从各个方面讲都有悖于倡导者的初衷。

首先，夺权的目的是不只是为了从别人手里把权夺过来，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建立新的权力当局。然而多数情况下，夺权是不彻底的，也就是说，以前的党政控制机构已被摧毁，但造反派却未能提供有效的替代机构。

其次，由于缺乏公共权威这个支柱，社会处于解体的极度危险之中。

第三，毛诉诸夺权的原因是要恢复国内的秩序和正常的生产。缺乏准备的夺权运动开始以后各方面的形势却越来越糟。在无政府状态下是不可能保持正常生产秩序的。1967 年 1 月可能是文革爆发以来工业生产最坏的一个月，至少武汉是这样。统计表明，这个月中武汉的工厂至多完成了生产计划的 60%，多数完成了 40~50%，有的只完成大约 20%。

最后，随着打碎市政当局的胜利，狂妄的造反派正设法摧毁旧体制的最后一个支柱——军队。在中国，地方与军队当局的关系传统上是非常密切的。比如在武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时担任着武汉军区第一政委，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又是湖北省委常委。然而随着夺权的升级，部队遭受造反派攻击的报告接连涌向了中央军委。

所以，毛期望群众夺权能带来革命秩序证明是个幻想。更使他失望的是，夺权几乎给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一场浩劫。紧迫的形势迫使毛必须立即采取严属的防范措施来控制疯狂的造反派。

第9章 武汉的「二月逆流」

2月8日声明在武汉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还在北京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毛在会上讲话说，袭击军队大院的造反派中一定有些「坏人」，陈和钟对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毛还劝告军队在受到袭击时「首先向进攻者退避三舍」。但陈和钟把毛的意思理解为「以守为攻」。假如造反派得寸进尺，那么他们相信军队应该还击以进行自卫。退避三舍可以，但不能退避四舍。

2月11日，十天前刚刚成立的武汉军区支左司令部遭到造反派中「香花派」的袭击。当时，由于有中央军委的支持，成都、福州和广州军区都采取行动对进攻部队的人进行反击。武汉军区也仿照其他军区的样子，于2月18日发表「严正声明」谴责2·8声明和香花派。次日，武汉的部队还空前地在市区内进行了武装游行以展示其力量之强大，所有军队大院大门口都设置了警戒线，宣布外人不得非法入内。

可想而知，武汉军区的声明受到了「毒草派」的欢迎。尽管这一派的人并不特别喜欢军队，其中有些人以前还曾批评过军队，但他们对军队站在自己一边反对强大的对手还是感到高兴。权力斗争的实质就是使能够合法提出权力要求者的数量尽可能少。假如说2·8声明是香花派的惨败之处的话，那么毒草派则希望自已与当地军队的结盟有助于把香花派赶出这场夺权运动。出于这个原因，在2月份的剩余时间里毒草派对武汉军区

通过发布声明、举行群众大会和进行谴责香花派的示威行动所表明立场表示非常热烈的支持。这时，武汉军区与造反派中的毒草派似乎有了一致的利益。在遭受夹击的情况下，香花派组织的许多成员被赶了出去。因此香花派还在进行绝望的斗争，但很快便失去了对毒草派的优势。

2月底左右，陈再道和钟汉华返回武汉。离开北京之前，周恩来与他们进行了谈话并告诫他们要特别注意工业生产；要形成各行业、各部门以及学校各班级基础上的大联合；恢复大中学校中的班级。周的指示使这两位军队领导人感到恢复秩序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同时，他们对敢于抵抗的造反派尤其是香花派的担心，随着中央文革对2·8声明的批评而消除了。2月27日，中央文革的一名成员向北京的第二司令部联络部代表指出，2·8声明是错误的，因为它赞成「反托派」立场，这位文革小组成员还警告，严禁把矛头指向解放军。

由于有中央保守和激进领导人两方面的支持，陈和钟对自己可以重建秩序充满信心。因而，他们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

首先，对造反派采取了高压措施。这一政策的第一个牺牲者当然就是「香花派」。

尽管文革严重破坏了权威的等级制度，但「金字塔」实质并未消除。唯一不同的是，基层和中层的领导基本上垮台以后，事事都要由最高权力机构——毛的中央来认定是否合法。出于同样原因，尽管鼓励老百姓起来造反，但并非意味着造反是他们的合法权利。相反，这是毛的中央给予的恩赐，随时都可以收回。一个组织只要不受到中央的点名批评，它就决不会向任何其他当局低头。然而一旦中央对该组织表示轻微不满，它的对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它。中央文革批判 2•8 声明的消息传到武汉时，香花派认识到他们在与军队和毒草派的对抗中输了。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持低调立场并等候时机。工总的头目于 2 月 27 日下午前往武汉军区司令部请求宽恕，以后几天里，香花派在大街上排长队，举着标语牌表示请求原谅他们所犯错误的愿望。然而当香花派低三下四表示屈服时，武汉军区却变得趾高气扬起来。它命令香花派所有组织清除全市的反对武汉军区 2 月 18 日声明的大字报和标语；警告香花派不得煽动群众进攻部队；禁止任何人公开表示反对武汉军区的立场。3 月 1 日，陈再道宣布，反革命必须镇压。我们只允许他们老老实实，绝不容忍他们乱说乱动。显然，武汉军区很清楚，姑息会带来灾难。总的来说，他们的意图是要摧毁造反派尤其是香花派。

为了切断当地造反派与中央和其他省市造反派的联系，军队于 3 月 1 日对长途电信局实行了军事管制。除非事先征得电信局军管会的同意，否则群众组织不得向中央发拍电报。还对当地造反派和外地造反派之间的书信秘密施行了检查制度。还有，为了削弱香花派对公共舆论的影响力，武汉军区关掉了《长江日报》。在剥夺了香花派的通讯手段后，军队又拔掉了香化派以及其他造反派组织的据点。3 月 3 日到 10 日，军队占领了红旗大楼（《长江日报》所在地）、井岗山大楼（一家市的行政管理局所在地）、中南旅社、民众乐园（一家娱乐中心）和红楼，所有这些地方都在市区内并在交通干线上，自 1966 年底以来，它们一直被造反派占为根据地。

这对造反派是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各自单位都是少数派，常常有可以被他们的保守派同事利用的弱点。只要允许造反派在他们的单位以外发挥作用，他们就能够在市或省一级的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一旦把他们分散或迫使其在本单位内活动，即使保守派不精心组织，这些人也很容易低头就范。

一场动摇造反派士气的政治攻势正在进行，在陈再道的指示下，当地报纸和电台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谴责 2•8 声明。这场运动威胁着似乎受到各方面轰击的香花派成员。为了进一步搞臭造反派，那些被军队重新夺回的地方向公众开放，以表明造反派们曾在这里犯下了怎样的罪行。在数以万计的参观者的印象里，造反派组织往好里讲是渣滓，往坏里说就是犯罪帮派。

就在批判运动不断加强时，一个针对工总的调查也在进行。出于这个目的，武汉军区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并动用了武汉市公安局的侦察力量对工总的头目进行侦察。调查使军队得出这样的结论，工总的确是个藏污纳垢的组织，它包庇牛鬼蛇神，纵容

坏人恶行。武汉军区决定解散这一组织。中央没有肯定武汉军区的建议但也没有驳回这个请求。中央的不介入态度于是被理解为对建议的默许。因为有先例，所以陈再道在发布命令摧毁工总前并没有过多犹豫。3月17日深夜，武汉军区派出部队，在公安局及其派出所的协助下，追踪并逮捕了区一级分部以上的工总头目。拂晓前，有485人被拘捕，3月21日，武汉军区在一天内发布了一个公告，一封致全市居民的公开信，和关于「工总反革命所犯罪行的调查报告」。工总（及其附属组织）被称为由反革命幕后操纵的一个组织，并命令其立即解散。

二司的头头们由于害怕遭到同样的屈辱结局，于当天列队游行以表明请求军队宽恕他们过去所犯错误的愿望。由于《十六条》禁止任何强迫废除学生组织，军队也不得不在对付二司时采取不同的策略。二司被谴责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只要其头目承担责任。军队还称有些反革命分子混入了二司领导层，希望该组织的普通成员纠正犯了错误的头头们的错误，并揪出「暗藏的阶级敌人」。普通成员都急于澄清自己的问题，因而很容易被利用以搞垮二司。这个策略似乎很见效。二司的三个主要头目开始互相指责。一些分部负责人也声称受到了欺骗，并成立了「整风办公室」来接管控制权。基层的普通成员则较之更甚。在正式脱离这个组织之前，成员们就针对所在分部的头头举行公开的声讨会，这一点并不罕见。随着各级领导人被清除，二司作为一个组织垮掉了。

同时，香花派的其他群众组织，如九·一三战斗队和红教工等，也迫于压力倒台了。

起初，毒草派造反组织对军队镇压香花派表示欢呼，希望通过这一行动消灭他们在夺权方面的对手。军队搜集工总的罪证时，他们总是热情地提供情况。然而，不久他们就发现，曾经遭到批判的保守派和干部们正利用批判2·8声明和香花派向他们展开反击。3月4日，仍由毒草派造反派控制的《湖北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坚决打退妄图秋后算账者的报复计划》。文章谴责了2·8声明，并警告「伺机报复的人」即那些保守派要规矩点。但军队则指责这篇社论与2·8声明是同样有害的。翌日，《湖北日报》被迫收回这篇社论。3月9日，这家报纸就社论中反映出的「严重政治错误」在报上作了长篇自我批评。该报编辑部被军队改组。过去的主编官复原职，造反派被赶了出去。人员改组保证了军队对该报的控制。3月4日社论受挫以后，毒草造反派开始走向衰落。到3月底，该派的一些组织已经解散，其他组织尽管还在挣扎，但已是奄奄一息。

在证实香花和毒草造反派均已解体时，武汉军区的一位副司令员得意地说：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现在就是要报，不是秋后算账，而是春前算账。

武汉军区支左司令部负责人也说：

这次运动就是要整你们这些牛鬼蛇神。跳出笼来登台表演，你们现在表演够了，该我们表演了。如果你们不老老实实，就杀了你们的头肥田，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现在是专你们政的时候了！

一度忍辱负重的保守派和干部们与军队持有同样的看法。在他们看来，毛鼓励不满者造反似乎是设置了一个陷阱。通过这个方法，隐藏的牛鬼蛇神会暴露出他们的真面目。他们对毛的计划非常崇拜，说「毛主席的确比刘少奇英明。刘少奇用网捕鱼，而毛主席是排水抓鱼」。12月份和1月初的挫折以后，保守组织基本上消失了，但保守派作为一个社会集团却拒绝投降。他们为避免与本单位里的敌对的造反派联系起来，也成立了独立的新组织，或者集体加入造反组织（在本单位居主导地位的造反派组织除外）。

3月，保守派又在新的伪装下复活了。为了给保守派恢复元气正名，军队对「左派」和「右派」的概念重新进行了定义：

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按党的政策办事，就是左派；不按党的政策办事就是右派。先说你们是反革命，你们不服气，现在你们自己跳出来了，把革命群众打成保皇派，斗争、戴高帽子、游街。凡是这样搞的统统是反革命。什么保皇派，都是好同志，是按党的政策办事的，是真正的左派。你们是什么红色造反者？是国民党，是法西斯、土匪。你们连资产阶级也不如，资产阶级还讲人性，你们连一点人性也没有。

用新标准来衡量，军队可以使一些保守组织复活，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因而又出现了。

在军队的支持下，保守派对造反派发起了报复性的反击。造反组织的头目经常在公开的批判会上受到谴责，甚至普通成员有时也被迫做检查。在军队要求下筹备成立工厂的「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和学校的「复课」委员会时，造反派尤其是香花派多半被排除在选举之外。3月份时，「造反」在武汉成了个贬义词。

军队在镇压造反派的同时，又大力重建公共权威。陈再道和钟汉华返回武汉，湖北省军区就于2月27日至3月1日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陈再道对与会者讲，必须做出努力以促进已经停滞的经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认为各级都应迅速成立对生产的领导实体。会后，成立了以湖北省军区副令员为首的省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命令地一级的军分区和县一级的人民武装部尽快成立他们各自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一周以后，指导生产的体系在武汉建立了起来。此后不久，

几乎各单位都成立了这样的办公室。

此后，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成了公共权威发挥作用的标准形式。所有的夺权活动，无论成功与否，都被宣布为无效。并希望通过各级建立这样的办公室，能够建立起一个统一、内在联系并有效的权威体系以填补 1966 年底以来留下的权力真空。

从理论上讲，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应该是基于「三结合」原则上的，诚然军人在各处的这类办公室中的确起主导作用。然而，在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中群众组织的代表如果说有的话，顶多也是个摆设。

干部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因为只有有着领导经验的干部才能够熟练地恢复社会和经济秩序。整个 3 月份，军队接二连三地召开干部会议，会上宣布过去的领导人恢复原职，群众应服从他们的领导。除了一些微妙的情况外，以前的官员多数官复原职。比如，前武汉市长刘惠农就被任命为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层官复原职进行得更为完全彻底

到 3 月底，局势似乎又回到了 1965 年时的样子。干部复职，工人回岗，学生复课。公安系统对维护社会秩序又开始发挥作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的作用又重新加以强调。停滞的经济发生了有利的转变。一句话，被颠倒了的文化大革命前的权力关系又一次颠倒了过来。3 月 28 日，刘惠农在一次干部会议的讲话中宽慰他的部属们说：

你们前一段挨了整，受了委屈，不要紧。现在牛鬼蛇神都跳出来了，要一网打尽。

陈再道对未来更为乐观，他说：

当前一股反革命逆流被粉碎，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实行大联合，右派组织正在土崩瓦解，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篡夺的权正在被夺回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

第 10 章 求平衡的发展

反击「二月逆流」

陈再道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没能注意到北京风向已变。正当他庆贺自己粉碎了武汉的「逆流」时，首都的造反派也声称他们在反击逆流，而这两者的意思是截然相反的。

在中央文革的发动下，各地都开始反击「逆流」。在武汉，各地 3 月份发生的局势变化带来的基本结果就是摆脱了军队强加给造反派的限制。《人民日报》发表《论革命的三结合》社论的第二天，新湖大就举行游行示威，鼓励二司的成员发奋努力并继续与走资派和保守派作斗争。武汉军区则按自己的方式对《红旗》的社论作了解释，并谴责这一行动是一次「反革命游行」，迫使新湖大公开作检查。3 月 19 日，北京红代会派一个调查组来到武汉。随着它的到来，谭震林已被揪出的消息传遍全城。该小组与当地造反派取得联系，告诉他们敌人对其所做的一切就是一股逆流，中央文革正在组织反击这股逆流。这个调查组还为向其领导写报告搜集证据，说明武汉造反派如何遭到镇压。调查组带到武汉的情况鼓舞了当地造反派的士气。3 月 26 日，新华工、新湖大和新华农（通常所指的三新）大胆地宣称，在武汉有一股严重的反动逆流，他们将与之进行战斗。当天，曾在几天前低三下四地向武汉军区递交「赦免请愿书」的二司头头们举行会议并发布通告要求其成员投入到与使他们深受其害的逆流的斗争中去。第二天，造反学生举行示威以显示其决心。他们齐声高呼，「一切权力归造反派」；「彻底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向二司的革命战友敬礼」。

到 3 月结束，形势已经比较明朗。3 月 30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两篇文章，作者分别是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和中央文革成员林杰，文中都鼓动全国造反派对逆流进行猛烈反击。这是党的机关报第一次公开用「逆流」一词描述过去两个月中发生的事件。三天以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对逆流进行了谴责。根据前面提到的那个调查组就武汉形势所提交的长达百页的报告，社论指出了逆流的主要特点是：

抓住革命小将的某些缺点、错误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甚至操纵已垮台的保守派组织进行翻案活动，把一些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

这些文章和4月6日军委的十点条例鼓舞了造反派的士气。4月上半月，武汉的形势甚至外部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安静了大约一个月的大街上再次济满了喧闹的人群；刚被洗刷过的墙壁又贴满了五颜六色的大字报和标语。所有造反派全都情绪高涨。不过政治上幼稚的学生造反派是喜形于色，成年人造反派则往往是内心窃喜。除了那些感到自己不会有什么损失的人以外，多数成人造反派在确信自己再次崛起没有危险之前宁愿持观望态度。而有些人从过去两个月的经历中得出结论认为，进一步卷入造反行动所得甚少而所失颇多，于是决定中断与任何组织的隶属关系，只对运动采取观望态度。所以我们会发现，像文革初期一样，在与逆流的战斗中学生们处于先锋地位。

4月1日，三新和二司各自举行了群众大会和游行。当游行队伍在街头相遇时，他们联合了起来，并互相称赞对方的「革命造反精神」。面对曾经毫无区别地镇压所有造反派的共同的强大敌人，那些夺权时的对手认识到彼此合作的必要性。他们的头号敌人并非北京的谭震林而是武汉军区的陈再道，用他们的话讲就是「武汉的谭震林」。从那天起，「打倒武汉的谭震林」成了团结武汉所有造反派的一个口号。为了从军队的控制中摆脱出来，造反派们开始对军训计划进行批判。征召学生进行军训的主张被谴责为迎合了走资派和保守派的需要，进一步推动了反革命逆流的进展。很多学校的造反派不仅停止了军训计划而且发动运动驱赶军队的军训队。在压力之下，武汉军区于4月9日决定从各校撤出军训队。

军队的让步增强了造反派的勇气。4月6日，一群造反派就在武汉军区司令部大楼外贴出大字报，题为《向武汉军区支左司令部的一小撮混蛋挑战》。这个大胆的行动在武汉引起了轰动。

在保守派看来，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和不可思议。当「逆流」一词最初出现在官方报纸上时，他们认为这是指陈再道谴责造反派的过火行动时所指的那个意思。他们当然不会同情那个逆流。然而不久就更清楚地看到，中央的意思是指对造反组织的镇压。狂妄的造反派叫嚣要「粉碎所有保守组织」。保守派因而被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对军队来说，形势正越来越尖锐。它曾付出格外的努力来维护的公共秩序，如今正再一次走向崩溃。除了造反学生以外，似乎已被解散的工总也准备制造混乱，尽管其头目仍处于监禁之中。4月8日，几十名前工总成员举行火炬游行。翌日，在两家最大的工厂里，一些造反工人宣布恢复成立工总分部。更糟糕的是，工总的一个联络中心于4月14日成立，并宣布其目的是完全恢复工总并释放其头目。学生造反派则更加凶猛。每天报道说有些学校里二司分部袭击了保守派和中间派组织的办公地点并夺取了广播设备。4月11日，第一中学造反派向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提出过分要求。在遭到拒绝后，他们举行了四天的绝食罢课。绝食结束后的第二天，一群造反学生占领了《长江日报》和《湖北日报》所在的红旗大楼。.

陈再道和钟汉华自3月底就一直在北京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武汉的挫折使他们大伤脑筋。他们认为所有这些乱子都是由于中央文革根据片面的情况而作出决定引起的。在中央军委的一次会议上，陈抱怨说：

中央文革不了解情况，不听军队方面的意见，只听革命小将和派驻各地记者的意见。我们反映的意见和报告，中央文革听不进去，向中央文革请示一个问题也不及时回复，弄得我们下面为难。

为了纠正有毛病的沟通制度，陈再道建议有两个选择：或者中央文革建立分支下属机构来分别领导各省的文革或者当地军队定期派代表到中央文革接受指示。他希望无论如何应在中央文革和当地军队之间建立一个直接的渠道。他说，如果我们按照中央文革的指示去做，我们就决不会再犯错误。

中央文革又一次拒绝了陈的建议。武汉学生绝食罢课引起了江青的注意。她听说至少有5万人参加了绝食。在4月16日与造反派代表会谈时，江青指出，成都和武汉的形势比较复杂和严重，那里的造反派要冲一冲以打击对手的气焰。在汉语里，「冲一冲」一词意思是批判或者攻击的意思。陈再道可以想象得到，假如江青的讲话传到武汉的造反派那里后果将会有多么严重。在陈的要求下，中央文革于4月19日召开会议听取军队关于武汉文革的汇报。在得知只有300名学生参加了绝食，而且绝食已经结束后，江青承认她被错误的情况汇报欺骗了。会议得出四个结论：首先，（保守派）红卫兵不应该解散。第二，4月6日中央军委十点指示前解散的工总不应予恢复；第三，国民党1949年从武汉撤离前在该市培植了大批代理人。由于那里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武汉军区逮捕500人并不过分。这些犯人逐案复审，但无论如何不能不加区别地予以释放。最后，武汉军区并没有犯「方向或路线错误」。另外，还决定戚本禹在4月21日接见武汉造反组织代表，并劝告他们停止把斗争矛头武汉军区。

陈再道和钟汉华对这个意外的好结果感到很高兴，于是立即把这些决定通过电话通知了武汉军区的其他负责人。尽管要求他们对此保密，但这些当时正受到造反派压力的负责人还是禁不住与他们的熟人知交分享了这个好消息。不久，这个消息传遍了武汉。4月20日，保守组织开动他们的全部宣传机器公布并欢呼「北京来的最受欢迎的消息」，而造反派则感到迷惑不解。

当天下午，江青从中央文革驻武汉特派记者的一篇报道中得知了这一新进展。想到陈和钟借中央文革的失误千方百计欺侮造反派，她勃然大怒。陈和钟被命令交出4月19日中央文革会议记录的副本并被警告不许再提此事。他们还得到通知，预定的中央文革成员与武汉造反派的会面被取消，并且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情况，中央文革将不再向武汉军区提供帮助，以此作为对那件事的惩罚。这件事过后，业已紧张的中央文革与武汉军区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恶化。中央文革有意拒绝了武汉军区请求作出指

示的要求，这就使武汉军区在以后急剧变化的形势中特别脆弱。

更重要的是，「中央四·一九指示」对武汉相互对抗的群众组织来说一直是个谜。保守派坚决认为这些指示来源可靠不会有假，而造反派则声称这些指示是军队和保守派捏造的。既然无法确定这些指示是否存在，每一方只能坚持认为符合各自利益的东西就是真正的指示，并都相信中央对自己一派表示支持。这种对自己的深信不疑带来了一种危险的均衡。假如有一方被中央告知它是错误的，两个阵营间的冲突就会以不幸的那一方退出竞争而告终。然而，如果双方都深信中央支持自己，那么对他们来说卷入你死我活对抗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

「拥军爱民」运动

不幸的是，中央当时有意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平衡。与毛的期望相反，中央剥夺军队权力的结果是导致了暴力和无秩序的重新出现。造反派们一经解放，就充分利用所获得的行动自由向解放军和保守派群众展开进攻。有迹象表明，1月份夺权所造成的无政府和混乱状态可能重新出现，而这与毛的愿望是背道而驰的。毛在文革中基本上想达到的是以一种他认为革命的方式改造中国和当时的权力结构，因而有些无秩序的现象作为过渡的代价是可以接受的。但他很清楚，无政府主义是否认权威的，当然这也包括他的权威。为使之朝相反的方向发展或者防止完全的混乱，至少有些权威还应保护，因为造反派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形成任何一种权威，这一点已被1月份的危机所证明。出于这个原因，毛发现他必须对造反派再次加以抑制，限制他们对军队的冲击，这样，国家权力的最后一个关键因素就能完好无损。但他并不想通过否认造反派的「革命热情」来否认这场运动的能动性，这意味着军队也应该停止对造反派的压制。因此毛不得不想方设法平衡惟命是从的军队和难以驾驭的造反派。

为达到这种平衡，中央停止了「彻底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而代之以「（民）拥军（军）爱民」的新口号。江青被指定来宣传这个口号。在4月20日庆祝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大会上，她首次提出了以下口号：

1月28号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是正确的、有效的。八条命令的主要方面，是讲群众应当怎样正确地对待人民解放军，是讲拥军的。……4月6日中央军委的十条命令，也是正确的，有效的。十条命令的主要方面，是讲人民解放军应当怎样正确地对待群众，是讲爱民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的精神，是一致的。把十条命令和八条命令对立起来，是不对的，绝不要利用这个十条命令去破坏那个八条命令。如果用这个十条命令去破坏那个八条命令，那就错啦。

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一个是怕同志们犯错误，另外怕坏人利用。因此，我们现在特别强调地提出拥军爱民的号召。

为了软化造反派对「反动逆派的代表」即军队领导人和保守群众的攻击，毛本人采取两个异乎寻常的象征性举动。4月22日，他命令释放了约一百名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成员。释放这些「臭名昭著」的保守派向所有的人发出了一个惊人的信号，表明中央对保守派的政策正发生变化。4月30日，毛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李先念和谭震林等到他的驻地进行了轻松的交谈。次日，这些人与毛和中央文革成员一起出席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五一节群众大会。谭震林的露面削弱了造反派，激励了保守派和军队。对后者来说，既然谭震林本人受到了毛的保护，那么前者对诸如「武汉谭震林」之类目标的进攻就证明是徒劳的了。

第 11 章 派性冲突的恶化

保守派与造反派联盟的形成

当陈再道和钟汉华于 4 月 28 日返回武汉时，该市的两大联盟正在形成之中，一个由保守组织的成员组成而另一个的成员则来自造反派组织。成立这样两个联盟并不是中央所希望的。相反它们倒是不久两个阵营将进行决战这一不祥预感的产物。

依靠「二月逆流」和「三月黑风」，保守派在过去三个月中重新获得了力量。许多新组织出现了，并在此期间迅速扩大了他们的力量。红武兵就是个值得注意的例子。该组织于 1 月下旬成立时，只有几百名成员。到 4 月 20 日，其成员已达 24 万人，使它成为武汉最大的群众组织之一。给人印象更深的是其建构严密的组织。在现存民兵建制的基础上，红武兵形成了一个准军事组织，其头目主要是过去的民兵干部，他们在文革前建立了广泛的组织和个人关系。根据地理划分，一个行政区域内的所有红武兵构成一个「兵团」；按照职业划分，一个行政局下属单位中的所有红武兵形成一个「纵队」。总共有 10 个兵团和 25 个纵队。在该组织中司令部无论以何种方式发挥作用，在处理日常和紧急问题上都是很有效的。由此可见，红武兵远远胜过了那些组织松散的造反派组织。

联合会与红卫兵的联盟垮台后，其成员用新名义成立了几十个新组织，有些则加入了相对中立的组织。4 月份，后者觉得没必要再寄人篱下。所以他们退出造反派组织重新加入保守派的行列。

随着一些新组织的出现，保守派的阵营也得到了加强。比如，有许多组织的成员几乎完全是由过去的社教工作组成员组成的，这 and 红武兵一样，产生了旧制度框架的强大残余力量，而以前存在的关系网使他们能够更顺利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当造反派在 3 月份倒霉时，保守派并没有感到有结成统一大同盟的必要，因为他们觉得一旦造反派分散开来，就能轻易使之臣服。但造反派在 4 月份的复活迫使保守派重新考虑他们如何对付造反派的策略。职工联合会的失败就是由于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和有效的运作系统。吸取他们的教训，各保守组织领导人都认识到了统一与领导的重要性。开始是有些偶然的接触，后来当造反派再次肆虐时则很快建立了正式和非正式的沟通渠道。4 月底，对武汉的所有保守组织在五一劳动节举行群众游行以显示团结与力量这一点的可能性进行了认真的考虑。这个计划后来成了泡影，因为中央禁止在那天游行，但联合保守派的想法却并未打消。统一的必要性又被阶级理论的「复兴」

合理化了。5月初，华中工学院的一位教师被邀请在各保守组织巡回讲演《如何分析武汉文革的形势》。最打动听众的就是他的阶级理论。他说：

首先必须要有一个阶级观点，千万不要混淆阶级斗争的观念，不能把阶级关系转变为「革」和「保」的关系，「造反」和「保守」的关系。造反派不算一个阶级，保守派也不算一个阶级。阶级毕竟就是阶级。工人还是工人，贫下中农还是贫下中农，资本家还是资本家，地主还是地主嘛！阶级还是一个阶级。在这里不能偷换概念，不能说阶级斗争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能说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革」和「保」的斗争；不能说「革」和「保」的斗争就是和三字兵[老红卫兵]的斗争。

他想方设法说明文革并没有改变社会（权力）关系的实质，这时散发的一份传单更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正如温度只能使鸡蛋变成小鸡，而不能使石头变成小鸡一样，那些地、富、反、坏、右及牛鬼蛇神决不会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放松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欲望。

这个理论不仅增强了保守派的自信，他们多数出身好而且在文革前的政治表现也都十分出色；而且指出了保守派大联盟可以赖以形成的共同基础。

5月16日，联盟联络中心宣布成立。由于该组织的全部成员超过了100万人，故自称为「百万雄师」。那时，百万雄师还是松散的联盟（尽管比以前紧密），成员组织也还相当独立。每个组织限派一名「联络员」到联络中心，这些联络员一起商讨协调对付造反派的行动。由于有规定，没有有关组织的同意，中心无权调度部署力量，因而这种领导方式缺乏效率以致无法应付紧急局面。随着保守派和造反派冲突的逐步升级，改变百万雄师的组织结构和领导层的呼声越来越高。

这一变革在6月3日发生了。52个成员组织同意放弃独立，并提出集中力量建立一个完全统一的组织。相应地，联络中心也被由各成员组织领导人组成的司令部所取代。

对新的主要领导人经过了认真的筛选。不胜任的候选人被排除在外。所以大多数新领导人是基层干部而非工人，这一点并不奇怪。每个候选人的政治背景也经过仔细考察。每个人的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要考察，而且还要弄清他们是不是造反派的奸细。

司令部的核心是常委会。常委会下面有一个处理日常事务的办公室和7个部门，各自负责内部安全、宣传、联络、后勤、组织工作、战略计划，以及最重要的运行协调（作战）。

所有成员组织的力量如今至少在理论上受司令部的调派。为了有效地管理百万名成员，司令部在 10 个行政区域内建立了 4 个分部并逐个委派了负责人。分部内部的结构通常仿照总部，这样总部的各部门容易在基层找到对口部门来执行其命令。

正当保守派建立自己的联盟时，造反派也在做类似的打算，但进展却不如保守派那么快。保守派的斗争是为了保留现有的社会秩序。由于不失就意味着得，因而对他们来说达到一致就相对容易些。而造反派的目标则复杂得多，他们都希望从文革中获益，但却各有各的打算。而且即使有着同样的目标，僧多粥少的局面迫使他们彼此拆台也是可能的，这一点在夺权期间就发生过。由于对他们来说无得就意味着失，彼此冲突的「得」的要求使他们在与共同的敌人战斗时必须留心注意其伙伴（潜在的竞争者），因而私下的竞争实际上妨碍了造反派结成大同盟。

但在 1967 年 4 月、5 月间形势的压力下，造反派发现他们还得团结起来以求得在与军队与保守派的对抗中生存下来。

在造反派已经完全垮掉的单位，首要任务就是重振造反力量，这并非易事。遭遇了 2 月和 3 月的悲惨经历后，大多数过去的造反派仍然心有余悸。在再次归属造反派组织之前，他们要确认对自己不再有任何危险。多数单位的工总支部直至 5 月底 6 月初还没有正式宣布重新成立，有些单位直到 7 月底武汉事件还是这样。许多造反派没有正式归属造反组织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再是造反派。5 月，所谓「八司」出现在武汉。它并非一个有形的组织，相反是指那些没有加入任何组织但热情支持造反派的个人。由于该组织是无形的，这就使它成为造反派这一边最凶猛的力量。除了参加街头辩论、群众大会、游行和绝食以外，这些人还常常袭击保守派组织并对保守派进行人身攻击。「八司」并非没有基础，其主要成员是以前工总的成员。无论他们是否与工总有正式联系，该组织相当多的成员到 6 月初还是再次活跃了起来。

其他造反工人组织在此前后也开始出现。比如，工造又从内部分裂中恢复了过来。在一些大企业里，造反派建立了新的独立组织。即使在造反派影响总体上有有限政府机构里，一些造反派同情者也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其中有政府工作人员「机关红司」和公安人员的「公安联司」。另外，一些不满的高层干部还建立了「革干联」，公开表示他们对造反派的同情和支持。

基于这些新情况，造反派开始设法通过行动建立自己的大联盟。

他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要求释放夏邦银。夏是汉阳轧钢厂工人，3 月 17 日逮捕的 485 人之一。不像工总的许多领导成员，夏的经历是相当清白的。他出身于贫苦的市民家庭，是个党员，文革前曾几次被命名为「先进生产者」和「学毛着积极分子」。尽管夏是工总的支部负责人，但他的案件显然可以作为向军事当局施加压力的法码，因为军队在对夏的指控上证据很少。从 4 月 22 日开始，三新和二司在被认为关押夏的武汉公安局汉阳分局前组织静坐。此后，每天都有来自全市的数以千计的造反派到

那里支持这一「革命行动」。面对日益增强的压力，军队不得不作出让步，夏终于 5 月 14 日被释放。

在静坐结束前，造反派又采取了另一个行动。5 月 10 日，公安学校的造反学生与武汉公安局江汉分局的保守派警察发生了冲突，双方都有人受了轻伤。前者指责公安局军管会应对此事负责，并要求军管会惩治「凶手」。为迫使军管会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些学生于 5 月 13 日在公安局大楼前举行了绝食。这一事件很快引起了广泛关注并认为给了造反派显示其「战斗团结」的极好机会。各行业的造反派都被动员起来支持公安学校的学生。几天时间内，武汉军区发现，实际上每个区尤其是城区和报社驻地，包括其司令部大院，都有人在绝食。据报道，参加者总数超过了 4 万人。5 月 19 日，钟汉华被迫与抗议者进行谈判。经过 8 个小时的讨价还价，抗议者宣布钟已同意满足他们的所有要求，并准备举行大会庆祝胜利。但武汉军区否认作出了任何让步。无论哪一边获胜，可以确定的是，这件事推动了造反派之间的团结，并扩大了他们的影响。

在这两件事的发生过程中，造反派还采取了有关的行动加强团结。5 月 6 日，6 个有影响的学生组织成立了武汉革命造反学生总司令部。两天以后，工总、工造和九三战斗队领导的 15 个工人组织也成立了一个类似组织，武汉革命造反工人总司令部。最后，于 6 月 1 日成立了武汉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并打算使之成为武汉所有造反派最终的权力中心。

然而，实际没有一个司令部有权力控制理论上归属于它的组织。而且到底是不是有过实际存在的司令部也大可怀疑，可以说充其量就是有个造反组织可以协调其策略和行动的半正式联络网，但成员组织仍然是独立的，因而司令部缺乏强制性权威致使策略和行动不容易协同作用，整个系统缺乏效率。不过在造反派看来，联系沟通网的建立也毕竟是个进步。面对强大的敌人，造反派需要这样一种机制来消除内部争吵并使自己的力量凝聚起来。

划分造反派和保守派的问题

从 4 月份到 6 月份期间，在武汉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分歧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工总是否应该翻案；另一个是如何评价武汉军区的「支左」。这个问题实际上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如果说工总受到错误对待，那么结论必然是武汉军区的大方向不对。相比之下，那些认为工总是「牛鬼蛇神大杂烩」的人自然支持武汉军区。

武汉军区当然坚持认为自己解散工总的决定是正确的。自中央文革于 4 月 19 日针对恢复工总亮出鲜明的立场以来，陈再道和钟汉华坚持认为中央对青海、安徽、四

川、内蒙古和福建军队的批评并不适用于武汉。为慎重起见，他们于4月22日命令成立一个专门小组重新审查工总一案。到7月15日，该小组已整理了三大卷针对工总的证据。这些证据再次确认了陈和钟的结论即工总是「一小撮反革命操纵的坏组织」，并且不打算向造反派让步。6月4日，武汉军区发表声明，重申了其一贯立场：工总不能恢复。

军队在工总问题上所表明态度越严厉，也就越能得到保守派的尊重。在防止工总复活这一点上，保守派比军队更加热心，因为他们知道，在文革这样你死我活的运动中，如果工总死灰复燃，那么他们就只有倒霉。这不是哪一边支持文革的事，保守派真正担心的是，文革前中国的整个权力结构可能会被颠倒，他们可能会被置于社会结构的底层而那些一直被他们看不起的人会起来欺压他们。二、三月间，他们对毛发动文革的意图的迷惑不解已经消除了。对他们来说，似乎文革像1957年的反右运动一样，只是毛用来捕捉牛鬼蛇神的计谋而已，现在造反派的复活把他们搞糊涂了。但无论如何他们不能想象毛会信任过去的牛鬼蛇神而抛弃「劳动人民」这个过去几十年中所依赖的社会力量。对工总一案，保守派肯定地认为，即使其成员不全是牛鬼蛇神，但可以肯定他们不是「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普遍认为，工总以及其他造反组织是由三类人组成的，即出身不好的人、落后分子和机会主义野心家。工总是「一帮阴险的新老反革命」，对此保守派毫不怀疑。为了与要求恢复工总的造反派门争，他们自然要支持武汉军区，并自称是「拥军派」。

所有造反组织都要求武汉军区为工总翻案，但目的则各不相同。以前的香花派当然为彻底恢复这个已解散的组织呼喊，因为假如工总不能恢复，那么不管造反派是否得势他们都处于不利地位。然而，恢复工总肯定不符合过去的毒草派的利益。他们利用工总一案指责武汉军区压制造反派，但却不想使其过去的对手起死回生。所以，香花派赞扬工总是个「革命组织」，而毒草派只是否认它是个反革命组织，意思是它同时也不是个革命组织。基于对工总本质的不同评价，因而他们对如何纠正三月黑风牺牲品一案的态度也迥然不同。香花派要求翻案即释放所有被捕的人并完全恢复该组织，而毒草派则只要平反，即在逐案审查后释放无辜者，去掉对该组织的「反革命」定性，但不使之恢复。这中间微妙的区别构成造反派联合的障碍。

然而，造反派与军队和保守派之间的对抗掩盖了这一区别。不管造反派的立场多么不一致，面对军队和保守派的强有力抵抗，他们除了一起战斗外别无选择。他们共同的口号是「打倒武汉的谭震林」。既然他们用「武汉的谭震林」意指陈再道和钟汉华，而当地军队又是以这两个人为代表的，因而他们就被认为是「反军派」。

5、6月间的武斗

保守派和造反派在工总和军队问题上的意见不一使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逐步升级了。

4月29日，在一家小纺织厂里，保守派和造反派开始诉诸武力。这一事件导致了武汉的大规模暴力冲突。此后，火药味越来越浓。只要一方召开群众大会或举行游行，另一方的人就在现场进行辱骂。当你来我往互相侮辱时，双方都失去了耐心，这类行动常常以拳脚相加而告终。

北京传来的是非混淆的消息更是火上加油。造反派对从「可靠来源」得知的他们斗争武汉的谭震林得到中央文革赞成的消息感到兴高采烈，而保守派则对「中央领导同志」谴责武汉造反派的消息感到激动万分。既然无从检验这类消息的可靠性，每一方都相信最符合其利益的消息而谴责与其利益相悖的消息为「谣言」或者「纯粹的捏造」。每一方都相信中央支持自己，因而在攻击对手时更加放肆。

5月21日，保守派组织在全市各区举行游行，据说这是为了抗议港英当局镇压那里的造反学生，但八司的骚扰使游行变成了混战。这是保守派与造反派之间在全市范围的第一次直接冲突，它引发了后来几天中的冲突浪潮。5月27日，第二十中学的冲突导致一名17岁学生死亡，而他恰巧又是二司成员。造反派在大街上抬尸游行，高呼「为死难的阶级兄弟报仇」、「血债要用血来还」。显然，局势越来越具爆炸性，一场大规模的战争随时可能爆发。

为了做好最坏的准备，双方都开始为行动积聚力量。造反派已经占领了市区许多公共建筑、学校和一些工厂。他们在那里集中力量控制关键交通线路。过去没有专门建立据点的保守派也认识到了武装自己的重要性。百万雄师于6月3日进行整编的主要目的就是加强保守派的战斗力。整编后第二天，百万雄师就占领了武汉市委大楼并将其司令部移至该处。由于保守派占工业企业工人的大多数，因而百万雄师很快毫不费力地控制了三个工业区——江汉、桥口和汉阳的多数工厂尤其是大中型工厂，并把这些地方的造反派驱赶到了他们在城里的据点中。同时还组成了一些突击队。这些突击队的组织类似军队，由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组成，其中多数人是退伍军人。

6月6日，中央向各省发出命令，严禁武斗。但似乎无人认真对待这一命令。6月8日，红卫兵举行游行，据说这样做是要「促复课」；公、检、法的保守派也进行游行以「宣传禁止武斗的重要性」。然而这些冠冕堂皇的「标语」背后的真正目的是要教训造反派。由于城区已处于造反派控制之下，因而可以料到游行队伍通过那里时，造反派会出来围攻他们。于是百万雄师埋下了伏兵，计划一旦游行遇到造反派，伏兵就出来增援。不出所料，缺乏组织的造反派落入了陷阱。他们的骚扰第一次遇到了组

织有素的队伍的抵抗，并且轻而易举就被打垮了。

这一惨败震惊了造反派。他们发现过去胆小而且好欺负的保守派如今变得强大而富于进攻性，于是决定用新的防御和进攻武器武装自己。以后几天里，在他们的据点里建起了防御工事，从五金店买来了镐，并锻造了长矛。有些人甚至还想用爆炸装置。有了这些准备，造反派戴着藤条帽，携带自制的「武器」，到处进行武装游行以显示其力量之强大。

百万雄师的计划就是扎扎实实地实现自己的任务。汉阳区那时已完全被保守派控制，故被称为「解放区」，汉口则被称为「游击区」，因为百万雄师控制除一些工厂和学校外的两个工业区江岸和桥口，而其商业区江汉仍基本处于造反派支配下。造反派统治的武汉的文化区武昌被称为「敌占区」。面对这种不平衡的力量分配，百万雄师决定采纳毛的著名策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首先，后方必须清理。6月9日，百万雄狮占领了居仁门中学，三天以后他们又冲进了武汉汽车配件厂，这两处都是造反派在桥口区的最后据点。那时，注意力已转向把造反派赶出桥口区这一点上。

武汉军区对阻止暴力冲突似乎完全没有办法。尽管6月6日以来已发布了三个措词强烈的命令，警告任何参与武斗的人都要受到惩罚，然而无论保守派还是造反派对此都不在意。6月14日，中央文革给陈再道打电话，敦促他制止武汉的暴力，但由于军队的强制力已被中央军委4月6日的十点命令削弱，因而陈再道无论干什么都不会有约束力。

6月17日，百万雄师发动全面进攻以「解放」被造反派占领的汉口城区。数以千计的人手持长矛前来参战。造反派于是阵容大乱，其中多数人是所谓八司的十几、二十岁出头的参战者。由于缺乏指挥系统，他们的战斗没有策略性和协调性可言，所以很容易被保守派打散并逐个消灭。此外，由于缺乏纪律，这些乌合之众一时还可以勇猛战斗，但一遇到真正的危险便作鸟兽散。有些人甚至准备好了百万雄师袖章以备一旦被捕作为护符。

这是一场凶猛而残酷的混战，从17日中午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上午。造反派称他们有近百人被杀，并有约千人受伤。但百万雄师却否认这个指控，坚持认为只有一个人的死与他们有关。真相可能就在两者之间。无论如何，有证据表明，至少有12个人在这次武斗中丧生。

出于对巨大损失的义愤，造反组织第二天接连发布动员令，指示其成员对武汉的谭震林和保守派展开「全力反击」。「针锋相对」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口号一时热闹起来。武昌的造反派甚至发出最后通牒，宣称他们将从武昌到汉口跨过长江消灭所有保守派，除非武汉军区立即解散百万雄师。然而武汉军区却不可能不顾自己是否同情该组织而解散它；而造反派想占领汉口的计划也只是空中楼阁，因为除了宣传这一点外他们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弱于保守派。所以造反派的喧嚣，并不能吓倒保守派，

反倒引起了其对手更强烈的反应。

6月23日，百万雄师开始蚕食所谓「敌占区」——武昌。第一个目标就是造反派的两个要塞：险峰大楼和第西铁路设计院。选择这两处显然不是随意的。前者位于汉口、汉阳去武昌的唯一出口处，后者则位于武昌与青山（庞大的武钢所在地）之间战略关口的关键位置。百万雄师欲占领这些关键位置，设法使它的部队推进得容易些，这是占领武昌的前提。

当包围两个要塞时，武汉水运学院的造反派意外抓住了百万雄师的7名支部负责人。他们把这些人当作人质，要求百万雄师立即停止围攻。保守派表示拒绝，相反，在占领险峰大楼和第四铁路设计院之后，百万雄师命令其部队包围了这个学院。200名被包围的造反派绝望地反抗，但由于众寡悬殊，第二天还是被打败了。

6月24日似乎敲响了武汉造反派的丧钟。在汉口，工造司令部遭到洗劫，有25名造反派被打死。为什么保守派如此残酷，这一行动的指挥者指出：

联合会时期，我们太老实，总是吃造反派的亏，窝了一肚子火，这时我们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我们的想法是只有把他们所有的据点都拆掉，武汉才能太平。说到工造，它的喇叭天天在那儿叫。不拿下这个据点，总叫人不舒服。打工造事先开了两次会。决定用汽车撞大门，武器是长矛。打时一般只戳一下子。只有那个女广播员骂得很难听，多戳了她几矛子。我们以前一直受造反派的压，这次出了一口气。

工造的垮台吓住了造反派。到第二天，汉口的全部和武昌的多数造反派堡垒全部空了。一些过去的抵抗者撤退到武昌的大学校园里，那里仍被造反派控制着；另外一些人则转入地下；还有些人则去远处避难。

武汉造反派的大灾难立即引起了中央的注意。6月24日夜，陈伯达打电话给陈再道，敦促他阻止进一步的暴力。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致电武汉军区。全文如下：

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在被中央点名批评后，百万雄师除了采取低调立场外别无选择。就在第二天，它把司令部从武汉市委大楼搬到了一家军需工厂并撤消了作战部。尽管保守派公开宣称「6月26日的通告是中央文革对百万雄师最大的关心」，但他们私下则抱怨「中央文革办事组并不太了解武汉真正发生了什么」，「这封电报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并希望将来北京开会能给他们提供一个针对造反派的暴行诉苦并为

其自卫行动辩护的讲坛。

6月26日的电报把造反派从死亡线上挽救了过来。中央文革的一个特派记者告诉在北京的武汉造反派代表，中央需要了解武汉军区的情况，并要求这些代表搜集这类消息并每天向北京报告，造反派头头心领神会，并又变得趾高气扬起来。6月28日，武汉军区命令所有组织，无论保守派还是造反派，必须撤出各自的堡垒，所有学生和工人必须返回原单位，必须放下所有武器。但所有造反组织声明拒绝遵守这一规定。于是一些人第二天又返回了他们曾离开了几天的堡垒。但毕竟造反派已元气大伤，由于害怕流血暴力冲突，许多人决定躲开是非之地较好，至少暂时应该这样。所以一度很拥挤的许多堡垒里安静和冷落下来，敢去那儿的多数是青年学生。

从6月27日至7月15日，武汉没有发生严重的暴力冲突，只有一些小事件。保守派和造反派都在等待中央答应要开的北京会议。为了在谈判桌上获得他们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他们必须学会克制。双方都认识到在此关键时刻的任何不明智举动都应避免。

武汉军区也在忙于准备这次会议。除了从保守派和造反派双方提名出席会议的代表外，它还在搜集所有主要群众组织、主要暴力事件以及经济形势的情况。

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武汉军区并没有隐瞒其对造反组织的反感。造反派被指责反对解放军。它估计，从1月6日到6月30日，有342名军人受袭击，其中226名受伤并有38名受重伤。在所有事件中，袭击者全是造反派。还有，造反组织被称为是「牛鬼蛇神大杂烩」。比如，新华工据说是该校政治教研室教师操纵的，而该室47人中有20人来自地主、富农和资本家家庭，有19人的社会关系和海外关系值得怀疑。

在武汉军区看来，最好的组织可能是第三司令部。自1966年底以来在与湖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中它一直很活跃，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个造反组织。但它不像别的造反组织，很少有过火行为，并总是站在军队一边。第三司令部的唯一问题就是在群雄并起中影响正在缩小。武汉军区断言，人们的同情在百万雄师这一边。事实上，陈再道与多数当地军人也是百万雄师的同情者，尽管从来没有公开赞同其行动。首先，百万雄师的政治背景是「纯洁」的。比如，武汉军区估计该组织的党员占全市党员的85%。还有，总的来说保守派行为克制。只有他们的克制被造反派误解为软弱时，他们才发起反击。尽管6月8日以后的事件是残酷的，但这些行动被认为对恢复市内秩序是必要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百万雄师支持军队。

造反派对暴力事件的叙述则与保守派大不相同。根据造反派的统计，从4月29日到6月底大大小小共有174个事件，其中130件发生在6月4日至26日之间。前后涉及7万人，导致158人丧生，1060人受重伤。保守派被指责挑起了所有这些冲突。而第三司令部则报告这期间有107起暴力事件，只有6起是由百万雄师引起的。它对「谁开第一枪」的描述比较属实。组织不力而且缺乏纪律的造反派，尤其是那些

所谓八司，的确更好斗，甚至造反派自己也承认：「八司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然而，对哪一方造成的伤亡更多，造反派的指控可能更有道理。由于保守派在数量、装备和组织上占优势，所以一旦决定发动反击，就能轻而易举粉碎造反派。

武汉军区坚持认为造反派应对多数武斗负责任，但中央文革的理解则大不相同，它谴责是保守派而不是造反派挑起了武斗。

武斗不仅使许多人付出了生命，而且严重破坏了公共安全；大大危害了生产和市民日常生活。工业总产值 5 月下降了 6% 而 6 月更下降了 16%。前半年的劳动生产率下降了 6%。生产的削弱导致许多消费品的短缺。武汉军区认为，造反派还要对经济困难的形成负责。由于保守派基本统治着工厂，所以当造反派跑到外面去的时候，多数工厂由保守派来维持生产，这一点的确是。但也有例外。在造反派负责的单位或者两派之间的对抗不强烈的地方，造反派在维护生产方面也起到了作用。但这些例外情况并不能改变武汉军区对造反派的看法。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保守派和造反派忙于你死我活的战斗时，中央却正在设法转移群众的注意力。在 5 月的 20 天里，《人民日报》第一次公布了 11 篇历史文献，半月刊《红旗》发表了四篇文章。同时，中央文革成立下属负责文艺工作的小组。所有这些安排都是想要把大规模批判运动推向「党内的头号走资派」——刘少奇。《人民日报》称之为「当前唯一正确的大方向」。然而，基层的武斗派等对这种批判并不怎么感兴趣。

由于间接手段没有发挥作用，中央被迫对武斗问题采取断然态度。6 月份，毛 1957 年的著名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被重新发表。随后，中央又发布通告敦促所有的人都要把毛在这篇文章中的教导运用到自己的实践中。保守派与造反派之间的矛盾被说成是「人民内部矛盾」。这就等于警告任何一方都不得动用武力解决争端。整个 6 月份，全国主要报纸刊登了十几篇社论斥责那些正忙于「无原则内战」的人，中央还颁布了三个措词强烈的命令制止武斗的扩大。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正如我们从武汉的情况中看到的，交战双方对紧张的局势非常投入，以至于连口头上表态支持中央的督促的时间都没有。为了抑制武斗，中央不得不采取更直接的措施来减少造反派与保守派和军队之间的对抗。其中一个措施就是召集对抗各方的代表到北京，并主持他们之间的谈判。到 6 月底，浙江、江西、广西、湖南、河南省和鞍山市的代表团已到了北京。

第 12 章 武汉事件

起初，中央已准备把武汉的保守派、造反派以及军队的代表召到北京去。但在 7 月 10 日，周恩来通知陈再道，谈判就在武汉进行，而且各方代表不必去北京了。计划变更的原因是：毛决定到南方几个省视察，第一站就是武汉。

7 月 13 日，毛在离京前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他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他视察的目的显然是要找到「打下胜利基础」的办法。人们希望，如果武汉能成为和平解决对立各派间冲突的模范。这也许有助于缓和全国形势。

为了保证毛的安全，周恩来于 7 月 13 日凌晨飞抵武汉。中午，公安部长谢富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空军政委余立金以及北京航空学院的 4 位学生造反派也从重庆飞临武汉。当晚，毛抵达武汉。虽然有这么多显赫人物到了武汉，但并非所有人在解决该市的武力冲突的危机中都起了作用。事实上，军队领导人到这儿来是为了警卫毛，只有周恩来、谢富治、王力负有解决当地问题的使命，而且只准许谢、王二人在公开场合露面。

大约当晚 10 时至 11 时左右，谢富治、王力到造反派控制的武汉大学看大字报。他们很快就被学生们认出来了。「中央派代表到了武汉」的消息因此迅速传遍各造反组织。

第二天，当造反派举行盛大的游行，以表明他们对「毛主席派来的敬爱的代表」的热情欢迎时，保守派惊慌失措，他们感到奇怪：「为什么中央代表到了武汉却不通知我们？」这实际上是造反派所希望达到的效果，那就是要通过造成一种假象，即他们与中央有特殊联系这种假象来威吓保守派。在造反派的游行行列中，「新华工」的队伍最为引人注目。该校地处武汉一隅，是造反派的堡垒，「百万雄师」从未碰过它。而且，这里的造反派几个月前就忙于制造武器，其中包括地雷和手榴弹。为了逞英雄，他们故意冲进「百万雄师」控制的地盘，并狂叫：「解散百匪」。而「百万雄师」的高音喇叭反击道：「打倒黑工总，镇压反革命！」「踏平『三新』、『二司』！」互相谩骂随即导致一场武斗。由于「百万雄师」原计划要在那天用组织其成员游长江的方式来庆祝毛畅游长江一周年，因此造反派起初以为可以趁对方无准备搞突然袭击。但他们没有料到「百万雄师」早已作好充分准备来应付敌手的突然袭击。几支极为灵活的机动队随时准备紧急行动。结果，造反派偷鸡不成反蚀把米，10 个人被打死，37 个人受重伤，80 个人受轻伤。

当晚，谢、王二人来到华中工学院。此时他们没有隐瞒自己的身份。造反派被迫

学毛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被迫作自我批评，并答应不再使用武力。然而，这些劝导并不意味着中央不同情造反派。

7月15日和16日，毛两次召集周恩来、谢富治、王力及其他领导干部讨论如何处理武汉的问题。毛建议给「工人总部」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虽然「百万雄师」是一个保守组织，但允许它作为一个群众组织继续存在，而且武汉军区要支持两派，尤其是造反派。与此同时，从7月15日至18日，周恩来以及谢富治、王力召集驻武汉部队师以上干部开会。虽然会议原定是要给当地部队干部一个表明他们对武汉形势的看法的机会，但由于有毛的指示作后盾，也由于他们对保守派的偏见，中央领导人几乎不接受地方领导的任何辩白。陈再道试图用武汉军区收集的材料证明，「百万雄师」是「真正」的革命组织，而造反派组织则不是。但谢和王打断了他的话，并迫使其部下承认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由于不知道毛已到了武汉，也不知道毛已对解决当地混乱定了调子，陈起初不肯屈服。

7月17日夜，谢和王到了「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王指责「百万雄师」的头头们卷入了组织武斗，并逼迫他们停止使用武力，交出武器，撤离据点。「百万雄师」的头头们回答说：该组织愿意放下武器，但造反派也应同时作到这一点。王当即斥责说：「你们提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别人嘛！」这次接见也因此不欢而散。

离开「百万雄师」的联络总站后，谢和王又去「二司」所在地武汉测绘学院。他们对造反派说：毛最近指出，不管是保守的还是反动的，只要一个组织中卷入了大量的人民群众，其普通成员就不应该被抛弃，而且应进行思想教育。虽然谢和王没有对当地的派别争端表明中央的任何观点，但其潜台词很清楚：中央支持造反派，但希望他们对保守组织的成员宽宏大量。

中央领导人不久就亮出了他们的看法。7月18日下午的会议上，周恩来向与会的军队干部宣读了中央的决定：（1）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尤为错误的是解散了「工人总部」。中央建议陈再道和钟汉华进行自我批评。要给「工总」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2）「三新」、「二司」、「九·一三兵团」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它们应该成为左派大联合的核心。（3）对任何一个群众组织，包括保守组织，都不应取缔或解散。（4）「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估计「工总」恢复之后，可能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5）「三司」是一个倾向保守派一边的群众组织。（6）军区应劝农民不要进城来帮助保守派袭击造反派。（7）军区应教育其下属各单位支持造反派。（8）所有群众组织都应进行整顿，并改变其对解放军的看法。

陈再道和钟汉华仍未被说服。他们拒不承认武汉军区犯了「路线错误」，因为他们从党的历史中知道，犯了「路线错误」是极为严厉的谴责，有可能毁灭一个人的政治生命。

由于别无选择，周恩来只好在当晚带他们去见毛。到这时候陈和钟才知道这是毛在幕后做出的决定，但陈仍然认为「路线错误」一词过于严厉。他表示可以接受「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提法，但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毛用降低这个提法的严重性的办法来安慰陈。「这怕什么呀，」他说道：「现在他们一提就是路线错误，谁都是路线错误。」听毛这么一说，陈的心情轻松了一些，表示愿作公开检查。然后，毛强调了不同群众派别间团结的重要性。他认为团结不仅重要而且也能做到。毛泽东说：「你们想一想，一个工厂，这一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你们相信吗？」毛泽东停顿了一下，又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因此，我相信，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只要我们进行充分的思想工作教育他们，那他们最终是可以联合起来的。」

在毛接见陈和钟之后，周恩来从武汉返回北京。由于当地的两位最高领导人接受了中央的决定，因此，和平解决当地的问题看来很有可能，但普通群众对这些决定将有何反映却被忽略了。

第二天凌晨两三点钟，谢富治、王力接见聚集在武汉水电学院的造反派。在他的煽动性讲话中，王力说：

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是排在最后了，但是，解决一定会解决得最好！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受压制、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这种现象要叫它一去不复返。

与此同时，他嘱咐造反派：

我们受压制、受打击、受排斥这种现象要把它翻过来。但是，我们决不能够对别的同志、别的人，对别的阶级兄弟，对群众采取打击、压制、报复。我们绝不能够采取这种作法。我们不能因为个人受打击，就动个人情感。我们要动阶级的情感。军队的同志犯了错误，只要他检查、改正就好了，就不要打倒了。我们要把毛主席四月间强调提出来的「拥军爱民」这个旗帜举起来。

中央的决定使造反派兴高采烈。由于坚信中央是站在他们一边的，造反派必然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这个好消息。他们控制的所有宣传机器立刻开动起来。不久，这个消息传遍武汉的大街小巷，但这个消息是被歪曲了的。造反派在进行宣传时，处心积虑地强调中央决定的部分内容，而对其余内容却只字不提。造反派强调，武汉军区的大

方向是错误的；「工总」必须平反；造反派是真正的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所有这些听起来让人觉得似乎中央和当地造反派一样，是完全赞成捣毁武汉军区及「百万雄师」的。

与此同时，中央已决定支持造反派的消息通过另外的渠道——武汉驻军 8201 部队传到了保守派耳中。当武汉军区在 2 月 1 日设立「支左」指挥部时，这支部队就受命支持武汉市的左派。在「百万雄师」建立后，该部队与保守派组织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该部队极为同情「百万雄师」，认为它就是「左派」组织，这都是公开的秘密。在 7 月 18 日夜和第二天早晨，该部队的师长和政委在参加完军队干部会议后，将周恩来的讲话先向部队下级军官，随后向全体战士作了传达。这两位领导干部不承认自己有错误，也不装出真心实意赞成中央决定的样子。他们命令其困惑不解的部下说：「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而这句话是周恩来对他们俩说过的。由于 8201 部队大多数干部战士是各工业、交通、商业单位及政府机构的军代表，中央的决定也通过他们的联系网络迅速传播开来。有趣的是，当这些决定传来传去的时候，造反派强调过的四点同样也被突出，这四点的确对两派都至关重要。

7 月 19 日，武汉军区主要领导开始执行中央的决定。早晨，陈再道和钟汉华作了自我批评。下午，再次召开军队干部会议，谢富治和王力被请去帮助那些人弄通「糊涂思想」。王趁机向天真质朴的干部们就「文化大革命」作了理论性的发言。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从 4 点一直讲到夜里 11 点多钟才收场。王力的讲话在改变听者对当地派别冲突的看法时是如何起作用的这一点尚不清楚，但不久即显而易见的是，即使所有高级领导人决定改过自新（这是不大可能的），随后几天的事态也是不可能制止的。

当王力在武汉军区礼堂讲话的时候，一场政治风暴正在这个城市里孕育着。

首先，官方把「百万雄师」定为保守派的消息使其成员们义愤填膺。仅仅一个星期前，红卫兵的一个研究小组向「百万雄师」总部提供的一份报告预计：中央关于武汉问题的决定将对保守派不利。这个预测是以对反映在中央关于相邻几个省的派别冲突的态度中的方式进行观察和分析为基础的。报告预测，中央顶多只会给「百万雄师」一个「群众组织」这样的模糊不清的身份，并允许其存在。「百万雄师」的主要领导人虽然认真地对待这个报告，但又认为它过于悲观。因此，这个报告没让普通成员知道，以免动摇军心。

王力在 7 月 17 日对「百万雄师」的严厉指责是另一个不详之兆。但「百万雄师」大多数头头和成员都仍不相信毛和党中央会抛弃他们这个共产主义统治的长期的权力基础。他们认为王的批评是以错误的材料和他个人的偏见为基础的。

但是，它竭力阻止的事却偏偏要发生。造反派当然强调王是代表中央来武汉的，而且他的四点指示代表了中央的看法。但保守派却表示了怀疑。那时候，除少数最高

地方领导外，没有人知道毛和周正在武汉进行幕后操纵。只有王和谢经常公开露面，而且大多数场合都是由王讲话，尤其是保守派认为是攻击他们的讲话都是由王讲的。因此，对王力的讲话不感冒的保守派倾向于认为王只代表他自己，而所讲的四点指示也仅仅只暴露出王个人对「百万雄师」的仇视。保守派担心，中央可能会受王欺骗，并认同他在武汉的所作所为。为了避免像其他省的伙伴们那样的悲惨结局，保守派因此不得不干一些极端的事来向中央证明他们拥有何等广泛的群众基础，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又何等强烈地反对王的武断决定。

7月19日，城市处于骚乱之中。由于被「王的决定」所激怒，甚至那些平时非常温驯的保守派也变得怒不可遏。「百万雄师」队员们的情绪焉如此之高，只要一点火星即可燃起一场燎原之火。

暴动的火花是由8201部队和驻武汉的空降师8199部队的战士们点燃的。黄昏，约60名战士聚集在武汉军区司令部大院的门外，要求谢富治和王力接见他们，并要求王力解释他发布四点指示的目的何在。在过去几个月的「支左」过程中，这些军人已形成这样的看法，即造反组织是「牛鬼蛇神的大杂烩」，而「百万雄师」则是由「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组成的，而且这些军人都曾积极镇压造反派。对他们而言，四点指示意味着彻底的失败。他们不能理解王力这个从北京来的钦差臣为什么要作这四点指示。但他们的要求没有引起这两位使者和武汉军区领导的重视。出于无奈，他们决定寻求广泛的支持以便对王力造成更大的压力。晚上8点左右，6辆宣传车开出来与「百万雄师」以及武汉「公检法」（一个由武汉市公安局、检察机关及法院工作人员组成的保守组织）建立联系。4个小时后，当谢和王离开武汉军区礼堂前往他们下榻的东湖宾馆时，愤怒异常的保守分子、军人和「公检法」成员乘着上百辆大卡车和几十辆拉着警笛的消防车一起冲入军区司令部大院。由于没有找到谢和王，他们转而质问武汉军区领导：「军区『支左』大方向明明没有错，陈再道、钟汉华为什么要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有人甚至把陈和钟叫作「投降派」。武汉军区领导当即向王力报告了军区大院正在发生的事情，并建议他接见保守派代表以缓和局势。但王认为这只是一场小范围骚动，不必大惊小怪，因而他和谢没采取任何措施平息事态就上床睡觉去了。

第二天清晨，约两百名保守派分子在一些公安干警的率领下冲进东湖宾馆，并在那里找到了谢富治和陈再道。由于谢和王不一样，他是老干部，也很少公开批评「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因此，他和保守派之间的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双方同意，两位特使在下午接见保守派并回答他们的问题，而保守派则答应立即撤离宾馆。但就在此时，王力从自己的房间走出来，而且又有几百人冲进宾馆，造成新的混乱，这些人多数都是8201部队和8199部队的战士。开始，一些人误把陈当作王，并用枪托猛揍陈。在找到正确目标后，他们向王冲去。据说，钟汉华这时跪在肇事者跟前，求他们不要带走中央代表。但局势已失去控制，他的哀求无济于事。王力被拖到武汉军区大院，

这里挤满了激愤的「百万雄师」队员们，他对人们的谴责只好忍气吞声。

当武昌城一角发生了这一系列事件时，一些振奋人心的消息正在全城传播。下面试举几例：

毛主席的四大天才发现：一、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红卫兵；三、上海的一月风暴；四、百万雄师。

毛主席对百万雄师的批示：「大、好、纯，要爱护它。」

中央文革来电：一、王力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王力关于武汉问题的表态，中央不知道；二、中央将派周总理和陈伯达同志来武汉解决问题；三、谢副总理和王力是来武汉了解情况的，不是来处理武汉问题的。

中央军委来电：一、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二、为了满足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可以造反；三、百万雄师好，陈再道好。

无法知道谁散布了这些谣言，但不难理解它们为什么传播得如此之快和如此之广泛。信谣和传谣者通常是那些从谣言中找到自己希望的人们，这可能是一条规律。在这件事中，保守派不遗余力地传播谣言，因为这说出了他们的心声。

谣言奇迹般地振奋了保守派的士气，成千上万的保守派分头戴藤条帽，手握梭标、棍棒、匕首坐卡车或步行参加盛大的游行。估计有 1000 到 1500 辆卡车为此目的而被征用。更多的人挤在街道两旁向游行队伍欢呼。街上刷满了大字标语和大字报，其内容都相同：「王力的四点指示是大毒草」，「王力滚出中央文革小组」，「王力滚出武汉」，以及「欢迎毛主席的真正代表——周总理和陈伯达同志——来武汉」。而且，保守派的固定的高音喇叭和活动的高音喇叭（宣传车）遍布全市，夜以继日地播放根据毛泽东作于 1949 年的诗作《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谱曲而成的歌曲，因为「百万雄师」一词在诗中出现过。

一个广为流传的传单对于提高保守派反对王力的信心起了重要作用。这篇题为《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的大字报写道：

王力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所主持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是反革命纲领「二月汇报提纲」的起草人，是推行苏修教育路线的旧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以前是刘少奇重用的红人，是孟夫唐的学生，是王任重的好朋友（王力的老婆和王任重的老婆是亲戚，王任重的女儿嫁给王力的儿子）。他混入中央文革后，摇身一变以极左的面貌出现。他在哪儿插手，那儿就出现武斗。四川、内蒙、江西、河南、湖北、浙江和云南就是例子。他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我们一定要把这颗埋在毛主席司令部的定时炸弹挖出来。打倒王力。

在这种狂热的气氛中，8201 和 8199 部队的许多战士兴奋得不能自制。他们扛着步枪，参加了「百万雄师」和「武汉公检法」的所有行动。自执行「支左」任务以来，虽然部队对保守派极为同情，但从未公开与它们联合过。现在剥下了这层面纱，在当天发行的「紧急呼吁」中，8201 部队的官兵宣称：

黑工总是个地地道道的、被反革命分子操纵的组织。我们要踏平工总，为民除害。百万雄师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浩浩荡荡的、硬梆梆的、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组织。他们把斗争的锋芒始终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他们旗帜鲜明，是执行和捍卫党中央指示的模范，是「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的模范，是制止武斗和打击牛鬼蛇神的英雄。谁敢妄动百万雄师一根毫毛，我们将毫不留情地杀他个片甲不留。

为了响应这一呼吁，百万雄师同一天也发出了一个「紧急声明」，郑重提出：

我百万雄师全体战士坚决与 8201 全体指战员同生死、共存亡。我百万雄师对黑工总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必须镇压。「三新」「二司」大小知识分子是不是革命的只能由我广大工农兵来鉴别决定，不能由「钦差大臣」来封。我们已经作好牺牲一切的准备，不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死不瞑目。

「三司」也发布了一个声明，但其措词远没有那么严厉。王力被称为「同志」。而且，虽然他的四点指示被认为是与毛泽东思想相抵触的，他们也只是批评这是「官僚主义办事方式的后果」。「三司」提出抗议的基本原因是：它认为，在各群众组织间分配参与武汉未来的谈判代表名额时，王力给「三司」的数额少得不公平。显然，它并不知道它已被中央划为保守派。否则，它可能也会像「百万雄师」那样采取战斗行动。

当武汉处于混乱时，毛仍在该市。他所下榻的房子紧挨着王力被人拖走的那幢楼，但他的安全并未受威胁。按毛的要求，武汉军区领导约在中午时分设法把王力救了出来，并把他转移到安全地点。但北京的中央领导认为，毛继续呆在武汉很危险。在与陈伯达和江青商量后，林彪派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到武汉送信。邱在下午到达武汉，并在下午 5 点钟见到了毛。在邱交毛的信中，林劝毛迅速离开武汉，因为该市充满危险。毛于是在翌日凌晨两点钟前往上海。在毛临行前，周恩来飞回武汉。为了平息混乱局面，他建议武汉军区从造反派和保守派中选派一百名代表去北京谈判。这个建议似乎给陈再道一个信号，即中央的态度已有所缓和，而且可能变得对「百万雄师」更为有利。

7 月 21 日，保守派的游行继续进行，该市仍处于骚乱之中。由于惧怕「百万雄师」的巨大力量，游行队伍所到之处，造反派都仓惶逃窜。在遇到抵抗时，「百万雄师」的部队不费吹灰之力就扫除了障碍。至少有一打造反派的最后据点被这股风暴席

卷而去。7月23日，全市只有4到5所院校仍处于造反派控制之下。

在占绝对优势的形势下，「百万雄师」和其他造反派组织开始考虑夺取省、市权力的可能性。当普通成员在街上游行之时，其头头们在举行联席会议讨论这件事。由于受保守派分子在过去两天中突然释放的巨大能量所鼓舞，所有与会者均认为夺权条件已成熟，因为「百万雄师」已取得大多数革命群众的拥护，而且大多数领导干部或是公开声明支持「百万雄师」，或是暗地里同情「百万雄师」。此时，武汉军区毫无疑问更愿与「百万雄师」收拾失去控制的造反派。由于「三结合」的所有分子都已作好准备，他们完全相信，胜利地夺权已是指日可待。为了准备已计划好的夺权，当天夜里决定建立「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斗批改联合司令部」。

武汉的保守派希望中央不久会宣布王力的四点指示无效，他们对已取得的胜利感到兴高采烈，但北京的权威们却作出了武汉发生的是一场「反革命暴乱」的结论。在7月22日凌晨，江青和康生在接见河南代表时公开谴责「百万雄师」是反革命组织，要求造反派拿起武器自卫。下午，谢富治和王力回到北京。他们在机场受到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要人的迎接。这种激动人心的欢迎仪式是极为罕见的，而且，其目的显然是要表明两位特使是完全受到中央支持的。晚上，林彪亲自召集了中央文革小组紧急会议，商议如何处理武汉事件。会议决定采取三项措施。第一，林彪大约在7月23日凌晨3时左右发电报给陈再道和钟汉华，命令他们到北京来，其目的是要看他们敢不敢来。如果陈和钟真的策划搞反革命政变，那他们就不敢来。第二，由中央文革小组在天亮前向各省发布一个「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搞武装游行，并声讨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第三，从凌晨5点20分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送谢富治和王力安全返回北京的消息。

7月24日，陈再道及武汉军区其他14位主要领导干部被带到北京。那一天，各地相继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游行，声讨「武汉反革命分子」。这些游行在第二天达到了高潮。中央文革小组天安门广场组织举行了一个盛大的群众集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以及党内第二号人物林彪等人出席了大会。如此之多的高级领导人聚集在天安门城楼上谴责一个地方事件，这恐怕是空前绝后的。7月26日，党中央召开批判会谴责陈再道、钟汉华及8201部队司令和政委。7月27日，党中央向武汉市民和指战员发表公开信，号召他们把斗争矛头对准「三个一小撮」——武汉军区、「百万雄师」和武汉「公检法」的坏头头。

当武汉的保守派初次从收音机中得知王力在北京机场受到欢迎的消息后，他们大为吃惊。对他们而言，这无异于晴天霹雳。在随后几天里，在北京的权威们明确谴责「百万雄师」，并支持「工总」及其同盟者时，消息就更加确实了。从各地发来的数千封电报飞往「百万雄师」总部，谴责其罪行，给该组织的主要头头们造成了巨大压力。他们对陈再道个人的命运并不大关心，但他们不能理解，北京当局为什么要如此

严厉地对待由大多数「纯洁」、「可靠」的人民组成的武汉最大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他们能够想到的唯一解释就是毛和林受到了蒙骗。开始，「百万雄师」总部决定，只要毛和（或）林没有公开表明其观点，该组织就不投降。然而，林彪在 7 月 25 日出席天安门大会使他们的幻想破灭。虽然仍有少数人猜测毛肯定已被林软禁，并发誓，除非毛亲自责难「百万雄师」，否则就要战斗到底。但大多数人现在痛苦地相信，新的事态发展是得到毛本人批准的。多年来，中国人民被反复灌输了毛从来不可能犯错误的信念。而且自「文革」开始后，在大多数权威人物被打倒的同时，毛个人的权威却在上升。任何人都可能被怀疑和否定，但毛除外。以毛为首的中央否定「百万雄师」却承认「工总」是「革命组织」一事，使保守派迷惑不解。下面是「百万雄师」一个分部开会的会议记录摘要，它反映了保守派们的情感在那些日子是多么的矛盾。

有人说：我始终不相信我们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就是刘邓的人，他们所讲造反派就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看如果表了态，我们也有罪，不表态也跑不脱。如果表了态，可以挽救我们下面的革命同志，不使滑得更远。现在总站表了态。只有汉阳没有表态，这就说明我们有分化。因此我们应该支持党中央、中央文革，我们应该表态，现在解放军战士思想不通，但是也咬着牙齿表了态。我们百万雄师是个整体，不应该分割，应该保存这个组织。

另一个人说，如果我们明天参加了明天的会议，我们就是承该了七月十九日是反革命行动。我们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就是砍脑袋，我们也不表态。

还有一人说：一、阶级路线问题，工总翻案我也不通。理由，从以前的情况，阶级阵线上看不通，但中央定了我只得执行。我认为这个组织不能当权。百万雄师是纯的，没有做坏事。我认为百万雄师在反逆流中是有功劳的。二、三相信，三依靠问题怎么理解，是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这次中央文革是压制多数、抬高少数。三、关于陈再道、武汉军区的问题，我们对他们希望很大。他们是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从我们和当时对方来说，为什么说我们保陈再道？我们是不承认的。[造反派]打解放军战士，我们觉得痛心。

结论：不管通不通应该立即贯彻中央指示。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第一次由林彪提出的「对毛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是「文革」期间一句流行的口号。对中央而言，通过一手鼓励盲从，另一手暗施压力的办法，必定会使某些不驯服之人或团体俯首称臣。对普通百姓而言，当他们发现毛的指示与自身的利益冲突时，盲目执行毛的指示是一个避免对毛的指示的正确性和神圣性产生怀疑的办法。在「文革」期间，每当中央的号召过于笼统时，各省的帮派就会或是阳奉阴违，或是根据其自身的最佳利益来解释它们。如果中央的指示极为具体，尤其是当中央决定否定这个或那个团体时，那么，几乎没有人敢对中央决定的正确性产生怀

疑。

上海的「赤卫队」和四川的「产业军」分别在 1966 年底和两个月前受到批判后迅速瓦解。正如这两地的情形一样，「百万雄师」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

7 月 27 日，「百万雄师」最后解体。在最后关头，总部告诫各分部的头头及活动分子：一旦造反派得势，他们必定会对保守派进行报复，因此，「百万雄师」成员有必要暂时离开武汉。因此，有许多人回老家的亲朋好友家避难。在许多工厂里，持续不断地有人逃跑。由于缺员太多，生产几乎完全停顿。几天后，「百万雄师」的 13 名主要头目被捕，其中 8 人一直被关押到 1972 年，一人死于狱中。

造反派弹冠相庆。因为保守派曾断言：「『工总』若想翻案，除非公鸡下蛋。」他们到处画了大幅的公鸡图，并在图旁边添上口号：「武汉的公鸡下了蛋，『工总』翻了案」。「被释放的」工总头头们像凯旋归来的将军那样受到了欢迎。而且，自 7 月 25 日起，造反派每天都上街游行，庆祝「武汉的第二次解放」。7 月 31 日，任命了新的部队领导，前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被任命为武汉军区司令员，武汉空军第二把手刘丰被任命为政委。

造反派赢得了城市，但并未赢得前保守派的支持。保守派的组织虽然瓦解了，但它作为一股社会势力仍然存在。两且，他们与造反派之间的冲突将以一种新的形式继续存在。此外，造反派组织之间在逆境中形成的伙伴关系能否维持还有问题。不过，在「七·二〇事件」之后，由于「百万雄师」的垮台，武汉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第 13 章 1967 年的酷暑

由于武汉军区的领导和「百万雄师」的群众并不想否定中央的权威，所以武汉事件很快就被控制住了。但武汉事件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后果：一个带挑衅性的口号「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开始在全国流行。

中央在获悉武汉于 7 月 20 日发生的事情后，决定谴责陈再道其在武汉军区下的下级们。但由于某种原因，中央并不想在官方媒介中指名道姓地批判他们，因而决定用「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来代指那些人。「军内一小撮」因此成了官方新闻媒介中谴责武汉事件的文章惯用的标准公式。细心的读者可能注意到，在大多数场合，这一提法特指武汉军区中的坏人。但是，这个词的含意在其上下文中偶尔也显得很模糊，以至人们完全有理由猜测：中央鼓励群众不仅从武汉军区，而且从全国军队单位中揪「一小撮走资派」。最富煽动性的文章之一是《红旗》杂志的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的社论。这篇文章号召全国的革命派「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据说，这是目前的中心任务。

某些高层领导人希望以武汉事件为借口，向其军内的对手们发起进攻。7 月 25 日，林彪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一个群众大会上，向清华大学「井冈山」的头头蒯大富授意：「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问题。我们要抓住这件事来解决（军队内）未解决的问题。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

为了领会林所说的「未解决的问题」的含意，蒯设法向王力探听情况，他问王，在各省保守势力的背后，中央有没有「黑手」？王在回答中暗示：徐向前和叶剑英是在中央的这类黑手，而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以及陈再道是各省的最危险分子。

虽然林、王等人肯定想清除一些持不同政见或暗地里持不同政见的军队指挥官，然而他们并不打算对军队进行一次可能削弱「无产阶级柱石」的全面清洗，但在实际上已发生了这样一场运动。

已在 7 月初复课的北京造反派学生现在又涌上街头，发动了一场反军运动。7 月 26 日和 30 日，应蒯大富的要求，首都造反派的头头们两次开会分析形势。他们讨论后得出的结论是：全国处于以反动军官为先锋的右翼政变的紧急危险之中。他们觉得，林在 4 月份发出的关于威胁来自「带枪的刘邓分子」的警告，以及他要群众抓住武汉事件提供的机会解决军队中「未解决的问题」的号召都表明：主要的威胁不再来自「党内一小撮」（这些人在前一年就已被「揪出来」），而是来自「军内一小撮」。因此，目

前的中心任务是夺取军权，也就是第二次夺权，但军权不会轻易易手，这是肯定的。因此，毛的某些话成了他们的口号，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等。为了准备应付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战斗，那些造反派决定采取行动提高群众的警惕性，并动员他们参加一场决定性战斗。

在掀起一场反「军内一小撮」的新的运动高潮过程中，武汉的造反派和他们的北京同类们一样卖力气。他们把战胜武汉军区 and 「百万雄师」至少看得和上海在 1967 年 1 月发生的事一样重要，他们把武汉事件称为「七月风暴」或「七月革命」。

7 月 25 日发表的一篇题为《论刘少奇的中原失守》的文章竭力渲染造反派在该市胜利的战略意义：

九省通衢的极端重要地理位置，决定了武汉问题的解决，将马上打断湘豫蜀各省军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交通上的联系。武汉控制在革命造反派手中，无异于在阶级敌人心脏插上了几把尖刀，动脉血管马上因心脏的破裂而瘫痪。反革命阵线的互相接应现在已经十分不容易了。

从夺权史上看，上海「一月风暴」还仅仅只是揭开夺权斗争的序幕。从「政权的根本问题是军权」这一点来说，只有现在在武汉地区由于七二〇事件所引起的「七月风暴」才是夺权斗争的真正展开。将军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一点决定了一切。

另一篇文章总结道：

武汉伟大的「七月革命」以丰富的革命实践告诉我们这样一条经验：要夺党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权、没收他们的大印，还得夺取军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窃取的一部分军权。缴他们的枪杆子。否则，前者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武汉造反派宣称他们在反对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斗争中受到了锻炼，他们觉得自己在如何对付本地军队单位的问题上可以对别地的造反派指手划脚。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年轻工人离开武汉前往其他省或湖北省的其他市、县，他们的使命是「支左」。

来自首都北京和「七月革命」的诞生地武汉的成千上万拥护「揪军内一小撮」运动的人被派往其他地方，这对于军队和造反派间和各对立的群众组织间业已紧张的局势无疑是火上加油，并几乎导致全国混乱。

首先，以大多数省份的地方部队单位和少数省份的新近建立的革委会为代表的虚弱的临时权威，成为更猛烈进攻的对象。造反派与军队的对立不是由武汉事件引起的，但那个事件为造反派对军队发起新一轮猛攻提供了新的著名范例，「与军内修正主义

分子斗争」的口号作为天赐之物而出现。造反派遵循的逻辑是：如果战士们不支持我们，那不是因为我们有了错误，而是因为他们处在修正主义分子的阵营中，所以，各地的造反派，尤其是那些受到军队打击的团体应抓住机会反击军队，其办法是给对手安上「军内修正主义分子」的罪名。造反派所攻击的绝不仅仅是「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正如周恩来后来所承认的，各军区及野战军的指挥官几乎都受到了攻击。

那些新建立的革委会也成了攻击的目标。在上海，市革委会被人指控执行了「一条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有人要求张春桥和姚文元辞职。在北京，一些学生组织在北京大学的「新北大」的领导下，发动了一场反对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的运动，目的在于让聂元梓取而代之。在黑龙江，许多曾帮助建立全国第一个省革委会的造反派组织现在自称为「炮轰派」，他们公开声称要打倒省革委会主任潘复之和副主任汪家道。在山西，省革委会领导人内部间发生了分裂，革委会主任刘格平支持「红总派」，而第一副主任张日清是「红联派」的后台。革委会作为一个公开的权威已是名存实亡。

第二，自「文革」开始以来，解放军的武器第一次被全国许多地方的敌对的群众组织所抢夺。有三个因素导致了这种新发展：江青发出的在「文攻武卫」的前提下「拿起武器」的号召；造反派相信，除非他们武装自己，否则无法打倒「军内一小撮」；部队被严格限制使用武力反对群众组织。在7月底和8月初，似乎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在努力武装自己。他们袭击部队仓库和兵营，甚至袭击载有援越战略物资的火车。这类自发行动令中央大为震惊。为了保持最低的公共秩序，它一方面劝群众不要随意抢夺部队武器，另一方面则允许有步骤地武装「左」派，几乎所有的造反派都对中央「武装左派」的决定感到欢欣鼓舞，然而几乎无人注意到中央关于停止从部队手中抢夺武器的号召。由于中央没有，也不可能具体指出哪个团体是左派组织，哪个团体不是左派组织，所以它的关于武装左派的决定实际上加快了群众组织间的军备竞赛。

在武汉，假想的来自「百万雄师」的威胁被当作造反派武装自己的借口。8月份，武汉造反派的出版物充满下列这类宣言：

百万雄狮没有放下屠刀，我们就应该拿起武器。历史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斗争会出现更大的反复。那么今后的斗争更残酷，以致空前的野蛮。那时武汉的上空就会听见枪声炮声了。从现在革命造反派的状况看来，应付这场斗争是很困难的。如果我们被打垮了，那么，所有的一切努力将毁于一旦，取得的成就将会成为泡影！这是可怕的结局。造反派迫切需要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和敌人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许多组织很快就建立了自己的准军事团体，并开始进行军事训练。但在大多数情

形下，造反派只是通过抢劫军火库来武装自己，而很少设法改组其组织。有一段时期在公共场合带枪成了一种时尚，而对天打枪和往空地上扔手榴弹则使许多学生和青年工人着迷。当未受过训练的造反派手中拥有武器的时候，引发对立群众组织间大规模混战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第三，由于部队和革委会的权威出现了危机，其作为调停者的作用被削弱，也由于刺刀、长矛等「冷」武器被步枪、手枪、手榴弹等「热」武器代替，武汉事件后的派别冲突一步一步地上升到武装斗争阶段。7月25日重庆的「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发生武斗。在这场武斗中可能是第一次使用了大炮。两天后，郑州的「二·七」公社通过血战杀进郑州卷烟厂，其中10个人被打死，100多人被打伤。8月4日，上海「工总司」10万人围攻上海柴油机厂，双方都有大量人员受伤。8月20日，广州的「东风」派和「红旗」派为争夺军械库发生冲突，结果，据报道说有150人被打死，100多人受伤，300多人失踪。8月28日，宁夏自治区青铜峡的驻军和造反派一起向保守派群众开枪，234人中弹，其中有101人死亡。这还只是极少数广泛流传的案件，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处于内战的边缘。其特点是，几乎所有省份的大量武装派别间进行对阵战，甚至北京这个全国最为清静的城市也成了那个夏天的牺牲品。武装团体在街上横冲直撞，在商业区发生了好几起枪炮对射的武斗。

第四，那个夏天的动乱几乎使「文革」淹没在骚乱的海洋中。由于缺乏军队和警察的镇压，解放以来一直受到严厉制约的强盗行径重又盛行起来，在大城市尤为严重。在此期间，盗窃、抢劫、强奸甚至谋杀案都司空见惯。据报道说，国家银行、仓库、粮仓、油罐场、冷库均被抢。更糟糕的是，许多反社会分子钻入各种群众组织，而且他们往往在派别斗争的掩护下进行犯罪活动，这样一来，公民们发现很难保护自己。某些城市的形势极为混乱，以致当地老百姓为了自卫不得不自动建立旧式的民团。

骚乱甚至波及到乡村。在某些地区，农民盗伐国家或集体所有的树木，未经允许就私分国家或集体所有的林地。在别的一些地方，农民拒不向国家出卖粮食、油料作物、棉花等统购统销农产品。在另外一些地方，一个队或大队的农民强行收割别的队或大队的农作物。而在安徽省的符离集则发生了一个极为严重的案子，数千名小贩想乘火车去外地作生意但又不想掏钱，于是占领了当地火车站，并阻断了交通。

第五，而且最为危险的是，在各省形势混乱的同时，北京的运动挣脱了中央的控制。8月20日，从化工部抢劫11卡车秘密文件一事使国内秩序的混乱带上了戏剧色彩。中央文革小组先后5次命令抢劫者立即交出材料，但该组织拒不执行。作为最后一着，中央文革小组不得不命令部队用武力夺回材料，但有人指责这是「镇压群众」的行动。最危险的是外交部所发生的事情，在王力于8月7日所作的关于外交政策的重要讲话的怂恿下，该部的造反派在中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馆前参赞姚登山的领导下接管了外交部大权。他们掌权之后，制造了一系列稀奇古怪的危险事件，使中国的对外

关系一片混乱。

这样一种形势即使不完全是无政府状况，至少也处于无政府状态的边缘。为了防止这种局势演变成真正的内战，周恩来向在上海的毛报告了所有的坏消息，试图向他表明全国的形势实际上是何等的严峻。由于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毛要求立即停止袭击部队，他谴责《红旗》杂志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的社论是「大毒草」并在林彪送审的文件草案上划掉了多处「军内一小撮」的字样。毛在评价王力的「八·七讲话」时，再次用「大毒草」一词谴责它。

一旦毛亮明自己的观点，官方路线重又趋于缓和。8月11日，周恩来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他在会上指出，「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口号，但似乎没有人理会他的讲话，因此必须作更多的努力。8月16日，周召集「北京红代会」的头头开会，提醒他们以后再也不用「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一词。8月20日，《人民日报》及其他重要的全国性和地方性报纸都登载了《红旗》杂志第14期的一篇社论，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柱石》一文。

而且，中央在8月25日发布了一个指示，要求进行一场全国性的拥军运动，其任务据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个指示通过一切途径向全国各地发布，其中包括用直升飞机空投。

然而，所有这些措施远不足以恢复公共秩序。虽然「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到8月底已被废而不用，但没有迹象表明造反派对军队的进攻和造反派内部间的武斗会逐渐停止。事实上，在8月底和9月初，江西、福建、广东、山西、广西、辽宁及其他省份均又发生了新的血案。显然，光靠一场拥军宣传运动几乎不可能迫使那些没有也不愿意收译中央打算通过发动这场运动所要传播的消息的造反派们听从命令。为了使运动逐步降级并恢复最低限度的公共秩序和生产，中央决定采取一些更严厉的措施。

首先，造反派在7月下旬和8月份的大方向受到了批评，而且他们的行动也受到了限制。在整个9月份，中央领导人频繁地接见北京和外省的造反派，他们都不失时机地谴责造反派言行中暴露的「无政府主义」和「极左倾向」。在这些场合，「揪军内一小撮」反复受到批判，「文攻武卫」被说成是受到了曲解，武装左派的计划再也没人提起。造反派的轻率口号「武装夺取政权」和「战争解决问题」被作为反动口号受到批判。而且，他们为发起「第三次大串联」所作的努力，对军队和新建立革委会的攻击，以及他们各自内部的冲突，都被作为要对夏天的骚乱局势负责的「无政府主义」而受到批判。而且，许多著名的造反派首领和全国闻名的造反组织，由于他们在煽动骚乱中所起的领导作用而受到严厉的批判。

为了重建公共权威，中央向群众提出了三项要完成的任务：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维护解放军的威望和组织完整，巩固现存的革委会。第一项任务也就是警告：任何把斗争矛头对准中央文革小组和周恩来的企图都必须被制止。

第二项任务是最为紧迫的任务。9月5日，中央发了个措词强硬的指示：「不许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和其他军用物资」，并且还命令，已经被抢夺的所有这类武器和装备「应一律封存，限期归还」。而且，该指示在军委6月6日命令后第一次授权解放军在遇到任何试图「抢夺武器」的「群众组织和个人」的袭击时，可以「自卫反击」（也就是可以开枪）这种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动武的权力已被证明是防止部队被袭击的最有效的途径。在授与这样的权力之后，袭击解放军的风潮迅速被制止了。

虽然在大多数省份，解放军是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唯一组织，但那时已在7个省市建立了革委会，而且它们被获准担任公共权威的角色。但所有这些新建立的权威在夏天或多或少都受到挑战，有些甚至瘫痪。这就是中央领导通过提出第三项任务来维持这些摇摇欲坠的地方权威的原因。

这三项任务必然是控制造反派，并停止导致国家某些地方处于动乱边缘的疯狂自由的三道禁令。

除了直接给造反派施加压力外，另外还采取了两个严厉的步骤。一方面，王力、关锋和林杰被赶出中央文革小组，而戚本禹接受审查后，也在几个月后被革职。另一方面，一个叫「五·一六兵团」的组织被揭露出来。

王、关和林成了夏天的极「左」的替罪羊。形势在夏天恶化得如此迅速的原因并非由于「阴谋家」发表了一篇罪恶的社论，或发动了一场反军运动，而是由于中央在这个关键时间证明自己无力惩戒和指导那些迫于社会矛盾的压力转向暴力的造反派。当毛决定制止局势的日益恶化并追究8月下旬的动乱的责任时，中央文革小组，尤其是江青觉得必须牺牲王、关、林，把全国范围动乱的责任归咎于这些人，而不是中央正在推行的政策。

「五·一六兵团」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其中散布着反周恩来的北京帮派势力。该组织主要由学生组成，势力也不大，它顶多也就在北京有微弱影响，在全国政治力量中更无足轻重。「五·一六兵团」在制造夏天的动乱中所起的作用与清华大学的「井冈山」或北京大学的「新北大公社」等全国闻名的组织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但现在被中央领导人谴责为反革命阴谋集团，并指责这个微不足道的团体「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有人断言，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解放军和新生的革委会」的行动高潮也是由该组织从幕后怂恿和操纵的。对「五·一六兵团」的惩治是为了警告其他人，用中国一句老话就是「杀鸡给猴看」。中央对这个组织本身并不关心。中央设法要表明的是：任何个人或组织若不想被指责与「五·一六兵团」有牵连，就必须立即停止其反对中央新的方向的活动。

正如往常一样，当中央明确禁止某件事时，其指示可能极为有效，虽然当它试图推行某件事时，事情往往违反其初衷。这个时候，由于中央的强有力的镇压措施，到

秋天时运动似乎已渡过了狂风暴雨，呈现出较为平静的局面。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都与当地解放军单位签订了「协议」，保证拥护解放军，并敲锣打鼓地归还武器和军事装备，设法使自己不陷入新的武斗。表面上看，似乎已基本恢复了秩序。但隐藏的动乱势力仍在悄悄地活动。中央的新的方针在造反派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由于对中央关于「极左倾向」的批评困惑不解，清华大学「井冈山」的报纸发表了一篇题为《什么是极左政策？》的社论抱怨说：「极左主义」的提法即使不是武断的，也是非常抽象的。其他组织走得更远，把新的方向的产生看成是「笔杆子屈服于枪杆子」的结果。武汉的一位理论家声称，正像列宁在 1918 年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条约那样，毛主席对中央的某些掌权的和事佬（暗指周恩来）作出让步，以便为发动新的反对「军内一小撮」的决定性战斗积累革命力量。因此，造反派并不急于向解放军交出武器。他们交出来的大多数是不易隐藏的大型武器，像手枪、手榴弹这类新型、小巧的武器大多被藏起来了。造反派和军队间以及各对立派别之间的休战因此很可能是暂时的，因为它没有随之而产生真正的政治缓和。

第 14 章 大联合

当全国其他地方夏天漂浮在动乱的汪洋之上时，武汉的局势反而相对缓和。由于中央已任命了新的武汉军区领导，而在武汉事件期间曾公开支持“百万雄师”的 301 部队等驻军又被别的单位接防，造反派就找不到理由进攻军队。而且，由于在前几个月中，造反派组织已被迫相互团结以与掌权的保守势力作斗争，甚至在他们的共同敌人被清除后，他们之间潜在的矛盾要恶化到武斗的地步尚需时日。结果，虽然街上偶尔贴出标语警告武汉军区新的领导人“不要步陈再道的后尘”，但总的来说，军队并未像广州、福州、南京、沈阳及其他许多地方那样遇到严重的挑战。而且，虽然造反派在部队的默许下抢夺了大量武器，但没有听说在“七·二〇事件”之后到夏末之间发生过大规模武斗。

顽固的保守派

但武汉的运动发展的进程违背了中央的意愿。

在武汉事件之后，前保守派们被迫承认错误，并投到其敌人——造反派一边。中央设想的情形是：他们由于受骗而加入了保守派，而且一旦他们认识到是受了坏人的愚弄，他们一定会转而反对那些自己曾错误地支持过的人，并使自己转变成造反派。但正如前面各章所阐明的，选择哪一派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事，而且，中央所期望的转化也不可能如设想的那么快发生。事实上，大多数前保守派从未真正屈服过。使他们相信陈再道及其部下是“坏人”并不难，毕竟，他们对陈知道得并不多。然而，却很难使他们相信那些他们明明知道是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并不光彩记录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造反派，要比他们这些人更“革命”，更加忠于“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因为他们自己解放前和解放后一直都是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因此，虽然“百万雄师”在中央正式谴责武汉事件后就毫无抵抗地迅速崩溃了，但其大多数成员作为一股社会势力仍然独立存在，而且拒绝与其长期的敌人——造反派联合。

由于害怕造反派报复，许多保守派在中央谴责武汉事件后从武汉跑回老家或其他安全之处避难。

但由于受到停发工资或者开除公职、学籍的威胁，他们后来被迫又回到原单位。学生一般对被除名的担心少一些，所以有些人直到 1967 年底才返校。

那些没跑和后来又回来的人面临两种选择：或是从此不再与群众组织沾边，或是加入造反派组织。

自文革开始以来，就有一批人从未正式与任何组织有过联系，因而被称为“逍遥派”。文革初期，“逍遥派”主要是那些由于自身有劣迹或是出身不好而造成政治上被动的人，或是那些由于觉得自己在文革中既不会得到也不会失去什么以及由于愚昧无知而造成对政治冷漠的人。对于前一种人，任何组织一般都不会准许他们参加进去，因为哪一个组织都不愿被人骂成“牛鬼蛇神”。但如果仅从旁观者的角度而言，他们往往同情造反派。而后者是纯粹的“逍遥派”，因为他们既不参加任何组织，也对派别是非漠不关心，他们仅仅希望运动不要过多地打乱他们的生活。

拒绝参加造反组织的前保守派们不能算作纯“逍遥派”。作这种选择是他们不愿与得胜的造反派合作的表现。虽然他们不再有自己的组织，但他们仍然公开或秘密地聚集在一起，相互交换信息和观点，进行娱乐活动。这些桀骜不驯的保守派令造反派大伤脑筋。造反派曾责令保守派承认只是由于无知才上当受骗。他们声称参加保守派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并设法迫使保守派分子站到他们这边来。然而，他们常常是枉费心机。

另外一些前保守派分子则转而加入了造反组织。他们中的一部分是一些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另外一些则是一些糊涂虫和胆小如鼠的人，加入造反组织的目的是为了表明他们愿意改造自己，并希望他们所加入的派别能使他们免遭个别造反派分子的报复。前一种人在投诚后，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有时可能比“真正”的造反派更积极，而后一种人只想苟且偷生，他们不大可能为造反派的事业献身。

大量的前保守派分子加入造反组织，是为了与本单位的造反派继续斗争。在武汉事件后，许多单位的前保守派分子或单独地或集体加入“九·一三兵团”。这是一个审慎而聪明的举动。“九·一三兵团”是从位于青山区的武汉钢铁公司的工人中起家的，而且直到7月中旬才形成一个地区性组织。然而，它与“工总”联盟，并在当地政治中获得一定影响，加入“九·一三兵团”给前保守派分子带来了人身安全，并使他们不依附于本单位的“真”造反派。这样，造反派分子对本单位保守派分子的迫害不得不有所收敛，因为他们害怕得罪整个“九·一三兵团”。

在许多单位，前保守派分子大量涌入最脆弱的造反派组织，希望以此改变其成员、甚至改变其领导层的成分。

在一些单位，两个独立的团体有时同时加入同一个外单位组织。例如，在一些学校里有“二司”的两个分部，在一些工厂里，同时存在“工总”两个分部，但两个分部都试图吃掉对方。只要有有两个分部同属一个组织的情况，那么其中一个必由前保守派分子组成，另一个则由“真”造反派组成。

不管前保守派分子是否参加造反派组织，他们与造反派之间的冲突仍然存在，在基层尤为激烈，因为人们都想在本单位掌权。对许多（即使不是大多数）前保守派分子而言，加入一个造反派组织并不表明其真正脱胎换骨。相反，这是一个使他一直继

续与造反派斗争的策略，只是斗争的形式发生了变化，而内容则丝毫未变。

桀骜不驯的造反派

虽然中央对前保守派分子的行动不满，但也对造反派不满。武汉事件后，中央告诫造反派不要对前保守派分子进行报复，并要求他们尽快在该市形成大联合。

报复可能是人类的一种天性。在太平年月，这种天性受到社会法则和法律的约束。但“文革”破除了所有社会法则和法律，也打碎了公共权威，所以报复在中国广为泛滥也就毫不奇怪了。因此，中央估计造反派很可能要对“百万雄师”成员进报复，所以设法劝阻他们。在武汉事件暴露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要求武汉造反派正确对待“百万雄师”中受蒙骗的成员。而且，周恩来于7月25日接见参加天安门广场召开的谴责武汉事件的大会的武汉造反派代表时，也劝他们不要处治前保守派分子。

造反派队伍的团结是中央关心的另一个大问题。中央知道造反派组织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因此，它竭力说服武汉造反派珍惜和巩固他们在前几个月与共同的敌人斗争时所形成的联合。《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为此发表了好几篇文章。而且，中央在8月8日将武汉军区新任领导和武汉主要造反派的头头召到北京，商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造反派之间形成大联合。中央领导向造反派头头提出一个口号：“困难时在一起，胜利后不分裂。”造反派嘴上说要听中央的话，并保证不辜负中央的期望，但他们从未照中央所希望的去做。

报复 几乎处处的造反派在武汉事件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本单位的前保守派分子进行报复。虽然中央在原则上不鼓励这种行动，但它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措施阻止造反派。而且，中央的许多指示和《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都督促武汉造反派与“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派以及‘百万雄师’和‘公检法’中的一小撮坏头头”作斗争，但从未解释过如何进行这场斗争。因此，在7月下旬和8月份，每一个单位都开斗争大会，天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被押到街上游行。这种情形表面上有些类似于破四旧，只是运动力量与受害者两种角色间交换了位置。“破四旧”运动的许多受害者现在成了趾高气扬的“革命造反派”，处在可以惩罚那些一年前曾虐待他们的人的位置，其受害者不仅包括“百万雄师”总部的头头，而且还包括其基层分部的头头，甚至普通成员也受株连。造反派不只是一要以牙还牙，相反，为了发泄他们的积怨，他们对保守派采取的行动要比这些人以前对他们所做的要残忍得多。许多前保守派分子被严刑拷打，他们的家被抄，家人受到虐待。据1970年的不完全统计，在武汉事件后，仅武汉一地就有600多人被打死，66000多人被打伤、打残。与两派间的武斗相比，

一派得胜后的报复似乎使更多人付出了生命和健康的代价。

学校的报复形式与其他单位有所不同。学生们在政治上通常还不老练，而且他们也知道毕业后就会各奔东西。所以他们在毒打自己的保守派同学时毫无顾忌。而工人和机关工作人员则不得不考虑对同事进行肉体上虐待可能带来的后果，因为在中国的体制中，一旦一个人参加了工作，他（她）就很可能要在那个单位待一辈子。显然，若被人知道曾打过人可能会对这一人将来不利。但这种担心并未阻止造反派工人对其同事进行报复。事实上，工人中的报复行动比学生中多。工人造反派常利用外单位的造反派同志，尤其是中学生和青年工人作为袭击预定目标的打手。用这种方法就有可能使受害者不知道是谁打了他。这种策略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效的。许多受害者说不出伤自己的打手的名字。但从理智上来说，这种策略是完全失败的。由于这种策略被广泛使用，没有一个受害者会认为被外单位的人打一顿是偶然的。相反，他们通常准确地猜出正是本单位的造反派暗中策划了这种行动，而且这些人要对自己的挨打负责。他们对策划者和打手都决不会宽恕。结果，尽管他们对本单位造反派的敌意没有消除，但他们与作为社会整体的造反派之间的矛盾却更加深了，虽然他们不得不暂时隐藏起这种感情。

新逍遥派 报复活动不可能永无止境。而且，随着公共秩序在9月份逐步恢复，造反派的暴行受到了抑制。大量的造反派突然之间不知道干什么才好。在重新评价造反派在文革中的作用时，一位前造反派的理论家指出，造反派是一股破坏势力，他们有很大的能量去扰乱和搞垮现存的体制，但他们丝毫不知道如何对它进行改革。在挣脱各种形式的镇压和约束寻求自身解放时，造反派倾向于集中进攻其顶头上司或其他个人，他们相信，过去是这些人给他们带来了厄运。对许多造反派而言，报复是使他们参与政治活动的主要动力（即使不是唯一的动力）。一旦他们成了胜利者，并向自己的仇人报仇雪恨后，他们就不知道下步该干什么了。由于没有明确的造反目标，大量的造反派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惰性状态中。这是一些被称为“新逍遥派”的人。

由于学校停课，工厂严重瘫痪，新逍遥派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打发时光。低年级中学生发现，与邻居家的朋友一起玩比在学校与造反组织的同志们呆在一起有趣得多。他们每天在街上游来荡去，从斗鸡和养鸽子这类儿童游戏中找乐趣。高年级中学生和大学生则找到了更高级的娱乐方式。有些人打扑克、练拳术、下象棋，另外一些人则读古今中外的小说。一年前被人焚烧的书现在又成了抢手货。另一些年轻人则开始谈恋爱。在沉溺于罗曼蒂克的生活中时，他们暂时从心中驱走了那弥漫于整个世界的狂暴气氛。也有些人很忙。有人重新钻进象牙塔里，或是潜心学外语，或是钻研数学、物理等课程。另一些人则实际些，学会织毛衣、裁衣服、炒菜、装配和修理收音机、玩乐器等。而工人们则更实际得多，他们想用最少的投资来改善家里每天的生活水平。所以，钓鱼、打猎、做木工活以及家庭装修成了许多人的业余爱好。在1967年下半年

年，武汉到处遥传：定期注射公鸡血可以延年益寿。在一段时期里，人们对此趋之若鹜。许多人冒冒失失地在自己身上照这种秘方如法炮制，并在一起兴高采烈地谈论其神效。当成千上万的人被打死、打伤的时候，另一些人却在寻找长生不老之药，这确实让人啼笑皆非。更令人可笑的是，许多被打成“毒草”的电影又被拿出来放映，其借口是为了对它们进行批判，造反派需要观看或重看这些电影，而事实上是人们已厌倦于老看那几部“革命”电影，而想扩大欣赏范围。有些造反组织设法从给那些处于文化饥饿状态的观众们放电影中来谋利。偶尔还听说有一个造反组织从另一个造反组织手中抢夺这类电影拷贝的事情。

经济主义的第二次浪潮 虽然逍遥派对于参加组织活动已不感兴趣，但那些仍在积极活动的造反派却不只追求其自身的利益。

在造反派取得7月胜利之后，一个新的经济主义高潮再次席卷武汉，有些造反派提出了一个煽动性口号：“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翻身，而且要在经济上也翻身。”经济上处于劣势的团体，利用公共权威无法运行的机会提出了他们的要求，并设法迫使那些胆战心惊的前当权派接受他们的要求。

大量已到农村和边疆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又回到了武汉，并要求在武汉解决户口和就业问题。对分配不满意的转业军人要求更好的工作。66届和67届的专科和技校毕业生也对分配的工作和报酬不满意，要求分配到更理想的单位，拿更高的工资。

国营企业的临时工和合同工要求转成正式工，或至少与正式享受同样的报酬和其他福利。而国营企业的正式职工则要求提升级别，提高工资，增加各种福利及奖金。

经济主义在集体企业中最为猖獗，工人不仅要求改革他们所希望改革的东西，而且未经批准就擅自进行改革。有些人把小企业合并成一个大企业，并称之为“国营企业”。相应地，他们把自己的工资和其他福利待遇提高到国营企业工人的水平。有些人把他们自己的企业分割成几个更小的部分，并声称每个企业都是独立核算单位，因此其成员有权在不受外来干预的情况下决定如何分配利润和分配多少红利。有些人则提高了他们的工资水平。

虽然几乎所有的造反派都无例外地提出过这些经济要求，但大造反派组织都不支持这些要求，因为其头头们考虑更多的是政治权利的再分配。因此，来自不同组织但在经济生活方面有相似利益的人们觉得有必要成立一个“个别问题”同盟，以贯彻他们的要求。这类同盟很少建立新的组织形式，这些人只是在需要的时候在一起行动。

许多社会心理学家和集体行为理论家已注意到，临时群体比组织良好的团体更可能被卷入暴力之中。这些观察已被那些利用文革机会谋求自身经济利益的人们行为所证实。常常有报道说，某人袭击本单位或上级机关的财会部门或市、省级财政机构、税务局和银行等，并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迫使那里的工作人员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攻击的目标不一定是前当权派，任何挡他们道的人几乎都肯定会遭到他们的袭击。结

果，他们常常与那些机关的造反派发生冲突。

“翻案歪风” 在一些人煽起经济主义歪风的同时，有些人则试图给自己翻案。为了给这些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一个所谓的“阶级关系已变化”的理论应运而生。这个理论由一个三段论命题组成。其大前提是：受压迫者倾向革命；小前提是：过去17年中有人受到了压迫；结论是：过去政治运动中的受害者就是目前政治运动的革命者。或换句话说，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已发生了变化。工人、农民和干部现在成了既得利益者，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如此保守的原因。只有那些遭受迫害的人才会冒险反对现存的权力机构，所以他们是造反力量的骨干。虽然这个理论很少公开发表，但它在造反派中拥有广泛的支持者。7月份造反派对保守派的胜利使许多造反派有勇气推翻那些现在被打成走资派或保守派的人加在他们身上的坏结论。那些前资本家、地主、富农、坏分子则抱怨“刘少奇反革命路线”错误地给他们戴上了那几顶坏帽子。而一些右派分子则声称，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搞的，因此右派帽子也应该搞掉。他们呼吁纠错，并要求发还在“破四旧”运动中被没收的财物。有些人甚至更为过分，利用机会迫害那些曾迫害过他们的人。

甚至那些在文革初期和批判“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前成为冲击目标的当权派，现在也出来要求平反。武汉大学“三家村”的所谓头面人物李达已于1966年8月去世。但他的亲属和该校教师、工作人员不想就此罢休。在武汉事件后，通过广泛地动员李的同情者，他们在学校成立了一个权威组织开展翻案工作，此后还使它成为学校的中心问题。“武汉文艺界黑帮头子”程云曾于1966年7月在当地官方报纸上受到公开批判，并随即被关押，现在他也公开声称自己无罪。前湖北省宣传部长曾惇曾被打成“李和陈的后台老板”，他也出来为自己辩护。有人指责王任重为了保全自己而把曾当作替罪羊牺牲了。

为了团结要求平反的人，1967年秋建立了一个所谓的“甄别平反委员会”，其任务是甄别冤案并平反。在一个短时期内，许多人到这个委员会要求帮助。该组织影响的扩大反过来给那些认为自己受了冤屈的人增加了信心。这种“翻案歪风”显然扰乱了中央确定的斗争大方向。

大联合——无法实现的目标

甚至那些没有变成逍遥派、经济主义者、或个人自由主义战士的造反派，同样也令中央失望。而且，北京的领导人真正感到头痛的就是这些人。

尽管中央反复要求形成大联合，但武汉造反派之间的关系在“七·二〇事件”后迅速恶化。事实上，它不可能有别的结局。从理论上说，大联合的形成仅仅是建立未

来权力结构的前提，但形成大联合的过程是权力分配的一种形式。由于吸取了 1967 年 1 月的夺权经验，造反派领袖不会不认识到：保证自己在即将建立的革委会中获得好位置的唯一办法就是在成立大联合时占上风。那些人要掌权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改革现存制度这种崇高目标，而是为了一己之私利。虽然在“文革”前形势就已很紧张，但还未到爆发的地步。结果，几乎没有人抱有通过组织方式克服社会弊病的严肃的想法。毛的“文革”给许多人一个泄愤的机会，但并未引导人们去思考社会混乱的根源何在，更不必说他们改革社会的能力如何了。他们进一步受到毛的夺权号召的错误引导。人们普遍相信文革的目标就是要用“无产阶级当权派”代替“走资派”，但没有人问一问：一个旧机构掺进一些新人是否就能作根本的变革。但许多人热衷于成为当权者，他们从未考虑过若真的掌权后该做些什么。

被界定的权力不可能被竞争者所分享，除非有一系列能够用来规范竞争者行为的可实行的法则。这些规则至少应包括从成千上万渴望掌权的男男女女中选出候选人的标准、从候选人中选择掌权者的程序、在掌权者中分配权力的原则。然而，当造反派在 1 月份被怂恿去夺权时，没有制定任何一条这种法则，所以夺权导致造反组织间激烈的冲突也就毫不足奇了。中央的确曾设法避免重蹈覆辙。但它不是去制定游戏规则，却只是改变游戏过程。造反派被告知，他们在夺权前必须形成大联合。由于缺乏规则，因而不能期望这场权力分配游戏在结束时会比一月夺权少造成灾祸。

在武汉事件后不久，由于都盼望掌握从省级到基层的权力，从而使“香花派”和“毒草派”又发生分裂，现在它们被尊称为“钢”派和“新”派。每一派都想在牺牲对方的前提下控制大联合。

首先，“钢”派提出，只有在中央于 7 月 27 日致武汉革命群众的信中提到过的七个组织，即“工总”、“二司”、“九三兵团”、“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以及“三司革联”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组织，并有资格参与成立省、市大联合，其他组织只有两种选择：或是解散，或是参加上述七个组织中的一个。这是从竞争中清除权力对手的一种策略。由于某种原因，“钢”派的力量相对集中在几个大组织中，而“新”派的力量则比较分散。上面提到的前面三个组织可能包容了“钢”派的全部学生和工人，而后 3 个组织则代表了“新”派力量集中的 3 所院校。显然，通过剥夺“新”派在其他高校、中学和工厂中的势力参加大联合谈判的权力，“钢”派要保证自己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对于“新”派而言，这个建议当然是无法接受的。作为武汉第二大工人造反组织和“新”派骨干的“工人造反司令部”被激怒了。8 月 8 日，当中央领导人接见武汉造反派领袖时，“新”派代表利用机会表达了他们对该计划的强烈反感。为了安抚“新”派，中央领导人声称，不管在这个或那个中央文件上是否提到过它们的名字，所有现存的造反组织都是“真正的革命派”，并有权参与成立大联合。

“钢”派一计不成，又生第二计。这时候它提出，将成立的大联合需要有核心领导，而“工总”就应当是这种核心。那为什么大联合需要授权给一个组织，使其成为该组织的核心呢？为什么“工总”应当成为这种核心呢？“钢”派阐述了一下几点理由。首先，“工总”遭受的迫害比其他组织多，所以它具有最强烈的革命精神。其次，它是武汉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并比其他任何造反派组织拥有更多的产业工人，因此，它最有资格代表无产阶级在政治生活中起领导作用。

“钢”派提出让“工总”成为领导核心的目的就是要吞并整个“新”派，这一点很快就暴露无遗。首先，它提出其他工人组织应当解散，其成员应加入“工总”。这些组织的头头可以被重新任命担任“工总”中的职位，但其前提是：这类职位缺人，而且“工总”领导人觉得他们适合这个职位。换句话说，他们的命运控制在别人手中。

其次，在设法把“工总”建成最强大的竞争者时，“钢”派开始提出大联合的“武汉道路”。在北京，学生运动已使工人运动相形见绌，而上海的情形正好相反。所谓“武汉道路”，就是以“工总”为核心把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钢”派相应提出，不仅工人组织，而且学生组织也应该加入“工总”。

第三，不但“工总”声称要充当省、市大联合的领导者，而且，“钢”派的分支组织在各单位也提出了类似的口号，而不考虑该组织在一个特定的单位中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掌握实际领导权。例如，在中原机械厂，“新中原”是拥有几千人的主要造反派组织，而“工总”在这里的分支组织只是一个几十人的小组织，但它却声称，它作为武汉最大的革命组织的代表应当，而且只有它应当享有在该厂行使权力的资格。这听起来似乎很可笑，但类似的事情在许多单位都发生过。

当然，“新”派也绝不会向“钢”派屈服。为了抵制“钢”派统治武汉的计划，“新”派提出了成立大联合的不同模式，即“革司联司的模式”。根据这个模式，各单位的群众组织应合并，并为大联合而成立一个联合司令部，但不指定哪个组织起领导作用。而且，省、市的大联合应由数千个这种独立的联合司令部组成，而不是只由少数几个大的全市组织控制。这个建议是以仔细的算计为基础的。首先，在武汉的几个大企业中，“新”派的势力自1967年初起就已建立了联合司令部，这些组织在武汉的政治生活中有很大影响。其次，由于“钢”派势力通常集中在一个组织中，而“新”派力量则较为分散，所以后者指望联合司令部至少可以保证自己在基层享有公平的代表权。第三，它期望这种模式为“新”派在省、市的大联合中平等地分享权力提供一个斗争机会。

这个时期的政治基本上就是力量的较量。“新”派不会不认识，如果它显得没有力量，那它的建议很可能会被“钢”派拒绝。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57个“新”派组织于8月17日宣布合并为一个单位“新武汉”。它希望合并会大大加强“新”派在与“钢”派的权力斗争中进行讨价还价的地位。与此同时，“新”派对“钢”派的

领导宣言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为了推翻后者的口号“树立‘工总’的权威”，“新”派提出了一个无人敢反对的口号：“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权威”。

8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革命大联合的核心是在群众斗争中形成的》的社论。该文明确指出：“以我为核心的口号是完全错误的”。“新”派把这篇文章作为其反对“钢”派的依据。由于这个原因，这篇文章自第二天起被全文刊登在“新”派各主要出版物的显要位置上。然而，这篇社论并未吓住“钢”派。它诡辩道：“工总”的确是在群众斗争中成为大联合核心的。而且，它反责道：那些拒绝接受“工总”领导的人实际上是梦想自己占据领导位置。

到8月下旬已很明显，“钢”派和“新”派在权力分配问题上都不会妥协，但它们为自己的口号所作的辩护听起来都冠冕堂皇。由于仅仅辩论已无济于事，两派都加紧扩充自己的势力。前保守派和未参加过任何组织的人成了他们争取的对象。由种种原因，很多前保守派分子参加了造反派组织。由于每一个组织登记的成员数量几乎都急剧增加，做袖章和刻印章的行业生意兴隆，而其他行业的生产却冷冷清清。

两派的关系到9月初更加紧张。9月4日，“钢”派势力联合起来建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总司令部”。这个行动是对建立“新武汉”的回击，也是两派进行一场恶战的信号。由于两大组织互不相让，冲突的危险增加了。幸运的是，这种危险倾向被“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制止了。

毛的“伟大战略部署”

毛的伟大战略部署一词最初出现在9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4天后，《解放军报》详细阐述了毛的计划的四项主要任务，即：大批判、大联合和三结合、拥军爱民、抓革命促生产。然而，这个所谓的计划并没有一个准确的表述。相反，只是在毛于7月、8月、9月份巡视湖北、湖南、河北、河南、江西、浙江和上海等地时所作的一系列“最高指示”中作过不系统的阐述。虽然这些指示中体现的原则在运动的更早阶段已被阐述过，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它没有什么新内容，但9月、10月份对毛的战略部署进行的强大宣传运动对后来的事态发生了重大影响。

初看起来，这个计划是宽泛的，实际上几乎涉及到当时所有的重要问题，如军队、干部、保守群众、武斗、大批判、生产、大联合、三结合、革委会、极左、无政府主义等等。但若认真阅读计划原文，并仔细看一看被中央领导人和官方新闻媒介大肆宣传的部分就会发现，战略部署主要是针对造反派的，其目的是通过批评造反派的极左思想来恢复秩序。

首先，造反派被警告说，由于全国大多数地方的保守组织已经垮台，现在是造反

派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毛详细地讲述了如何“正确”地对待军队、干部和保守群众。他强调，军队的威信和组织统一必须维护，95%的干部必须受到保护，受蒙骗的保守分子应被宽恕，并在将来运动的各阶段中成为依靠对象。这些讲话显然是对造反派前几个月的所作所为的严厉批评，毛把那种现象称为“极左主义”。

他也批评了“极左主义”的另一种表现——派性。正如他所目睹的，派别冲突正像封建诸侯割据一方那样分裂国家。他着重批评了每一个组织都把自己弄成“大联合”核心的倾向。在他看来，群众组织间的大联合只有在相互协商后才能形成。

毛断言：“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但他没有解释工人阶级内部为什么已出现大分裂。他仅仅指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与走资派的挑动、钻入群众组织的阶级异己分子的破坏以及造反派成员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有关。这种分析没有考虑“文革”前在人民中存在的潜在冲突。诊断失误，也就无法开出治病良方。毛关于克服严重派性的办法是要各派多作自我批评，少讲别人的错误。如果另一派也这样做，两派可以就可以达成相互理解并找到建立大联合的共同基础。这个处方当时被概括成一个简单的口号：“斗私批修”。

在一定意义上而言，“毛的战略部署”不是一个计划，而是期望、警告和鼓励的结合。中央焦虑的是如何使敌对的造反派团体结合在一起，以恢复最低限度的公共秩序。因此，当这个战略部署已广为人知的时候，中央采取一致行动激发群众形成大联合的热情。9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辉煌胜利：欢呼上海革命大联合的新高潮》的社论，该文试图向全国表明：上海造反派在建立大联合问题上是有魄力的。四天后，《人民日报》发表了另一篇社论，它宣布，一个在造反派之间建立大联合的新高潮正在全国各地形成，该文赞扬它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潮流”。

在中央通过公布一些假事例设法制造一个大联合“高潮”同时，各省的造反派也组成假联合以宽慰焦虑的中央。

在武汉，9月22日至24日这三天里确实可以看见一个大联合的高潮。9月22日，桥口区和江岸区的造反派宣布，他们已就在本区建立大联合达成了协议。9月24日，江汉区的造反派发表了同样的宣言。与此同时，在成千上万的人来到武汉军区司令部和新建的解放军武汉警备司令部，不断向他们报告各自单位的造反派已达成联合的“好消息”。大的群众组织争相表达他们“紧跟毛的战略部署”的愿望。“工总”和“九·一三兵团”宣布他们已决定合并成“工人联合司令部”，并邀请“工人造反司令部”参加。“工人造反司令部”则反过来燃放烟幕，好像它已准备解散，并与其他工人组织建立大联合。“二司”提出口号“解散钢二司，实现大联合”。而“新”派的骨干力量“新华工”提出：“不要新派，不要钢派，要无产阶级革命派”。

在局外人看来，大联合似乎已经出现。但局内人都知道这些都只是装装样子。中

央还未来得及为武汉的“好消息”而高兴，纸上的联合就一个接一个地破裂了，而且，甜言蜜语地献忠心迅速被新的派仗所取代。在9月底和10月初，“内战”又升级了。

幸运的是，危险的进展被制止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被周恩来光临武汉所打断的了。10月8日，周和康生率领一个重要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抵达该市。他们到武汉后获悉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去欢迎他们的造反派刚刚在机场打了一仗，而且双方均伤亡惨重。这个事件必定使周清醒地看到武汉造反派之间存在的由来已久的分裂。因此，他在该市停留期间，每天都接见主要群众组织的领袖。他运用刚柔相济的策略迫使造反派尽可能快地形成大联合。首先，他告诉造反派，在全国29个省市建立新的政府机构（革委会）的进程必须加快，而且预计在1968年1月底前完成。湖北省和武汉市当然也不能例外。然后，他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告诉造反派，不会让他们中的任何人担任未来的省、市革委会主要领导，不管他们过去曾发挥过多么大的作用。革委会主任将由有经验的部队或地方干部担任。最后，他指示说，大联合应分别采取工代会和红代会的形式，不能拒绝工人、学生以及任何群众组织参与筹备这类代表大会。周希望，通过确定最后期限、降低造反派领袖对他们在新的政府机构中的位置的期望，具体规定大联合的形式及其合法的参加者，以此平稳地达到造反派间的团结。

周的讲话表面上受到各组织的热情赞同，然而幕后的派别斗争仍极猖獗。唯一不同的是，战场由街道搬进了会议室。10月3日，开始进行建立市级工代会和红代会的谈判。谈判的中心问题是：各组织在两个代表大会的领导小组中应占多少名额，以及哪个组织的头头应当在其中担负领导职务。但首先应当决定的是，哪个组织有资格参加这两个代表大会的筹备委员会。两派都知道，谁在筹备过程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谁就最有可能得到有利的结果。由于周恩来明确指定6个主要学生组织参加红代会的筹备委员会，从而避免了各组织为参加筹备委员会争论不休。10月14日，红代会筹备委员会宣布正式成立。然而，周恩来没有料到，武汉的情况和北京不一样。在北京，工人造反组织从一开始就发展不充分，所以，只要使学生造反派受到控制，那里的形势多多少少就会趋于稳定。而武汉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是平行发展并相互结合在一起的。为了应付这里的复杂局面，仅仅注意学生组织是不够的。由于周没有对哪些组织参加工代会筹备委员会作出安排，为建立工代会而进行的谈判在筹备委员会问题上遇到了障碍。

“工总”和“九三兵团”坚持认为，筹备委员会只应该由它们两个组织和“工造”组成，并且，这三个组织的代表名额应按七、五和三的比例分配。“工造”自然拒绝接受这个建议。它抱着要与“钢”派平起平坐的希望，建议筹备委员会还应包括12个小型工人组织，而且，三大组织在该委员会中的代表数额应该相等。经过10月13日、14日、15日的激烈的讨价还价，“工总”和“九·一三兵团”最终同意它们都和“工造”一样，只派三名代表参加筹备工作，但它们断然拒绝考虑让三大组织以外的

其他组织参加筹备委员会，谈判因此陷入僵局。

10月17日，中央发布了一个简短而重要的通知，其中指出：“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一切跨行业的组织，都应该在自愿的原则下，按行业进行必要的调整。”中央的主要意图是，把各组织分成孤立的、可能也更易控制的部分，从而重新控制运动。

跟往常一样，中央的新指示受到所有组织的欢迎。已中断的谈判因此于10月18日又重新恢复。但任何一方都无兴趣讨论怎样执行中央关于解散类似它们那样的大群众组织的指示。相反，注意力仍然集中在筹备委员会的构成这个老问题上。“工造”强调，中央通知中用的是“所有组织”一词，因此它坚持认为，它提出的让小型群众组织的代表参加筹备委员会的建议与中央所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工总”和“九·一三兵团”表示反对。它们指出，“工造”的建议中所包括的各组织的成员主要来自一个单位。这两个组织坚持认为，虽然那些组织有资格筹备本行业的大联合，但不能准许它们参加市级的工代会筹备委员会。由于两派各不相让，谈判再次于10月20日陷入僵局。

此后，武汉军区和武汉警备区对局势进行了干预。经过三天紧张的幕后活动，“工造”于10月24日发表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声明，表示“经过部队领导人的教育”，它将向“工总”和“九·一三兵团”妥协。换句话说，它不反对工代会筹备委员仅仅由三大组织构成。据报道说，由于军队施加压力才使“工造”作出这种让步。军队对该组织施加压力的原因可能不是因为它偏袒“钢”派，而是因为它觉得被介入的组织数量越少，建立工代会的过程也就越容易控制。

工代会筹备委员会于10月25日宣布正式成立。然而，该委员会随即就遇到了交叉火力。10月29日，当它召集第一次会议讨论下一步计划时，想不到有一大群人代表已被排挤掉的组织冲进会议室，他们来的目的是要表达他们对“钢”派试图僭取所有权力的愤慨。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求派代表参加筹委会。由于在混乱的气氛中冲昏了头脑，有些人暴露了自己的真正动机。例如，一个人喊道：“对，我是有野心，我想参加筹委会。你们可能说我自私。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你我之间没有多大的差别。差别在于，我敢于公开承认这点，而你们却不敢。”当主持会议的“工总”头头朱洪霞想用宣布散会的办法使他自己和他的伙伴们摆脱困境时，对立派的人怒不可遏。于是两派的人打了起来，朱被打伤。由于“工造”的主要头目一个也没来开会，“钢”派深信这个事件是“新”派策划的。为了进行报复，从下午到半夜，“钢”派的力量冲进“新”派在该市的155个据点，数百人被打伤。此后，工人组织间的谈判完全破裂。

尽管周恩来解决了筹备委员会的组成问题，但红代会的筹备作也遇到了麻烦。问题的症结在于，“二司”在如何选举未来的红代会领导人的问题上与其他五个组织看

法相左。“二司”认为，选举领导人的工作应分三步进行。首先，各校的各组织应形成大联合；其次，各校应派代表出席红代会；最后，代表大会的领导人应由代表们选举出来。这个计划实质上就是“新”派所说的“革司联司的道路”。初看起来，它可能让人疑惑不解。为什么“钢”派的学生要采取它的工人战友们所坚决反对的计划呢？然而，对“二司”及其对手的力量对比作分析便可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二司”是武汉最大的学生造反组织，其成员总数可能超过其他所有学生组织的总和，而除少数高校和更少数的中专外，它的势力在大多数院校都占优势，但在红代会筹备委员会中，它却处于少数地位，因为其它五个组织都是“新”派的势力。如果在全市各组织的基础上选举代表大会的领导人，那几乎可以肯定，它会在那个机构中处于劣势。因此，为了避免失败，唯一的办法就是设法确定对自己有利的规则。这就是“二司”坚持要由全市各校代表选举红代会领导人的原因，它相信这种办法能保证自己在代表大会内外的优势。

其他五个组织拒绝考虑“二司”的建议。他们自然也不放弃在筹备委员会中所占的优势。他们坚持认为，筹委员成员应该成为红代会领导小组的成员。

双方发现，找不到相互妥协的办法。随着“钢”派和“新”派工人组织间关系逐渐恶化，学生组织间的谈判也在11月初中止了。

毛曾经希望，他提出的“斗私批修”会有助于造反派克服派性，并为大联合扫平道路，但事实并非如此。造反派对这个口号顶多也就是表面应付，象征性地作一下自我批评。为了给自己的夺权活动寻找依据，各个组织都想把自己装扮成好人，自我批评则意味着政治自杀。在这种情形下，劝那些夺权者自己承认错误，达成相互谅解并团结起来，就像中国一句古话所说的那样是“缘木求鱼”。由于同样的原因，《文汇报》所倡导的“无条件联合”也必定要失败。在权力角逐中，对手间的无条件联合是从不会实现的，除非一个绝对权威施加压力。然而，如果真正施加了压力，这种“联合”几乎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联合。毛对全体中国人拥有绝对权威，但他不准备在那时候把“无条件联合”强加于人。由于还没有规则，各派都打算提出和坚持会对自己的政治地位有利的方式。因此，谈判的唯一结果只能是破裂。

与前几个月相比，1967年11月的武汉也和全国其他各地一样较为平静。没有看到关于暴力的报道，没有引人注目的事件，没有热烈的争论，也没有广泛的狂热。但也很少有人谈论大联合。有些观察家在描述这段时期的局势时断言，“文革”掀起了狂风暴雨，而现在已风平浪静。但对峙不应被误当成平静，在武汉，建立工代会和红代会的谈判破裂后，“钢”派和“新”派间的不和正在扩大。两派都开始向对方的主要头目进行人身攻击。而且，有关两派在前段时期关系的令人难堪的事情抖落出来。

“钢”派指责“新”派是陈再道在2月8日后“香花”派的“帮凶”，而“新”派则嘲笑“钢”派在“工总”于3月份被宣布为非法组织时曾向陈再道求饶。相互揭疮疤

使两派满腔仇恨，并使他们间的关系更为紧张。事实上，“钢”派和“新”派都害怕这种紧张会随时导致武斗。为了作最坏的打算，它们开始组织自己的职业武装力量。但在“秩序”和“团结”口号盛行的大氛围中，很难为引起新的暴力冲突开脱罪责。所以，虽然对立派别都恨不得一口吃掉对手，但它们都不得不控制自己，以免做出什么过火举动。它们在等待采取行动的恰当时机，但这个时机并未很快到来。

第 15 章 革命委员会

早在 9 月份，毛就要求加快在 29 个省市建立新的政府机构的进程。中央也相应地安排了一个时间表：到 1967 年底，至少要在 20 个省建立革委会，而且各地在 1968 年春节（1 月底）前应当完成这项工作。尽管中央煞费苦心，但在 12 月初全国也只有 9 个省革委会开始工作。这种令人失望的缓慢状况一定令中央灰心丧气。让造反派自己协商如何分配权力通常耗费时日，而且麻烦层出不穷，这个办法在各省实施过程中也屡屡失败。中央逐步认识到，如果它规定的最后期限到期，必须从上至下采取强制性措施。

压制造反派

中央试图促进形成大联合及在各省建立革委会的新办法就是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967 年下半年，中央把各省的地方组织的代表召到北京，并给他们办学习班。在吴法宪为首的所谓中央学习班的监督下，参加者协商与在各自省份分配权力有关的一切问题。

但武汉的情况不同，学习班不是办在北京，而是办在武汉。武汉军区和武汉警备区受权主持学习班。学习班于 12 月初开始，各大组织的主要头头都被召来参加学习班。由于有中央作后盾，军队在处置那里的造反派时采取了“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一方面，它威胁造反派说，不管谈判的结果是什么，他不能对此进行抵制。造反派头头被告知，“谁在谈判过程中故意制造麻烦，就将谁清除出工代会或红代会领导小组。”因为，据说破坏建立大联合就是破坏“毛的伟大战略部署”。另一方面，它设法制定一个有关领导小组构成和成员的方案，这一方案允许两派及其组织拥有大致相等的代表人数，并进而制定一个能被它们接受的计划，这个策略似乎非常有效。12 月中旬达成了有关两个代表大会领导小组构成的协议。新华社在 12 月 17 日兴高采烈地宣布：“在武汉已形成了革命大联合”。但这种联合更多地是形式上的，而非实质上的，因为这是军队施加压力的结果。“钢”派和“新”派都对这种结局不满。由于军队的精心安排，前者控制了工代会，而后者控制了红代会。因此，类似“二司”的站在“钢”派一边的学生组织，以及类似“工造”的站在“新”派一边的工人组织对于在各自的代表大中处于劣势几乎不可能感到满意。但他们除了接受军队所作的强制性安排外别无选择，因为那时的政治气候正朝着有利于军队而不利于造反派的方向变化。

1967 年 12 月，给军队下达了如下命令“支左不支派”。这最好地阐明了新的路

线。以前，武汉及其他省的造反组织常常运用如下的逻辑攻击军队：“我们是左派。如果你们不支持我那就是不支持左派”。新的口号使军队摆脱了这种攻击，因为它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表示支持哪一派。军队因此又恢复了主动。换句话说，为了恢复秩序，它不必过多地考虑在此过程中会得罪什么人。

“支左不支派”的口号还有另一个重要意义。1968年1月28日，《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以口号“我们必须支持所有革命群众组织”为题的社论。根据这篇文章，“不能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造反派被告知，想方设法在群众组织中区分造反派已毫无意义，所有现存的群众组织都是革命的。造反派还被告知，即使那些犯过错误的人也不应被赶出革命行列。作为例子，文章强调，前“百万雄师”的成员应有参加建立基层大联合的权利，而且，中央指出，今后区分左派的主要标准是看一个组织愿不愿意形成和巩固大联合，而不看其在“文革”前一阶段中的表现。因此，造反派的政治资本，即他们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走资派”的光荣历史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1968年初开始的批“极左”运动进一步破坏了造反派的威信。《人民日报》发表的1968年元旦社论第1次吹响了在全国彻底清除派性的号角。文章断言：“能不能自觉地克服派性，是在新形势下愿不愿做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标志。”

1月中旬，运动达到高潮，所有中央和地方报纸都连篇累牍刊登批判派性的文章。而且，中央领导人在接见各省造反派时，都不失时机地谴责派性。

武汉的运动在军队的指导下形成燎原之火。各级、各单位都举办了旨在克服造反派中存在的派性的学习班，尤其是那些长期存在严重问题的单位成了运动重点。由于中央和地方军队施加巨大压力，所以尽管造反派不大愿意，但还是被迫作自我批评，即使这种口是心非的自我批评也常常用来为派别斗争的目的服务。许多人为了防止对手抓住自己的弱点，在作自我批评时采用了两种策略。一种叫做“避重就轻”，另一种叫做“等债交换”。有人甚至玩弄“棉里藏针”的策略，即看似作自我批评，实则攻击对手。因此，这种自我批评言词谨慎，不给对手留下任何把柄。而且，为了避免留下把柄，通常的作法是，同一派的人在去学习班以前先凑到一起商量对策，但造反派现在不得不约束自己。正是在这种令人气馁的气氛中，武汉红代会和工代会于1968年1月中旬正式成立。

强行“三结合”

然而，大联合的形成仅仅是建立革委会的前提之一，因为原来设想革委会要以“三结合”为基础。革委会中的军队代表几乎不成问题，因为中央严禁造反派染指军队

事务，但干部代表问题却很棘手。

因为毛在“文革”之初几乎并未设想要大规模打倒干部。这就是毛在联合的每一阶段都不得不发出“正确对待干部”口号的原因。但在实际上，这种规劝的努力从未产生过预期的效果，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客观原因。造反派之所以不愿解放干部，是因为他们害怕失去自己在“文革”期间所得的一切。一方面，造反派担心，如果以前的干部们官复原职，那么，那些曾为保护他们而战的保守派会被宣布无罪而重新得势。另一方面，他们担心官复原职的干部会对曾过火地“批判”过他们的人进行报复。此外，每个人都清楚，干部参加进来必定会削弱造反派在革委会中的地位。所以，造反派普遍倾向于尽可能多的干部继续背着“走资派”的罪名。

但是，中央似乎认为，广大干部的行政管理经验对于平稳地管理经济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新的政府机构——革委会中必须给他们保留位置。1967年10月，毛在作进行联合的第二次大的尝试时强调指出，实现建立革委会的基础——三结合的关键是解放大批党的干部。在11月7日发布的通知中，中央指出，只有让干部参加后成立的革委会才能得到承认。与此同时，一篇重头文章强调，只有极少数干部可以算作“走资派”。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可以解放，而且人们应当有勇气解放他们。毛的谨慎的干部政策此时又被概括成一句口号“在处理干部问题时，我们要扩大团结面，缩小打击面”。所有这些向造反派传递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信息，即不管愿意与否，他们都必须与干部分享权力。剩下的关键问题是，他们将在革委会中与谁一起共事。

在选择未来的伙伴时，造反派首先往往选择那些他们认为容易控制的人。“文革”中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是，那些在“文革”前忠实地执行官方政策的有贡献的干部往往比“老好人”式的干部受到群众更猛烈的批判。那些“老好人”虽然担任负责工作，但他们不敢负责，不讲原则，不得罪人，而且庸庸碌碌、胸无大志。由于他们很少得罪人，所以在“文革”中，很少有人找他们算账。因此，虽然其他人被打成了“走资派”，但他们却被当成“可以教育好的干部”。造反派在推荐他们参加革委会时另有打算：希望在表面上与“老好人”合作的同时，把他们当作手中的玩偶。

造反派要选择的第二种人是“文革”前夕从外单位调来的干部。由于他们呆的时间不长，所以不大可能与人结仇。所以，在别的干部受到折磨时，他们通常被赦免。由于这个原因，造反派当然愿意与那些新调来的干部共事，而不愿与那些他们曾当众侮辱过的、长期与之共事的干部合作。新调来的干部可能不如那些“老好人”那样容易控制，但他们至少不会像那些对造反派怀恨在心的人那样对造反派充满敌意。通过这些措施，他们要使革委会里的干部绝不会威胁到他们的利益。

由于“老好人”和新来的干部对造反派的利益无害，所以他们多半可以被各造反派接受。但对于其他干部，甚至那些曾支持过造反派事业的人，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

从“文革”初期起，就有一些干部站在造反派一边。他们被造反派当成“革命干

部”。他们的组织——“革干联”于1967年5月18日成立。那些干部靠近造反派的原因虽然多种多样，但大致可分为四类：有些在“文革”前受过组织处分；有些受到顶头上司的压制；有些人认为，自己在提拔问题上受到歧视；而有些人则把自己的前途押在造反派的胜利上。

在7月发生的武汉事件后，当群众造反组织公开分为两派时，“革干联”从内部分裂了。大部分与“钢”派联盟，自称为革干联的“左翼”，而另一些人则与“新”派结合在一起。这一分裂导致依附于两派中不同派别的干部相互攻击。

两派对干部的相互攻击从11月份起更加变本加厉。因为许多人知道，虽然革委会将由军官、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组成，但实权将主要掌握在干部手中。军队只能在提供指导原则时起领导作用，而造反派代表则不会被允许过多地干涉新的权力机构的日常事务。因此，那些有行政经验的干部将考虑从制定政策到执行政策等一切问题。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而言，能够使更多的干部在革委会里与自己合作的派别更有机会控制那些委员会。

斗争得最激烈的问题是：谁参加省、市革委会。由于“文革”对于我称为的“权力结构金字塔”未损丝毫，所以，很明显的是，谁控制了上层革委会，谁也就控制了下层的政治活动。可以肯定，“钢”派和“新”派都曾设法在两个即将成立的革委会中获得更多的干部代表。

就这方面而言，“钢”派肯定会在省革委会中占优势，因省委和省政府的大多数支持造反派的前领导干部，站在“钢”派一边。但在市一级，两派则势均力敌。如果市革委会落入“新”派之手，在武汉市就会出现两个敌对的权威。若不及时控制市级政权，省革委会就会仅仅成为名义上的权力机构，因为在武汉市以外，“钢”派（“新”派也一样）对全省72个县几乎没有影响。为了避免这种糟糕的前景，“钢”派竭尽全力与“新”派争夺对市革委会的控制权。

由于前市党委和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干部几乎都不同情造反派，而且也没有人站在他们一边，“钢”派于是提出，打破省、市党委和政府、高等院校、大企业的干部之间的界限，这样让前市级机构以外的干部进入市革委会。

“新”派不反对打破不同干部间的界限，但它坚持认为，前武汉市副市长薛朴若是市革委会中“革命干部”主要代表的最佳人选。至于省革委会，由于极少有省级“革命干部”站在“新”派一边，它被迫从别处寻找干部人选，例如从武汉以外的干部中来选择。另一个选择是前省委省政府中从未支持过造反派的主要领导干部。“新”派认为，让这些人进入革委会比让对立派推荐的人进入革委会要好得多，因为前者的倾向，最坏也就是无法预料，而后者则肯定会在未来的政治中支持对立派别。

12月20日，武汉军区领导有意识地向正参加军队主持的学习班的造反组织头头透露：中央希望能考虑让张体学成为未来的湖北省革委会的主要成员之一。这个消息

在“钢”派中引起强烈的愤慨，然而令“钢”派更为吃惊的是，他们听说张是毛主席亲自指定的。没有人敢否定毛的权威，但“钢”派头头们私下认为毛任命张是一个信号，它表明中央正设法结束关于让哪个“革命干部”参加革委会的争执，它采取的办法就是建议让那些从未倒向任何派别的人担任那些职位的候选人。此外，中央还正在设法尽可能多地“解放”前省、市主要领导，并让他们进入即将形成的新的权力机构。

毛任命张使“钢”派大吃一惊，也使它担心自己无法按设想的那样在省革委会中获得优势。如果中央能接受张，它也可能接受“新”派推荐的其他人。而且，事情如果真的到那种地步，那些以前的干部们会对“钢”派在机构中的地位造成严重的威胁。为了应付这种复杂的局势，“钢”派决定竭尽全力打好筹备省、市革委会这一仗。由于受到毛的指示的鼓舞，“新”派不甘心输掉，因此，两派都准备进行夺权比赛。

武汉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1968年1月中旬，武汉军区加快了建立革委会的步伐。1月12日，它开始就市革委会干部候选人问题进行正式谈判。两天后又开始就省革委会干部候选人进行谈判。13个主要群众组织的头头应邀参加谈判。在市革委会问题上，“新”派提出19名候选人，而“钢”派提21名；在谈到省革委会组成问题时，“新”派提出14名候选人，而“钢”派提出18名。就市革委会言，两派所提候选人中，只有3人是双方都提了名的，而在省革委会中也只有6人。就其他人选而进行的讨价还债极为艰苦。双方都不愿在对方让步前作出妥协。那些造反派头头在关起门大肆争吵的同时，他们指挥自己的人从外面向谈判施加压。两派还散发了大量的出版物美化自己所推荐的干部，丑化对立派所提出的候选人。

尽管军方作出了艰苦的努力，但两派间的谈判在经过10天的激烈争吵后仍未能就革委会问题达成协议。若在过去，谈判失败可能会导致推迟建立革委会。但中央现在改变了它对革委会作用的看法。它不再坚持认为，只有在解决对立派别之间|、重要问题上的争执后才能建立革委会。相反，中央现在认为，先建立革委会，然后通过新的政府机构解决派别冲突可能更好。然而，要建立革委会就应在群众组织未能就谁可以参加革委会问题达成协议时从上面采取强制性措施。

在武汉，在“钢”派和“新”派间未能达成协议后，军队担负起决定市、省革委会组成人选的任务。事情的进程开始加快。几天后，军队不仅提出了有关的建议，而且，这个建议还得到了中央的批准。1月20日，武汉市革委会宣布正式成立。2月5日，湖北省革委会也宣布成立。

两个革委会都由军人担任第一把手。武汉警备区的司令和政委分别被任命为武汉

市革委会的主任和第一副主任；武汉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则分别被任命为湖北省革委会的主任和第一副主任。由于武汉军区设法使两派的代表总数保持平衡，所以两个革委会中的副主任、常委、委员职位的分配似乎也很公平。各大群众组织的头头绝大多数都在革委会中担任了职务，这显然是试图安抚他们。而且，两派发现，虽然他们提名的一些干部被否决了，但其他人被安置进了革委会。有趣的是，湖北省革委会中的革命群众代表几乎全都来自武汉地区，只有少数几个人是来自湖北的 72 个县。看来，为了安慰武汉的“会哭的孩子”，军队就完全忘记了“喂”该省其他地方的相当数量的“安静的孩子”，尽管武汉地区的人口只占湖北省的 10%。

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建立后，在武汉出现了一个来之不易的休战时期。

再也没有大的冲突和武斗。而且，基层革委会一个接一个地建立。但革委会的建立并未结束派别冲突。相反，派别活动仍在暗中酝酿着。导致冲突的持久源泉是：两派都不满足于已在省、市革委会中所得到的那份利益。的确如此，当一个游戏中的游戏双方都想赢的时候，胜负各半的结局不会令任何一方满意。此外，每一派都怀疑对方更得到军方的同情与支持。这类推测不一定属实，但它们确实影响两派对该市权力分配的估计。

从理论上而言，革委会代表公正的政府权威，但在实际上，革委会成员一直代表他们各自的派别在起作用。因此，派别冲突进入了革委会内部。但由于军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内部团结一致。派别活动中才没有像山西那样导致在省、市出现双重权力机构。而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武汉市革委会和湖北省革委会被一些造反派私下称作“军政府”。但基层的普遍情况是，匆匆忙忙建立的革委会在成立后不久就遇到了麻烦。与上层不同的是，一个单位中常常是一派绝对压倒另一派。如果那是事实的话，占优势的派别常常不顾小派别的反对而独自建立革委会。由于不愿被制服，受压迫的派别就设法骚扰另一派并拆革委会的台。因受到单位内部关系网的支持，这类行动可能非常有效。在被指责为“派别委员会”的时候，许多单位的革委会瘫痪了。甚至在那些两派共同掌权的单位，革委会可能也只是名存实亡。由于派别时时存在，以致革委会无法通过决议，而且，即使采纳了某个决议，革委会也很难实行它。

进一步恢复秩序

不过，由于省、市革委会的建立，造反派一般都被迫约束自己。

整个国家的政治气氛的确都在发生变化，虽然在四川、广西和山西等省份还时不时发生武斗，但在 1968 年的头 3 个月，有 9 个省建立了自己的新的政府机构。从 2 月份开始，在进行批判派性运动的同时，对“无政府主义”也进行了正面抨击。“无

政府主义”和“派性”被看成是“结在同一根毒苗（极左思潮）上的两个黑瓜”。旷工、罢工，破坏交通和通讯设备，损坏公共财产，抢劫国家仓库，以及否定法律和纪律的所有其他行为都被当成有害的无政府主义倾向的表现。造反派受到规劝说，要克服无政府主义并好自为之。而且，为了根除派性，造反派被敦促“检查和整顿”各自的组织，这意味着要清除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坏分子，而且不管他们在这些组织中有多高的地位。反派性和反无政府主义运动因此为军方镇压造反派并恢复秩序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在武汉，新成立的武汉市革委会和湖北省革委会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动了一场批判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的这动。为此，它们颁发了决议，召开群众大会，指令当地报纸和电台发表或广播有关文章，命令各单位组织学习班。同时，那些措施有助于增强该市反极左思潮的声势。严厉批判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给造反派造成很大压力，使他们愁眉苦脸，因为它们（而不是走资派和保守派）成了运动的主要目标。尤其是那些造反派头头(其中许多人进入了各级革委会)受到了更猛烈的冲击。他们被指责在成立大联合过程中为自己捞权，在就革委会成员问题进行谈判时拼命排挤依附于对立派别的干部，以及在其成员中灌输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等等。而且，在经过一年多的暴力和流血后，许多普通的造反者对政治已很厌倦。他们认识到，打派仗只对冲突各派中想掌权的铁杆分子有好处，因此，他们欢迎能使他们的私生活恢复到更平静更有秩序社会的机会。迫于形势的压力，即使那些顽固和陷得很深的造反派也不得不谨言慎行。结果，群众组织在2月份和3月初普遍处于停顿状态。随着党的重建、清理阶级队伍、复课以及生产正常化摆上新建立的革委会的议事日程，造反派的影响被进一步削弱。重建党必定意味着恢复各级党组织和各单位党员的威望。由于大多数党员或是加入过保守组织，或是对那些组织一直表示同情，造反派的影响可能会随着党的活动的恢复而被有效地克服，这实际上就是造反派所担心的。清理阶级队伍是对造反派的更直接的威胁，因为根据一般被接受的标准，造反组织中比保守组织中的确存在着更多的“不纯”分子。清理阶级队伍可能不仅会清除“暗藏的阶级敌人”，而且还可能会大大地损害造反派的名声。造反派的统治地位很可能要发生动摇。

号召复课和恢复生产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削弱造反派。因为造反派，尤其是那些有劣迹的造反派往往在本单位处于少数地位，而单位间的相互联系对他们至关重要。如果割断了他们与外单位的同志们的联系，那他们在各单位的影响即使不会完全破坏，也会被大大地削弱。毫不奇怪的是，在整个“文革”期间，每一个稳定阶段的开始都伴随着促使学生复课、工人复工的努力，而造反派通常也不愿心甘情愿地服从中央的这类指示。而现在把旷工、旷课作为臭名昭著的“无政府主义”的表现而加以批判，而无政府主义又被描绘成可能导致天真无知人滑向反革命阵营的桥梁。造反派不得不回到本单位，而这大大降低了他们的政治份量。

第 16 章 从「三反一粉碎」到非激进化

当中央决定否定反极左运动时，缓和期在 3 月下旬突然结束。中央之所以突然来这样一个转变，是因为它认为反左斗争放过了右派。

武汉反对四种右倾的运动

正如“极左”一样，“右倾倾向”的内涵也是很抽象、随意性很大。没有人对这个概念下过定义。毛曾警告说，准确地阐述口号和标语的内涵在中国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因为它们：能够对绝大多数群众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但在“文革”期间，中央常常不谨慎地突然改变官方路线，以此作为应付由以前的口号引起的种种问题的权宜之计。这种朝令夕改是造成“文革”的显著特点之一——从一个极端常常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原因。官方路线的朝令夕改削弱了中央指示的效力。群众对不利于自己的政治利益的官方政策的对策是，或者口头应付，或者干脆置之不理，并为自己的目的而作出其他解释。尤其是造反派已体会到，在极左思想受到批判时，他们必须暂时老实一点，而当右倾受到批判时，他们又可以肆意横行。中央以对北京的考察为基础，断言目前运动阶段的“主要危险”不是来自极左，而是来自极右，从而放任各省的运动不平衡地发展。而且，在号召进行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右倾战斗时，面临着极左分子重新拉帮结伙和派性重新出现的危险。对中央而言，反右倾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打退右派对新生的革委会的进攻。显然，在发动一场新的运动的同时，中央想巩固、而不是削弱新的公共权威。但想借助于反右倾运动来促进在全国建立新的政府机构，中央采取行动的方式可能只会导致事与愿违。

随着反右倾运动进入高潮，毛的两条“最新指示”发表了。指示进一步解除了前几个月强加在造反派身上的束缚。毛首先指出，必须对派性进行阶级分析，已受到严厉批判的“小资产阶级派性”已被清除，并被“无产阶级派性”和“资产阶级派性”所替代。虽然资产阶级派性的所有表现仍然受到批判，但无产阶级派性却被认为是好事，而且，革命者必须支持它。这是毛使运动的两个高潮之间保持微妙均势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但对造反派而言，毛的这个指示是他们的大救星。现在，每个组织都可以有恃无恐地宣称自己属于无产阶级派，并以无产阶级派必须反对资产阶级派为借口，重新进攻对立派别。

其次，毛把“文革”与反对国民党的斗争相提并论，他断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

这个指示可以被用来为造反派的过火行为辩护。由于“文革”现在被看成是国、共两党之间斗争的继续，所以对立各派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对手骂成是“国民党反动派”。而且，在处理反动组织时，他们可能会表明，任何方法，包括暴力，都可以使用，而且决不能表现丝毫同情。

官方路线的突然转变在武汉很快就感觉出来了。来自北京的令人振奋的消息重新燃起了造反派因批极左而几乎泯灭的激情。各组织随即召集其主要头目开会，分析中央政策的转变对本组织的意义。有趣的是，“钢”派和“新”派得出了同一个结论：“文革”已进入决战阶段。

为了准备决战，各组织不得不招兵买马。但这并非易事，由于许多人因官方路线朝令夕改而变得心灰意冷，并且对看上去毫无意义的派别斗争不再抱幻想，所以他们丧失了对运动的热情。甚至新的反右倾斗争也无法激起他们的革命热情。他们更愿退出运动，作一个旁观者。

为了克服这种障碍，两派造反组织都声称“百万雄师”将要卷土重来，企图通过威吓真正意志消沉的成员的办促使他们行动起来，这又重新引起了对前保守派的进攻。

在前几个月里，当极左倾向受到批判时，一些前保守派利用机会发泄了对造反派的不满。由于毛强调工人阶级内部团结的重要性，并号召停止工人内部的内战，所以他们争辩道，“百万雄师”作为一个工人组织，不应被解散。由于毛曾告诫造反派说，不要把那些一时犯过某些错误的人和领导成员中有坏分子的革命组织赶出革命队伍，所以，前保守派分子指责造反派在武汉事件后疯狂地对他们进行肉体上的凌辱和摧残。由于毛仍然称陈再道为同志，并要求造反派恰当地安置大部分老干部，所以他们坚持认为保护这些干部并没有错。而且，有些人上北京去控诉本单位造反派对他们的虐待。一般而言，前保守派分子只敢暗地里发发牢骚，而不敢搞串联。但有些人却正计划用组织方式向造反派挑战，虽然他们的企图在采取具体行动前就于1968年1月初暴露了。这就是所谓的“百万雄师地下司令部”。与此事有牵连的不到12个人，而且都不是“百万雄师”以前的头头。

然而，这件事被造反派抓住并被夸大成来自前保守派的“威胁”。据称，“地下司令部”已在全市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并准备发动政变。在号召提高革命警惕的同时，对前保守分子，尤其是对“百万雄师”的各级头目采取了进攻行动。许多人再次在批判

大会上受批斗，被游街，而且有些人被关押起来。新成立的隶属“工总”的“江城前哨”在镇压前保守派的新浪潮中发挥了特殊作用。自命为“群众专政”的团体实际上是“工总”的冲锋队，被它强占的武汉体育馆则成了一个大监狱。在接到某个单位的造反派送来的黑名单后，“江城前哨”会派人到该单位去，或是在某个地点用拳头教训黑名单的人，或是把他们抓回来关进体育馆，那些被关进体育馆的蒙受到严刑拷打，有的人甚至被打死。

造反派对前保守派分子如此残酷的另一个原因是，各个组织都想通过虐待那些人来说明自己没有受右倾思潮的影响。那时普遍认为，“心慈手软”就等于“右倾”。为了证明自己是革命的，某个组织因此不得不举止粗暴。而且，为了证明自己比别人更革命，它不得不表现出更为粗暴。

然而，没有多少人相信它所大喊大叫的“狼来了”。在大多数情形下，只有极少数作恶多端的造反派响应其头头的号召，而且，更糟糕的是，有些单位里没人有兴趣参加新的运动。由于对“文革”的反复无常已感到厌倦，许多造反派变得玩世不恭。

由于缺乏广泛的支持，两个对立派别不得不比以前更依赖特殊势力。这是一些由原来相互对立的大组织豢养的半职业化的冲锋队，如“工总”的“江城前哨”、“九·一三兵团”的“敢死队”、“工造”的“铁军”。在过去，这些组织顶多在派别斗争中起辅助作用，然而，它们现在被指望发挥主导作用。这些团体之所以有战斗力，主要原因不在于其成员与各自派别的头头们目标一致，而在于他们是一群暴徒。它们常常从流氓地痞中招募队员，而且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成员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喜欢打架斗殴，却痛恨纪律约束。他们对加入哪一派并不在意，而只要参加一个组织就行。他们不关心为什么要打派仗，他们只是为打仗本身所吸引，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一种历险。敌对的帮派常常与对立的造反派别共命运。这样，他们可以在派别斗争的借口下清算旧仇。

4月，“钢”派和“新”派间发生斗殴。正如以前所揭示的，问题的症结在于两派都觉得“必须重新分配权力”。通过“重新分配”，各派实际上都想从各级新权力机构中清除其他派别，并由它自己垄断全部权力。为了给这种口号找借口，“钢”派指责“新”派的人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要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滚出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而“新”派则指责“钢”派的成分是“由一帮流氓阿飞组成的右倾分裂主义组织”，并坚持认为，“只有在‘钢’派被清除之时，武汉才能恢复和平。”

干部问题又被重新提出来。“钢”派提出抗议，“刘真和张华被排挤出湖北省革委会是右倾表现”。它指责张体学是“右倾翻案的元凶”，并想以此打倒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中由“新”派提名的所有干部。另一方面，“新”派宣布要打倒所谓的“王任重扶植的影子政府”，这意味着要打倒“钢”派向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

会推荐的所有干部，而不管他们实际上是否已得到任命。

1968 年的酷暑

到 4 月底，两派间的关系已变得极为紧张，以致“工代会”和“红代会”都无形解体了，而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的存在也出现了危机。由于忙于指导派别斗争，那些群众组织的代表再也没时间参加这两个革委会的活动。

与此同时，两派都想方设法收集武器。许多人被派往省内外各地，用他们随身带去的新闻纸、香烟、猪肉、汽车等抢手日用消费品换取武器。上一年秋天没有上交军队的步枪和手枪又派上了用场。两派都紧锣密鼓地作好应付最坏结局的准备，因为他们相信一场流血决战是无法避免的。

5 月 3 日事件证实了他们这种焦虑。简而言之，这个事件的情形大致如下。在 4 月份，中原机械厂里几位参加了“工总”的人被控制该厂的“新”派势力当作“流氓”逮捕了。为了以牙还牙，“江城前哨”绑架了该厂“新”派势力中负责安全保卫的头头。虽就释放人质问题进行了谈判，但很快就陷入僵局。随后，“江城前哨”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 5 月 3 日前释放“钢”派的人。然而，该厂的“新”派势力决不屈服。5 月 3 日“江城前哨”用数千名列成战斗队形的人包围了该厂，并堵死了通往该厂的所有道路。不久，一场全面进攻开始了。这场武斗导致 3 人死亡，57 人受伤，以及数百万元的财产损失。只是在武汉警备区派出 23 个连的士兵进行干预后，这场武斗才被制止。

这个事件使两派确信，必须为打赢即将来临的决战加快作准备。在随后的日子里，“钢”派领导小组在长江上一艘游动小船上召开最高会议，讨论适当的战略部署。然后，与“钢”派联盟的大量群众组织的头头们被从全省各地召到武汉，讨论制定如何对付“新”派在全省各地挑战的计划。5 月 11 日，该派召开大会。会上，数千个分支派别的头头们听取了“钢”派领导人对目前形势的分析，以及为应付这种局势所采取的措施。听者惊讶地得知，有证据表明，“新”派正在酝酿一个阴谋，企图暗杀“钢”派的主要领导人及其基层骨干。显然，这是要挑起“钢”派普通成员对“新”派的仇恨。

“钢”派的这些活动使“新”派清醒地意识到面临的危险。因此，它于 5 月 15 日至 18 日召开了最高会议，来自全省各地的大约一百名“新”派领导骨干出席了会议。出席者得出的结论是，面对“钢”派的威胁，他们必须有备才能无患。为了迎头痛击“钢”派每一个挑战，会议决定要着重注意舆论宣传、组织和武器等问题。会后，与会者着手动员基层的支持。他们带回去的信息是：

“过去，我们新派与钢派打交道时太心慈手软，别人打我们，我们还不忍打别人。今后我们再也不应该学马丁·路德·金，非暴力抵抗在这儿行不通。”

除了煽起派性外，两派还加紧进行战斗准备。高层建筑被两派占领，成了他们的指挥据点。到处谣传说，有些组织正在为抢军械库进行侦察。而且，两派的分支组织间更频繁地发生冲突。最后，两个事件把原本极为险恶的形势推到了真正的战争边缘。5月18日，“钢”派所推崇的著名理论家鲁礼安被“新”派绑架。为迫使“新”派释放鲁，“钢”派组织了一个所谓的“营救鲁礼安联合代表团”，并在“新”派的几个据点周围进行武装示威。然而，这些抗议还未产生结果，就又发生了另一个事件。5月26日，当“工总”的两个头头开车经过“工造”下属的“铁军”所控制的地区时，“铁军”向他俩开枪射击。虽然这两人均未受伤，但这个事件似乎证实了“钢”派对“新”派的指责，即它正在计划暗杀“钢”派的领导人。第二天，“工造”所有头头们都到全市各处发表演讲，一方面谴责“新”派的“罪恶勾当”，另一方面煽动其追随者采取行动。由于担心“钢”派可能会采取报复行为，“工造”在同一天向其各个据点发了一个秘密指示：

你们必须立即处戒备状态。今晚（五月二十七日）凡来我大楼附近从事骚扰和挑衅者，先朝天鸣枪示警。若执意不听，或有反抗行为者，可开枪还击。”

5月27日，没有见到有关两派冲突的报道，这只是因为双方都在忙于搜集武器。在5月26日至28日的三天里，两派争相在武汉搜集武器，该市及郊区县的军械库几乎都被抢，而且在有的地方，直接从解放军战士的手中把武器抢走。据估计，仅在5月27日这天，约有80,000支枪被盗。在这3天中，有100,000多支枪被抢和10,000,000多发子弹被抢走，用林彪的话说，这使武汉成为从军械库抢枪的状元。许多组织现在是枪多于人。

5月28日，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通过湖北省革委会向两派转发如下电报：

“中央要求他们立即停止抢枪，坚决制止这个违反中央命令的犯法行为。并请他们准备派代表来京商谈。”

和往常一样，两派都声称“衷心拥护”中央的指示。当晚，“工总”及所有其他大组织都下达紧急指示“禁止”其成员抢枪，但人人都知道，这只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暗地里没有人这封电报当回事。

第二天，为了表明自己“衷心拥护中央指示”，许多组织舞锣打鼓以证明他们正在归还武器。但他们归还的只是一些破步枪，只占他们前段时期所抢武器的一小部分。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因为，用“工总”的一个头目的话来说，他们必须“做最坏的准备”。

对许多造反派而言，步枪、手枪和手榴弹首先是有趣的玩具。打枪似乎比打扑克和下棋更有趣。即使那些不准备积极进行真正武斗的人也喜欢玩枪，打枪一时成了一

种时尚。在5月底和6月初，该市白天黑夜都枪声不断。更糟糕的是，有些人觉得对天射击还不过瘾，于是就相互比试枪法取乐。电线杆和电缆常常成为射击目标。结果，不到几天就发生了60余起击断电缆的事件，其中包括军用电缆和连接汉口和武昌的电缆。那些枪法不好的人就向停在地上的飞机等大目标射击。仅在6月3日这一天，有5架飞机被打坏。虽然没有把人当作射击目标，但到6月中旬，有57个人被流弹打死，327个人被打伤。

武器也成了商品，因为武汉的许多组织武器过剩，而北京、广州和河南等地却缺乏武器，于是武器交易就出现了。许多人带着猪肉、肥皂、香烟、火柴或现金从邻省来到武汉，并带着步枪、手枪、手榴弹离开。交换双方对这种交易一定很满意，因为他们只是花了点时间抢劫国家仓库和军火库。

然而，武器主要被用来进行战斗和吓唬人。造反派拥有现代武器增加了武斗的可能性。5月30日，为了支持“二司”在武汉测绘学院的下属组织，“江城前哨”的人包围了该校，并炮轰“新”派盘踞的大楼。战斗中约有30人被打死打伤。6月5日，40卡车“工总”和“二司”的人强占了“新”派的据点第一冶金工业公司，但付出了一人死亡的代价。3天后，“新”派的另一个据点被“九·一三兵团”的敢死队所占领。这3个目标都位于青山区。人们有理由推测，“钢”派有一个逐区铲除对手的庞大计划，至少“新”派是这样想的。它谴责“钢”派已制订了一个与“新”派“决战”并“在6月份取得最后胜利（控制全省和全市）”的计划。“钢”派反过来指责“新”派正大张旗鼓地倡导“走四川道路”，并在为此作准备。两派的指责似乎是有根据的，因为双方都没有否认对方对自己的指责。而且，双方都把毛的一句名言作为自己的口号：“丢掉幻想，准备战斗。”由于武汉的空气越来越紧张，居民们终日胆颤心惊。为避免被流弹所伤，人们轻易不出家门。许多人离开武汉，去外地的亲戚家避难。即使那些驻扎在各自组织所在堡垒的造反派打手们也感到害怕，因为他们担心，一旦他们预料中的全面战争爆发，他们的供应就会断绝。所以，他们到处抢劫仓库，以获得尽可能多的粮食、猪肉、蔬菜、煤球及其他生活必需品，而且，有些人甚至从银行抢劫现金。形势比一年前造反派与“百万雄师”斗争时更为混乱。

当武汉形势一步步地恶化时，武汉军区的最高领导曾思玉和刘丰（同时还担任湖北省革委会主任和第一副主任）正在北京。他们不在武汉，这是湖北省革委会的其他领导不敢对造反派的暴行采取严厉措施的原因之一。6月15日，曾和刘在受到林彪、周恩来及其他中央领导的接见后终于回到武汉，肯定是已得到中央的强有力支持。他们回来后迅速采取严厉措施恢复秩序，6月中下旬，他们召集对立两派的头头们开了一系列会。会上，这些派别斗士们因本组织的暴行而受到批评。他们被警告说，要交出他们拥有的所有武器，解散他们建立的冲锋队，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解散他们的组织。

最初，造反派头头们并未认真对待这些批评和警告。除了会上假惺惺地作了一下自我批评外，他们并不打算退缩。在6月下旬，天天都有武装游行。这些活动表面上是要纪念一年前反派对“百万雄师”的反抗，然而，实际上是在向各组织的对手显示自己的力量。每天仍是枪声不断。偶然在城市的某个地方响起密集的枪声，表明对立派别间又在进行一场血战。虽然大多数组织的枪和手榴弹都过剩，但他们仍认为还需要更有威力的武器进行进攻和防御。在许多工厂和学校，造反派开始发展“新”型武器，如坦克、化学武器、炸药包、杀伤炸弹和反坦克地雷。对立派间的关系紧张到了极点。

非激进化

面对日益失去控制的国内混乱，中央被迫停止反右倾运动，并设法恢复公共秩序。7月3日，它发表了一个严厉的通知，要求停止广西的暴力冲突，但7月17日在北京地质学院举行的一个秘密会议上，20个激进组织的代表仍然决定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联络网，以相互支持对各自省份的对立派别的斗争。如果不使这个计划胎死腹中，桀骜不驯的造反派会认为中央领导人软弱可欺。这种危险的形势迫使毛不得不为维护“法律和秩序”并亲自加以干预。7月27日，在他的要求下，全国第一个工宣队被派驻清华大学，目的在于平息学生暴乱。而且，在第二天的短短几个小时里，毛召见了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蒯大富、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他对这些“年轻斗士”态度严厉，并强硬地警告他们，如果他们坚持搞武斗，他们就会被部队包围和歼灭。这是“文革”期间毛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亲自找红卫兵谈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革”的发动者向运动动力的杰出代表们所转达的信息是一个最后通牒。

7月3日通知是“文革”的转折点，此后，被称为“革命大民主”的火焰逐渐熄灭了。中央的新方向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因为他们不再需要暴力。然而，更热情的反应还是来自各省的军事权威，他们长期以来对造反派无法无天的行为非常痛恨，却又不得不对那些滋事者努力装出同情，或者至少不敌视的样子，现在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管束造反派。

武汉军事当局对7月3日通知的最初反应是：广泛地宣传这个指示，同时警告说，任何违反中央新的大方向的行为都决无好下场。7月7日，湖北省革委会发布紧急指示，它的措词比中央指示更为严厉。中央的通知仅仅敦促群众组织交还抢夺的武器，而该省的命令则授权地方军队用武力收缴造反派的武器，并声称对藏匿武器的人严惩不贷。随着时间的推移，军队领导对造反派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在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于7月13日举行的联席会议上，曾思玉点名批评了湖北省革委会中代表造

反派的3位副主任，即朱洪霞、杨道远和张立国。以前从不敢当众批评这些人。7月18日，毛指示要进一步宣传7月3日通知。因此，中央决定发动一场群众运动，以使中央的新方向家喻户晓。这个指示进一步促使各省军事当局镇压造反派。7月22日夜，武汉的部队搜查了全市118个旅馆和招所，目的在于赶走外省来的武器贩子。结果，有2,700人被赶走，270人被逮捕，其中包括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派来私运武器回京的特使。两天后，当中央发布7月24日通知时，武汉召开了另一个群众大会，再次逼迫造反派交出他们所掌握的有武器。

尽管对新的政策不满，但造反派无法进行抗拒。他们唯一可做的就是私下诅咒中央颁发的两个通知是“毒草”，或是偷偷摸摸地撕毁载有两个通知的标语。

在1968年余下的几个月里，他们的日子越来越难熬。8月，《人民日报》社论强烈抨击所谓的“多中心论”。从来没有人散播过这个理论。实际上，每个造反组织（或派别）都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正统的代表。但争相声称自己是新的权力机构的核心就是无政府主义状态。“多中心论”一词实际上就是“派性”的另一种说法，只是因为毛在几个月前指示要“对派性作阶级分析”，为了避免自相矛盾，才发明了这个新词来重新批判派性，与中央在四个月所放弃的任务基本相同。

为了清除派性的影响，湖北省革委会（尤其是军事当局）召集全省（尤其是武汉）的各大群众组织的主要头头参加8月中旬举办的大型“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会上，傲慢的造反领袖再次受批判。与此同时，一个反对“多中心论”的运动高潮正在形成。在此前后，武汉军区的主要军事领导人再次被召到北京。毛泽东接见了他们，林彪听取了他们关于武汉形势的报告，而且，他们还得到了有关最近行动方针的指示。

军区领导从北京回来后，军事当局提出了三项任务。第一，向学校派工宣队。派工宣队最初只是权宜之计，目的在于平息北京（尤其是清华大学）的桀骜不驯的学生造反派之间的暴力冲突。但在8月中旬，毛得出结论，如果要使院校不再成为动乱的持续性根源，就应使工宣队制度化。

8月25日，中央向各省发出通知，要求向全国各地的学校，尤其是大学派工宣队。为了给这个决定制造理论根据，同一天还播发了姚文元所写的题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毛的“年轻斗士”现在成了需要接受“再教育”的“臭知识分子”。两天后，第一个工宣队被派往武汉钢铁学院。这里和清华大学一样，两派学生瓜分了校园，在各自的领地内修了许多堡垒，而且经常进行武斗。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所有学校实质上都被工宣队控制。工宣队在学校第一个任务是解除各派的武装，并解散其组织。尽管他们负隅顽抗，但他们一旦被割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孤立的造反派就容易制服了。

其次，群众组织逐渐被解散。9月6日，在武汉各级革委会正、副主任出席的会议上，曾思玉宣读了湖北省革委会通过的关于“解散所有群众组织”的决定。这个文

件宣告所有群众组织为非法组织，并声称“阳奉阴违”是不允许的。迫于压力，“工总”召开群众大会宣布解散。三天后，“工造”关闭，最后，“九·一三兵团”于9月20日停止活动，其他小组织也纷纷宣告解散。随着群众组织的解散，它们的出版物也被封，高音喇叭被拆除。在存在两年之后，一切都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第三，开始捅“马蜂窝”。8月25日，《红旗》刊登了一篇题为《马蜂窝就是要捅》的文章。所谓“马蜂窝”是指那些长期存在严重派性的单位。为了克服那些单位的派性，文章认为必须采取一些强有力的措施。然而，在武汉，这个口号被添加了新的内容。许多造反派分子被指责为“马蜂”，并在特定的“学习班”上受批斗。例如，“工总”第二号人物并担任湖北省革委会常委的胡厚民受到了批判，他的罪名是指使“工总”势力抢劫武器，尤其是围攻中原机械厂。他被说成是“阴谋家”和“野心家”。在公开批判胡之后，许多单位的造反派头头被打成“胡厚民式的人物”，而且日子很不好过，有些人甚至被关押。例如，“工造”的第二号人物彭祖龙虽然在名义上是湖北省革委会的成员，但却被武汉警备区关押了七个月。

派驻“工宣队”、解散造反组织以及“捅马蜂窝”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打掉了造反派的威风。但对造反派的镇压并未停止，而且在1968年最后两个月更加变本加厉。

到中共于10月中旬举行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十二中全会时，“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已在武汉全面铺开。为了推动运动的发展，成立了军宣队，并被派往各单位。军宣队所到之处，大权均由他们掌握，而把革委会撇在一边。从理论上讲，运动的目的是要揪出和批判各单位的“坏”分子，不管他们在前一阶段的“文化革命”中是站在保守派一边，还是站在造反派一边。然而，在实际上，这种运动的受害者是造反派，因为许多造反派分子家庭出身不好，而且个人历史上有污点。而且，军宣队依靠历史清白的人履行清除“坏”分子的任务是完全符合逻辑的，这意味着在牺牲造反派的前提下，前保守派分子的社会地位突然提高。

然而，大多数前保守派分子起初都非常谨慎。他们在前两年不止一次地看到，造反派势力暂时削弱之后，可能很快又会东山再起，所以，在有更多的证据表明造反派必垮无疑之前，他们不会冒险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虽然他们与造反派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们起初还不敢暴露自己对老对手的仇恨。而且，造反派常常或明或暗地威胁前保守派分子不要找不自在。

为了推动运动的发展，军宣队想方设法解除前保守派分子的顾虑。其中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毫不留情地打击最顽固的造反派分子，以此来警告其他造反派，鼓励前保守派分子。在10月和11月份，《长江日报》几乎每天都发表报道说，现已查明，某些单位的造反组织一直由“暗藏的阶级敌人”把持。许多单位被说成是“坏人掌权，好人遭殃”的地方。由于军宣队的不懈努力，前保守派分子逐渐消除了怕造反派卷土重来的顾虑。于是，他们积极帮助军宣队搞运动。当然，他们的头一个目标就是对“七

“二〇事件”后迫害他们的造反派头目和造反派分子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如果从造反派分子本人或家人的档案中找到了对他们不利的材料，他们就会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在许多情形下，调查并无必要。保守群众通常对本单位造反派的履历了如指掌。那些履历不清白的人几乎无一例外被指责利用“文革”提供的机会对“革命干部和群众”进行阶级报复。甚至那些出身好的造反派可能也被打成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障碍”和“绊脚石”，因为他们试图采取不协助军宣队揭露迫害者的“罪行”的办法来保护他们有问题的战友。随着运动的发展，前保守派分子又开始得意洋洋。运动似乎证实，正如他们从“文革”初期以来就确信的那样，在造反派队伍中确实存在大量的“牛鬼蛇神”。所以，他们得出结论：“永远不能让造反派掌权”。

到1969年年初，武汉造反派已丧失了对于从基层革委会到省级革委会的控制权，假如他们曾经控制过的话。首先，许多造反派被当作坏分子开除了他们在革委会中的职务。然后，以“巩固或改组”革委会的名义对许多单位的革委会进行了大换血。而且，有些单位的革委会本身也受到怀疑，并被所谓的“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或“斗、批、改领导小组”或“革命领导小组”所替代。不管形式如何变化，但结果是相同的：通过用前保守派分子替代造反派分子以及用未曾支持过造反派的干部替代支持过造反派的干部的办法，对权力机构进行了改组。

11月份，湖北省革委会召开了所谓“县以上革委会党员代表大会”。约有4,000人参加了会议，会期为21天。会上，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任爱生和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杨春亭因“无原则地”支持造反派而第一次受到批判，而且被扣上了“黑手”和“老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下级革委会中曾支过造反派的干部也遭到围攻。在这次会议之后，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中的造反派代表即使还没有被撤职的话，顶多也只是起一个给“三结合”装门面的作用。

造反派经过多年血战而艰难夺取的政治权力到1968年底大部分丧失，虽然有些造反派名义上仍是各级革委会的委员和名存实亡的“工代会”、“红代会”代表。

除掉学生造反派是一件更容易的事。在党的十二中全会上，提出让所有大学生毕业，并长期关闭科研院所。11月15日，中央发布两个通知，提出了大中专毕业生工作分配的指导方针。根据这两个文件，所有学生都应在1968年底以前离校并到工作单位报到。稍后，又发表了毛的另一个“最新指示”。指示号召初、高中学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虽然毛说要“说服”学生的家长把子女送到农村去，但学生及其家长别无选择。在武汉，除1969届初中生外，所有学生都被告知，他们能去的唯一地方就是湖北省农村。一个月内，第一批中学生告别武汉，到该年年底，武汉大中学校的校园几乎空无一人。

知道关心政治的高年级学生现在被打发走了，这样，令人头痛的麻烦事和无法无天的造反学生也就随之而去。

在经过两年半的“文化革命”之后，当 1969 年开始时，一切似乎又都恢复了原状。如果回顾一下两年半来发生的一切，人们会对“文革”是否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产生怀疑。如果“文革”的目的是要搞臭和打倒毛在党内的主要对手，那这个目的可以说已达到了。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的刘少奇被开除了党籍。如果只是要除掉刘及其同伴，毛没必要发动这样一场震惊世界的动乱。如果运动的主要目的是改造中国人的思想，那么，“文革”显然是失败的。因为自 1949 年解放以来，中国人民还从未这样不加掩饰地采取合法和非法手段追求狭隘的私利，如果革命意味着在社会和政治结构特点上的根本变革，“文革”似乎也远远没有达到其目的。革委会与以前的权力机构真正有区别吗？如果没有的话，怎样才能使它发生变化？这是一些人提出来并试图回答的问题，他们是身体力行“新思潮”的人。

第 17 章 新思潮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而造反派也并非自动起来造反的。虽然他们长期以来可能一直对以自己的顶头上司为代表的行政机构不满，但很少有人认真思考过目前的社会政治制度有什么缺陷，更不用说如何改造它了。因此，当「文化大革命」给他们提供造反机会时，他们狂热地利用这个机会迫害那些他们认为曾经虐待过自己的人。毛的名言「不破不立」成了他们的座右铭。但当毛号召他们在旧体制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权力机构时，他们却难以担当此任。他们很少关心新的权力机构的特点，也从未考虑过如何在与人民群众的正式关系上使自己与旧当权派区别开来。他们感兴趣的只是权力本身。尽最大可能掌握更多的权力成了每个组织的主要目标。1967 年和 1968 年的事态主要集中在哪派应在革委会中获得多少权力问题上，这表明，作为未来权力机构的形式，革委会本身是得到对立各派认可的。

然而，有些人却认为「文革」的预定目标不是改组官僚政治，而是要创造新社会。对他们来说，「革委会」的建立顶多只是一种「表面改革」。真正重要的是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没有压迫和剥削，没有官僚政治和经济上及其他方面的不平等的生活。

这种「新思潮」在「文革」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已出现。在 1966 年 11 月 15 日发表的致林彪的公开信中，一位北京中学生批评林误解了毛关于「炮轰司令部」的思想，这位年青人强调，「炮轰司令部」的意义并不在于揭发某个官僚的罪行，他指出：

文化大革命展开[以]来突出来的问题，即改善无产阶级专权，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党和政府组织形式需极大的改变，十七年前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需制造出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

毛在 1967 年 2 月对「彻底改造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的批评并未铲除「新思潮」。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思潮」成了一种普遍现象，虽然它从未成为造反势力的主要倾向。1967 年下半年，在许多地方陆续出现了一些信奉「新思潮」的团体，如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山东的「十月革命小组」，上海的「东方学会」，广州的「八·五公社」，以及引人注目的湖南的「省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委员会」（简称「省无联」）。

在武汉，一个自称为「北斗星学会」的组织于 1967 年 11 月 7 日宣布成立。华中工学院的鲁礼安和冯天文成了该组织的精神领袖。1967 年 4 月，他们宣布从控制华中工学院的「新华工」中独立出来，成立「敢死队」。虽然该组织只有 8 位成员，但它从 4 月到 9 月间发布了一系列在武汉市具有广泛影响的文章。结果，这个小组组织成

了在该市政治生活中有影响的著名组织。然而，它与两大派之间的关系使它处于困难地位。它认为武汉的大联合应以「工总」作为领导核心，但它同时又指出，「工总」的领导小组必须扩大，要包括其它组织的头头。各派都对这个建议不满。当中央在10月份敦促学生复课时，「敢死队」自动解散了。但这两个人仍然关注着运动的发展。由于对造反派头头们贪婪地抢夺即将成立的革委会中的职位感到失望，他们开始反躬自问：运动的根源是什么？革命的预定目标：是什么？实现这些目标的最好方式是什么？他们一定很失望地发现，在经过一年多的运动后，他们还不能轻而易举地回答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正是为了探索「文化大革命」的内涵，他们决定建立「北斗星学会」。

该学会的纲领宣布：

那些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而又专好以势压人，进入官场的人，管他司令也好，佛爷也好，在历史的长河中，终于混不了多久。大浪淘沙，决少不了他一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那些善于思考问题的人。只有那些永远善于思考，善于学习，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方是将来历史舞台上的主将。

显然，他们把自己划归到后者的范畴。问题在于，该小组当时只有8名成员，其中7名大学生，1名中学生。两大派别完全着迷于未来的权力机构，而对这个小团体漠不关心，它们认为该团体的纲领是书生气的、天真的、「脱离阶级斗争实际的」。

11月20日，冯天艾离开武汉，前往上海考察。冯走后，「北斗星学会」处于停顿状态。在12月4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曾思玉和刘丰称该团体是一个「奇怪组织」，并指出，在出席该团体开幕式的人中有1957年被定为右派的老右派分子白桦，他们的讲话导致该团体垮台。

但鲁并未屈服，在武汉军区领导谴责「北斗星学会」的同一天，中央发布了一个《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该文件的基本目的是要在恢复城市秩序的同时维持农村的秩序。但有谣言说，毛已指示要在冬闲时掀起「一个农民运动新高潮」。鲁似乎觉得传闻比官方文件更讲得通。他认为，如果中国近代史揭示了什么的话，那就是没有农民的支持，任何革命都不可能以胜利而告终。所以，他决定投身于农民运动。12月10日，他建立「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它通常被简称为「决派」。碰巧，一个农民组织「浠水县巴河区第一司令部」于12月中旬开进武汉，并强行封闭了《湖北日报》，因为该报发表的一个社论被该团体的对立派别当成镇压它的借口，而且其成员中有6人在武斗中丧生。

鲁在与「巴河一司」的头头王仁舟交谈后发现两人的观点竟不谋而合，王的理论是，农民是当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根据受压迫和剥削的团体最可能成为最革命团体

的逻辑，他认为由于农民的政治经济地位在中国社会中一直是最低的，所以他们具有最强烈的革命精神。

应王的邀请，鲁前往巴河考察「巴河一司」正努力建设的「新农村」。这是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试验，生产队被取消，生产手段掌握在大队手中，耕牛被集中管理；以前归各家所有的家畜现在都上交给大队；以前一直分散经营的手艺人现在也被赶到一起做活。在 1958 年狂热的「公社化」运动后已被解散的食堂又被重新恢复了。农民一日三餐都被迫在一起吃。而且，所有的私房都被扒倒了，农民被迫搬进简陋的集体房屋。当然，这些措施遭到了大多数当地居民的反对。为了强制实行「新生活」，「巴河一司」在王仁舟的领导下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它被授权「严惩胆敢破坏新农村的人」。

王的「新农村」不仅遭到内部反对，而且还被敌对的近邻所包围。然而，在鲁看来，这个未能推广的试验预示着全省和全国农民的日常生活未来。他仿效毛泽东的作法，于 1967 年最后一天发表了《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预言，一场迅猛的农民运动高潮正在形成，而且他断言，是否支持农民运动是区别「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标准。

但是，与他所预期的相反，《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发表的 1968 年《元旦社论》只字未提农民运动，这表明中央不打算进行农村革命。更糟糕的是，武汉的大造反组织都对巴河区社会改革经验不感兴趣，而且对「巴河一司」在与对立派武斗中的失败也不表任何同情。相反，它们发表声明谴责农民组织，并最终把他们赶出了武汉市。至于「决派」自己，虽然有几千名信徒登记，但它从未形成一个明确的组织。然而，「决派」的建立的确产生了至少一个积极后果：它吸引了一批优秀的年轻知识分子聚集在鲁的周围。当冯于 1968 年 1 月从上海回到武汉时，他被介绍给了这些新朋友。此后，他们经常在一起侃大山，其中最令人激动的话题之一就是湖南的「省无联」。

「省无联」是如何在「文革」中崛起的，这是一个无须在此赘述的令人心驰神往的故事。它于 1967 年 10 月 11 日成立于湖南省会长沙。在 1967 年 10 月至 1968 年 1 月的 3 个月里，它发表了一系列阐述其政治纲领的文章，其中最著名的是 1968 年 1 月 12 日发表在「省无联」机关报《湘江评论》上的《中国向何处去？》。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名叫杨曦光的中学生，该文试图阐述 4 个主题：作者所希望看到的中国未来；对「文革」前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对中国在 1967 年冬天的形势的估计；将要采取的行动步骤。

「省无联」的政治纲领是与中央关于恢复公众权威的政策大相径庭的。在《中国向何处去？》一文发表一个星期后，中央就对该团体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它被谴责为「反革命大杂烩」，而它的理论被打成「极端反动的思潮」。由于中央的批判，使「省

无联」这个默默无闻的地区性组织一下子闻名全国，它的理论被当成「反面典型」而传遍全国。

鲁礼安、冯天艾及其「决派」同志们被「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人民公社」等思想所吸引。他们认为，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的确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相互妥协的结果。他们相信，那些委员会作为一个新的权力组织是不稳定的，所以也不能有真正的权威。由于毛曾称三结合式的革委会是一个「临时权力组织」，所以，他们认为，革委会只是过渡性的，而并非「文革」之后的新权力机构的最终形式。正如「省无联」所宣称的，最终形式是公社。2月份，鲁起草了「决派」章程，它在语言及内容的诸多方面都与「省无联」的纲领相似，它声称：

决派当前的奋斗目标就是为了巩固在摧毁旧省市委斗争中诞生的、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夺权斗争中诞生的、在革命群众运动中诞生的年轻的红色政权、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而斗争，并使之过渡到巴黎公社式的崭新的国家机器——真正地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正式权力机构——武汉人民公社而奋斗！

为了实现最终目的，鲁坚持认为，「决派」必须像中国共产党 1927 年在城市失败后所作的那样，要投身于农民运动，并领导这个运动。他断言，只有当农民行动起来，而且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相结合的时候，「决派」才能实现自己的建立公社的历史使命。

然而，在 1968 年 2 月和 3 月初的政治氛围中，「决派」发现自己很难在批极左的形势下继续存在下去。迫于形势的压力，它最终停止了活动。鲁礼安和冯天艾被迫返回已经复课的校园，但他们未在失败面前屈服。过去，他们因太忙而很少读《人民日报》、《红旗》、《文汇报》、《解放军报》社论等以外的出版物。现在他们有充足的时间来自学，他们第一次阅读了《法兰西内战》、《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及《国家与革命》。这些书深深地吸引了他们，他们读得越多，就越确信中国应建立一个「中华人民公社」的新社会。而且，他们读得越多，就越强烈地感到，历史已赋予「决派」领导猛烈地推翻「革命委员会的资产阶级专政和修正主义体制」的使命。鲁确信军队是实现这个使命的关键。谁控制了军队，谁就可以掌握政权。为了清除现存的武装力量，鲁认为解放军应被彻底消灭，并代之以人民武装，他似乎觉得这是完全正义的，因为马克思曾称赞巴黎公社「打碎常规军」的措施。

而且，鲁设想，如果党的「九大」不能按毛预计的在 1968 年召开的话，全国造反派中的先进分子就会像毛泽东、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在 1921 年所作的那样，聚集在一起探讨全国政治中的重要问题。换句话说，他预计将建立新的政党取代已经

腐化的中国共产党。在他看来，武汉的「决派」就是这样一新政党的适当的领导者。

中央在3月底发出的反「右倾潮流」的号召证实了鲁和冯预言，即「文革」必定会向纵深发展，而不会以批极左而告终。而且，他们认为，「决派」在「文革」的新阶段中应该发挥指导运动的领导作用。为了动员人民群众并扩大「决派」的政治影响。他们决定恢复曾在1967年断断续续刊出过的《扬子江评论》。聚集在《扬子江评论》新旗帜下的「决派」老朋友们，在4月份经常在一起分析武汉和全国的形势以及相应的对策。他们都赞成用公社取代革委会这个目标，但在应采取何种策略的问题上却存在分歧。有些人认为，现在已到了打倒周恩来、张春桥等在中央的调和派的时候了，这些人用发动批极左思想运动来压制造反派革命精神；另一些人则坚持，重要的不是进攻中央的某个领导而是清除调和政治路线，但前者占了上风。

在此前后，他们听说企图「炮轰」张春桥的上海「红革会」已在4月初遭到镇压。因此，张春桥就成了他们的头号目标。5月16日，复刊后的《扬子江评论》第一期刊载了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其叛徒考茨基》和冯的《论派别与派性》。他们指责张春桥在1967年6月曾设法阻拦武汉造反派攻击陈再道，他们还谴责张春桥控制的《文汇报》自1967年8月下旬以来就成了「调和政治路线」的喉舌。对「调和路线」及其主要代表的批判的目的在于为更激进的路线制造合法依据，在他的文章中，鲁再次阐述了他的理论，即为了实现「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目的，一场内战是无法避免的，也是必须的。在鲁的文章发表十天后，武汉再次发生了大规模的抢枪事件，这可能不是偶然的。

5月18日，鲁被「新」派的一个组织绑架，冯自告奋勇担任了《扬子江评论》的主编。从那以后一直到7月中旬，《扬子江评论》又出版了四期，在这几期发表的文章中，有两篇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篇是冯所写的《怎样理解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一文。这篇文章依据「省无联」的关于一个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已在中国形成的论断，第一次指出，「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文化革命，而且也是一场政治革命，在此过程中，工人阶级将推翻新的剥削阶级。接着，它指出，任何政治革命都包含三个特点：首先，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政党。它认为，现存的中国共产共产党必须进行一场革命性的变革，而「决派」将成为改组后的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其次，政治革命必然、而且不可避免地会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它指责期望无产阶级革命派不经过战火的洗礼就能在「文化大革命」中取胜是一种幻想。第三，社会革命必定与政治革命相伴而产生。它断言，社会革命将导致「人民公社」这种社会政治关系的新形式的出现。显然，所谓政治革命的「三个特点」就是「决派」长期以来所鼓吹的货色。

另一篇题为《对「文化大革命」中各政治团体的分析》的文章，是由武汉大学历史系学生杨宪林撰写的。这篇文章认为，现有团体基本上可划分为六种：极右势力、

保守派、造反派、中间派、形左实右派、「决派」。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一般造反派「决派」的区别。作者认为，前者对运动的目标的理解非常肤浅，而后者则有极深刻的理解。更确切地说，一般造反派不仅普遍漠视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彻底改造现存社会制度的必要性，而且也很少认识到他们的敌人已形成阶级这个简单的事实。他们认为「文革」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清除某个走资派，所以不去反对革委会。相反，他们在革委会相互争权夺利。「决派」却不一样，他们完全理解，引起「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就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紧张化决定了进行彻底社会变革的必要。这就要求推翻新的资产阶级的统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重新分配财产和权力，建立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这种区别的言外之意是很清楚的，也就是说，「决派」作为造反派中的先进分子应当在未来的斗争中发挥先锋作用，虽然它作为一个正在形成的政治势力在目前还很弱小和不大成熟。

正如前一章所指出的，以发布 7 月 3 日和 7 月 24 日通知为起点，中央突然对造反派采取了强硬政策。在巨大的压力下，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造反派觉得最好还是躲过中央的严厉打击再说。但冯和他聚集在《扬子江评论》周围的朋友们却不愿屈服。在 7 月 29 日开会讨论如何应付新形势后，他们于 8 月 4 日在武汉最繁华地段贴出了一张大幅标语，其内容只有三个口号：

革命人民渴望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无产阶级大民主精神万岁！咆哮的扬子江，呼唤湘江、松花江、珠江、乌江、黄浦江挽捆自手来，汇成天安门前的一条护城河。

这显然是在向中央和地方当局最近采取的镇压政策宣战，尤其是第三个口号表明，这些年轻人决心联合各省的「极左派」向目前的「逆流」发动一场全国性的反击。他们相信，就像两年前的 1967 年春、秋的「逆流」一样，目前的这股「逆流」也是由中央的调和派，或者更具体地说是由周恩来、康生和张春桥掀起的，因为他们对搞垮湖南的「省无联」和上海的「红革会」，以及发动广泛的批极左运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8 月 5 日，《人民日报》开始批判「多中心论」，这是新瓶装旧酒，就是说用另外的名义批判派性。然而，冯和他的朋友们却要使批「多中心论」变得对他们有利。在 8 月 8 日至 13 日这 6 天里，他们共发表了 4 篇长文章，但用的是同一个副标题：《评多中心论的反动理论》。他们认为，没有任何群众组织、省市革委会处于宣称自己是中国政治「第二中心」的地位。只有那些在中央占据领导地位的人才会形成这样的中心。那些文章认为，由于刘少奇和邓小平已被打倒，「第二中心」就是指党中央内部的「调和势力」。这样，批多中心论运动被解释成不是反对造反派的派性，而是反对周恩来、康生、张春桥等人的运动。他们指责《文汇报》是第二中心的喉舌。由这些

论断而得出的结论是，造反派应该起来反击目前的镇压逆流，而不是忍气吞声地屈服于压力。

然而，诡辩终究不能改变铁的事实。8月22日，曾思玉在湖北省革委会召集的一次会议上宣布，《扬子江评论》「是一本极为反动的刊物」，鲁礼安和冯天艾「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三天后，冯被捕。结果，鲁和冯的追随者很快树倒猢猻散，《扬子江评论》也停刊了。

「新思潮」的存在引起了造反派的严重关注，却没有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不论是「北斗星学会」，还是「决派联络站」，还是《扬子江评论》，其铁杆成员都未超出二十多人。其他省代表这「潮流」的团体可能也是非常小的组织，正如「新思潮」追随者所批评的，大多数造反派只是把「文革」当成发个人私愤的好机会。他们可能（而且确实）破坏了旧权力机构，但他们却没有考虑过新的权力机构应当是什么形式。他们相互争权夺利，然而他们真正关心的不是权力的品质，而是其「数量」。

另一方面，「新思潮」的拥护者试图根本改变现存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并非偶然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具有如下三个特点：出身不好、年轻、不掌权。他们造反的原因是对「文革」前的社会秩序不满。他们生活阅历很浅，所以能够接受标榜平等的乌托邦理论。而且，他们不参与造反派之间的权力斗争，所以他们能够思考用更深刻的方式进行社会变革的问题。

毫无疑问，所谓「新思潮」是很不成熟的，其追随者几乎只读过官方报纸的社论及一些马、恩和毛泽东的著作。他们所受的训练就是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说话，而且有时候觉得对此还不是很得心应手。而且，由于他们缺乏历史、哲学、经济的基础知识，所以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也就很肤浅。他们不是有什么说什么，而多半是从「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的话语中摘取片言只语来支撑自己的政治纲领。巴黎公社之所以成为他们所遵循的模式，是因为这是他们所知道的接近其理想的唯一模式。

此外，他们所采取的方式与他们的目标也不一致。他们过分注重破坏现存官僚体制的方式，却几乎没有谈到过如何建立一个能够从体制上根除官僚主义和不平等的新型政府机器。他们从未问过自己，巴黎公社实际上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而这种社会形式是否能在当代中国发挥作用以及能否带来完全的民主，他们也未考虑过。总而言之，他们所说的「进行一场根本的机构变革」就是要利用那些可能会在反体制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干部」全面取代现有的官僚。他们警告造反派，仅仅清除少数新官僚将不会解决任何问题。他们应当反躬自问，如果清除了所有官僚，中国是否会更民主更平等？

与「省无联」和「北、决、扬」（北斗星学会、决派、《扬子江评论》的简称）所代表的激进新思潮相对照的是，1968年出现了一股自由主义的新思潮。浙江省的一

群人声称「区分造反派、保守派和走资派没有任何意义。人人都是公民。而作为公民，任何人都有选举和被选举的平等权力。」这种观点在杭州市几个大厂的工人中有市场。他们坚持认为「没有普遍选举也就没有民主。只有那些领导成员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公众权威才会得到人民的信任」。而且，选举还被当成解决派性的一种办法。这种思潮还认为，如果革委会这个新的权力机构能通过选举建立，那么对立派别就不再会被迫相互捣鬼或诉诸暴力。据报道说，该省的一些小城市响应这个广为传播的思想，进行了选举。

自由主义新思潮也和它的激进的伙伴一样，在 1968 年下半年遭到镇压。它被指责为「迷信选举」、「形式主义」，甚至是「反动思潮」。

激进的和自由主义的新思潮的出现表明，中国社会中有一批人不甘心充当「中央的驯服工具」，而是要想方设法独立地探索「文化大革命」的内涵。虽然他们的理论仍然非常幼稚，也没有得到公众的普遍支持，但它们的存在就是对中央权威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拥护新思潮的团体迅速遭到镇压的原因。而且，由于他们人数很少，中央可以果断地镇压他们。

第 18 章 1969 年的派性回潮

到 1969 年初，作为一场动乱、革命和暴力大动荡的「文化大革命」似乎走到了尽头。令人头痛的不服管束的大、中学生被赶到乡下去了，自发的群众组织被解散了。革委会在 29 个省、市、自治区，而且实际上在各单位都建立了起来。中国的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已被开除出党。根据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的说法，「文化大革命」正在开始一个「斗、批、改」的阶段。然而在风平浪静的背后，另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暗潮涌动

在 1968 年末和 1969 年初，中央所说的「斗、批、改」具体是指毛的一个「最新指示」中的内容，这就是根据「三结合」的原则建立革委会、群众批判刘少奇、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机关干部下放搞体力劳动。在这些任务中，清理阶级队伍被当成是最重要和最紧迫的任务。

在工宣队或（和）军宣队（通常称为军代表）的监督下，清理阶级队伍这动的进行有利于前保守派。官方确定的这动对象是：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然而，这动对象实际上要广泛得多，其中包括资本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些在国民党政府中做过事的人、那些参加过「反动秘密会社」的人、那些在「文革」前被判过刑的人、那些在「社教」运动中被开除的人、那些在「文革」期间犯过杀人、抢劫、强奸罪的人。而且，这些运动对象的后代往往也因其出身不好也成了运动的对象。除了走资派及其子女外，运动对象实际上就是一类人，即在「文革」前被镇压的人。对走资派及其子女的处理往往极为谨慎，与处理其他运动对象大为不同。结果，实际上，大部分当权派并没被正式戴帽子，除非他被查出，或被怀疑是叛徒、特务以及有其他历史问题的人。事实上，正是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期间，当其他「敌人」被揭露和清查出来的时候，在前两年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扣上「走资派」的干部一批又一批被「解放」了。

由于阶级成分现在被官方认定为选择清洗对象的主要标准，造反派必定是在劫难逃，因为他们中有许多人的家庭出身不好。

而且，工宣队成员和军代表是根据中央确定的标准认真选拔出来的。他们往往出身好，而且很可能是保守派或同情保守派的。他们自然而然就和当地的干部和保守分子一样认为，有些阶级敌人已暴露出他们对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仇恨。因此，毫不奇

怪的是，许多单位的前保守派分子被当成重新进攻「牛鬼蛇神」的运动骨干而成为依靠对象。

出身好的造反派被要求从他们的队伍中揭露「阶级异己分子」。虽然他们不愿伤害同一派别的战友，但有些人也的确揭露过以前属于对立组织的人。然而，造反派不久就开始认识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危及到所有造反派（不论其出身好坏）的政治生命。虽然到那时为止只有出身不好的造反派受到迫害，但随着运动的加剧和越来越多的造反派被揭发出来是「公开的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保守派分子又开始重弹他们从「文革」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弹着的老调：所有造反组织都是「坏人的庇护所」和「罪恶的渊薮」。

一种新的政治论调正在形成，即不仅坏人可能是造反组织的成员，而且参加过造反组织的人可能就是坏人。因此，那些还未被运动所触及的造反派分子也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完全有理由担心，由于自己曾参加过造反组织，很可能会成为运动的下一个目标。仍在各级革委会中担任职务的造反派头头尤其害怕。他们的权力因工宣队或（和）军代表的到来而被大大削弱，并随着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发展而被进一步削弱。现在，甚至他们的基本上已名存实亡的职位似乎很快也会被撤掉。他们可以想象得到，如果「旧政权」复辟将会产生什么后果。他们的确从目前进行的运动中看到了走向复辟的危险倾向。

面对日益加剧的压力，造反派作了微弱的抵抗。从武汉在 1968 年 10 月初进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第一天起就广泛流传着抱怨运动是针对群众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言论。工宣队被称为「保守队」，而军代表被称为「保守分子的同情者」。他们被指责帮助前保守派向造反派反攻倒算。然而，这类私下的嘀嘀咕咕无助于扭转似乎是不可抗拒的运动的方向。灰心丧气的造反派因此渴望看到中央已了解到他们的感情的迹象。1968 年 10 月中旬，《红旗》杂志的一篇社论中有一句话说「反复旧」，它很快就成为造反派抗拒清除造反干部和解敢党政干部的借口。十二中全会的新闻公报于 11 月初发表，其中批判了 1967 年的「二月逆流」。此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被一些人说成是镇压造反派的「新二月逆流」。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的 1969 年《元旦社论》必定使武汉的造反派大失所望，因为社论中一个字也没提中央会不会对「逆流」进行反击。相反，社论强调五种统一的重要意义：思想、政策、计划、命令、行动的统一。它要求人人都要服从各级地方当局的集中领导。社论指出，今年的首要任务是举行党的九大。因此，人民群众应当在促生产和推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发展方面作出新的成绩来准备迎接代表大会的召开。

由于没有得到北京的鼓励，武汉的造反派转而求助于别处。在 1969 年的头三个月里，有一大批文件在该市秘密地传阅着。这些文件揭示，几乎所有地方的保守派都

在利用清理阶级队伍的机会向造反派进攻。接下来，文件谴责这种倾向，并鼓励造反派与之战斗。与其他地方相比较，武汉的形势对造反派而言尤为压抑。这里不仅不允许公开谈论「复辟倾向」，而且造反派还被迫言不由衷地声明他们不感到压抑，而且拥护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虽然这场运动使他们的一些战友被清除掉了。大约在此前后，发动了一场批判「造反派受压论」的小规模运动。《长江日报》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批判这种观点，指责这种观点是保护「垂死的牛鬼蛇神」的「反革命谬论」。甚至连「工代会」的喉舌《武汉工人》也被迫加入这场批判。

由于他们意识到若被限制在各自的单位就永远不可能打败保守派势力，于是，造反派在 1969 年 1 月初为恢复串联作准备工作。不久，形成了许多非正式的联系网。各种谣言通过那些网络不径而走。有的谣传中央最近下发了新的文件批评清理阶级队伍的大方向是错误的，而且要求给那些在运动中被错误地清除的人平反。还有人谣传，上海已经没有军代表了，而且上海造反派建议武汉造反派起来造「复辟活动」的反。这类似乎令人振奋的消息促使造反派采取更明确的行动来改变局势，而有些在革委会中仍有一官半职的人又开始活跃起来。他们故意与军代表或（和）工宣队作对，而有些没参加革委会的人也变得很活跃。在工厂，有些人甚至公开声称：「虽然我们的组织被解散了，但「工代会」仍然存在。「工代会」是我们造反派的领导核心，你们军代表算老几？你们的傀儡革委会算老几？」

在 1 月底和 2 月初，许多下放农村的中学生回武汉和家人一起过春节。其中一些顽固不化的造反派分子迅速与工人造反派建立的秘密网络建立了联系。这些学生造反派仍像过去那样无所畏惧、敢作敢为，他们在大街上贴出大字报，他们要在春节后使造反派势力重新集合起来，找保守派算账。学生造反派的行动提高了其他部门的造反派的士气。在某些单位，他们开始公开要求推翻军代表在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强加在他们自己及其战友们头上的罪名。在其他单位，他们准备建立自己的组织。

面对清理阶级队伍这动半途夭折和他们的权威被削弱的威胁，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召开一系列会议讨论如何「镇压反对清理阶级队伍的逆流」。结果，从 1 月中旬起，当地的《长江日报》、《湖北日报》等报纸发表了一系列措词严厉的社论威胁造反派。与此同时，采取有关行动安抚各单位的保守派。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强调首要任务是为迎接党的「九大」作准备，宣布任何与此任务相反的行动都必须被制止。人们被要求参加排练在大会开幕那天准备举行的庆祝游行，这成了下班后必做的事，而且，它使人们忙于此事，几乎没有时间干别的事，因此，一直到党的「九大」在 1969 年 4 月 1 日召开，造反派的抵抗几乎没有发展到公开的地步。

武汉的「反复旧」运动

1969年4月1日，党的「九大」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武汉的8名代表被选为中央委员或侯补委员。他们是曾思玉（武汉军区司令员和湖北省革委会主任）、刘丰（武汉军区政委和湖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方铭（武汉警备区司令和武汉市革委会主任）、张体学（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饶兴礼（农民劳模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夏邦银（前造反派头头和湖北省革委会常委）、董明会（武汉钢铁公司工人）、谢望春（纺织女工），其中无一人担任过八届中央委员或侯补委员。在三位工人中，只夏邦银是造反派头头。

毛当然知道，他正在设法造成的「文革」后的领导层的联盟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为的。但是，如果「文化大革命」要带来一个有秩序的结局并开始一个新的时代，中国就必须有这种领导层的联盟。所以，「团结」成为党的「九大」的口号。毛热心于促进团结，这是极不寻常的，因为他相信不断革命，而且长期以来所信奉的就是冲突和斗争。因此，毛在这方面所作的持续努力仅仅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解释：毛想使最近所发生的动乱不再重新出现的决心；他认识到一个统一和强大的国家领导层对实现那个目标是至关重要的；他在调和党的最高领导层中的对立派别时所遇到的困难。

党的「九大」开幕后，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性有组织的庆祝活动。从大会的第一天到九届一中全会闭幕，在整个4月份，武汉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到处充满着节日的气氛。几乎天天都举行庆祝活动。大多数人可能并非在真正欢庆党的「九大」，而是在欢庆它所预示的内容——「文革」骚乱的结束。

然而，正如中国一句成语所言：「树欲静而风不止」。当毛在中央和地方创造团结的时候，一场新的动乱出现在武汉。这场骚动已酝酿了很长时间。由于主要地方领导人在3月下旬至4月份期间正在北京出席「九大」，他们不在武汉，使得这场骚乱得以爆发。

当毛为首的中央正设法稳定局势时，促使造反派起来造反的因素可能有四个：第一，对许多造反派来说，如果他们从过去三年的经历中得到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厄运从不会持续太久。1967年4月和1968年4月，造反派两次侥幸地逃脱了厄运，而且得以卷土重来。他们相信1969年4月也会是他们的另一个幸运月。第二，公开的派别冲突一直在其他几个省持续不断。对武汉造反派而言，似乎这些派别冲突保证一场更大的混乱不会使他们付出太大的代价。

第三，一些令人振奋的消息正从外面传到武汉。有人谣传张春桥已号召上海的造反派反击「复旧」。最近发表的关于8341部队在「六厂两校」经验的报告也谴责了「复旧」。最激动人心的是胡厚民从山东带回来的消息。胡在1968年9月受到严属批判，

但正在寻找反攻倒算方法。为此目的，他于 1969 年初去了山东，据说那里已经开始反击「复旧风」。胡发现山东也和武汉一样，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有许多造反派被清除，而大批党政干部被重新解放。给他很深印象的是，在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的支持下，该省确已开始了反击。他对山东形势的描绘提高了武汉造反派的士气。

第四，造反派仍保有一定的政治势力，这使他们能够东山再起。虽然许多造反派（通常是那些历史上有污点的人）被清除了，但大多数造反派并未遭到正式迫害。那些当了革委会委员的造反派多半还保住了自己的职位，至少在名义上如此。在有些单位，造反派甚至还掌握上层权力。使那些幸存的造反派沮丧的是，由于以前的一些战士被当作「牛鬼蛇神」清除掉，导致了一场贬低所有造反派的风潮，这可能削弱或甚至断送他们的政治生命。当然，他们不会坐视自己剩余的政治力量被断送。他们面临两种选择：冒险用那些和可能更多的力量进行背水一战，或是心甘情愿地灭亡，许多人选择了后者。而且，虽然市级「工代会」和「红代会」被削弱了，但它们仍然存在，而且能够为鼓动不满提供必要的领导。

在造反行动一时间自动广为蔓延之后，当「九大」还在开会期间，武汉「工代会」终于在 4 月份跳出来了。为了把抵抗（主动和被动地）转变为有组织的抵抗运动，「工代会」于 4 月 8 日发表宣言，公开声明支持日益扩大的工人自发罢工。为了使其立场合法化，宣言声称：

复旧和反复旧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

而且，它号召基层工代会勇敢地站出来领导反对复辟花招的斗争。它要求重新建立已经解散的这类工代会。之所以要强调「工代会」作用的原因是：它和革委会不一样。在革委会中，造反派不得不与军人和党政干部分享权力，而且在许多情况下，造反派仅仅是一个摆设，而工代会却是造反派的势力范围。为了确保这个势力范围不被其他势力染指，宣言进一步强调「基层『工代会』必须服从同级革委会和上级『工代会』的双重领导」。这是对毛在《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发表的 1969 年《元旦社论》中提出的「革委会必须进行一元化领导」的原则的大胆修改。事实上，「双重领导」只是个幌子，宣言的作者真正所要的是由「工代会」而不是由革委会行使「一元化领导」。

武汉在 4 月底和 5 月份重又出现动乱。市工代会的喉舌《武汉工人》在 1 月 1 日到 4 月 23 日的 4 个月里一共只出版了 8 期，而在 4 月 23 日到 5 月 25 日的一个月里就出版了 9 期。不仅其出版期数增加，而且其内容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武汉工人》在停刊 5 个月后于 1968 年 9 月 26 日重新复刊后，它完全成了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的应声虫，从未发表过自己的独立见解。然而，在 1969 年 4 月中旬后，

它开始发表批判性和激进的文章，把谴责的矛头指向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及其背后的军事当局。例如，4月23日出版的这一期上列出了「复旧倾向的10种表现」。这些表现包括：（1）所有群众组织被解散，致使省、市革委会中的造反派代表的权力基础被严重削弱；（2）两级革委会中一大批支持造反派的「革命干部」被打成「罪恶的幕后操纵者」或「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被赶出了决策层；（3）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期间，许多造反派被打成「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分子」或「牛鬼蛇神」，而且许多造反派被说成运动中的「绊脚石」和「障碍」；（4）以「防止派性腐蚀新生的红色政权」为借口，许多单位的造反派被禁止在革委会中担任职务；（5）打着「现在是改组时期」的幌子，前保守派分子得以保留下来，而前当权派也被重新解放；（6）那些造反派有广泛影响的革委会常常受到怀疑，而且被「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或「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领导小组」所取代。文章声称，为了「颠倒被颠倒了的历史」，造反派必须进行斗争，以夺回被「资产阶级分子」，也就是被前保守派、当权派和支持他们的军人所篡夺的权力。

由于在前几个月里经历了同样痛苦的遭遇，不同派别的造反派再次认识到他们必须团结起来共同战斗。「工总」、「九·一三兵团」和「工造」的头号人物朱洪霞、李湘玉和吴炎金之间一直形同仇敌，但他们在4月下旬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敦促人们「反复辟、反复旧，打退新、旧『二月逆流』的造攻」，这个口号随即传遍全武汉。

武汉居民一夜之间从大字报和传单上知道了联合声明的内容，它成了造反派的动员令。因此，当「工代会」于4月27日在汉口召开群众大会时，据报道说，有50万人参加了大会。当然，并非人人都是造反派，也并非每个人都决心投入这场战斗。然而，如此众多的人参加大会也表明，三位造反头头的努力已经导致造反派的反复旧。大会是打着「庆祝『九大』胜利闭幕」的旗号进行的，但「九大」提出的「团结」口号却被忽略了。即使提到过「团结」一词，这也只是说造反派内部的团结，而不是毛的本意。这次大会的真正目的是要把造反派聚集到一起以显示他们的力量，巩固和重振昔日的威风，夺回失去的权力的决心，并以此来保持造反派的士气。朱洪霞在讲话中声称：「有周总理、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和张春桥的支持，我完全有信心打赢这一仗。」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朱及其听众们不知道，在「九大」期间的一次会议上，当曾思玉向毛汇报武汉造反派目前的行动时，毛指示他稳住形势，不要对造反派表示同情。

几乎所有的大、中学校的学生都已被分配了工作或被发配农村去了，而且「红代会」也是名存实亡，大多数常委都走了。然而，它却在4月30日设法召开了一个常委扩大会议，并过了题为《反复辟、反复旧，为争取更大胜利而战斗》的决议，根据这个决议，所谓「复旧」就是指恢复旧权力机构和旧的办事方式和办法。为了打退这种倾向，决议断言，造反派应批判和抛弃如下「谬论」：（1）由于毛的革命路线的胜

利，两条路线斗争已经结束，所以，区分造反派和保守派已没有意义；（2）造反派队伍中有许多牛鬼蛇神，所以造反派应当成为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对象；（3）造反派犯下了打、砸、抢罪行，现在是找他们算账的时候了；（4）造反派普遍都极为自私和无法无天，以至于不能行使权力，所以，他们应当自动下台或被赶出革委会。「工宣队」是妨碍学生造反派在校园煽动新的动乱的主要障碍。所以，决议坚持认为，具体针对工宣队的敌对行动并不等于反对大多数工人阶级，因而发生在「反复旧」过程中的这类行动完全是合法的。

5月7日，「工代会」和「红代会」联合召开了名义上是庆祝毛的「五·七指示」发表四周年的群众大会。然而，会与「五·七指示」毫无关系。据报道说，出席大会的有20多万人，它实际上是造反派显示其力量的大会。同一天，这两个代表大会发表了一封措词强硬的致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的公开信。公开信指责说，自1968年秋天以来，这两个委员会的「某些主要领导人」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首先，这两个革委会已变成那些领导人手中的玩物，而造反派代表和支持过造反派的「革命干部」，即使未受批判并被清除的话，他们也被架空，而且大部分被赶出了决策层。所有重大问题的决策都是在未与这两个委员会中的其他大多数委员商量的情形下由一个主要领导小组作出的。例如，清理阶级队伍的指导路线；向学校派工宣队的计划；批判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任爱生；批判湖北省革委会常委胡厚民等，莫不如此。第二，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都已被大大地扩充和改组。这两个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最初都不超过100人。但到1969年初，两个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都已超过1000人。而且，更糟糕的是，新增的工作人员大多数是前保守派分子。第三，《长江日报》、《湖北日报》等当地的官方报纸都被用来对造反派造谣中伤。

以那些谴责为基础，公开信提出七项要求：（1）所有党政干部必须服从造反工人监督进行的「再教育」。（2）必须阻止那些拒不接受造反派的最高权位的人打击造反派；（3）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的主要领导应就他们前几个月所犯的错误作公开检讨；（4）「工代会」和「红代会」必须加强，而不是被削弱，而且再也不准否认它们在当地政治中的作用；（5）必须重新解放那些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受到错误批评或被清除的造反派，而且要恢复他们失去的权力；（6）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必须站在反复旧斗争的前列；（7）「工宣队」必须置于工代会的领导之下，而且，他们之中的保守派分子必须由造反工人替代。总起来看，那些要求实质上彻底否定了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在前半年所作的一切。这两个委员会的权威们因此似乎处在紧迫的危险之中，情况也的确是这样。公开信发表四天后，乘坐100多辆卡车而来的造反工人冲击了这两个委员会的办公大楼，造反派在行动中表示了对省、市权威的蔑视。

造反派的「反复旧」运动打破了武汉的平静，但造反派却是一股日薄西山的势力，

而不是一种蒸蒸日上的力量。大、中学校的学生几乎全部被赶出城市，从而去掉了造反派的最具冲动的力量。而那些在校的中学生由于太年轻而对政治漠不关心。同时，由于得到毛的认可，工宣队的高压政策制服了学校教师及其他知识分子中的造反派。结果，在整个4、5月份，造反派全面控制的文教和科研机构大多数平安无事，而社会的其他部门却或多或少处于骚乱之中。党政机构也普遍较为平静，这不仅是因为造反派基本上未控制这些部门，而且还由于这些机关的工作人员，尤其是造反派都被下放农村去「搞斗、批、改」了。

「甚至在工业和商业系统中，许多（即使不是大多数）前造反派分子在「反复旧运动」的高潮中也显得漠不关心（至少表面上如此）。由于对政治感到厌倦，有些人早已退出运动，并沉缅于家庭生活。现在他们又采取了毫无二致的态度。有些人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因历史问题而受迫害，所以他们现在仍然胆颤心惊，并打算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虽然造反派在前几个月中普遍受迫害，但也有例外。在某些单位，尤其是那些造反派在「文革」初期反对工作组而不反当权派的单位中，造反派得以保持其优势。由于没有直接受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害，这些单位的造反派很少有人愿意为别人的利益而去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冒险。所以，他们倾向于躲开他们以前的战友正在进行的战斗，虽然他们可能对那些人感到很同情。

只有那些根正苗红，而且相信参加新的骚乱不会使自己付出任何代价，却可能获取暴利的人才会积极投身于这场运动中。那些在革委会中担负正式职务又没有多少实权的人最为热心地推动斗争的发展，希望它会决定性地改变他们的权力地位。

在「反复旧」运动中，四个单位的作用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是邮局、电讯局、供电局和银行，即所谓的「三局一行」。和通常发挥行政功能并主要由办公职员组成的其他局不一样，这四类单位是为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提供直接服务的，而且其工作人员通常不被看成是政府官员。但由于当地军事当局不了解地方情况，这四类机关被错误地划分为行政机关；而且，其中大部分工作人员，包括邮递员、话务员、行政机关的勤杂人员和银行出纳都被当成行政干部下放到农村搞「斗、批、改」。由于远离家人，又无法忍受农村的艰苦生活，那些人希望尽快回家，「反复旧」运动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供电局的造反派发表声明宣称：「强迫工人在农村进行斗、批、改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邮电局和电讯局的造反派在繁华街道上贴出大字报，号召城市居民支持他们的返城要求。大字报警告说，由于全市缺邮递员和话务员，已经很糟糕的邮电服务可能还会每况愈下。许多人以回武汉参加「反复旧」斗争为借口擅自跑了回来。有趣的是，这四类单位的某些前保守派分子参与了他们的造反派对手们的行动，他们公开表示支持「反复旧」斗争，但他们却更关心和家人的团聚。只有那些担心被赶出权力机构的造反派头头才真正热衷于「反复旧」斗争。

在造反派的群众基础日益削弱的同时，它的队伍也变得越来越精干、虔诚和有战

斗力。因此，虽然他们在人数上减少了，但他们的能量丝毫没有减弱。因此，武汉在 4 月底和 5 月份的形势极为混乱，在许多方面类似于 1967 年和 1968 年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被禁止的「新思潮」重又出现。

1969 年的新思潮

由于得知外面的世界重又天翻地覆，在 8 个月前被关进监狱的冯天艾在 5 月中旬偷偷地让人把三篇文章带出监外。5 月 25 日，令地方军事当局和居民大吃一惊的三篇文章出现在汉口的闹市区，其攻击目标集中在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尤其是曾思玉和刘丰。纯属偶合的是，一名因残废而没有下放农村的名叫肖务农的年轻人在 5 月 22 日创办了名叫《百舸争流》的刊物。肖曾与「北斗星学会」、「决派」和《扬子江评论》有联系。在《百舸争流》第一期上，他赞颂鲁礼安是「翱翔在武汉上空的雄鹰」，而且宣布要踏着鲁的足迹，为完成鲁的事业而战斗。同时，被打垮的《扬子江评论》的残余分子又聚集在一起，并以墙报的形式恢复出版。

除了煽动造反工人打倒张体学和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的其他主要领导外，这些年轻人还设法为造反派制定一个纲领。他们认为造反派的当务之急不仅仅是恢复在革委会中的某些职位，而是要建立一个能使他们的统治制度化的新的权力机构。他们的基本思想是使「工代会」与同级的革委会平起平坐，并使后者服从前者的监督。换句话说，「工代会」将成为发号施令的机构，而革委会则成为其执行机构。这的确是一个大胆的建议。集中和统一一直被看成共产党国家政治体制的基石。而且，在经历了两年半的「文革」动乱之后，毛又强调自上而下重建集中和统一制度的必要性。但这个根本原则现在遇到了挑战，而且，另一个原则——分权与制衡——提出来了。如果实行这样的原则，整个中国政治体制都会从根本上被动摇，甚至毛的绝对权威也可能会成问题。造反工人一般不会洞悉其中的奥秘，但他们仍被「『工代会』将有权监督革委会」的想法所吸引，因为他们似乎觉得如果这个原则能够被确立的话，他们不仅可以夺回失去的权力，而且不必再担心失去在革委会中的领地。在整个 4 月底和 5 月份，「工代会必须领导反复旧斗争」成了造反派的口号，这表明《扬子江评论》的「新思潮」正在造反派心中扎根。

「反复旧」运动打乱了毛的计划。他在党的「九大」上曾号召他的子民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但派性在武汉和其他几个地方又死灰复燃。这种派性削弱了地方权威，扰乱了公共秩序，中断了生产。在过去的两年半里，「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证明，派性是一种难以治愈却容易传染的有害的社会疾病。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要把派性扼杀于萌芽之中。为了防止武汉的派性传到别处，以毛为首的中央在 5 月中

旬将几十名地方造反派头头召到北京，并命令他们停止目前正在进行的运动。5月27日，中央发布了着重处理武汉局势的通常被称为「五·二七指示」的文件，它宣布「反复旧」运动的大方向是错误的。虽然并不服气，但那些著名的造反派分子除了打退堂鼓外别无选择。大多数参加过「反复旧」运动的人很快就老实了。对他们而言，继续进行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毫无意义。到6月初，自4、5月份来笼罩在该市的骚动气氛开始冷却。「工代会」和「红代会」的报纸停止出版，有组织的造反势力渐渐消失，而街上又恢复往日的宁静。短命的「反复旧」运动就此以失败而告终了。

6月份，中央作了更多的努力来兜售其「团结」主旨。6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一篇题为《高举「九大」的团结旗帜，争取更大的胜利》的社论。社论重申，区分造反派和保守派已无任何意义，而且它宣称，甚至那些在「文革」初期首先起来造「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反的人在这动过程中可能也犯过错误，而且，如果真有其事的话，他们应该认真地检查自己的错误并改过自新。这样，就剥夺了造反派的大部分政治资本。而且，它警告造反派不要攻击刚刚解放的党政干部和革委会。社论指出，即使那些干部和组织偶尔犯过错误，但他们的权威必须受到尊重。

在武汉，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在中央的支持下，自6月份起就采取了强硬路线。7月份，在全市发动了「纪律」教育运动。8月，批判无政府主义成了头号任务。

但派性顽固得很。虽然有形的派别组织已不复存在，但无形的联系却仍得以保留。怀着变天的希望，一些顽固的造反派分子从事地下活动，以保持其秘密网络的运动。他们有时甚至公开抗拒地方当局恢复铁序的措施，那些深受「新思潮」影响的人通常都更加顽固。和以往的情形一样，面对正在变化的形势，理论家们往往比实际工作者更坚持己见，假如后者真有什么前后一致的观点的话。6月初，当「五·二七指示」传达到武汉时，《扬子江评论》发表了一篇还为《怎么办？》的文章，认为造反派的最佳战略是暂时退却，以便为反击作准备。然而，「新思潮」的另一个刊物《不争春》却在一篇文章中认为，最好的策略是以攻为守。二者虽然在战略问题上看法不一致，但都认为造反派永远不要放弃自己的事业。但他们同时也认识到，面对来自中来和地方越来越大的压力，造反派不得不退却，至少暂时如此。

然而，尽管造反派为了存在下去进行了背水一战，但其失败是注定了的。面对两种选择，即或是以牺牲公共秩序为代价来安抚造反派，或是牺牲造反派来恢复公共秩序，毛为首的中央选择了后者。因此，造反派的抵抗越激烈，中央对他们的镇压就越果断和严厉。1969年9月27日是武汉造反派的末日，那天，中央发布了《关于武汉北、决、扬的指示》。该指示对当地后来的局势发挥了重大的影响，所以有必要引述一些重要内容。

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在武汉市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的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妖风。对这类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

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关机构检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

中央决定，在北京举办【武汉】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有的反革命分子到现在还逍遥法外，扰乱革命秩序，破坏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的落实，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广大工人群众、贫下中农、革命干部要以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国家主人翁的姿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和劳动制度，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积极同破坏生产和消极怠工的现象作斗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和一切革命同志，特别是共产党员，更必须按照无产阶级党性办事，成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模范，成为加强、巩固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模范。

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显然事先已知道中央要下达这样的指示，因为在该指示发表前的一个星期，也就是9月19和20日，十二个据说是「北、决、扬」后台老板或骨干人物被捕了。

在10月3日至10月27日的湖北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公布了「九·二七指示」，这个指示敲响了「北、决、扬」及武汉广大造反派的丧钟。参加会议的有武汉的中央委员和侯补委员、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的委员、「工代会」和「红代会」的委员，以及挑选出来的大企业和高等院校革委会的委员，会议正式开始了持续两年之久的批判造反派运动。曾思玉、刘丰、张体学在会上摆起了大架子。他们对当地的著名造反派，分子大加呵斥。在强大的压力下，有些造反派领袖屈服了、除了造反派个人外，「工代会」和「红代会」也遭到了攻击。有人指责这两个机构是反革命组织「北、

决、扬」的避风港。

在闭幕会上，曾思玉宣称：

从揭发的大量事实看，有的单位领导班子是不纯的。权掌握在什么人手上，值得研究。有的就是坏人掌权，好人受气。我们要遵照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关于增补、调动、撤换各级革命委员会成员的通知》，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

这段话表明，中央和省级权威们决心通过改组和调整机构来彻底清除造反派的影响。

第 19 章 70 年代初的中国社会

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

湖北省革委会扩大会议闭幕一个星期后，湖北「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北京举行。由武汉警备区挑选出来的约 600 名武汉著名的造反派分子被召去参加学习班。虽然号称「湖北学习班」，但它并未包括湖北省其他地区的造反派。该学习班由 5 个连组成，其中一个连是学生（不包括中学生），另外 4 个连是其他部门的人。担负领导责任的是以武汉警备区司令张昭剑为首的党委，学员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例如，虽然全部学员都住在空军学院，但各连之间却不准来往。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学员串通一气写检查材料。的确如此，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真正目的就是要迫使学员承认自己的罪行，并揭发别人。然而，几乎没有学员自愿上钩。他们在检讨自己的错误时，往往避重就轻，而在被迫揭发别人时，又往往闪烁其词。为了克服造反派的消极抵抗，党委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钢」派和「新」派的成员被迫相互揭发。为了雪旧仇，有些不够老练的造反派上当了，他们相互指责对方挑起武斗，搞打、砸、抢，支持「北、决、扬」等。通过这种办法，学习班党委逐渐积累了实际上对每个学员都不利的「证据」。在头两个月左右，学习班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主题，任何对某个造反派分子和整个造反派不利的事都可以揭发，但还不太清楚如何解释所有零散的材料，也不知道采取什么行动来打击相关的人。1970 年 1 月，中央提出了主题——清查「五·一六兵团」分子。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五·一六兵团」早在萌芽状况时就被扼杀了，只是在北京有不到 100 人与该团体有关。毛和他的中央完全知道「五·一六兵团」已完全被消灭了。那么为什么在隔了两年后又把该组织的问题重新提出来了呢？唯一的解释是，中央认识到造反派的周期性抵抗是恢复公共秩序的主要障碍，并决心再次全部清除造反派。「清查五六分子」只是一个借口。在中央，稳健的领导人长期以来对造反派不满，而且，林彪集团也对他们不感兴趣，只有文化革命派支持他们。但正如前面章节所指出的，只是在造反派的行为有利于他们的利益时，文化革命派才会支持基层的造反派。当造反派的过火行为威胁到他们的利益时，他们决不会同情造反派。因此，重提「五·一六兵团」的事肯定是由中央领导层中各种团体间相互妥协造成的。

从 1970 年 1 月开始，「清查五·一六分子」成了湖北「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主题。「北、决、扬」被说成是拥有大量成员的「五·一六兵团」的分支机构。为了清查

当地的「五一六分子」，搞清楚北京的「五·一六兵团」与其在武汉的下级之间假想的「联系」就被看成是至关重要的。担任「二司」情报部部长的武汉测绘学院学生李立第一个被当成了联系人，因为李在前几年经常来往于北京和武汉之间。但他坚决否认这种无根据的指责。然而，在强大的压力下，曾经负责起草 1967 年 2 月 8 日声明的武汉水电学院的学生雷志茂和曾担任过「二司」驻京联络处主任的该校年轻讲师李苏民被迫违心地承认，他们曾在北京的林杰和谭厚兰等著名的「五·一六分子」和胡厚民、杨道远等武汉的主要造反派分子间牵线搭桥。对学习班的党委而言，雷和李的供词证实了「五·一六兵团」已渗透到武汉的假想，而且为追查该秘密团体的当地成员提供了线索——这是多么伟大的胜利啊！

从那以后，那些可疑分子被迫承认自己与「五·一六兵团」的关系。如果他们承认了，他们就会被要求交出他发展的成员的名单。因此，可疑分子的名单就会像滚雪球般地扩大。在稍加抗拒之后，名单上的许多人最终都屈服了，承认自己参加过「五·一六兵团」或其外围组织「北、决、扬」。他们垮下来的原因在于，他们被告知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而且，他们发现，认罪可能是使自己从无穷禁尽的审问中脱身的唯一办法。然而，有些人不管遭受多大的压力都寸步不让，但他们坚持申明自己无罪并不能解除别人对他们的怀疑。相反，他们被看成是顽固分子，而且比他们那些变节的同伙们遭受更大的痛苦。

当重要的造反派分子在北京遭受折磨时，他们在武汉的喽罗们发现形势越来越对他们不利。有好几场运动在同时进行。在所有这些运动中，前造反派分子都是运动的对象。即使一个人在历史上无任何问题，但若他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几年里参加过造反组织就会被怀疑是「五·一六分子」或「北、决、扬」成员，这个罪名可能导致他们的毁灭。的确是这样，除了那些早已完全退出政治的人以外几乎所有的前造反派分子在那些日子都受尽折磨，有些人是因为历史上有问题，另一些人则是因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或是在 1966 年和 1968 年间趁乱谋取暴利，而且，另外有些人是因为被怀疑是「五·一六分子」或「北、决、扬」成员而受迫害。造反派党员被其他党员看成阶级异己分子。一般来说，各级造反派头头，有打、砸、抢及其他暴力行为的胡作非为的造反派分子，以及那些利用「文革」报私仇的人最有可能受到打击。

这种镇压是在军代表的指挥下进行的。那些思想觉悟相当落后的士兵倾向于依靠前保守派分子和干部来向他们早已恨得咬牙切齿的造反派施加压力。当然，保守派分子和干部希望看见造反派被消灭。由于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造反派此时已无可挽回地失败了，前保守派分子和干部终于相信：颠倒已被颠倒了的历史的时候到来了。

与混乱的、放任自流的前一阶段的斗争不同的是，1969 年和 1970 年的连动虽然仍称为「群众运动」，但它是在解放军和工宣队的更稳定的领导下以更节制的方式进行的，而且是按照上边的更具体的指导路线进行的。

在全国和当地榜样的引导下，武汉的几乎所有单位都建立机构处理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由军代表、干部和出身好的人（大多数是前保守派分子）组成的专案组赏罚负责处理可疑分子。可疑分子常常被投入「牛棚」或学习班，进了这两个地方的人被禁止离开划定的场所，不准回家和接待来访者，也不准与外界进行信函和电话联系，即「五不准」。他们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囚犯，唯一不同是的，他们被关押在本单位而不是国家的监狱。

从理论上讲，肉刑是禁止使用的。我所采访的大多数人（不论是迫害者还是被迫害者）都证实，这个禁令得到了充分的遵守。「逼供和诱供」也应在被禁之列，但这却是一种普遍现象，使用的办法多种多样。最流行的是「车轮战」和「精神战」。或是因为不能顶住巨大的压力，或是因为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所诱惑，或是因为这两者，许多被指控的人承认了自己所没有犯过的罪行。

在 1970 年所关押的人大概在武汉及全国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除了那些家庭成份不好的人以外，单是「五·一六」和「北、决、扬」可疑分子就占了居民的很大比例。这种过火行为可能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首先，许多军代表认为，如果他们不得不作出选择的话，冤枉一个无辜的人要比放掉一个可能的坏人安全得多。其次，许多以前受到造反派迫害的保守派分子和干部利用机会报复造反派。这两个因素相互作用，造成了大量的前造反派分子的悲惨命运。

中央对「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受指控的人数之多感到震惊。1970 年 3 月 27 日，中央发布了《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指出：在清查「五·一六」的斗争中，「有些单位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必须引起特别警惕和关注」，但通知同时也强调：「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人们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解释这种模棱两可的指示。由于权力掌握在军人手中，所谓的「扩大化倾向」也就不会停止。事实上，「扩大化倾向」源于中央的假想：「五·一六」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大组织。只要中央坚持这种看法，这种倾向就不会得到制止。

1970 年 6 月，湖北「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结业。经中央批准，「工总」的核心人物胡厚民、「二司」头头杨道远和「九·一三兵团」头头李湘玉被撤销了在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中所担负的职务，并被关进监狱。此外，湖北省革委会 8 个副主任中唯一支持过造反派的副主任任爱生被宣布是「北、决、扬的主要后台老板」，并被软禁起来。

其他学员被分成两部分：那些在省、市革委会中担任职务的人被分配到在省革委会第二招待所举办的另一个学习班，其余的人则继续参加分散在全市各个单位，尤其是大学里的学习班。参加后一类学习班的还有广大的基层造反派头头。所不同的是，每一个造反派都有好几个本单位的同事充当「动力」。大多数「动力」是前保守派分

子。他们来这里的目的是要揭发造反派在「文革」前和在此期间所犯的错误；批判他们和迫使他们承认更多的东西；以及日夜监视他们的行动。在第二招待所办的学习班持续了一年，而分散在全市各地的学习班办了两个月到一年。学习班解散后，造反派学员返回本单位或分配到其他单位。在这两种情形下，他们被迫在公众的监视下干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后来了解到，作为结束学习班的计划的一部分，武汉军区曾秘密计划将 84 名著名的造反派分子判死刑，但不知何故没有这样做。

恢复旧的权力机构

1969 年至 1970 年中的政治发展根本改变了中国省以下的权力机构的责质（如果不是形式），至少在武汉是这样。造反派被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夺了权。大多数人由于被戴上「暗藏的阶级敌人」或「潜伏下来的「五·一六兵团」和（或）「北、决、扬」的成员」的帽子而失去了在革委会中的位。即使他们被查清了并无这两种罪行，他们可能仍会失去权力，因为他们所担负职务的革委会解散了。而且，即使那些造反派有幸未被赶出革委会，他们也没有实权。以前的「工总」头头朱洪霞、「工造」头头吴焱金、「新华工」的头头张立国的情况就是如此。从未宣布免他们的职，但不允许他们接近他们担任副主任的省、市革委会的办公大楼。只是在极少数单位，由于造反派在「文革」初期与当权派联合在一起抵制过工作队，那里的造反派才因其广泛的群众基础得以保持自己的地位。但他们发现，在反对造反派的大气候中，他们所处的地位脆弱不堪，因而不得不摆出防御姿态，以避免他们在大多数地方的同志们那样的悲惨命运。

当造反派被赶出各级领导层时，通过对革委会进行的一系列「调整」，他们的位置被他们在 1966 年—1968 年间与之斗争过的干部和在「文革」前作为「积极分子」或「先进工作者」占据地方优势的前保守派分子所取代。「文革」前的权力分配方式在实质上（如果不是在形式上）又恢复了。

造反派还受到其他形式上的歧视，在机要单位，如政府机构、监狱、电讯局，等等，采取了措施清洗造反派。内部调动是最当见的方式，造反派常常被迫从工作了多年的单位调到新单位，大多数是从上往下调动。被分配到农村的造反派学生不久也发现，他们所受的是二等公民的待遇。1970 年，工业企业部队单位开始招工和征兵，对象是在农村受过再教育的知青年。但前造反派分子通常都被排除在外，甚至造反派分子的家人和亲戚也受到株连。他们常常被当成「不可靠的人」，并因此而被剥夺了提升的机会。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说，造反派在 1970 年初已被人当作和右派分子或坏分子一类的人了，虽然官方从未否定过造反派在「文革」头两年的大方向，

政治气候的变化导致前造反派分子对「文革」和中国政治的看法的根本变化。许多人变得玩世不恭。他们从前两年的经历中得出结论：「政治斗争不可知」。在未知的政治海洋中求生存的方式是「中央表态我表态，运动后期当左派」。因此，他们再也不会像 1966 年至 1968 年那样狂热了。有的人从自己的痛苦经历中顿悟：他们对党政机构的造反行为和锐意创新的热情都受到了中央的左派精英们的操纵，这些人把他们当作在党内和政府内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有些人得出的教训是：中国的政治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其基本的规则是「力量就是权力」。为了摆脱目前的困境，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必须为夺权而进行一场新的决战，但下一步他们要自觉地为自己的个人利益而战斗。

第 20 章 批林批孔运动

党的「十大」及其对地方政纲的影响

1970 年 8 月 23 日至 9 月 6 日，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向毛发动突然袭击，阴谋抢班夺权，在遭到毛泽东的揭露后，又于 1971 年 3 月，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巧《571 工程纪要》，妄图谋害毛泽东，以「夺取全国政权」。阴谋败露后，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于 9 月 13 日乘飞机出逃，结果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从而宣告了林彪集团的覆灭。

「九·一三」林彪事件以后，1973 年 8 月召开的党的「十大」的预定目标，是要重申经过清洗和改组后的党对中国政治生活的影响。

林彪集团的垮台带来了填补权力真空的问题。毛的选择是采取平衡中央的现有两个集团的办法：调和有丰富行政经验的老干部和价值观极为激进的「文化革命派」之间的关系。这两者的权力在 1972 年都加强了。在 1973 年上半年，这种趋势继续存在。

与往常一样，毛并不追求静态平衡。相反，他要通过保持对立派别间的紧张关系来寻求推动力和前进。在准备「十大」时，毛有意增加中央的老干部和「文革」派的实力，但他在思想上赞同后者的看法，即始于「文化革命」的改革值得称颂和继续，而且他支持后者反对前者的斗争。这就是为什么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会被授权起草「十大」的三个核心文件（政治报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宪法）的原因，通过这种办法保证激进理论成为未来的大会的主旋律。

1973 年 8 月 24 日至 28 日，「十大」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开会。这次大会体现了毛追求动态平衡的思想。新的党的领导层的组成显然是平衡上文说的两个集团的代表的结果。许多在 1966 年至 1968 年间受到严重冲击，并在 1969 年被赶出「九大」中央委员会的高级干部又被选为新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或候补委员。除造反派头头保住了他们在「九大」上所获得的在中央委员会的职位外，中央的「文化革命」派的大批忠实的追随者第一次钻进了党的最高权力机构。

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任命显然也是基于对两个集团的妥协的考虑。引人注目的是，王洪文在大会上跃升为党的副主席，仅仅位居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后，或许毛打算让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

虽然新的领导层的组成明显是妥协的结果，但激进仍是党的「十大」的主旋律。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王号召与会者注意如下的事实：在党的十次路线斗争中，

一种「错误倾向」常常试图掩盖另一种错误倾向。这也就是暗示目前存在一种「错误倾向」。王的讲话的核心是猛烈抨击「修正主义」并反复引述毛的「反潮流」是「马列主义原理」的语录。王显然是在号召回到「文化大革命」，因为在「文革」口号「造反有理」和「反潮流」的新提法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这个口号是鼓励向权威造反。由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等人负责起草并由周恩来在大会宣读的政治报告也通篇充斥「文革」语言。

早在「十大」正式开幕前，其激进的特点就已引起各省的造反派的注意。8月24日，即大会开幕那天，杭州的一群「新部」在市委大院贴出大字报，抱怨失去了他们前几年的工作，并被送回原单位（最可能的是当工人）他们随即占领了市委大楼，并折磨那里的某些领导干部。大约就在这时候，武汉的前造反派秘密势力网也准备采取行动，但他们的计划因几位积极的组织者被捕而暂时夭折了。然而，王洪文和周恩来在「十大」的讲话的发表，给那些造反派「反潮流」壮了胆。9月5日，汉口闹市区出现了一篇题为《我们为什么重新造反》的大字报。这是自1969年中期以来该市见到的第一张造反派大字报。同一天，谢妙富被捕。但他的同伙并未被吓住。相反，他们贴出更多的大字报，要求释放谢及其他被捕的人，结果引起该市骚动

在经过四个相对平静的年头后，大多数人开始主动或勉强地服从权威，当一小群人再次起来向省、市的权威们挑战时，他们震惊不已。当然，前保守派分子对这种造反行动非常愤慨，并希望它们不久就会得到平息。另一方面，前造反派分子觉得那些造反者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但大多数人也认为投入一种斗争太危险。因此，当造反者在9月中旬举行第一次游行时，总共只有不到100人参加了游行。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是一批敢作敢为的坚决的男男女女。正是由于他们的不屈不挠的努力，武汉才逐渐形成了一种战斗气氛。城市的各个角落再次变得拥挤不堪，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各种派别的人在一起交换信息、观点和在1966年至1969年的战斗经验。越来越多的大字报夜以继日地出现。

然而，尽管那些自命为「反潮流战士」的人的影响在扩大，但在1973年最后两个月，他们的抵抗主要还是一种地下运动。地方政府仍然对他们充满敌意。由于公安部门受命加紧搜查这些捣乱分子，更多的造反者被逮捕。大多数前造反派分子仍然尽量躲着那些鲁莽的人，以免惹祸，虽然他们可能同情那些人。朱洪霞和夏邦银等最近被任命了官办群众组织的一官半职的造反派头头尤其谨慎，以免被人认为是那些暴风雨中的海燕的同谋。由于直到最近他们还未掌权，他们不愿仅仅为了发泄四年来心头郁积的不满而牺牲既得利益，他们似乎觉得最好的策略就是不冒险。由于担心自己的仕途会被那些暴风雨中的海燕们的行动所毁灭，他们私下试图劝「反潮流战士」的头头们（大多数是他们的同伙）不要制造事端，但他们失败了。而且，不久后他们会发现，他们对局势的看法过于保守。

武汉的批林批孔运动

在批林批孔运动于 1973 年至 1974 年间处于酝酿阶段时，湖北省的最高领导层正在进行调整。在刘丰垮台后担任湖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的张体学于 1973 年 9 月 3 日逝世。3 个月后，由于 8 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结果，湖北省委书记曾思玉调往山东，而山东省委书记杨得志调往湖北。和其他 6 个人一样，他们两个人也不再担任省委书记职务。为了补上党委书记的空缺，最近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来自北京的老干部赵辛初被任命为湖北省委书记。来武汉上任之初，他作出了巨大的让步。

显然是由于中央施加了压力，新上任的省领导在 1974 年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释放在前 3 个月里关押的「反潮流战士」。1 月 6 日，聂年生在汉口举行的反潮流战士群众大会上重新露面。聂在讲话中声称，曾思玉之所以被调走，是因为他犯了严重的错误。他指出，由于曾思玉和刘丰这两位曾领导湖北省清查「五·一六」和「北、决、扬」分子运动的省级领导犯了众所周知的错误，所以那个运动的大方向也不可能是正确的。这种诡辩对他的追随者，即那些已开始更猛烈攻势以迫使省、市；权威们给他们翻案的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春节前，在北京参加由王洪文主持中央学习班的董明会回到武汉。他首先会见了那些最近在官办的群众组织得到了一官半职的著名造反派分子，向他们传达王洪文在中央学习班上的讲话。他着重强调了两点：首先，王谴责了许多（即使不是大多数的话）镇压造反派的省份的地方官员。其次，王提出要把更「年轻的干部」提拔到更高和更重要的岗位上去。这两点实际上是造反派长期以来的内心深处的思想和感情。如果说他们；在 1973 年末还对反潮流犹豫不决，并采取不冒险的策略的话，现在，由于得到党的第二副主席的明白无误的支持，他们抛弃了疑虑，并决心投身到这场战斗中去。大约在那个时候，省、市的当权者收到北京要求他们对「造反派高抬贵手」的指示。迫于北京和武汉的压力，湖北省委在春节期间召开了一个座谈会，邀请数十名当地的著名造反派分子对省委的工作「提出看法和意见」。参加座谈会的除董明会、夏邦银、朱洪霞、张立国和吴焱金等已担任一官半职者外，还有自 1973 年夏天以来领导新的造反连动的聂年生和王华珍等人，以及在 1966 年至 1968 年期间曾担任过主要造反组织的主要领导，但在 1969 年后一直不得志的人。在座谈会上，他们利用机会发泄自己对地方当局过去四年来镇压造反派的所作所为的不满情绪。

座谈会之后，武汉再次出现了骚动。为了表明它决心推动湖北的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展，湖北省委于 1 月 28 日在武汉最大的礼堂召开了有 10 万人参加的动员大会。而且，在随后的半个月里，省、市两级的工会、青年团、妇联等领导机构也召开了一系列群众大会。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正在开展的运动置于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之下，但

这只是枉费心机。

的确是这样。当前造反派分子重又死灰复燃时，旧的派别仇恨再也抑制不住了。到2月初，以过去的造反派为一方，以保守派为另一方，形成了两个基本阵营。前造反派自称为「革命群众」，而前保守派则自称为「工农兵」。城市的各个角落：被两派贴满了大字报，而且，两派每天都在闹市区的街上举行群众游行，公共秩序受到严重危害。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虽然正在进行的连动名义上叫做「批林批孔」，但人们对这两位死人并不感兴趣。「革命群众」和「工农兵」在运动期间相互冲突，但其冲突的根源并不在于：「批林批孔」。两派都知道，这种批判要搞，但谁也不会真正花力气去搞。与此相类似，「新生事物」本身是不是应当加以保护也不是两派关心的问题。毕竟，把知识青年下放农村的制度、「五，七」干校、教育革命、八个样板戏等几乎不可能给两派中的任何一个带来好处。但有一个新生事物被认为对前造反派有利，而且「革命群众」会拼死捍卫——在组成各级各类领导集体时的「老、中、青」三结合原则。在造反派看来，「老、中、青」三结合应被解释成老、中和造反派的结合。其根据是：「即使一个造反派已经80岁了，但仍然应该认为他(她)是年轻人」。显然，通过采取「老、中、青」相结合的办法，前造反派分子希望增加掌权的机会，这实际上是「工农兵」竭力防止出现的事，因此，利害攸关的主要问题仍是权力分配。前造反派分子若想掌权，他们首先必须证明，他们是清白的，而且，前几年对他们的所有指责都是不公正的。为此，他们需要把整个清查「五，一六」和「北、决、扬」分子的运动说成是错误的运动，而不是像反潮流战士们前一段时期那样一个案子一个案子地翻案。对前保守派分子，尤其是那些曾经积极参加清查「五，一六」和「北、决、扬」的人而言，即使为个别造反派分子平反都是不允许的，更不用说全部平反了。每一派的利益都与另一派的利益正好是针锋相对。

为争取全面地重新评债「清查五·一六」和「北、决、扬」运动，「革命群众」在2月中旬举行示威游行，并在武汉市公安局门前静坐，要求释放被关押的「工总」头头胡厚民、「九·一三兵团」头头李湘玉、「二司」头头杨道远和湖北省革委会的8位副主任中唯一站在造反派一边的「革命干部」任爱生。1967年春，造反派曾成功地迫使当局释放夏邦银。由于有先例可援，「革命群众」相信他们完全有把握打赢这一仗。

2月23日，胡厚民和李湘玉获释。「革命群众」像欢迎凯旋而归的英雄那样欢迎他们。在发现他们的对抗策略是一个成功的策略后，「革命群众」准备给地方当局施加更大的压力，以迫使他们作出更大的让步。但这个事件在前保守派分子中引起了更大的仇恨和愤怒。「工农兵」指责省、市当局在处置前造反派时所采取的温和路线。为了防止对造反派分子作更多让步，他们决定向地方当局施加更大的压力。省、市当

局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采取消极态度的基本原因是他们不了解中央为什么要发动批林批孔运动。

1974年3月，武汉出现了一个派别冲突的新高潮，应朱洪霞和夏邦银的要求，省总工会常委召开特别会议讨论该市面临的紧要问题。虽然造反派的人数在这个25人委员会中并不占多数，但朱、夏及其同伙们通过其强有力的个人影响和策略技巧，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他们有利的形势，从而设法操纵了这次会议。朱和夏发表了战斗性讲话，批评地方当局在1969年后反对造反派的种种作法。他们的讲话随即在群众中广为流传。3月3日，「革命群众」举行规模空前的游行。游行队伍由数百辆满载造反派的卡车组成，这与当局的软弱无能形成了鲜明对照，造反派头头们的战斗性给那些不敢公开站在「革命群众」一边的前造反派分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士气。随着造反派士气的提高，他们要求处于所谓「新生势力」的地位，也就是说，让像他们那样的人担任各级领导职务，「权力必须掌握在革命造反派手中」的口号就是在这个时候提出来的。

面对愈来愈大的压力，当局被迫对「革命群众」让步，那些要求赔偿因清查「五一六」和「北、决、扬」而造成的损失的人得到了赔偿。此外，还把一些著名的造反派分子安排到更重要的领导岗位上，这被称为「补台」。几乎所有在1969年后被赶出省、市革委会的造反派都官复原职。

由于羡慕他们以前的头头一跃而成为省、市的显赫人物，而且，相比之下自己却在仕途上郁郁不得志，于是，基层的造反积极分子开始要求在本单位谋得一官半职。那些当过革委会委员的人要求复职，而那些甚至在1968年都从未当过革委会委员的人则打算建立所谓「批林批孔办公室」，并迫使本单位党委承认该办公室在目前运动中的领导作用。

3月4日，湖北省委发布「七条」，第一次正式承认湖北的清查「五·一六」和「北、决、扬」运动冤枉了许多好人，并答应为所有受害者平反。这是进一步安抚暴动的造反派的措施。为了防止因平反而导致更大的派别冲突，「七条」指出：「使这么多清白无辜的人受到冤枉的罪魁祸首是刘丰。那些在运动中办过案的人对此没有责任，更不用说那些参加过运动的群众了。」「七条」希望这个措施会安抚保守派分子。然而，试图两边讨好只是枉费心机。

在造反概看来，「七条」是「一株大毒草」，因为对他们来说，把给造反派带来痛苦的责任统统推在刘丰一个人身上是无法接受的。在讨论「七条」时，前造反派分子普遍认为，那些办过案的人都有责任。当报仇雪恨的机会到来后，造反派决心要为自己所受的全部痛苦向保守派分子和干部报复，并利用这机会夺回权力。

保守派分子也对「七条」极为不满，他们觉得镇压隐藏在造反派队伍中的「牛鬼蛇神」一点错也没有。而不对之处在于，从未正式给1967年7月的武汉事件平过反。

而且，前保守派分子和干部仍然处在随时可能遭受批判的地位，尽管自 1969 年以来他们一直处于优势地位。保守派分子对于省、市当局对造反派采取的退让政策尤为愤怒。他们提出，如果造反派的个人损失能够得到赔偿，而著名造反派分子能够被任命为官方组织的领导职务的话，那么，保守派分子至少也应受到同等待遇。而且，「工农兵」要求澄清武汉事件的真相，补偿他们在武汉事件后所遭受的损失，并把重要的保守派分子安排进省、市两级的重要岗位。

然而，在三月中旬，形势发生了对造反派有利的变化。迫于「革命群众」的压力，湖北省委修改了「七条」，并代之以「六条」。原建议中为那些在清查「五·一六」和「北、决、扬」运动中处理过造反派案子的人开脱责任的那条建议被删掉了。重要的是，这种修改意味着造反派可以用自己在前几年遭受的痛苦去找其上级和保守派同事们算账。

事态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了大多数造反派的士气。在许多单位，造反派开始贴大字报，指名道姓地攻击其上级和保守派同事。后者被指控犯了方向和路线错误，而且被迫向受过自己迫害的人道歉。

当然，保守派也被激怒了。3 月 19 日，当省里的主要领导赵辛初和赵修出席武汉钢铁公司的一个会议时，「工农兵」的一帮人劫持了他们，并要求他们解释为什么省当局要向造反派屈服。虽然这些人对两「赵」非常客气，而且几个小时后就把他们放掉了，但新华社驻武汉特派记者把这个事件报告了北京。3 月 21 日，中央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武汉形势的「三点指示」。指示声称，「绑架赵辛初和赵修同志是错误的，不许为 1967 年 7 月武汉事件翻案」。

「三点指示」使「工农兵」沮丧不已。尽管他们坚持认为他们并未绑架省主要领导，而只是请他们来对话，但他们也被迫处于守势。与灰心丧气的保守派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造反派把「三点指示」当成中央支持他们为解放而斗争的确切信号。结果，他们发动了更猛烈的攻势。

3 月 23 日，一群刚刚从农村返城的前造反派学生开始沿街贴出大量的大字报，要求释放前「二司」头头杨道远，因为省当局认为，关押杨是经周总理亲自批准的，与胡厚民和李湘玉的情况不一样，并以此为借口拒不释放杨。两天后，为了证明他们争取释放另一位造反派——罪行累累的江岸车辆厂的罗小毛的决心，一群工人把大卡车堵在铁路上，从而使京广铁路和该市的一条公路干线的交汇处堵塞了 3 小时零 7 分，这个事件使全国的经济大动脉被紊乱了好几天。

3 月 26 日，由于从内部渠道获悉武汉军区领导的「三办」保存了许多反对造反派的「黑材料」，一群「革命群众」占领了该办公室设在武汉军区司令部大院内的办公大楼。他们在该 1 办公室的确找到了成吨的人事档案、会议记录、档案和关于清查「五·一六」和「北、决、扬」的文件。令这些占领者大为震惊的是，在他们抢来的

材料中有一份名单上开列了省当局曾经打算判处死刑的 84 名造反派头头的名字。这一发现使许多人，尤其是名单上挂了号的人得出结论：目前的战斗是一场生死之战，而他们的唯一选择就是战斗到底。占领「三办」的直接后果就是引发了冲击解放军的浪潮。许多单位的造反派竭力「揪回」曾统治过他们的军代表，并质问、批判、甚至公开控诉他们。

在这种形势下，当地的《长江日报》再次摆脱了其主管部门的控制。除了发表与省、市当局唱对台戏的报道外，该报还发表了大量攻击「工农兵」的社论的文章，它实际上成了造反派垄断的舆论工具。

4 月 1 日，湖北省委召开第二次「批林批孔」群众大会。然而，会议遭到造反派的冲击。从那天起，在 4 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中，造反派重新打起早已于 1969 年解散的「工代会」和「红代会」的旗帜进行了多次大规模游行，造成了一种造反派似乎会取胜的气氛。甚至某些省级领导也开始考虑加入造反派了。在清查「五·一六」和「北、决、扬」运动结束后担任湖北省委书记的赵修成了「革命群众」和「工农兵」人人皆知的湖北省委中同情造反派的人。他在第一冶金工业公司所作的一次讲话导致该公司党委宣称自己是「造反党委」。这句话的含意虽然相当不明确，但其他单位的不知所措和焦虑的领导干部把那个行动看成是不祥之兆。为了摆脱危机，他们觉得除了采取第一冶金工业公司党委的办法外，别无选择。因此，在 4 月的第一个星期里，各单位的党委和团委纷纷发表「造反宣言」。在发表宣言的同时，那些官方组织还动员本单位的工作人员参加游行，通常还有宣传车播放「造反宣言」。武汉的主要街道连续好几天挤满了游行卡车，生产和交通处于严重混乱之中。

「工农兵」和「革命群众」知道，几乎没有一个党的干部在宣布自己支持造反派时是真心实意的。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做，仅仅是因为他们对 1966 年的事件仍记忆犹新。他们不愿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但「工农兵」似乎觉得不管怎么说这些干部是在讨好造反派，这可能会提高造反派的士气而挫伤他们自己的积极性。为了限制煽动的后果，他们想方设法劝说尽可能多的领导干部装病并请病假。但这个策略也无济于事。造反派却对事态的转变弹冠相庆，尽管他们知道那些宣布支持造反派的党政干部并未消除对他们的敌意。然而，只要那些当权者能够屈服，并对造反派亦步亦趋，那么，他们是不是心甘情愿地这样做也就无关紧要了。

在胜利的气氛中，一群「革命群众」在 4 月 5 日绑架了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和 5 名法官，法院收到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立即释放仍被关押的自 1969 年以来犯有打、砸、抢、杀及其他罪行的造反派，武汉的公共权威处于彻底崩溃的边缘。

遏制激进主义

无政府主义并非只出现在武汉。有证据表明，到4月初为止，至少浙江、河北、河南、湖南、江苏、四川、江西、广东、山西、山东等省都处在混乱之中。其他省可能也处于骚动之中。国家的工业生产受到严重的破坏。这种混乱必定使毛及文革派领导人回想起局势完全失控的1967年和1968年的酷暑。让那种灾难重新出现肯定对他们没有好处。为了防止公共权威像7年前那样崩溃，中央不得不着手制止派性在各省的自动发展，4月初它决定克制一下自己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调子。

武汉首先受到这种转变的影响。4月7日，湖北省委收到并当即公布了中央的一系列指示。造反派在过去两周中所做和所支持的几乎所有事情都被否定了。造反派被命令释放中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和法官，退出武汉军区司令部大院，交还从「三办」抢走的所有材料。它还宣布，试图给杨道远翻案，占领公共建筑物以建立宣传站，驾驶卡车游行以及攻击以前的军代表等等都是错误的。那些指示使灰心丧气的保守派又兴高采烈，却使造反派如坠五里雾中。造反派在得知4月10日发布的中央12号文件的内容后更加惊慌失措。该文件指出，许多省的运动破坏了工业生产。它要求立即纠正这种倾向。为此，文件强调：

批林批孔运动必须在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准建立战斗队。不准进行跨单位跨地区的串联。

正如前几年所常见的那样，重申党的领导的主导地位是中央正在认真准备恢复秩序消除动乱的第一个信号。12号文件使武汉当局避免了从政治上垮台。由于得到北京的支持，地方当局开始采取措施控制运动的发展。各级领导干部被要求更多地关心生产和加强党的领导。「革命群众」和「工农兵」都被规劝解散他们的「联络站」、「上访团」、「广播站」及其他临时组织，并回到原单位。从农村返回武汉并要求在城市安排工作的前学生造反派被劝说返回其原来的下放地点，而那些利用运动来满足他们经济要求的人则受到了批判，并被勒令归还他们所得到的一切。同时，公安部门被要求狠狠打击在前几个月猖獗一时的流氓阿飞。

12号文件受到了广大「工农兵」和保守派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很快在全市的街上贴满了无数欢呼文件发表的大字报，这与没有任何反应的造反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保守派觉得文件会保证他们压倒造反派，因此，他们夜以继日地举行群众大会庆祝胜利，然而，对某些在一个星期左右前被迫声明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而言，这个转变简直难以相信。他们记得「文革」常常是曲折发展的，所以他们非常谨慎，以致不敢过于相信所见到的第一个有利的信号。

对造反派而言，12号文件所带来的转变实在太糟，以至令人难以相信。他们对局势的突然转变百思不得其解。他们可能会通过派一些人到可以得到更多信息的北京去的办法来找出这种转变的原因，并决定如何应付。他们的确这样做了。4月，中央通过了关于河南和山东派别冲突的决议。此时有谣言说，中央不久就会处理武汉的问题。为了影响中央的决策，朱洪霞、胡厚民及其他站在造反派一边的人在4月中旬离开武汉前往北京。

那些著名造反派分子离开后，出现了谣传，说中央在处理武汉问题时可能会考虑把一些造反派头头安排到湖北省和武汉市的重要岗位上去。这个谣言使「工农兵」和某些不大知名的造反派分子心神不安。前者不安是因为他们不愿看到任何造反派分子当官，而后者心神不定的原因则在于他们担心分赃时会把他们扔在一边。结果，更多的人跑到北京去了。

这些代表一直在北京呆到5月初或5月中旬。4月下旬，省级主要领导也来了。但令造反派和保守派分子大失所望的是当中央和省级领导讨论武汉的未来时，却把他们排除在外。

与1974年的前四个月相比，5月份显得平静多了。这是战略相持，各方都在等待中央的最后裁决，任何团体在此关键时刻都决不会鲁莽行事，因为任何不慎重的行动都会损害他们的政治前途。

5月24日，省主要领导终于从北京回来了。但中央的决议，没有包含任何对造反派有利的内容。决议声称：

- 1、清查「五·一六」和「北、决、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 2、曾思玉及其他省级主要领导可能犯过某些小错误，但总的来说还是好干部。
- 3、可能有必要补充领导，但不能在牺牲老干部的前提下实行。而且，不能过于草率地处理这件事。
- 4、所有非正式的群众组织必须立即解散。

5月26日，湖北省委和武汉军区召开空前规模的盛大聚会，并立即通过有线广播网向各单位作了传达。会上，在宣读中央的决议后，省委书记赵辛初、武汉军区司令杨得志以及政委王六生都作了措施词强硬的讲话，警告不要在目前的运动中发泄宿愿。换句话说，再也不允许谴责清查「五·一六」和「北、决、扬」运动了。

5月28日，召开了另一个群众大会。21个在前几个月的骚乱中犯了罪的人被判处死刑或徒刑。这次大会也通过有线广播网作了实况转播。该会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恢复公共秩序。但那些个人要求尚未得到满足的造反派却担心，一旦局势正常化，他们就可能再也找不到机会给自己翻案了。所以，他们不愿结束运动。虽然他们都公开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但「革命群众」私下却表示灰心丧气。当他的喽罗要求他谈谈对决议的看法时，彭祖龙这位「工造」昔日的二号人物毫不掩饰地说：

「这个决议本身是我所不愿看到的。现在重要的是我们和我们的对手如何解释它。」

6月，省、市当局采取严厉措施恢复秩序。他们接二连三地开会强调生产、团结、纪律、秩序的意义，而且，地方报纸发表一系列社论，号召忠实地执行中央的指示，但派性并未就此而消亡。6月中旬，武汉重新出现了狂热的气氛。到月底，武汉再次被抛进了大动荡之中。在繁华地区重新建立了广播站，而宣传车重又在街上横冲直撞。大街小巷的墙上再次贴满了对立派别相互攻击的大字报。而且每天都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更糟糕的是，「革命群众」和「工农兵」开始相互诉诸武力。例如，在6月的最后一天，至少发生了两起流血事件。

在各省当局正像湖北那样徒劳地反对似乎不可制止的派性时，中央领导对国民经济的持续恶化感到震惊。据国家计委在6月18日递交给政治局的一份报告说，与1973年的同期相比，29个省、市、自治区中有11个省的工业生产在1974年头五个月实际上下降了。

7月1日，中央委员会发布《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在痛惜生产指标下降的同时，该文件号召更加重视生产，并号召严格遵守纪律，结束派别冲突。那些在造反派的进攻面前擅离职守的干部被命令回来继续工作，而那些离开岗位的工人则被敦促返回其所在工厂。它警告说，无论是谁不执行中央的指示都要受到处罚。由于武汉被当作混乱的典型之一，所以该文件对该市的震动特别大。

在中央指示下达的同一天，武汉有大约30名造反派在谢妙富的领导下袭击了湖北省委办公大楼，袭击者被拘留了。为了表示抗议，谢的一群追随者在7月3日又猛冲省主要领导经常召开重要会议的场所省委第一招待所。在向武汉的人民群众传达中央的7月1日文件时，这两个事件被当成了反面例子。中央通知的贯彻过程要比贯彻中央关于湖北问题的决议时更有效，没有人胆敢反对毛亲自批准的中央正式文件。

在确立了政治生活正常化、停止派别冲突以及集中精力搞经济的势头的同时，文化革命派在中央的影响也被削弱了。在7月中旬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宣称：「她（江青）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而且，他曾告诫过自己的妻子：「你要当心，不要搞四人帮。」毛的讲话挫败了政治局里的「左」派领导人的锐气，但却使那些要重建公共权威的稳健领导人欢欣鼓舞。虽然周恩来因癌症于6月份住进了医院，但邓小平及其他稳健领导人对最高领导层的决策所发挥的影响越来越大。此后，「批林批孔」运动从实际目标转向理论目标。当中央的激进派领导人失去了积极性时，各省的造反派再也无法维持他们的攻击，不得不被迫退让了。

7月13日，「工农兵」举行规模空前的群众大会宣布解散该组织。这是表明「工农兵」正在响应中央号召的一个政治姿态，也是庆祝该团体战胜「革命群众」的一个典礼。「百万雄师」以前在市、区或部门的几乎所有的头头们都参加了主席团，这给观众一个印象，即在事隔6年之后，保守群众组织的复与是轻而易举的。信息很明确：

虽然「工农兵」现在宣布解散，但只要有必要，它随时都可以重新集合起来。事实上，在群众大会之后，虽然保守组织不再以一个实体进行活动，但那些头头们之间的非正式联系网却仍然保留着。

「革命群众」从未正式宣布解散自己，因为它作为一个松散的联盟，从未形成统一的领导。而且，到 7 月底为止，武汉[已基本上遏制住了派性。

在 8 至 9 月份，「团结」成了《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的一系列社论的中心主题。10 月 11 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准备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它公布了毛的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毛的话道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由于对无政府主义和混乱感到厌倦，他们渴望稳定和团结。从此以后，稳定和团结的主题得到强调。

稳定在武汉产生了明显的效果。该市的工业生产总值在：1974 年下半年大幅度上升。据报道，从 7 月到 12 月份，每月总产值分别增加 2.1%、21.1%、11.9%、14.9% 和 5.9%。但由于工业生产在前 6 个月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与前一年相比，该年的总产值实际上下降了 24.3%，这比 1967 年的下降幅度要大得多，只是比 1968 年略好一些。但是，稳定政策的功绩是不能抹煞的。除了零星的小规模派别冲突事件外，该市恢复了正常。到 1974 年底，和全国别的地方一样，武汉的批林批孔连动结束了。

第21章 邓小平的复出与1975年的武汉局势

在群众的派性在各省得到抑制时，精英们的派性却再一次在北京爆发。此时的中心问题是：在「文革」派和稳健派中，到底哪一派会操纵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以及哪一派会在会后控制中央行政机构。好几位元老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政治局九位常委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康生、董必武住进了医院。因此，大会对于毛以后时代的权力分配可能是至关重要的。正因为这样，一场新的权力斗争就无法避免了。

「文革」派尤其希望控制国家行政机器，因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虽然在政治局中起着积极的作用，但在政府机构中没有任何正式职务。更使他们感到焦虑的是，毛已在10月4日暗示，鉴于周恩来身体状况的恶化，他希望让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这个位置不仅会增加邓接替周的机会，可能会使他接毛的班。「文革」派因此把邓看成是他们事业的最大威胁，而且，为了清除这种威胁，他们想方设法贬低邓。

毛对「文革」派为了窃取更多的权力而小题大作很不满，因为这可能会破坏他使中央的两个对立派别保持权力平衡的计划，他认为这种安排会使中国遵循他的远见卓识在平衡跃态中发展，同时也会使两派处于他的控之下。为了挫败「文革」派试图清除其对手的企图，毛建议，邓小平不仅应担任第一副总理，而且还要担任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

1975年1月13日至18日，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终于召开。会议开幕前，已于1月5日确定由邓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而且，在1月8日至10日举行的十届二中全会上已宣布选举邓为党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会议期间，他被正式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邓小平复出后，开始推行他的稳健的现代化纲领。1976年春，他集中精力进行社会经济重建工作。

邓反复强调以下的几个关键政策。

首先，必须反对派性。派性危害经济和社会秩序。邓从处理铁路工作问题的经验中看到，对付闹派性的人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发动群众与他们斗争，而且决不让步。

第二，必须要用纪律进行工业管理，而且要恢复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那时候，工厂纪律松弛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工人不上班，是不是遵守规章制度，都无人

过问。在邓看来，如果不恢复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企业的混乱状况将永远不会改变。

第三，必须采取措施激发人民群众进行经济重建工作的热情。虽然不久前「文革」派还集中攻击「资产阶级法权」，邓仍然坚持认为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并恢复必要的物质刺激。尽管许多人仍然轻蔑地把知识分子叫做「臭老九」，邓却引用毛的话「老九不能走」指出，应当给科技人员及其他知识分子以适当的待遇，或更具体地说，要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使他们能够为社会主义事业集中精力工作。尤为重要的是，邓要求为那些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受到错误打击的人平反，其中包括那些没有被正式戴帽子，但也受到冲击并遭受严重的精神痛苦的人，他建议采取措施尽早使他们放下精神包袱。

第四，必须关心群众的福利。邓要求各级领导把群众的生活问题摆上议事日程。

最后，必须在各级各类单位建立强有力的领导班子。邓认为导致经济衰退和公共秩序混乱的主要原因是许多地方的领导班子「软、懒、散」。因此，他认为要恢复秩序就必须加强从中央到省、市、区、县及基层的各级领导。

1975年5月，在中央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上，这五点重要政策最终形成，第二个月就出现了积极的结果，与以往的产量持续下降的情形相反，武汉、包头、鞍山和太原等国营大型钢铁企业的产量都开始好转。而且，在整个钢铁企业，6月份的日平均钢产量开始超额完成。同时，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速度也正在加快。

在邓小平于1975年初推行新的路线时，武汉仍不太平。虽然该市自1974年7月起已没有发生过武斗，但某些派别团体，(基本上是「革命群众」的「民间组织」)和「工农兵」的「活动小组」仍然存在。在1974年的最后四个月里，他们偶然在街上举行集会，但并未引起骚乱。然而，在1975年初，造反派的「民间组织」采取另外的措施来燃起动乱的火花。在北京召开「四届人大」的同一天，一个自称为「革造民兵」的组织在武汉成立。「革造民兵」是一个由与谢妙富有联系的年轻人组成的不到一百人的组织，据后来指控说，其中三分之二的人曾受过纪律处分，或有连法行为。换句话说，他们大部分都是流氓无赖，聚集在「革造民兵」的旗帜之下只促使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和更具破坏性。

1月15日，即「革造民兵」成立两天后，该组织不顾中央关于「稳定和团结」的号召，在汉口闹市区举行宣誓大会，导致六个月来第一次交通堵塞。1月18日，「四届人大」闭幕。如果这次大会有什么引起了「造反民兵」的注意的话，那不是周恩来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计划，而是大会批准的新宪法所授予的一项民权——罢工。他们肯定准备和愿意利用这个权力。然而，大约在这个时候，一份《中央领导与朱珙霞、张立国、马学礼、杨道安谈话纪要》(后两人在「文革」前是「模范」工人并在以往与「工农兵」有联系)通过官方渠道向当地、居民作了传达。根据这个纪要，

中央领导（没有点名）说，在 1974 年，武汉有些人不批林不批孔，但破坏生产公共秩序，无耻地要官要党票，并冲击省、市领导。他们继续指出，其中某些人必须有所收敛，这显然是指「革造民兵」。当然，「革造民兵」被这个谈话纪要激怒了，他们先是想通过把这次谈话叫做「便谈纪要」来贬低它的重要性。随后，他们又抗议说，不要认真对待「便谈纪要」。然而，他们的抗议被省、市当局宣传该文件的声音所湮没了。

为了使老百姓了解他们的观点，「革造民兵」决定在汉口闹市区建立一个广播站。2 月 13 日，他们突然占领位于城市交叉路口的中南旅社（其地理位置相当于曼哈顿的时代广场），并赶走那里的服务员和客人。他们公然蔑视公安局的警告，架起了八个高音喇叭，并开始广播。在随后的三天多时间里，当地领导徒劳无益地劝说「革造民兵」退出旅馆。2 月 17 日深夜，一批警察奉命前去赶走他们，但他们不仅未能赶走「革造民兵」，反而以与占领者进行肉搏战而告终。由于被警察的干预所激怒，愤怒的「革造民兵」用他们十一天前抢来的坏卡车堵住了旅社前面的交叉路口。汉口的三条干钱之一因此而处于瘫痪状态，并使全市连输系统出现了部分瘫痪。结果，该市的生产和日常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武汉在二月份的工业生产总值与一月份相比下降了 28.7%，只完成了该月生产指标的 66%。

在这十一天里，省、市领导们多次命令「革造民兵」撤去路障，但后者量若罔闻。他们声称，除非省、市领导公开向他们道歉，否则决不撤除路障。而且，他们威胁要堵死连接武汉三镇的汉水大桥。他们认为，一旦城市陷入混乱，就会像 1966 年至 1968 年所发生的情形一样，北京会进行干预，而地方领导可能会被迫向他们妥协。造反派中老谋深算的那帮人和「街道帮」一样对七个月来局势的发展感到不满，但他们一直保持沉默。当然，看到省、市领导处于尴尬处境，他们非常高兴。但对他们来说，卷入这件事是很危险的。所以，他们一般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例如，朱洪霞私下告诉他的朋友：「中南旅社事件是一件好事。不管他们（革造民兵）是否能取胜，我们（造反派的老练帮）必定是胜利者。」他所说的意思是：如果中央迫使当地领导让步，「老练帮」就可以和「街道帮」的造反派一样从中得利；如果中央批评「革造民兵」，那么，这更能衬托出「老练帮」的遵纪守法。

「革造民兵」失算了。2 月 26 日，中央指示湖北省委「严厉处置堵塞汉口重要交通枢纽的肇事者」。由于得到北京的支持，当地领导的态度变得比以前强硬得多。第二天，一份以湖北省委的名义发布的命令要求「革造民兵」立即拆除路障。在随后的日子里，「革造民兵」中的积极分子，包括那些没有直接参与中南旅社事件的人，几乎全部被捕，总共约有 100 名男女被投进监狱，「街道帮」因此被完全摧垮了。

在这个事件后，在武汉看不见派性了。造反派的「老练帮」似乎也失算了。3 月份，曾担任湖北省革委会委员或武汉市革委会委员的朱洪霞、夏邦银、张立国及其他

著名造反派分子被发配到农村。从理论上讲，他们去那里是为了「受锻炼」，这是以往提拔他们的一个前提条件，但也可以以他们未能经受住考验为借口，永远把他们留在那里，不管是什么情况，但就目前而言，由于其头头被发配，而且是被分散在各地，「老练帮」也被击溃了。

也是在那个月中，邓的3月5日讲话和中央《关于改进铁路工作的决定》开始在全国掀起对「资产阶级派性」的猛烈进攻。4月，当邓的亲密战友万里和谷牧三番五次地发表讲话批判顽固的帮派分子和派性的危害时，这场进攻更加猛烈了。中央5日益强硬的反派性立场使许多帮派分子胆颤心惊，甚至使某些人感到绝望，因为他们担心在1969年至1971年期间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可能会重演，即使不会更糟的话。谢妙富最忠实的同谋者之一，因中南旅社事件而和其他许多人被关进监狱的吴XX于4月24日自杀了，以避免将来受更多的苦。

5月，当「四人帮」在北京受到攻击时，谢妙富成了武汉群众批斗的靶子。有关他的「罪行」的证据被编印和散发到各单位。他被说成是该市派性的化身。6月，谢被判处7年徒刑，而且，他在「革造民兵」中的许多同伙被判处5年徒刑到「一年劳改」。审判都采取公审的形式，而且每个单位都被要求派人参加公审大会。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地方领导要使他们的下属们知道，那些胆敢否定权威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

批判派性在6月份发展成广泛的群众运动，并在随后的三个月里达到颠峰状态。自1973年后期以来多少有些懒散的湖北省委和武汉军区党委重又变得敏捷、果断和高效了。有战斗力的地方领导使批判派性能够按照全面、深刻和有秩序的方式发展，从6月到9月的四个月时间里，动员了所有的宣传手段！「围剿」派性。《长江日报》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驳斥据说是帮派分子所信奉的谬论，如：「不为错误路钱而生产」和「只要矛头对上，大方向不会错」。帮派分子大吵大闹要官要党票的行为也受到了批判。他们被描绘成一群野心家。据称，批判派性运动的目的在于创造一个再也无法滋生派性的环境。

1975年的反派性运动在规模和方式上都与1969年至1971年的运动有很大区别。的确如此，谢妙富等极具破坏性的造反派分子被关进了监狱；而朱洪霞等有影响的造反派头头被发配外地；但这场运动并未转变成反对每一个造反积极分子的「大清洗」。没有派出特殊的调查组去控告基层「革命群众」，也很少开批判大会斗争他们。当然，那些在1974年重新跳出来的造反派多多少少觉得提心吊胆，但他们一般都不像害怕清查「五·一六」和「北、决、扬」运动那样害怕目前的反派性运动。他们焦虑的心情甚至可能得到宽慰，因为邓小平在发动反派性连动时曾说过：在揭发「五·一六分子」运动中造成的错案必须立即纠正。

到1975年夏季，武汉也和全国各地一样，「事情」正如邓小平预期地那样大部分

已「进入正规」了。由于生活转入正常，经济开始好转。例如，武汉的工业生产不再下降。相反，在 3 月至 11 月间，它每月以 11%到 17%的速度增长。

更重要的是，在邓的新政策下，团结正在形成，除了邓的天然同盟者——保守派群众和党政干部外，许多前造反派分子也被包括在内。例如，由于「文革」派的敌视而脱离中央「文革」派的知识分子造反派高兴地听说邓高度评价了他们的作用。由于全国工资长期以来一直冻结，那些主要因经济原因而起造上级的反的前造反派分子现在终于认识到邓在讲话中所包含的真理：动乱会破坏全国经济，而经济的持续下降又会减少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可能性。邓强调必须更加关心群众生活的话，实际上是他们长期以来希望从北京听到的。那些拥护新风气、新思潮的人也发现，在他们与邓为首的中央稳健派领导人之间有共同基础。例如，他们都不赞同「文革」派的绝对平均主义，并相信，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遵循「按劳分配」的原则。甚至那些试图为自己在 1969 年至 1971 年所受的冤屈翻案而在 1974 年重新起来造反的人，尤其是那些没有政治野心的人发现，邓是通情达理的，因为他对因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或其他罪名而受迫害的无辜者表示同情，并且，为了给中国社会带来稳定和团结，邓把他们平反看成和反派性一样重要的任务。而且，在邓的指导下，目前的反派性运动的目标很有限，这就使那些在 1974 年曾参加过派别活动的大多数人免遭伤害。

由于已经经历过 1973 年至 1975 年的政治曲折，比「文革」开始以来任何时候都要多的人赞成稳健派中央领导人的稳健政策。尽管在许多问题上还有分歧，但他们都希望邓的新路线能保持下去，在不久的将来把中国建成一个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技术进步的国家。

第 22 章 「文化大革命」的最后篇章

文化革命派的反击与武汉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5 年后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和康生等人因健康状况愈益恶化而越来越力不从心了。稳健派和「文革」派都知道，一决雌雄的时刻正在逼近，而且，谁在决战中占了上风，谁就会在毛泽东以后的时代以胜利者的面目出现。因此，对「文革」派而言，抓住每一个机会对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似乎越来越得势的稳健派进行反击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机会很快就来了。8 月 13 日，毛在与北大中文系的一位年青教师讨论《水浒》时，一改长期以来对该书的偏爱之情，说它应被当成反面教材，说《水浒》「好就好在投降」。毛在重评《水浒》时，把宋江说成是钻进起义军中，但又为自己的升官发财而投降朝廷、破坏起义队伍的叛徒。第二天，姚文元在收到谈话纪要后，立即给毛写信，断言毛对《水浒》的重新评债「对于在本世纪和下一个世纪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而且，他建议在中国的舆论界发动一场批《水浒》运动。8 月 15 日，毛批准了姚的建议。毛的谈话和姚的信随后被传达到各省。

此后，中央和地方的报刊杂志都发表文章批《水浒》。批《水浒》和「投降主义」与其说是对稳健派的警告，不如说是吹响了号召进行一场消灭他们的战斗号角。

碰巧的是，一直与江青关系密切的毛的侄子毛远新在 9 月份取代王海蓉和唐闻生，成了毛的联络官。

从上升之日起，毛远新就设法劝说他的伯伯除掉邓小平。为了激起毛对邓的反感，毛远新使他伯伯对邓送上来的两封信加以注意。这两封信的作者是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刘冰及其三位同事，他们在信中抱怨锐，随着「文革」而出现的改革导致了学术水平的降低，并向毛报告了像太上皇一样在清华作威作福的迟群和谢静宜的不法行为。正如预期的那样，这封信引起了毛的雷霆之怒。他不容许攻击他最后的伟大事业——「文革」，也不容许对他的两位门徒——迟群和谢静宜说三道四。毛远新的煽动性评论使毛确信「刘冰不只是一要打倒迟和谢，事实上，你才是他们的真正目标。」毛由此得出结论：这个事件不是孤立的，而是两个阶级和两条路钱斗争的继续。

1975 年 11 月 3 日，毛关于刘冰来信的谈话被传达到清华大学的师生之中。该校就这个事件展开了「辩论」。与此同时，按照毛的建议，政治局开会批判邓小平推翻「文化大革命」改革措施的错误。结果，邓被剥夺了权力。11 月下旬，政治局召开

「吹风会」。会上，北京和各省的党、政、军高级干部被告知：毛决定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

在随后一个月里，教育战线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面铺开。

1976年2月中旬，政治局把29个省、市、自治区的军政领导人召到北京参加第二次「吹风会」。一本由毛远新编辑而成的毛泽东批邓言论集被分发给与会者。根据这个文件，毛曾指出：「邓小平不懂马列主义。他代表资产阶级。」如果说与会者以前还不太理解毛对邓的态度，那么，毛的谈话消除了他们的疑虑。

华国锋主持了这次会议，他在2月25日的讲话中宣布「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是「当前的主要任务」。显然，不让邓东山再起也符合华的利益。

然而，到3月份为止，批邓运动没有在各省引起多大的反响。只有极少数人响应中央发出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斗号召。大多数人觉得政治空气非常压抑。邓的务实纲领在1974年至1975年所带来的稳定与「文革」派激进政策在1966年至1968年和1973年所造成的动乱之间的对比如此明显，以致许多前造反派分子现在似乎也拥护邓。人们普遍担心，「文革」派对邓的攻击会重新把中国推向动乱的深渊。干部们普遍处于焦虑状态。新近流行的说法「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使他们非常紧张，他们记忆犹新的是：在「文革」的头三年中，他们被戴上了「走资派」的帽子，并因此而吃尽了苦头，他们担心这个悲剧又会重演。有些人决定申请提前退休，而另外一些人则表面上拥护这场运动，但实际上也只是附和官方新闻媒介上的胡言乱语。

那些把自己的前途寄托在「文革」派最终战胜稳健派的人可能是北京的激进派领导人在「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所依靠的唯一力量。这些人主要是过去的造反派头头，他们只占居民的很小一部分。他们的信徒或是改变了信仰，或是变得对政治漠不关心。在任何情况下，中央「文革」派过去的走狗们在群众中几乎得不到任何支持。甚至对那些残存的走狗们而言，他们之所以渴望重新起来造反，并非由于他们对中央的激进派们有什么好感，而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命运完全依赖于江青、张春桥等北京的某位要人得势的基础上。武汉造反派的智囊胡厚民指出：「我们的脸上已经打上了造反派的烙印。不管我们干什么，别人都把我们看成造反派，并这样对待我们。或是在战斗中得胜或是被打死，我们没有第三种选择。」由于别无选择，他们唯有抱着成功的希望不断地斗下去。为了增加成功的机会，对他们而言，采取一致行动支持北京的「文革」派就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他们不可能不认识到目前在「文革」派和稳健派之间进行的上层斗争是一场最后的决战，而且如果「文革」派失败的话，那他们也会被不可挽回地赶出政治舞台。由于这些原因，尽管他们的群众基础日益削弱，但在「文革」派发出了战斗号召时，那些死心塌地的造反派分子仍然准备与他们在当地的敌人战斗到底。

1976年2月，由于意识到政治风向正在发生变化，已于1975年3月成为公社干

部的朱琪霞、夏邦银和张立国等人从农村返回武汉。他们回城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集合被打散的造反派。为此目的，召开了一系列秘密会议。据报道说，夏邦银在一次会上保证他将「要脱了膀子斗」。张立国似乎更直截了当，他说：

「这一次我们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要么赢尽，要么输光，捞到了就做大官，捞不到就坐大牢。」

在作好准备后，曾在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任职的十七名著名造反派分子于2月23日发表了致湖北省委和武汉军区党委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批评说，在武汉市，上自省委，下至基层党委，都没有执行中央的「战略部署」，没有紧跟目前的形势，没有跟上人民群众前进的步伐。它指责说，尤为严重的是，在各级领导干部中，有一批人认为别人在「文革」的前三年对他们的批判是错误的，并时刻伺机报复。那些干部被说成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其五个特点是：他们独断专行、反动透顶、贪得无厌、顽固不化和狂妄自大。这封信要求把「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赶出历史舞台。

公开信发表后不久，成立了一个由六男一女组成的「核心小组」。这个组织被确定为该市的造反派势力的领导核心。此外，还打算在市政机构的各局及武汉各区建立分支机构。他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复杂的网络能够建立一个有渗透性的指挥系统，而「核心」可以通过这个系统来向现存的行政机构挑战。

当核心正在武汉形成的时候，董明会作为武汉市委书记之一，正在北京出席第二次「吹风会」。3月2日，江青和王洪文接见湖北等12个省的军政要人。当江问董他作为前造反派分子，是不是觉得在武汉受压迫的时候，董作了肯定的回答。江青利用董的证言，斥责湖北省委第一书记赵辛初和武汉军区司令杨得志虐待造反派，并要他们保证回武汉后向造反派赔礼道歉。王洪文质问赵和杨，为什么湖北当局不经中央同意就在1975年把夏邦银、朱洪霞和张立国发配到农村去。他总结说，他们之所以能做这些坏事，是因为「湖北领导班子的构成没有体现「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就」。

江、王批评省主要领导的消息很快传到武汉。可能并非偶然的是：该市著名的造反派分子仅仅在第二天就发表了第二封公开信，敦促省、市领导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放弃邓小平的政策，转而支持造反派势力。为了向地方领导施加更大压力，一群造反派在朱洪霞和吴焱金的带领下两次冲进湖北省委于3月9日至11日召开常委会的会场。而与此同时，出席会议的夏邦银则从内部积极配合造反派的冲击。3月19日，这群人又冲进湖北省委和省革委会的办公厅和组织部的办公大楼。在场的几位领导干部被打。第二天，这帮人强行占领省革委会第一招待所，并向省、市领导发出最后通牒，声称如果当局不作重大让步，他们将采取更猛烈的行动。

用胡厚民的话来说，要害问题就是权力。他声称，「从政治上续：「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从组织上而言，这个连动远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现在必须解决组织问题。」夏邦银则更为直率。他说：「是的，我们正想方设法夺权。为什

么不？如果我们手中有权，世上还有谁敢对我们说半个「不」字？」。因此，「核心小组」制订了一个计划，要使从省到基层的现存的权力分配模式革命化，其重点放在上层。根据这个计划，八名造反派应被安排进湖北省委常委，而且其中四人要被任命为省委书记。虽然省工会委员会已有 111 名委员，「核心小组」仍建议在其中增加 120 名造反派分子，并提出具体的候选人名单。而且，它还要求安排九名以上的造反派分子担任该委员会各部门的副职。团省委是造反派试图控制的另一个机构，它建议，除造反派已担任的一名书记和六名副书记外，还要安排七名造反派担任副书记。非常可笑的是，造反派推荐的七名候选人中有四个人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而且！年龄偏大，没有重新入团的资格。

造反派向市级机关提出了类似要求，而且，造反派头头提出的个人要求还不包括在内。例如，湖北省委常委每次开会，夏邦银都要求「老朽」们安排他当省委书记。董明会虽然已是武汉市委书记之一，但仍梦想登上省委书记的宝座。张立国认为自己十分老练，而且，他显然与其他著名造反派分子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他和他的更为厚颜无耻的同伙们一样对权力充满了强烈的贪欲。唯一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最好是在会议上向「老朽」们讨价还价，而其他则采取直接向当局施加压力。他在会议上要求的也是要担任省委的一名书记。朱洪霞的情况则更有趣，他不是党员，却想成为湖北省委的书记之一。根据党章规定，入党必须得到本人所在工作单位的党支部的批准。朱知道自己不可能有机会得到这种批准，为了越过组织原则，他直接给王洪文写信，要求王亲自批准他人党。他认为，如果党籍问题解决了，他想成为省委常委和省委书记之一的梦想就会实现。而且，他对自己的梦想充满信心。

仿效那些著名造反派头头的做法，那些名气小一些的造反派头头也在下级各部门要官要职。总而言之，造反派的要求，不管是集体的还是个别的，是在上层还是在基层，都对现存的权威们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如果满足了这些要求，那么，可以想像不久「干部」们会相形见绌，而且整个行政机构的根基都会被动摇。

然而，尽管他们虚张声势，但造反派势力实际上是外强中干。在 1976 年春，武汉顶多只一、两千造反派分子仍在积极活动。造反派队伍中最为凶残的分子，如谢妙富及其同伙们还在监狱里“虽然有人呼笼释放那些罪行累累的派性斗士，但应者寥寥无几。而且，即使他们出狱的话，也不一定会投入新的造反，因为他们那些在 1974 年重新起来造反且没有坐牢的同伙们现在也对政治感到厌倦了。虽然在主要街道的墙上还刷着标语，且偶尔在这里或那里开群众大会，但很少有人注意这一切，这与 1974 年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不要说与 1966 年至 1968 年的形势相比了。在许多单位，包括那些曾经以造反派堡垒著称的单位，造反积极分子并没有卷土重来，甚至那些昔日的造反派头头也倾向于退出此时的派别活动。

造反派夺权的最后一搏

然而，即使「四人帮」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但他们在各省仍不乏忠实信徒。但与广大敢怒不敢言的群众相比，那些走狗们只占少数，至少在武汉是如此。

早在 1976 年 3 月，该市的造反积极分子就已认识到，周恩来正在形成一面旗帜，所有反对文化革命派及其激进政策的势力都将聚集在这面旗帜之下。3 月 5 日，由激进派编委会主演的《长江日报》在重印新华社重要报道时，也和上海的《文汇报》一样，故意删去了其中的周恩来的题词。对已故总理的昭然若揭的侮辱激起了公众的义愤。许多人到编辑部表示抗议。这对当地的造反积极分子而言似乎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夏邦银立即打电话给王洪文，向他报告了这个「反革命事件」。

中央在 4 月 7 日对「天安门事件」的谴责使大多数人民群众痛心疾首，却使基层的文化革命派拍手称快。由于省当局在清明节前后没有阻止武汉的游行，所以，他们认为这是迫使当权派中的「老朽」们作出更大让步的绝好机会。

4 月 8 日，湖北省委勉强地召开群众大会，表示拥护中央政治局的 4 月 7 日决议，并谴责天安门事件。大会结束前，以朱洪霞、吴焱金为首的一帮人冲进会场并绑架了几位省主要领导。这几位领导被带到造反派在汉口闹市区举行的另一个群众大会上，并迫使他们公开表示，他们将作出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与在「文化大革命」中崛起的新生力量站在一起。然而，令造反派吃惊的是，中央在第二天批评了这种作法。造反派头头通过他们的信息渠道不久得知，他们之所以受批评，并非因为他们的要求不恰当，而是因为他们的斗争形式与中央的文化革命派所主张的斗争战略相左。文化革命派所主张的战略是「内紧外松」，那就是要在不断向地方领导施加压力的同时又要设法避免扰乱公共秩序。之所以会采取这种新的策略的原因在于：文化革命派从过去的经验中得知，一旦激进运动使国家处于动乱之中，就会不得不让稳健派领导人出来收拾混乱的局面，而这无疑会加强稳健派的权力地位并损害激进派的声望。他们期望这个新战略会带来他们所认为的积极后果，而避免消极后果。

1975 年 4 月中旬，武汉的造反派头头开始采取「内紧外松」的策略。因此，进行了某些调整。首先，决定让该省的两位中央委员——夏邦银和谢望春退到幕后，而由朱洪霞及「核心小组」的其他成员充当造反势力的总指挥。其次，建议造反派尽可能避免以派别斗士的面目露面。用吴焱金的话说就是「我们现在不需要为自己的力量拉大旗，也不需要树招牌」。第三，自 1976 年 2 月以来在汉口闹市区定期刊出的由「核心小组」直接控制的墙报停刊。墙报写作小组的成员被劝说向《长江日报》投稿。

从 4 月中旬到 5 月下旬，他们利用中央号召追查政治谣言的机会发动了对省、市政府及其他敌对势力的一场新进攻。4 月，他们断言武汉的清明节活动是与天安门事

件相似的反革命事件，并进而要求当局采取行动逮捕那些曾参加过活动的人，尤其是「寒城牛」被说成从幕后策划整个活动的「阴谋团体」。这种指责的目的在于沉重打击保守势力在该市的骨干分子，因为人人都知道，「寒城牛」与「百万雄师」以前的头头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证实他们的指控，在夏邦银的指使下，收集了反对「寒城牛」的「证据」，并最终送给了中央当局。5月，造反派转而追查惩处那些传播政治谣言的人。尽管在两个月内，省、市当局召开了一个又一个的群众大会，以表明他们愿意贯彻北京的指示，但造反派仍不断指责他们这样做完全是假心假意的。5月底发表的一封致湖北省委的公开信指出，「寒城牛」的成员一个也未被捕，只有少数几个被怀疑曾传播政治谣言的人被关押起来了。这句话的含意非常清楚：某些当权者正在设法包庇「反革命分子」。那时候，中央的宣传集中了指控邓小平曾幕后操纵「天安门暴乱」，而造反派的目的显然要用类似的指控打倒那些敌对的地方领导，那就是要把他们说成是导演武汉事件的「后台老板」。

面对来自北京和武汉的愈来愈大的压力，省、市当局不得不在5月下旬对当地造反派作出让步：正式任命胡厚民及其他四名造反派担任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的专职委员，因此而成为脱产干部。对当局而言，这是一个重大的让步，因为让这五个人担任这两个权力机构的专职干部不仅意味着他们的社会地位会由体力劳动者上升到高级干部，而且还意味着会大大增加造反派在决策层的发言机会。但对造反派而言，这仅仅是第一个胜利，他们要继续干下去。胡厚民告诉他的同伙说，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要设法让更多的造反派担任湖北省委和武汉5市委的专职委员，成为真正的领导核心。而且，他声称：

先省市，后地县，上面仿个样子，下面照着办。要由五个到五百五千到五万。

重要的是，大约在那时候，武汉的造反派得到了王洪文的新的鼓励6月初，湖北省的主要领导被召到北京接见。在指出湖北在把造反派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的问题上落在各省后面之后，王洪文严厉地批评了那些省级主要领导，敦促他们进行彻底检讨，并在造反派问题上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6月19日，湖北省委书记赵辛初勉强代表省委作了检讨，但造反派对此并不满意。他们谴责它是「唯心主义的再评价」「空头支票」和「假心假意的检讨」。王洪文亲自干预武汉问题使造反派大受鼓舞，他们确信，迫使当权者作更多更大让步的时机到了。七人「核心小组」协商并制定了一个十六字战略：「上下夹击、软硬兼施、脚踏实地、独立自主」。此后，这句话成了造反派的行动指南。

在省、市两级，造反派根据唐歧山的建议提出了四点要求：1.湖北的所有中央委员必须被任命为省委书记。这显然是指夏邦银、董明会、谢望春等人。2.另外一大批造反派必须被安置到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中去，或是担任书记，或是担任常委。3.省委和市委下属的组织部、宣传部、办公厅必须由造反派负责。4.省委和市委中的工作

人员必须包括很大一部分造反派分子。

为了实现那些要求，造反派在对付省、市主要领导时的确采取了软硬兼施的策略。一方面，为了迫使那些当权者把他们当作权力机构的「新鲜血液」加以接受，他们反复警告说，那些歧视「在文革中崛起的新生力量」的人决不会有好下场。另一方面，又大肆宣扬所谓「上海经验」，据说，上海的大批老干部自愿提前退休，这样一来，他们现在生活得非常安逸和舒适。当地的老干部也被鼓励去效法这种作法。他们得到保证说，只要他们给「新干部」职位，造反派再也不找他们的麻烦了。

在基层，造反派的行动要比他们在省、市一级的同伙们激进多了。七人「核心小组」确信，为了迫使省、市当权派屈服，必须颠覆现存权力机构的根基。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聚集了足够多的造反派力量，他们就会被鼓励去夺权，而不是仅仅与「老朽」分享权力。从6月份起，在三十一个大中型企业积十四个行政局中，造反派宣布恢复「真正」的革委会，这意味着要恢复在1968年和1968年前曾存在过很短时间的由造反派控制的革委会。目前的革委会被宣布为「非法的」，因为，据说其中几乎没有包括「在文革中崛起的新生力量」。因此，在上述单位中出现了两个革委会，它们都声称自己是本单位的唯一权威。结果，那些单位的生产即使没有完全停止的话，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在其他许多单位里，虽然造反派没有强大到足以恢复所谓「真正」革委会的地步，但他们也进行了一些独立的对抗性活动，并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现存的权威。

无一例外的是，在造反派试图夺权的所有地方，他们的行动都受到了抵制。1976年夏，武汉的造反派和他们在其他地方的同伙一样，发现自己所处的形势是：被允诺了一个大好的成功机会，但与此同时，可能又会大大地加深危机。在中央文革派领导人表面上大权在握，并花费更多的气力来把更多的造反派安插到各级领导岗位。那些仍很积极的造反派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登上官位只是时间问题，或高或低的问题。但造反派同时也很沮丧，因为绝大多数的人仇恨他们，或者至少对他们冷淡。不仅省、市的领导干部忌恨他们，而且下级的干部也对他们不满。在群众中，甚至他们以前的战友中有很大部分(更不用提以前的保守派分子了)人对他们现在的行为也侧目而视。据说一个造反派分子曾悲叹：「现在至少有80%的人是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社会基础。」

由于迷恋于权力，那些顽抗到底的造反派试图把自己的前途寄托在中央的「文革」派得势的基础上，尽管人民群众越来越不支持他们。而且，他们打算把所有拒绝与他们同流合污的人（不管是不是干部）都当成他们权力道路上的绊脚石。那时候，邓小平正被当成所谓「资产阶级还乡团的头子」而受到中央的宣传机器的批判。武汉的造反积极分子利用这个漫骂邓的比喻别有用心地说：「还乡团」除了有「团长」外，肯定还有营长、连长、排长、班长和小喽罗。这种办法使他们对任何人的进攻都变得合

理合法了。事实上，在许多单位中，造反派开始从广大的干部和职工中清查「邓小平的还乡团」的「团员」。有些造反派甚至警告那些被指控的人：一旦他们在全国掌权，他们就要向他们的对手施行张春桥所说的「全面专政」。更具体地说，他们威胁道，为了征服敌人，他们可能需要杀一批、辟一批、清查一批、下放一批，并给一批人戴上走资派或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甚至那些已不问政治的前造反派头头也受到了威胁。他们被告知说，他们若不重新投入战斗，那么在造反派取得最后胜利后，他们会被作为「投降主义者」而受到惩罚。

造反派对不合作者的攻击和威胁确实吓住了不少人，但也激怒了更多的人。在6月中旬，保守派势力重新聚集起来了，这时候他们所打的旗号是「革命工人」，基本上由曾在1974年至1975年积极活动过的「工农兵」的原班人马组成。有趣的是，「革命工人」对省、市当局的抨击丝毫不弱于造反派。造反派抱怨各级当权者极为顽固地阻挠造反派进入领导岗位，而「革命工人」则指责他们对「蒯大富、聂元梓之类的人（造反派的另一个说法）过于顺从」。「革命工人」的目标就是要阻止当权者向他们的对手让步。为了显示他们对该市事态的影响并向省、市的当权者施加压力，他们鼓励甚至举行广泛的怠工，尤其是造反派已提出了领导权要求的那些工厂更是如。结果，该市的生产在夏季出现了持续下降。

「革命工人」的另一个攻击目标是《长江日报》。他们指责该报「完全是一份派别传单」。的确是这样，自造反派的「核心小组」在4月中旬决定他们在大街小巷的墙报停刊以来，《长江日报》名义上是武汉市委的官方喉舌，而事实上却成了造反派宣传他们观点的重要工具。一大批著名的造反派分子，像夏邦银和朱洪霞等人都在该报发表过文章。而且，据说还有更多的类似文章正在起草过程中，但保守派却得不到这种特权。为了表示抗议，一群「革命工人」于6月26日冲进该报办公室并在那里贴了许多标语，要求武汉市委立即改组该报编辑部。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对该报控制权的武汉市委当然毫无异议，相反，他们暗地里希望这个事件会给那些激进的编辑们施加足够的压力，使他们对自己的激进腔调有所收敛。这就是它为什么会非常超然地声称「工、农、兵评报是一件新事物」的原因。

在政治斗争方面似乎更为老练的造反派发现，可以利用这个事件来反击保守的「革命工人」和当权者们。6月27日凌晨，夏邦银打电话向王洪文报告了《长江日报》事件。他把「革命工人」对该报的攻击说成是两个月前在北京和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的继续。他指控说，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内的「一小搓走资派」操纵了这个事件。与此同时，造反派头头正举行一个秘密会议，会上决定该报暂时停刊，以引起中央注意这个事件。在6月27日至30日的这四天中，该报完全停刊，尽管省、市领导试图阻止发生这种事。正如造反派所预期的那样，中央最终进行了干预。结果，「革命工人」中的五名积极分子被拘留，并被关押了15天。更重要的是，省、市行

政机关的威信进一步被削弱了，这个事件最终以造反派大获全胜而告终。

在 1976 年 7 月和 8 月，武汉的造反派变得更加盛气凌人。《长江日报》索性脱下了假装在派别冲突中保持中立的外衣。7 月 22 日，为了纪念 1967 年的「武汉事件」发生九周年，该报用了整整四个版面重新发表出自造反派手笔并在 1967 年曾一度流行的一打「战斗诗篇」。由于它们是带挑衅性的，所以那些诗再次激起了保守派群众对该报及广大造反派的强烈愤慨。随后，全市出现了抗议该报派性的大字报。然而，《长江日报》完全无视广大群众的愤慨，它在 8 月份甚至刊登了许多由胡厚民等造反派头头撰写的更富挑衅性的文章。

与此同时，造反派加紧迫使省、市当局给他们更多的权力。据事后报道说，为了探讨在全省，尤其是在该市夺权的可能性，造反派头头在 7 月份举行了两次聚会。据猜测，在会议上，足智多谋的造反派战略家胡厚民提出了一个初步的计划，该计划得到了与会者的同意并成为造反派的行动纲领。然后，在湖北省委于 7、8 月份在襄樊和应山（位于鄂西北的两个县。会议在此举行是为了避免武汉造反派的冲击）召开的两个会议上，参加这个会议的造反派头头试图把这个纲领付诸行动。这两个会议原本是打算处理有关工业生产的问题，但夏邦银、董明会、朱洪霞及其他与会的造反派不断提出重新分配权力的问题。他们抗议道，造反派在这两个会议上的代表人数都不够。他们进一步抱怨说，到那时为止，造反派在所有权力机构中的代表人数远远少于它应有的数目。湖北省委被敦促在提拔更多的造反派到领导岗位上来的问题上带个头，以便为各级老干部树立榜样。看来，造反派真正迈上了权力之路。

尾声

1976 年 9 月 9 日，在一种不安和反复无常的气氛中，毛泽东溘然长逝了。几乎与此同时，中央领导层的各派之间随即就发生了小规模冲突。当然，冲突的根本原因是接班问题。

「四人帮」是最高领导权的最肆无忌惮的竞争者。在毛逝世后的悲恸日子里，「四人帮」的直接对手是华国锋。作为中央机关的后起之秀。自从他于 1976 年 4 月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后，他被文化革命派和稳健派看成是多余的「黑马」。现在，「四人帮」觉得该除掉他了。

然而，早在毛逝世以前，许多稳健派领导人已经开始考虑采用「非常手段」清除他们的激进派对手。在毛逝世前后，正当「四人帮」阴谋策划利用手中掌握一切力量发动武装政变登上毛的宝座时，一个类似的秘密计划也在酝酿中。

由于意识到「四人帮」掌权将会对自己的政治生命构成威胁，华国锋与忧国忧民

的稳健派联合起来。10月6日，北京发生了一场政变。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毛远新被捕了。在中国政治舞台肆意横行了十年之久的激进派小集团终于魂归西天了。

尽管在政变之后，北京不愿立即公布逮捕「四人帮」的消息，但它不久之后就传到了武汉。突然之间，武汉的大街小巷贴满了批判「四人帮」的标语。既不敢激动也不能伤感的感情压抑的人们现在终于解放了，并迸发出火山般的愤怒。在整个10月里，武汉和全国各地一样，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为了表达他们的欢乐之情，许多人举行集会庆祝中央的「文革」派的垮台。由于需求量突然增加，啤酒、葡萄酒、白酒很快脱销。人民群众已经有十年没有这样高兴过了。

但是，也有极少数人因稳健派的胜利而变得垂头丧气。直到10月8日，武汉的造反派（虽然数量很少）还春风得意。现在，由于他们的庇护者的垮台，他们掌握省、市权力的梦想也落空了。

那些造反派为「四人帮」，也为他们自己遗憾不已。他们觉得，如果「四人帮」抢先一步发动政变，中国的政治局面就会截然不同。但令人悲伤的事实是：失败已成定局了。虽然有极少数人计划上山打游击，但大多数人认为这不现实。胡厚民建议装出支持新政府的样子，在他看来，造反派比那些掌权的「老朽」们有年龄优势。「让我们与那些老朽们比一比，看谁会在二十年内取得最后的胜利。」他们许多同伙们也设法以此自慰。

但是，他们在这个时候却不得不准备受苦。11月初，朱洪霞、夏邦银、胡厚民和造反派的其他主要头目被命令参加「学习班」。从12月份起，作为一场新的全国范围的反对「四人帮在各省爪牙」的运动的一部分，他们也和其他省的同伙们一样，开始接受群众的批判。群众的批判持续了一年，在些期间，举行了许多批判大会斗争他们，而且，当地的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批判据说是他们在过去十年中所犯的「罪行」。大约在1977年底，夏邦银、朱洪霞、胡厚民、张立国、董明会、李湘玉、吴焱金及数十名名气稍小的造反派头头「正式」被捕，虽然到那时候为止，他们未经任何正式程序就已被关押了一年多。后来，他们分别被判处二至十五年徒刑。

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在向党的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宣布：「「四人帮」的垮台标志着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的确，对那些会逐渐使「文革」以前的状况恢复起来的老干部和保守派群众而言，「文革」是结束了。但对那些因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而不得不在铁窗中度日的人而言，这场运动远远没有结束。

第 23 章 结论

在 1966 年到 1976 年这十年间，中国人民经常听到的是：「文化大革命」正在从胜利走向胜利，然而，前面的章节展现了与此完全不同的图景。回顾这场运动，可以说它似乎一直是在一个又一个的危机中蹒跚而行的。「文化大革命」的前两年多（1966—1968），中国一直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发动这场运动的毛和他的亲密战友都无法控制它，甚至在这段无秩序的时期过后，毛领导下的政治进程也不断地发生「偏向」，从而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危机、停滞不前、挫折和社会变革。终于在 1976 年，毛的尸骨未寒，中央所有的文化革命派便被一举粉碎。在随后的几年间，毛的政治路线几乎遭到了完全的背离。毫不夸张地说，文化革命惨重地失败了。

那么，为什么由大家公认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所指导的这场运动最终会成为他的一个污点呢？这正是结论部分所要研究的问题，在后面的几节中就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并进一步弄清前面章节中所引用的那些试图对超凡魅力关系作出某些经验主义概括的材料的真正含义。

「真正的信徒」还是「理性行动者」？

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献中，尽管高层的精英们一直被描绘成为专为自己打算的或诡计多端的人，但这场运动本身则常常被描述成为一种社会的反常状态盛行的运动，好像其他所有的人都是毫无理性的毛的追随者，他们只是被作为一种充满了盲目狂躁情绪的工具。然而，一个人是不是一个盲目的虔诚的信徒并不取决他自认为是一个什么人或他相信自己是一个什么人。相反，一个人的行为会暴露出他的真面目。个人公开宣称忠诚于某一种思想或某一个领袖并不足以证明他是一个真正的信徒。只有认真分析这个人本人的主张，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行为，才有助于我们确定他的声明是否与他本人的主张一致，是否反映了他的真实愿望。

一旦群众被指定为真正的信徒，正如毛中心论所主张的，就会极度轻视社会上那些非真正的信徒的重要作用，就会错误地把全体居民等同于真正的信徒。当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每一个人都想成为毛的真正的信徒，这是事实。然而，我们不应被这种表面现象所迷惑。我的访问记录表明，尽管绝大多数的追随者真正相信毛的与生俱来的天才并一心一意地追随他，但有些人则是由于怕连背他的指示会受到惩罚才响应他的号召的。还有一些人既没有被毛个人的神秘性所迷惑，也不怕受惩罚，他们之所以追随毛是由于他们看到他的地位、权力和指示对他们职位的升迁极为有利。显

然，后两种类型的人仅仅是自称的追随者，他们几乎不能被称为真正的信徒。

不过，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毛的真正的信徒。他们完全是心甘情愿地跟随毛，毛指到哪他们就跟到那里。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在文革中扮演的是毫无理性的行动者这样的角色呢？其实不然。前面的章节已经表明，对代价和利益的精打细算自始至终充斥着「文化大革命」的方方面面。广大人民群众似乎也都是理性的行动者。我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是有充分根据的。

决定参加 人们一般都认为，所有中国人一听到毛的号召便毫不犹豫地投入到这场运动当中，事实并非如此，成年的中国人最初都是小心翼翼地决定参加这场运动的。他们通过过去历次的政治运动认识到，胆敢向权威挑战的人决没有好下场，因而他们很难克服那种惧怕独自亮明自己观点的心理。这就是为什么由那些政治上幼稚的学生首先采取自发行动的原因。

成立群众组织 在自发的群众组织形成的过程中，出现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现象，这并不偶然。造反组织的成员主要来自对现存权力机构心怀不满的社会集团，而保守派则主要是那些竭力想维持现状的既得利益者。二者的攻击目标也截然不同，造反派一般都不注意非党的管理人员和专家，他们的矛头直指他们所属企业的党的领导核心。而保守派则是攻击职能部门的干部，尤其是那些有阶级背景和个人历史问题的干部。如果他们所批判的党的官员一直是他们的恩主，那么他们的批判一般都比较温和，这一分歧是文化革命前社会斗争的必然结果。

即使那些旁观者在一边旁观也有其充分的理由。对有些人，诸如带着「坏」阶级标签的人来说，在派别斗争中站在鲜明的立场上是危险的；而对另外一些人，如走中间道路的工人来说，他们并不指望从这种表面上毫无原则的混乱中得到什么。人们常说，「文化大革命」期间主要有两个派别——激进派和保守派。这样，就忽视了一大批人，也就是所谓的逍遥派。我认为逍遥派由两种人组成：一种是不参加任何组织，另一种是即使他们是某一组织的正式成员也漠不关心他们组织的事情。在许多单位中，他们约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逍遥派的人数也越来越多。清华大学的井冈山是当时全国最著名的红卫兵组织之一，华中工学院的新华工是武汉最有影响的红卫兵组织之一。纵观它们当时出版的报纸就会发现，从 1967 年年初开始，逍遥派便成为这两个组织中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到 1968 年夏，据说清华大学的井冈山组织只有不到三百个积极分子。如果这一情况属实，那么在其它组织中逍遥派所占的比例还会更大。这种状况是如此突出，就连毛本人也不得不对此感到担忧。

行为方式 由于造反派和保守派各自的立场不同，二者的行为方式也完全不同。作为各单位中的大多数，造反派主张积极参加本单位之外的活动，例如由许多单位组成的全市性的组织是他们与本单位内的保守派进行日常斗争的力量源泉。与造反派相

反，保守派则认为应在各自单位内部反击他们的敌人，因为在那里，他们不仅是多数，而且有足够力量使敌人屈服。

团结的程度 奥尔森认为，只有当人们受到「选择刺激」时才会采取集体行动。这样说也许有些牵强附会，但「选择刺激」这一概念有助于估价「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同的群众组织中团结的程度。造反派组织一般比他们的对手保守派更为团结，这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造反派追求的是社会地位和社会承认，按照奥尔森的理论，这是非集体利益和「选择刺激」。第二，造反派，或用蒂里的术语「挑战者」，之所以参加集体行动是因为他们通过个人的努力无法改善自己的处境。第三，在「毫无退路」的情况下，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差异就会被忽略不计。尽管保守的群众组织也明确表达了他们的利益要求，但在多数情况下他们的行动都更被动，因为他们想要捍卫的是公共利益和现存的权力分配方式。甚至在造反派阵营的内部，因人们期望在实现本组织的目标之后从中得到的直接利益不同，所以他们对集体事业承担的义务也不同。从 1967 年夏开始，造反派中越来越多的普通成员认识到，在他们的派别中，充其量也只能有少数人能在实现本组织的目标之后从中得到好处。结果，许多人失去了热情并退出派别争斗，成为逍遥派。至于造反派的领袖和积极分子，那些诸如他们在将来能成为领导和有升迁的机会的极具吸引力的选择刺激促使他们为自己的将来精打细算。因而他们与持续不断的造反行动利害攸关。此外，由于他们以前牵扯了许多事情，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被紧紧地捆在了一些他们无法挣脱的社会组织上。就连那些对他们曾经为之献身的事业失去幻想的人也常常感到，退出派争舞台的代价太高，因而被迫留在派性斗争的行列里。

基层造反派与北京激进的领导人之间的关系 在许多社会运动中，社会精英和人民群众之间都是相互对立的关系，文化大革命与这些社会运动不同，它有其自身的特点：社会精英和人民群众之间已被作出了划分，而激进派和保守派的划分又进一步明确了社会精英卸人民群众之间的界限。但把基层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看成一听到上级的命令便立即采取行动的相似的社会团体，未免过于简单化了。以造反派为例，尽管造反的群众高喊激进中央领导提出的口号，但他们的目标则与那些倡导或发动他们的领导人的目标有着根本的差异。毛的基本目标是彻底改革上层建筑，把中国人民改造成成为「新人」，其首要目的是要消灭他的敌人；而他的激进的追随者们的目的则是打击他们自己的对手，提高他们在中央领导层中的地位。但绝大多数造反派之所以投入这场运动完全是为了改变他们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虽然他们都攻击现存的政治制度，但又都有各自不同的原因。再者，他们实际上所攻击的是现存政治制度的不同的部分，他们彼此想得到的东西在多数情况下也不完全相同。从某种意义上说，激进的中央领导人和基层的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是在为权力的再分配而战。但即使在这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目标也不一样：前者关注的是最高层权力的再分配，而后者关心的是地

方权力的再分配。中央的激进派关注地方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为了谋求来自下面的支持，从而向他们在中央领导层中的对手施加压力。同样，造反派对导致中央分裂的问题也并不真正感兴趣。这也正是在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林彪时群众兴趣不大的原因之一。

乔治斯利夫伯维尔在他著名的研究法国革命的专著中提出了「平行革命」的概念。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也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一种单一的运动，而是一系列平行运动。中央和地方激进派的得益是平行的，即在同一个方向延伸但永远也不会重合。

根据以上观点我们可以假定，真正的信徒之间也存在着根本不同的差异。有人会进一步提出问题：为什么那些真正的信徒的行为常常像理性的行动者，而那些崇拜同一个领袖的人则互相争斗，甚至自相残杀呢？下面几节将对这一表面上看来似乎难以解答的问题作出进一步的解释。

超凡魅力的领袖气质之剖析

偶像与他的崇拜者一个十分简单但经常被忽视的道理是：领袖的存在必须以群众的存在为前提。没有追随者的人，无论有多大能耐，也不能视为领袖。个人崇拜必有两极：偶像及其崇拜者。偶像本身并不能制造个人崇拜，只有当偶像受到他人顶礼膜拜时，才会产生个人崇拜现象。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在个人崇拜的两极中，崇拜者比偶像更为重要。如果我们承认，个人崇拜是由崇拜者与偶像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则仅仅研究偶像的特征很难说明个人崇拜这种现象。这样当然不是为了否认偶像的至关重要性，而是为了强调：忽略了崇拜者的作用及崇拜者与偶像的关系，就难窥个人崇拜之全豹了。

另一个同样十分简单但也经常被忽视的事实是：偶像是单一的，崇拜者却可能包含了千差万别的各色人等。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崇拜同一个偶像，虽然可以肯定他们的崇拜中有共同的成分，但也必定有不同的东西。据此，还可以推论：崇拜者的人数越多，他们在信仰和行为方面的差别就会越大。假定所有的崇拜者会以同等的热情、同样的方式拥戴同一偶像，实际上是在制造神话。

个人崇拜的两个向度：情感向度与认识向度 个人崇拜可以从两个向度进行观察和研究，即情感向度和认识向度。一方面，崇拜者对偶像充满了信赖、敬畏，甚至愿为之献身的情感；另一方面，他们又把偶像作为认知的对象，试图理解偶像发出的信息。个人崇拜的这两方面作用不同。就对崇拜者行为的影响而言，头一个方面决定了崇拜者与偶像的关系，后一个方面决定了崇拜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他们与外部世界

的关系。虽然，所有的崇拜者对共同的偶像有同一种依恋情感，但他们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会依其对偶像发出的信息理解不同而不同，并使其行为方式大相径庭。在极端情况下，他们之间甚至可能发生严重冲突。更重要的是，崇拜者对偶像的崇敬并不能保证他们准确地理解偶像的意图，因此，甚至崇拜者与偶像之间也会出现潜在的冲突。

偶像是一个信息载体 崇拜者理解偶像的过程就是他们在后者发出的信息中寻找与自己的生活相关的信息的过程。说得稍微过火一点，受人崇拜的偶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所传送的信息。偶像只是一个信息的载体。在另一方面，信息却不能自话自明，同一信息对不同的人意思大概很不相同。没有接受者的参与，信息毫无意义。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理解偶像就成了一种解释它所传达的信息的活动。

这里，有三点应引起注意。第一，在一定程度上，所有人对他人都是隐形的。张三的经验，李四没有；反过来，李四的经验又与张三不同。正是由于存在这种隐形性。产生了解释的必要，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靠解释来实现的。但是，崇拜者与偶像的沟通与一般人之间的清通有一个显著的差别。一般人之间的沟通一般可由面对面的方式，至少是一对一的方式来实现。这种情况下，双方可以互相询问，使对对方的理解不致出现太大的偏差。但在偶像与崇拜者的关系中，不可能是一对一的沟通。这样，崇拜者没有办法得知他们对偶像的理解是否准确。毛泽东是一个更特殊的例子。不像罗伯斯庇尔和希特勒，他很少在公众场合讲话。虽然在文革的头半年，他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一千一百万进京朝圣的红卫兵，此后，他便很少作公开露面。大概是为了使人觉得他：「神龙不露首尾」，即使偶尔出现一两次，也只是摆摆手、笑一笑，从不讲话。红卫兵曾多次要求他说几个字，聆听一下「伟大领袖」的声音，却都被周恩来挡了驾。对他钟爱的红卫兵小将，他也从无暇与之直接对话。只是到了一九六八年七月，局势乱得无法收拾，连神通广大的中央文革说话也没人听时，他才不得不亲自出面显「神威」，召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五大学生领袖」。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红卫兵面谈，谈话的结果是他决定解散红卫兵造反组织。由于毛泽东与他的崇拜者之间存在着这么大的距离，崇拜者们不可能请他澄清他的每一项指示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本人也不曾出面加以澄清，詹姆斯戴维斯有句话说得精彩：「熟友眼中无伟人。只有保持距离，才能使人敬畏。」但距离的存在增加了解释的必要。

第二，由于偶像传递的信息会在往后的事件中受到检验，很明显，这种信息越明确、越肯定，便越容易被证伪。反之，话说得堂而皇之，但模棱两可，让人不知所云。引起崇拜者怀疑的可能性则小得多。古往今来，这类例子太多了。所谓毛泽东的「最高最新指示」，都是些只言词组，而且往往不明不白。例如，毛泽东把文革看作一场「阶级斗争」，但他却没有给「阶级」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一九五八年，他指出，一个人的阶级属性可由他的政治态度来决定。这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大胆的修正。但他

从未在理论上发展他的论点。实际上，他对阶级的看法是十分混乱的，结果连很多中共高级领导人也不知如何运用他的阶级分析方法，更不要说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了。又如，「走资派」是官定的文革的打击对象，但什么是「走资派」，查遍有关文革的文献，竟找不到一个定义。一九六七年春，毛泽东在一个场合问包括林彪在内的中共高级领导人：「你们认为什么叫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果没有一个人回答。毛只好说出自己的看法：「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嘛！」但这只能叫同义反复，绝不是一个定义。「阶级」和「走资派」这两个概念可以说对文革至关重要，它们关系到谁是这场运动的动力，谁是这场运动的对象等大问题。这两个概念的不清因此引出了对它们的完全不同的解释。

第三，在「偶像——崇拜者」关系中，后者往往是修养不深的平头百姓。对于政治思想史学者来讲，如何系统地研究毛泽东思想是一码事，对一般百姓来讲，如何理解「伟大领袖」的指示是另一码事。思想史学者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可能比较接近原意，但对历史事件不会有什么影响；作为崇拜者的老百姓对毛泽东指示的理解也许十分肤浅，但他们据此而采取的行动可能使历史改观。因此，研究文革应注意下里巴人们看似肤浅的解释。

解释在只允许官方意识形态存在的环境下，显得尤其重要。如果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话，人们可以从众多的意识形态中选择对自己最具说服力的一种。但是，如果官方「罢黜百术，独尊一家」的话，唯一可钻的空隙就是对官方意识形态作出不同的解释。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或许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理解是一种建设性的活动。在理解过程中，人们希望发现信息的原意，但常常赋予信息以新意。一旦形成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就脱离原来的信息具有某种独立性，具有它自己的「生命」，并产生它自己对社会的影响。实际上，在「偶像——崇拜者」关系中，真正影响崇拜者行为的不是偶像发出信息的原意，而是他们自己赋予那些信息的新意。所以从作社会分析的目的出发，研究信息接受者的信息的解释比研究信息本身更为重要。

我们还可得出另一点结论：「偶像——崇拜者」关系或「领袖——群众」关系不是崇拜者或群众被动地接受偶像或领袖的信息的单向传递过程，而是能动的崇拜者或群众对偶像或领袖发出的信息不断作出自己的反应，并影响后者未来的信息形成的相互作用过程。这就解释了毛泽东为什么要根据变化的形势不断对自己的文革「战略部署」作出修改。

同一领袖在不同人心目中的形象不同 在不断解释领袖发出的信息的过程中，人们会逐渐形成对他的总体印象或形象。也许每个中国人脑子里毛泽东的形态都不一样，但正如托洛斯基所说：「即使个性总是独特的，也不意味着对它无法进行研究。个性中实际上融合了部落的、民族的、阶级的、世俗的、制度的因素。只有当这类因素存

在时，个性才能表现出来。」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对毛泽东的总体印象会受他所处的社会地位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每一个社会集团都有自己相对一致的对毛的总体印象，而且，不同的社会集团对毛的总体印象也会有所不同。

必须注意，一个客体的形象与客体本身不是一回事。当一群崇拜者自认为是在追随一个领袖时，他们实际上追随的是他们自己关于这个领袖的形象。本书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武汉基层群众的行为的研究表明，人们崇拜的不是毛泽东本人，而是他们自己心目中的毛泽东。而后者是他们揉进了自己的理想、期望、爱憎而塑造出来之形象，是他们自己的创造物。虽然，所有人可以引用毛泽东的同一条「语录」，呼喊同样的口号，他们所要表达的东西却往往很不一样，而且有可能是完全对立的。更重要的是，当现实中的毛泽东发出了与他们心中的毛泽东形象相矛盾的指示时，他们就会惶惑不安。如果这种矛盾不断出现，他们就会修改自己对毛泽东的总体印象，并据此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

有一个小故事很能说明问题。一九六七年夏天，毛泽东前往南方巡视。在回京的途中，他发现他所乘坐的专列上的乘务人员分为三个不同的派别。为了说服他们实现「革命大联合」，毛派随行的张春桥和杨成武召集三派开会，试图消除他们之间的矛盾。但乘务员们根本不买张、杨的帐，毛只好自己出面找三派的代表谈话，一说就是两个多小时。看在毛的面子上，三派终于答应设法联合。谁知一出毛的车厢，大家马上翻了脸，又吵得一塌糊涂。张春桥、杨成武为此大发雷霆，告诉不听话的乘务员们，毛解决一个省、市的问题，也很少费两个小时的口舌，现在却为他们花了两个多小时。在这种压力下，火车快到北京时，三派宣布他们「联合」起来了。可是以后从未未见有人宣传这个例子，大概车到北京后，这个「联合」又散了架。这个例子说明，人们心中的毛泽东与现实中的毛泽东不是一回事。毛出面找乘务员谈话以前，三派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忠于毛泽东的，是执行他的「革命路线」的；但当毛本人出现，并苦口婆心地劝他们联合时，大家都没有被说服。自认为忠于毛泽东的人都没有被毛泽东本人说服，这种矛盾现象为什么会出现呢？只有一个解释：人们心中的毛泽东比现实中的毛泽东更重要。把这个解释推而广之，我们可以说：对崇拜者来说，正是他们心中的偶像，而不是偶像本身，影响着他们的行为。

人们的社会地位及他们心中偶像的形成 达伦多夫曾指出：在每个社会组织中，总有些人或集团处在「治人」的位置，另一些人或集团处在「治于人」的位置。前者高高在上，发号施令，后者不得不俯首帖耳，瞧人家眼色办事。这样就形成了阶层、阶级。各阶层、阶级在享有财富、权力和威望等方面，地位是绝然不同的，同时对事情的看法也会不太一样。有既得利益者希望维护和巩固现存体制，处在社会底层的人则认为世道不公，要求改变现状，由此产生了社会冲突。

当不同社会集团的人崇拜同一个领袖时，他们之间利益的冲突并没有消失。在构

成自己心中的领袖形象时，他们会揉进各自的期望。这大概是一个潜意识过程。追随者自以为是领袖的「真诚的信徒」，实际上，他们只是自己心目中的领袖的「真诚的信徒」。在这个意义上，追随者之为追随者并不是出于对领袖盲目的崇拜，而是因为他们相信领袖能解决他们各自面临的问题，虽然，这个领袖其实不是那个外在的人物，而是他们心中的创造物。在意识的层面上，追随者是非理性的，但在潜意识的层面上，他们是相当理性的。说得更明白一点，在意识的层面上，他们固然显得很盲目，但在潜意识的层面上，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就显现出来了。

本书的研究表明，文革前的中国大陆虽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在精英分子与广大群众之间横着一条巨大的鸿沟」，但的确存在着韦伯所说的「受惠和受损阶层」。文革使长期掩盖着的各阶层间的潜在冲突一下子爆发了出来。我曾采访过的文革的参与者都承认，自己在文革前社会中之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文革中参加那一派。直至今日，前保守派仍认为造反派不外四种人：家庭出身不好的、犯过错误或受过处分的、调皮捣蛋的、有个人野心的。反过来，前造反派认为保守派大概是三种人：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一贯整人的、对上级逢迎拍马一心往上爬的和没有主见、唯上级是从的。很难想象这些文革前背景迥异、文革中互相敌视的人们能崇拜同一个毛泽东。

不同社会集团的人心中的领袖形象不同 既然个人心中的领袖形象里包含了他自己的期望，不同社会集团对同一领袖有不同的总体印象，因此也就顺理成章了。研究群众行为的乔治鲁德发现，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虽然下层革命群众支持国民议会里资产阶级政治集团提出的目标和思想，但前者最关心的是能否买到便宜的面包和其他日常生活必需品，而后者寻求的是自由贸易和财产权。同样的口号对不同的人含义不同，所以两个集团时有冲突。

正如前面各章所表明的，文革期间，在保守派看来，毛泽东是劳动人民的领袖，是现存体制的象征，但在造反派眼里，毛泽东是他们反抗现存体制的「红司令」。运动初期，与毛泽东的愿望相反，大多数人认为，还动的目的是打退「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进攻。从六六年四月到八月，报刊杂志充斥着批判这些「坏人」的文章。斗争的目标上挂吴晗、邓拓、廖沫沙，下联本地区、本单位对现状不满的人。很多普通的人仅仅因为他们是五类分子，或出身五类分子家庭，或发过几句牢骚，或穿着打扮不同于众，而被批判。不少人还被戴上「假左派、真右派」、「反党分子」、「猖狂分子」、「小三家村」等奇奇怪怪的「帽子」。因此，当八月份公布的《十六条》宣布：不准把斗争矛头对准普通工人、学生；十月五日中央紧急通知要求为所有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的人平反时，前一段被整的人觉得毛泽东真是他们的「大救星」，群众很快地分了派。连动初期的骨干分子成了保守派，他们的「牺牲品」成了造反派。两派都以为毛泽东站在自己一边。从六六年十月到六七年二月，造反派势力越来越大，保守派们对中央的指示左看右看仍不理解。但他们并不

怀疑毛泽东，而是认为有人欺骗毛泽东，才产生了有利于造反派的政策。因此，他们起来反对中央文革。一月夺权失败后，运动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一月底，在批阅谭震林的一个报告时，毛写道：如果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在文革中跳出来，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仔细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这使很多人想起《十六条》中说的：坏人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现在毛本人说要开始打击坏人了，这不是意味着文革要收尾了吗？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批准了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这个举动更使人相信，毛泽东要收拾前一段跳出来的「牛鬼蛇神」了。保守派兴高采烈，他们认为毛泽东只是玩了一个小小的花招，先「引蛇出洞」，然后「秋后算账」，跟一九五七年反右差不多。造反派的日子艰难起来，不少人被送进了监狱，不少造反组织被勒令解散。他们不明白，现在的毛泽东怎么与前几个月的毛泽东不太一样。六七年四月是另一个转折点，《人民日报》四月二日发表题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造反派一下又翻过身来。毛泽东又变得可亲可敬了，「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毛主席亲」成了一时流传的名句。三个月后的武汉七二〇事件使全国各地的保守组织纷纷瓦解，保守派的人们又陷入了苦恼：劳动人民的领袖怎样会抛弃广大劳动人民呢？直到一年半后，「清理阶级队伍」开始时，他们才「醒悟」过来：还是毛泽东站得高、看得远，他放手让各种各样人跳出来表演，然后扎紧口袋，把坏人清理出去。毛泽东仍是劳动人民的领袖。

以上的例子说明，各人心中的领袖形象是依自己的期望塑造的。他们顶礼膜拜的实际上是以异化形式出现的自己。

心中的领袖形象不同导致了不同的行为方式各人心中的领袖形象不同必然导致不同的行为方式。上面曾提到，毛泽东认为文革是一场阶级斗争，但谁将成为打击的对象却不清楚。保守派相信，毛泽东发动文革不是为了彻底打垮文革前的体制，而是为了做局部的改善。因此，绝大多数当权派是好的或较好的，不应打倒，应打倒的只是极少数。而在他们看来，极少数人之为走资派，要么是被「牛鬼蛇神」腐蚀了，要么本身就是钻进革命队伍的「牛鬼蛇神」。所以，总的说来，「牛鬼蛇神」应是运动打击的主要目标。但是，造反派不这么看。对他们来说，文革就是要彻底改造现在的体制。他们的口号是「十七年历次运动要重新评债」、「打倒形形色色的衙门，打倒一切官老爷」、「凡是「长」字号的干部一律靠边站」。

对文革的目的理解不同，所以各派的策略也不同。保守派倾向于依靠现存的组织结构和通讯渠道。一开始，他们依靠本地的党组织和政府。当这些机构瘫痪后，他们转向军队。只有通过这「名正言顺」的渠道传递的消息，他们才相信。造反派则与现存机构为敌。对地方党政机关、军队说的话根本不信，为此，他们建立了各种各样的通讯渠道与北京和其它地方联系。

虽然两派崇拜同一个领袖，使用同样的口号，他们彼此却很难沟通。处于敌对状

况中，他们都不信任对方，怀疑对方。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偶然事件，也会被解释为对方有意吃掉自己的大计划的一部分。为了防备对方的进攻，两方都积极作舆论和物资上的准备。然后，终有一天，文斗变成了武斗，武斗逐步升级，从拳头到棍棒，到铁矛，到枪械，最后在有些地方发展到动用大炮、坦克。在六七年夏天和六八年夏天，武斗是如此广泛、激烈，以致毛泽东也承认文革已变成一场内战。这一切当然都大出毛泽东所料。真有讽刺意义的是，厮杀的各方都是他「信徒」，都声称在为捍卫毛的「革命路线」奋战。

文革这个例子说明，不论一位领袖人物多么「伟大」，他所领导的连动并不总是朝着他拟定的方向发展。有些时候，他不仅领导不了运动厂反会被运动推得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

应该强调的是，文革的大多数参与者，不论是保守派也好，还是造反派也好，都真诚地相信自己是毛泽东的信徒他们不认为自己是打着毛的旗号谋求私利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在潜意识的层面上，他们确在为自己的利益奋斗。通过把期望揉进自己塑造的毛的形象，他们觉得自己是在为一个崇高的事业、为一个代表人民群众的领袖献身。在崇尚公益、卑薄私利的中国，这种信念释他们可以不为罪恶感所羁，而放心大胆地与自己的敌手作殊死之斗争。这大概也是文革为什么那么残酷的原因之一。

「毛的形象」这一概念的重要意义 在我看来，「毛泽东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是理解文革的一个重要概念。一方面，这种形象把亿万群众与毛泽东联在一起；另一方面，它的形成是由一个文革前的经历决定的，并反过来会决定他在文革中的表现。运用这个概念有几点长处。因为群众心目中的毛泽东不同于现实中的毛泽东，我们可以更准确地描述毛泽东与群众的相互关系。因为所有文革参与者都自称是毛泽东的「真诚的信徒」，而实际上各人心中有各人的毛泽东，我们可以更准确地描述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因为「毛泽东的形象」是联结文革前的经验与文革中的表现的中介变量，我们可以把对文革前社会的分析与对文革本身的研究结合起来。毛的形象这一概念为我们用一种逻辑紧凑的方法把以上所有各方面结合起来提供了有用的手段。

超凡魅力的消失

至此，我们才可以解释「文化大革命」最不可思议的一面：为什么毛虽然具有超凡的魅力，却对这场运动失去了控制？

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他当然想完全控制这场运动的方向。个人崇拜对他来说似乎是动员民众的一个有效工具。但不久之后，这位主席便对这场大规模的运动感到震惊，在后来的十年间，他常常被他释放出的这股激流卷回去，并感到无力控制这

场运动。为什么呢？首要的是因为他制造了一种他无法有效地行使领导权的局势。

归根结底，领导具有两个作用：指导和发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成功地，也许可以说是太成功地发动了广大群众，但他却没能成功地指导这场运动。对于一个领袖来说，眼看着由他发动起来的追随者们走向另一个方向，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要指导一场运动，这场运动的领导者就要确定运动的目标，要制订一个实现这个目标的行动纲领，并使这个纲领付诸行动，以发挥它的作用，同时还要监督它的实施以保证预定的行为得到正确的贯彻实施，当人们的行为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时要对之加以纠正。然而，毛的领导却没有达到其中的任何一项要求。

不一致的目标 与权力不同，领导意味着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目标之间有某种一致性，而权力则并不要求目标的一致性，它是完全独立的。然而，毛及其同僚的目标与广大群众的目标则完全不同。尽管在感情上人民群众是忠于毛的。但作为「策略上的理性的行动者」，他们又有自己所追求的目标。因此，利益方面的分歧便是理解毛的领导在这场运动中失败的出发点。

不适当的纲领 由于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社会中社会政治冲突的早产儿（领导集团内部的斗争加速了它的分娩），因而不但群众没有一个明确的、成熟的、或先进的指导社会变革的政治纲领，就连毛本人在发动这场运动的时候也没有制订出一个计划。毛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对新生的「资产阶级」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阶级斗争」，但他却没有提出相应的关于这种对抗的制度基础的理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各种紧张关系都被说成是由「官僚主义」造成的。而「官僚主义」主要是被当作行为和态度问题，而不是被当作制度问题。要反对官僚主义，在毛看来就必须要进行「思想改造」和「夺权」。历史早已经证明，思想问题的解决和个人改造的完成都不能消除官僚主义，它们至多也只能是缓和这个问题。但毛当时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他面临的是制度问题，而制度问题则要求用制度改造的方式来解决。

由于没有一整套相应的和系统的理论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因而当发觉在这整个十年间，「毛常常是在一种特定的意义上作出决定，以应付不断出现的各种特殊问题，而不是根据事先规划好的蓝图行事」时，也就不足为怪了。

畸形的传播媒介 如果有一套等级组织把毛的指示向他的追随者们作出权威性的解释，并把这些指示转化成具体的决定，加以实施，那毛或许就能够发动一场统一的行动。在「文化大革命」的极盛时期，全中国的领导机构都处于瘫痪状态。为了控制这场运动，毛不得不主要依靠对政治符号的运用。但事实证明，这是在失去沟通和实施机制支持的情况下而不得不采取的协调这场运动的一个下策。

沟通主要是为了阐明一场运动的目的，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沟通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能动的和相互作用的过程，它包括信息的上码、传递和解码三个步骤。首先，必须保证信息准确无误，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因为如果信息不全面、不准确，它就

不能为人们所接受。然后，经过上码的信息被传递出去。这里的问题是，是否具有有效的传播渠道。最后收到信息的人，还得对它进行译码。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沟通方式十分混乱。首先，个人崇拜的盛行使教条主义的陈词滥调充斥于世。尽管在这些革命词句的背后所掩盖着的是对资源分配的日益激烈的竞争，但参加者们则极少公开表露他们的真正动机，因而传播出的信息往往是不准确的。此外，毛的指示通常都是只言词组，它们含糊且前后矛盾，这就为灵活的解释留下了很大的余地。

第二，纵横交错的信息传播渠道是畸形的。由于中国政体「蜂窝状」的格局，所以横向的沟通在文革前的中国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在「文化大革命」的极盛时期，全市范围的群众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单位之间的封闭状态，但派别活动却又阻碍了相互对立的团体之间的交流。1969年以后，随着权力机构「蜂窝状」格局的恢复，横向间的交流再一次降至最低限度。至于纵向的沟通，「看门人」的重要作用尤其引人注目。在像「文化大革命」这样大规模运动当中，最高领袖和广大群众之间的信息交流很少是直接进行的。这就需要各级领导人来充当最高领袖和普通参加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媒体，用库尔特列文的话说，这种处于中介地位的领导就叫「看门人」。

「看门人」的主要职责是传递最高领袖发布的信息。然而，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两年间，「看门人」大都被撤消了。在这种情况下，传播渠道增一多了。报刊、广播，及所谓「领导讲话」取代了通过组织逐级上传下达的沟通渠道。此外，群众组织的小报，全国范围的小道消息网络和遍布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联络站并驾齐驱，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和颇具吸引力的传播系统。信息传播机会的增多减少了某一个领袖或几个领袖根据他或他们的愿望垄断沟通媒介的可能性。后来，虽然地方当局的权力得到了恢复，但它并没有机械地传达北京的指示。相反，它常常是有选择地对中央发出的那些模棱两可的信息作出反应。

对毛的指示加以解码更复杂也更有兴趣。以上关于「毛的形象」的讨论发现，人们解释毛的指示并不真正关心其「本来的」或「真正的」含义。他们对毛指示的解释实际上是他们个人背景、愿望和需求的产物。据此，当看到在「文化大革命」参加者们对毛的话作出许多不同的解释时，也就不会感到意外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都利用官方意识形态的含糊性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一旦中央的精神被引用和解释，广大群众就开始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解去行事，由此就产生了反作用。这些信息再反馈回北京，这是一个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过程。这也就是说在毛的中央试图指导群众的同时，它也不得不对群众的动向作出反应。群众并不是消极的工具，相反，群众在这场运动的每一个阶段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靠不住的执行机构 毛及其同僚指导和控制这场运动的能力由于他们缺乏可靠的

执行机构而受到进一步的削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曾多次表明，他们不需要以任何正当的程序作幌子便能废除地方权力机构。但在这整个十年间，他们从没有获得省级和省级以下机构的通力支持，这使他们成了光杆司令。由于除了进行思想倾向的批判之外没有任何加强团结的手段，他们发现他们自己根本无法指导运动沿着他们预定的方向前进。为了达到激进的目标，他们不得不依靠自发的动员，在这种情况下，势必会造成一定的危害。然而，即使是为了恢复最低限度的法律和秩序，他们也不得不依靠地方当局。一般说来，地方当局都痛恨激进政策和地方造反派，希望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权力关系。这两种倾向都不是毛的中央愿意看到的，但它又找不到一条摆脱这两个极端的途径。这也正是毛的中央时常从「左」到「右」摇摆的原因。

「超凡魅力」之批判 长期以来，毛一直被看成是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由于他能够唤起和保持人们对他个人的忠诚和献身精神，他也许被认为具有超凡魅力的品质。但本书的研究表明，起码就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来说，追随者对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的忠诚和献身精神并不是完全彻底的。与马克思韦伯的假设相反，从策略上讲，广大群众并不是无理性的，而且他们还对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起着制约作用。看来韦伯关于具有超凡魅力领袖的理论大有问题。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对领袖人物超凡魅力的论述实际上一直是纯理论的论述，像「盲目信仰」这样的概念——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在他的追随者身上所焕发出来的一种信念——很少受到经验的检验。然而，大量的事实证明，运动的领袖，无论他们是否具有超凡的魅力，总是处于失去对他们已经焕发起来的力量的控制和看到他们的思想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这样的危险之中。有时，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甚至不得不见风使舵或者使他们的政策迎合他们的追随者的愿望。这恰恰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在毛身上的一切。

无意的愿望的合理化 不过，现在大多数中国人同我的绝大多数采访对象一样，仍然坚持认为他们是受了毛的愚弄才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并表示他们参加这场运动是为了毛，而不是他们自己。对这种说法必须加以否定。我并不是说这些人是在撒谎。他们是真诚地作出这番解释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一般说来，社会冲突极少直接表现为物质利益的冲突。利益之争往往披上道德之争的外衣，诸如谁对谁错、什么合理什么不合理，正义在那一方等。稍稍研究一下古今中外的社会冲突更就会发现，为了说服别人也为了说服自己，冲突两方总会尽量为自己的目标、纲领和行为寻找一个说得过去的道德基础。这时，如果有一种学说能够用来表达自己的愿望，他们就会拿过来作武器；如果有人能起象征作用，赋予正在进行的斗争一种意义，他们就会拥戴这个个人当领袖。

文革开始时，毛泽东早已奠定了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毛泽东思想已被奉为一切行为的指南。这样，冲突的各派别无选择，为了证明自己一方是正义的，他们必须把自己的组织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联在一起。当然，他们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反对毛

泽东就没有活路，必须把自己伪装成毛的拥护者，就绝大多数人而言，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相信毛泽东代表着正义，毛泽东在自己一边。可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在潜意识里，在实际行动中，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

潜意识的发现是弗洛伊德的一大贡献。他指出：人们真正想要的往往不出现在意识中，出现在意识中的往往不是人们真正想要的。尤其是当人们的愿望与大众接受的道德观念冲突时，情况更是如此。这时，人们就会把这种不那么「高尚」的愿望合理化，使之看上去名正言顺。

在文革的环境下，公开追求私利是说不过去的，因此，人们就会有意无意地把自己意愿和行为全理化为对崇高目标的追求，如「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捍卫红色江山」等。合理化不仅是为了向他人表白，也是为了求得自己心理平衡。合理化使人们自己也以为是在为崇高的目标奋斗。这就是发生在多数文革参与者身上的情况。如果有人告诉他们，在听起来堂而皇之的声明背后，他们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实际上着眼的是自己的利益，他们会觉得十分冤枉。还是「受了蒙蔽」的说法更能使人接受。

又一次「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失败了。它的失败不仅仅在于毛的远大抱负没能得以实现，以及自他去世以来，他忠诚的追随者一直被关在监狱。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民都一致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灾难。每一个人，不论是干部、前保守派、前造反派，还是旁观者，如今都声称他或她是这场持久性运动的受害者。的确，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没有任何赢家的游戏。在这十年当中，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在某一个时期，或在某些方面遭受了这样或那样的摧残。所以，人民都感到他们被欺骗了，并真诚欢迎邓小平政权所倡导的改革。

自「四人帮」被捕以来，尤其是 1978 年末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新的领导层在寻求一个新的发展战略的同时，也废弃了许多毛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纲领。革命结束了，革命的冲动也已经消失。「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现代化」是当前的主要任务。市场正逐步吞蚀传统的由国家计划控制的领域。经济的快速发展甚至改变了人们的道德观念。「斗私，为公」已一去不复返了。代之而起的是新政权强有力的呼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和 1978 年以来的这段时期的鲜明对比所形成的悬殊差别，使许多人认识到，理查德德，洛文萨尔是对的，即「现代化战胜乌托邦主义」的确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正如维尼舒指出的，尽管在邓的领导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如果「我们把眼

光从火热的表面现象转向深层次的研究，……就不仅会发现变化了的方面，也会发现没变的方面」。「邓与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国民党人以及晚清的前辈们的最明显的共同之处是，他们都决心使国家强盛起来」。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今天的改革者们坚信，毛的妄动意味着背叛了他公开宣称的目的，而他们现在则找到了一条更为可靠的富国强兵的快捷方式。

然而，一直困扰中国数十年的平均主义的理想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基本矛盾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在中央，尽管一直都有一个共同认识，即经济改革是必要的，但高层领袖之间在诸如「中国应沿着市场经济的方向走多远？」「容许有多程度的不平等？」等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分歧。新的道路并不是笔直的，而且已经出现了曲折。

在整个社会当中，后毛的时代已经出现了二十多年前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就开始形成的一种趋势，即政治精英和职能精英正在走向联合。邓的政权认识到，要想以最快的速度发展经济，就必须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达成妥协」。如果说以前毛的政权试图强行控制和使用职能精英的话，那么，如今新政权则试图把科学、经济、工程、教育、文化等专业精英吸收到党的领导层中，并「同化」党外一切潜在的领导力量。1978年以来，阶级划分已被取消，数百万知识分子被吸收入党，他们当中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安排到各级重要的领导岗位。职能精英和政治精英之间的差别正在逐渐消失。我并不否认这两个集团之间还存在着冲突，有时甚至是重大的冲突。这两种精英集团要达到完全的溶合也许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不过，我坚信，这些冲突正在逐步缓和，而居于次要地位的全体精英和全体群众之间的冲突则正在逐步加剧。

的确，在后毛的社会中另一个重大的发展是，在组织社会生产时，精神鼓励已让位于物质刺激，因而，「积极分子」和「落后分子」之间的区别已不再有任何意义。其结果是，群众将更加团结一致地与联合起来的精英相对抗。

中国还会再发生一次「文化大革命」吗？本书的研究表明，也许会，也许不会。假如中国社会主义的矛盾一直得不到解决，而且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也未必会得到解决，那么由这种固有的矛盾所引起的社会冲突似乎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由于以前曾将精英和群众之间的矛盾模糊化的诸种因素已大体消失，再一次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狂暴的和毁灭性的社会冲突也不是不可能的，尽管冲突的实质会有所不同。最高领导层中也可能再一次爆发尖锐的政策冲突或权力斗争。不过，「文化大革命」的痛苦经验教训可能会使统治精英中的派别不愿采用毛的造成惨重损失的战略在反对他们在中央的对手的斗争中，为了得到群众的支持而放松对社会的控制，甚至摧毁所有现存的社会控制机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发生另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危险性，我们可以说除非精英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恶化到非要爆发的极点，否则，是不会发生大规模的群众暴乱的。

不管中国的前途如何，就现在来说，我们最好发出另一次大灾难的警报。

后记

本书是我的博士论文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的中文缩写本。论文原有三十章，近千页。为了缩小篇幅，中文本砍去了分析文革前中国社会状况的头六章，并对以后各章有所删节。更重要的是，它删去了原著中的所有注释。如果这些万不得已的做法给读者带来不便，我愿在此致歉。牛津大学出版社不久将推出本书的英文版。虽然武汉文革仍是英文版的主线，但其理论色彩稍强一些，且其分析框架也与中文版大不一样。那些希望将对文革的认识上升到理论高度的读者也许会发现英文版更有趣一些。

从开始准备材料写作此书到现在八年已经过去了。在此过程中，我的研究工作得到了许多师友的启发和帮助。首先，我想感谢我在康奈尔大学政治系修博士学位时的三位导师：Vivienne Shue，Martin Bernal 和 Benjamin Ginsberg。他们对我十分信任，从不将观点强加于我；同时又绝不马虎，对那怕是细微的差错也不肯放过。这种既自由又认真的学术态度，是学生能从老师那儿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在康奈尔大学求学年间，我的学习和研究还受到其他一些师长的关怀。我希望对 Theodore J.Lowi，Sherman Cochran 和 Victor Nee 几位教授表示深深的谢意。

到耶鲁大学政治系任教以后，曾就论文的修改及其有关问题向一些同事求教。他们的批评使我受益匪浅。这些同事包括 David Apter，Yitzak Brudny，Daborah Davis，William Fortz，David Mayhaw，Bruce Russett，James Scott，Lan Shapiro 和 Helen Siu。

需要特别感谢的是八十五位接受我采访的文革亲历者。他们牺牲了自己宝贵的时间，抽出晚上和周末来与我谈他们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种种经历。一次谈不完，再谈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没有他们的通力合作，仅靠我自己的记忆和查阅文字材料是不可能对武汉文革的历程有什么深刻了解的。由于曾保证过不公布他们的姓名，我不能在此公开对他们一一致谢。但我会永远将他们的姓名记在心里。

在武汉进行调查时，我曾花了几个月时间在武汉市档案馆、武汉市图书馆，和湖北省图书馆查阅有关档案和文革小报。上述三个单位工作人员的认真负责和耐心细致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再度与他们合作。

最后，我要感谢将我抚养成人的父亲王茂珠，母亲董厚玉。他们在农村长大，进城后才上了几年业余中学。但他们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从小对我严格要求，并尽量为我的学习创造一个较好的环境，使我得以成为家中第一个大学生、第一个博士。我也要感谢妻子赵利群。她最能体会写作此书的甘苦，因为我那上千页的博士论文全是由她利用休息时间一页一页打印出来的。我还要感谢我的女儿王晓曦。她八岁以前是在

姥姥、姥爷哺养下长大的，直到我完成了论文，才得以与父母团聚。我为此欠她八年的父爱。

王绍光

于美国新港 1993.10.27